

潜夫论

[东汉] 王 符 著
王 珍 译

目 录

前言	(297)	断讼第十九	(348)
潜夫论第一卷	(299)	衰制第二十	(351)
赞学第一	(299)	劝将第二十一	(352)
务本第二	(302)	救边第二十二	(355)
遏利第三	(304)	边议第二十三	(357)
论荣第四	(306)	实边第二十四	(359)
贤难第五	(308)	潜夫论第六卷	(362)
潜夫论第二卷	(312)	卜列第二十五	(362)
明暗第六	(312)	巫列第二十六	(364)
考绩第七	(314)	相列第二十七	(366)
思贤第八	(316)	潜夫论第七卷	(368)
本政第九	(318)	梦列第二十八	(368)
潜叹第十	(320)	释难第二十九	(370)
潜夫论第三卷	(324)	潜夫论第八卷	(374)
忠贵第十一	(324)	交际第三十	(374)
浮侈第十二	(326)	明忠第三十一	(379)
慎微第十三	(330)	本训第三十二	(381)
实贡第十四	(332)	德化第三十三	(383)
潜夫论第四卷	(335)	五德志第三十四	(385)
班禄第十五	(335)	潜夫论第九卷	(391)
述赦第十六	(337)	志氏姓第三十五	(391)
三式第十七	(342)	潜夫论第十卷	(402)
爱日第十八	(345)	叙录第三十六	(402)
潜夫论第五卷	(348)		

前言

王符，字节信，安定临泾（今甘肃镇原县）人。其生卒年月不可详考。大约生于东汉和帝、安帝之际，卒于桓帝、灵帝之际。少好学，有志操，与马融、窦章、张衡、崔瑗等人相友善。其活动在黄巾起义之前。当时东汉社会矛盾日趋尖锐和严重，朝政更加腐败黑暗，统治阶级的贪婪和残暴，再加上连年的自然灾害，使社会更加动荡不安、民不聊生。王符性情耿介，不苟同于世俗，于是终身不仕，隐居著书三十余篇，以抨击时政之得失，取名为《潜夫论》。

其所著《潜夫论》共三十六篇，多数是讨论治国安民之术的政论文章，少数也涉及哲学问题。他对东汉后期政治社会提出广泛尖锐的批判，涉及政治、经济、社会风俗各个方面，指出其本末倒置、名实相违的黑暗情形，认为这些皆出于“衰世之务”，并引经据典，用历史教训警告当时的统治者。把社会的黑暗动乱的根源归之于统治者的昏暗不明，把治理乱世的希望寄托在明君和贤臣身上。他希望明君能任贤使能，忠信纳谏，天下就能太平。他建议采取考功、明选等办法，来改革吏治，反映了当时庶族地主强烈参政要求。他的政论文中有同情人民重视人民的思想，他强调“国以民为基，贵以贱为本。”这是对先秦时期“民本”思想的继承和发扬。在经济政策上，他要求重本抑末，重视发展农业生产，爱惜民力，重视对边远地区的防御和建设。他反对谗纬迷信，大量揭露官吏豪强奢侈浪费和迫害人民的罪行。

王符的自然观是二元论的，他的思想徘徊于唯物和唯心之间，但他更倾向于唯物主义。

《潜夫论》一书年代久远，历经沧桑，文字生涩，脱误遗漏之处尚多，注释家各执一辞，有的含义至今不明，因此翻译起来尚感困难，而注释家所未解决的问题，只好暂且缺如，或稍加翻译，或直书其文，因此致使有些段落字句不相连贯，或者辞不达意，或者揣测有失误之处，再加译者学识浅簿，翻译谬误之处在所难免，务请读者多加指正。

潜夫论第一卷

赞学第一

天地之所贵者人也，圣人之所尚者义也，德义之所成者智也，明智之所求者学问也。虽有至圣，不生而知；虽有至材，不生而能。故志曰：黄帝师风后，颡顓师老彭，帝尝师祝融，尧师务成，舜师纪后，禹师墨如，汤师伊尹，文、武师姜尚，周公师庶秀，孔子师老聃。若此言之而信，则人不可以不就师矣。夫此十一君者，皆上圣也，犹待学问，其智乃博，其德乃硕，而况于凡人乎？

是故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士欲宣其义，必先读其书。《易》曰：“君子以多志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是以人之有学也，犹物之有治也。故夏后之璜，楚和之璧，虽有玉璞卞和之资，不琢不错，不离砾石。夫瑚簋之器，朝祭之服，其始也，乃山野之木，蚕茧之丝耳。使巧倕加绳墨而制之以斤斧，女工加五色而制之以机杼，则皆成宗庙之器，黼黻之章，可羞于鬼神，可御于王公。而况君子敦贞之质，察敏三才，摄之以良朋，教之以明师，文之以《礼》、《乐》，导之以《诗》、《书》，赞之以《周易》，明之以《春秋》，其不有济乎？

《诗》云：“题彼鹄鹄，载飞载鸣。我日斯迈，而月斯征。夙兴夜寐，无忝尔所生。”是以君子终日乾乾进德修业者，非直为博己而已也，盖乃思述祖考之令问，而以显父母也。

孔子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耕也，馁在其中；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箕子陈六极《国风》歌《北门》，故所谓不忧贫也。岂好贫而弗之忧邪？盖志有所专，

昭其重也。是故君子之求丰厚也，非为嘉饌、美服、淫乐、声色也，乃将以底其道，而迈其德也。

夫道成于学而藏于书，学进于振而废于穷。是故董仲舒终身不问家事，景君明经年不出户庭，得锐精其学而显昭其业者，家富也，富佚若彼，而能勤精若此者，材子也。倪宽卖力于都巷，匡衡自鬻于保徒者，身贫也，贫阨若彼，而能进学若此者，秀士也。当世学士恒以万计，而究涂者无数十焉，其故何也？其富者则以贿玷精，贫者则以乏易计，或以丧乱期其年岁，此其所以逮初丧功而及其童蒙者也。是故无董、景之才，倪、匡之志，而欲强捐家出身旷日师门者，必无几矣。夫此四子者，耳目聪明，忠信廉勇，未必无侔也，而及其成名立绩，德音令问不已，而有所以然，夫何故哉？徒以其能自托于先圣之典经，结心于夫子之遗训也。

是故造父疾趋，百步而废，自托乘舆，坐致千里，水师泛轴，解维则溺，自托舟楫，坐济江河。是故君子者，性非绝世，善自托于物也。人之情性，未能相百，而其明智有相万也。此非其真性之材也。必有假以致之也。君子之性，未必尽照，及学也，聪明无蔽，心智无滞，前纪帝王，顾定百世。此则道之明也，而君子能假之以自彰尔。

夫是故道之于心也，犹火之于人目也。中阱深室，幽黑无见，及设盛烛，则百物彰矣。此则火之耀也，非目之光也，而目假之，则为己明矣。天地之道，神明之为，不可见也。学问圣典，心思道术，则皆来睹

矣。此则道之材也,非心之明也,而人假之,则为己知矣。

是故索物于夜室者,莫良于火;索道于当世者,莫良于典。典者,经也。先圣之所制,先圣得道之精者以行其身,欲贤人自勉以入于道。故圣人之制经以遗后贤也,譬犹巧倕之为规矩准绳以遗后工也。

昔倕之巧,目茂圆方,心定平直,又造规矩绳墨以诲后人。试使奚仲、公班之徒,释此四度,而效倕自制,必不能也;凡工妄匠,□规秉矩,错准引绳,则巧同于倕也。是故倕以其心来制规矩,后工以规矩往合倕心也,故度之工,几于倕矣。

先圣之智,心达神明,性直道德,又造经典以遗后人。试使贤人君子,释于学问,抱质而行,必弗具也;及使从师就学,按经而行,聪达之明,德义之理,亦庶矣。是故圣人以其心来造经典,后人以经典往合圣心也,故修经之贤,德近于圣矣。

《诗》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日就月将,学有缉熙于光明。”是故凡欲显勋绩扬光烈者,莫良于学矣。

【译文】

天地所最珍贵的是人,圣人所最崇尚的是德义,德义能使人变成明智,明智的人所崇求的是学问。世上虽有道德最高尚的人,没生下来就很聪明,世上虽有极有才能的人,未生下来就极有智慧。所以古书上说,黄帝以师礼相待风后,颡顼以师礼相待老彭,帝喾以师礼相待祝融,帝尧以师礼相待务成子,虞舜以师礼相待纪后,夏禹以师礼相待墨如,商汤以师礼相伊尹,周文王、周武王以师礼相待姜尚,周公姬旦以师礼相待庶秀,孔子以师礼相待老聃。如此说来就信而无误,那么人就不可以没有老师了。那这十一位君主,都是道德最高尚的人了,他们还有待于学习、问难,他们的智慧博大精深,他们的仁德硕然庞大,而何况于一般平凡的人呢?

所以工匠要想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必须首先磨利自己的器具;有志之士要想宣传其道义,必须首先读他的书。《易》说:“君子从而广泛地了解古人的嘉言善行,来培养自己的德行。”所以人有了学问,就像工匠能治器物一样。因此夏后氏之璜,楚人和氏之璧,虽然有卞和玉璞的质朴,如果不加入凿磨,也脱离不了砾石。像瑚簋这样的礼器,朝祭时的服饰,当它开始时,也不过是山野中的树木、蚕茧中的丝罢了。因为有巧倕施以绳墨用斧斤加以裁制,令女工施以五色而用机杼织成,才使其都成为宗庙中的礼器,只有礼服上绣有花纹,才可以进献鬼神,才可以奉献给王公。而更何况于君子有敦厚忠贞的朴质,敏察的才能,辅佐以良朋好友,用明师教授他们,再用礼乐来成就他的文采,用《诗》、《书》加以劝导,赞助以《周易》,明教以《春秋》,君子不就成功了吗?

《诗经》说:“请你看看那鹄鵒,一面飞来一面鸣。我是天天在迈进,你是岁月往前行。早起晚睡要勤劳,切勿辱及父母亲。”因此君子终日忧愁是要使德操和事业有所进步,不但是为了使自己才智博大精深而已,推究其本意就是思虑遵循祖宗美好的名声,扬名于后世,以光宗耀祖。

孔子说:“我曾经整天不吃东西,整夜不睡觉,去想,没有益处,不如去学习。”“耕田,也常常饿着肚子;学习,常常得到俸禄。君子只着急得不到道,而不着急得不到财。”箕子对周武王陈述六种极不幸的事《国风》有歌颂《北门》之诗,这就是所谓不忧愁贫呀。怎能有好贪而不忧愁的呢?推原本意是志向专心,明其崇尚。所以君子所索求的丰厚东西,不是美味佳肴、华丽的服饰、淫逸的音乐、声色,是打算致力于他的仁道,而执行他的德操。

原则成功于学习而藏于经典之中,学有所成在于发奋自励,学业荒废在于惰弛自弃。所以董仲舒终身不问家事,京房历年不出庭院,才得以精专其学而显达昭著。

其学业的,因为他们家中富有,像他们家中富有安逸,而能勤奋精专如此的人,才是才子呀。倪宽出卖劳力于都巷之中,匡衡自卖于人家当酒保,是因家庭贫穷的缘故,像他们那样贫困如此,而能如此奋学习的人,是优秀的士人呀。当今的学士,经常数以万计,而没有半途而废的,也不过数十人,这是什么缘故呢?其富贵之家则以财物玷污他的学业精专,贫困之家则以穷乏改变其计划,或因丧乱耽搁其年岁,这就使无知的幼童违背他要学习的初衷呀。所以没有董仲舒、京房那样的才能,也没有倪宽、匡衡那样的志向,而想勉强舍弃家室旷日持久地投身于师门,必然寥寥无几。像董仲舒、京房、倪宽、匡衡这四个人,耳聪目明,忠信廉勇,未必没有同伴,当他们成名立功之时,美好的声誉就会被赞扬不已,而造成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呢?只是将自己的才能寄托于先圣的经典,把心思都凝聚在孔子的遗训上了。

所以让造父疾走,行走百步便停止了,如果让他托身于乘舆之上,坐着车子就可远达千里;如果让水手浮着在车轴上,解开绳子便溺水而死了,如果让他托身于舟楫,坐在船上便可渡过江河。所以做为君子的人,性情并非隔绝人事,是善于托身在事业上。人的天赋,不能有一百个相同的,而他的明智之举则可以达到成千上万,这不是他们的本身所固有的才能,必定是借助于学问才能达到的。君子的性情,未必都能通晓一切,当他们学习之后,就会聪明而不会被蒙蔽,智慧就不会停滞不前,前代帝王,能安定百代,这是他运用法则的英明,而君子可以借助于此以彰明自己。

所以法则在人们心中,就像火在人们眼中一样。在陷井深室之中,黑暗而看不见东西,当设置点燃腊烛之后,而各种东西

都可以看见了。这是火的照耀,这不是眼睛发出的光,用眼睛借助于火光,则为自己照明。天地的法则,神明掌握着它,是看不到的。运用学问经典,心思方法,就都可以看得到了。这就是原则的用处,而不是心中本来就明亮,而是借助于原则,就成为自己的智慧了。

所以索求东西于夜室的人,无不善于用火去照明,索求原则于当代,无不善于运用典籍。典籍,就是常用的原则。是前代圣人制订的,前代圣人得到的原则越精深,就越能运用于自身,要让贤人自己勉励自己,以达到运用原则的地步。所以圣人制定经典来留传给后来的贤人,就像巧倕制定规矩准绳以传给后代的工匠一样。

过去倕的精巧,用眼睛测量方圆,用心思测定平直,又制出规矩绳墨用来教诲后人。假使奚仲、公孙班这样的人,离开规矩绳墨这四种度量器具,而仿效倕自己制作,必定不能成功;平凡的工匠,手执规矩,设置准绳,他的精巧就可与倕相同了。所以倕用他的心思来制定规矩,后来的工匠用规矩往往能符合倕的心意,所以度量对工匠来说,精巧就可以达到倕的境界了。

前代圣人的智慧,心思通达神明,性情耿直而遵循规律,又制造了经典以传给后人。假如使贤人君子,脱离了学问,仅怀着质朴之心而去行动,必然不能完备;当贤人君子从师就学,案照经典而行事,就会聪敏而明达,德义就会得到理顺,这样学问也就丰富了。所以圣人用其心思制定经典,后人用经典去迎合圣人的心思,所以修明经学的贤人,他的仁德就接近于圣人了。

《诗经》说:“德如高山人敬仰,行如大道人遵循。”“日久月长渐积累,积累学习到光明。”所以凡是想显扬功勋和业绩的人,没有不善于学习的。

务本第二

凡为治之大体,莫善于抑末而务本,莫不善于离本而饰末。夫为国者以富民为本,以正学为□。民富乃可教,学正乃得义,民贫则背善,学淫则诈伪,入学则不乱,得义则忠孝。故明君之法,务此二者,以为成太平之基,致休征之祥。

夫富民者,以农桑为本,以游业为末:百工者,以致用为本,以巧饰为末;商贾者,以通货为本,以鬻奇为末。三者守本离末则民富,离本守末则民贫,贫则阨而忘善,富则乐而可教。教训者,以道义为本,以巧辩为末;辞语者,以信顺为本,以诡丽为末;列士者,以孝悌为本,以交游为末;孝悌者,以致养为本,以华观为末;人臣者,以忠正为本,以媚爱为末;五者守本离末则仁义兴,离本守末则道德崩。慎本略末犹可也,舍本务末则恶矣。

夫用天之道,分地之利,六畜生于时,百物聚于野,此富国之本也。游业末事,以收民利,此贫邦之原也。忠信谨慎,此德义之基也。虚无谲诡,此乱道之根也。故力田所以富国也。今民去农桑,赴游业,披采众利,聚之一门,虽于私家有富,然公计愈贫矣。百工者,所使备器也。器以便事为善,以胶固为上。今工好造雕琢之器,巧伪饰之,以欺民取贿,虽于奸工有利,而国界愈病矣。商贾者,所以通物也。物以任用为要,以坚牢为资。今商竞鬻无用之货,淫侈之币,以惑民取产,虽于淫商有得,然国计愈失矣。此三者,外虽有勤力富家之私名,然内有损民贫国之公实。故为政者,明督工商,勿使淫伪,困辱游业,勿使擅利,宽假本农,而宠遂学士,则民富而国平矣。

夫教训者,所以遂道术而崇德义也。今学问之士,好语虚无之事,争著雕丽之文,以求见异于世,品人鲜识,从而高之,此

伤道德之实,而或矇夫之大者也。诗赋者,所以颂善丑之德,泄哀乐之情也。故温邪以广文,兴喻以尽意。今赋颂之徒,苟为饶辩屈蹇之辞,竟陈诬罔无然之事,以索见怪于世,愚夫慧士,从而奇之,此悖孩童之思,而长不诚之言者也。尽孝悌于父母,正操行于闺门,所以为列士也。今多务交游以结党助,偷世窃名以取济渡,夸末之徒,从而尚之,此逼贞士之节,而眩世俗之心者也。养生顺志,所以为孝也。今多违志俭养,约生以待终,终没之后,乃崇饬丧纪以言孝,盛飨宾旅以求名,诬善之徒,从而称之,此乱孝悌之真行,而误后生之痛者也。忠正以事君,信法以理下,所以居官也。今多奸谀以取媚,挠法以便佞,苟得之徒,从而贤之,此灭贞良之行,而开乱危之原者也。五者,外虽有振贤才之虚誉,内有伤道德之至实。

凡此八者,皆衰世之务,而暗君之所固也。虽未即于篡弑,然亦乱道之渐来也。

夫本末消息之争,皆在于君,非下民之所能移也。夫民固随君之好,从利以生者也。是故务本则虽虚伪之人皆归本,居末则虽笃敬之人皆就末。且冻馁之所在,民不得不去也;温饱之所在,民不得不居也。故衰暗之世,本末之人,未必贤不肖也;祸福之所,势不得无然尔。故明君莅国,必崇本抑末,以遏乱危之萌。此诚治之危渐,不可不察也。

【译文】

凡是治理国家识大体的人,无不善于抑制末业而专务本业的,无不善于依靠本业而整饬末业的。凡是治理国家的,以富民为根本,以治学为基础。百姓富裕了才可以教诲,学习端正了就得到本义,百姓贫

穷就违反善道,不学正道就欺骗伪装,学习正道就不会变乱,得到义理就会忠孝。所以有道之君治理的方法,专务忠孝这两项事情,用它成就太平的基业,达到美善吉祥。

使百姓富裕的人,以农桑为根本,以游手好闲为职业的人为末业,各类工匠,应该以他制造的工具符合实用为根本,以奇巧伪饰为末业,做买卖的人,以流通货物为根本,以屯积居奇货物为末业。这三种人如能遵守本业脱离末业而百姓就会富裕,如果离开本业而死守末业老百姓就贫穷了,贫穷的厄运到来百姓就会忘记善良,富裕了百姓就乐于教诲。教育训导这件事,要以道义为根本,以巧辩之言为末利,关于言辞这件事,要以忠信孝顺为根本,要以诡辩华丽为末利,刚强的人要以孝悌为本,以交游为末利,孝悌的人,要以能达到赡养老人为根本,以华而不实为末利,作为臣子的人,要以忠诚正直为根本,以谄媚求爱为末利:这五种人如果都遵守本业脱离末业,那么仁义就会兴起,如果脱离本业追求末利,那么道德就会崩坏。慎重本业省略末业还说过得去,如果舍弃本业专务末业就变成了坏事。

如果运用天的原则,把地利又加以区分,六畜就会适时生育,各种东西广聚于原野之中,这就是富国的根本。游食之业和末作之事,用以收取百姓的钱财,这是国穷的根源。忠信谨慎,这是德义的基础。虚无诡诈,这是变乱天的原则的根源。所以努力耕田是富国的方法。当今的百姓离开农桑奔走于游食之业,开采财源,聚集于一家之门,虽然私人富裕了,但国计更加贫困了。众多的工匠,所以使他们不过完备器物罢了,器具以方便为宜,以牢固为上。当今的工匠好制造雕琢精美的器物,用技巧加以装饰,以骗取百姓的财物,这对邪恶的工匠虽然有利,但对国家财政就更加有害了。做买卖的人,是要他们流通货物罢了,货物要以耐用为宗旨,以坚固为凭借。而

当今的商人竞相出卖无用的货物,过于奇巧奢侈的器具,用以欺骗百姓夺取他们的产业,这对奸商虽然有所获利,但对国计民生更加损失。以上三种人,外表虽然有个人致富的私名,但内部却有损害百姓致使国家贫困的实质。所以治理国家的人,要明察工商业者,不要使他们邪恶虚伪,去沾染游食之业,不要使他们专擅厚利,要宽容农业这个根本,而使致力学习的士人荣达,这样百姓就会富裕,国家就会安定了。

教导训诲别人,所以要推崇道德学术而崇尚德义。而当今有学问的士人,好讲论一些虚无之事,争着著述雕凿华丽的文章,以求与世不同,众人很少能识别,从而抬高自己,这就有伤于道德的实质,而迷惑学童是最深广的。诗赋这种东西,是讽颂善恶的,发泄悲哀和快乐情绪的,所以要温文而雅以宏广其文,要触景生情因事喻物以尽其意。当今作赋颂的人,苟且做些饬口的辞句,竞相陈述虚构的事实以欺骗他人之事,用以索求与世之奇异,一些无知的士人,便随从其后而加以惊奇,这就给儿童的思想造成谬误,而助长了不诚实的言论。对父母尽孝悌,端正操行于家门,这样才能成为有功烈的人。而如今的人多务于交游结为朋党以为援助,欺世盗名以达到其成功的目的,而一些夸奖末利之徒,也跟随其后加以崇尚,这就逼迫功烈之士改变节操,以迷惑世俗的心理。顺从父母的心思和志向而加以赡养,因此就可以成为孝子了。当今多数人却违背父母的志向以节俭奉养老人,使其终生节约以等待老死,死了之后,于是就崇饰丧事来说明他的孝顺,大宴宾客以求孝顺的名声,诽谤善良之徒,从而加以称赞,这是惑乱孝悌的真实行为,这是误导子孙最痛心的事,用忠诚正直来奉事君主,用奉行法治来治理百姓,这是做官的基本原则。而当今的官吏,用奸佞阿谀以取得上级的欢喜,用阻挠法律的执行以方便谄媚的人,苟且求得了官职之徒,从而称赞他们贤能,这是灭绝坚贞善良的行为,从

而开创了危乱的根源 这五种人 ,外表虽有振济贤才的虚假名声 ,而内心却有损于道德的实质。

凡是这八种人 ,都是衰弱世道的事情 ,是受昏君所保护的。这些人虽然还没有达到篡杀君主的地步 ,但也使衰乱之世逐渐到来了。

本末盛衰的争论 ,关键都在于君主 ,并不是百姓所能改变的。老百姓本来就跟随君主的爱好而爱好 ,是顺从私利而生的。

所以君主务本而虚伪之人都归于本业 ,君主爱好末业 ,虽诚实敬重之人也都趋就于末业。况且百姓冻饿在家里 ,就不得不离去 ;百姓温饱有了保障 ,就不得不居住在家里。所以衰败黑暗的世道 ,不论从事本业和末业的人 ,未必都是贤人和不贤的人 ,祸福的存在 ,其形势不得不这样。所以英明的君主莅临国位 ,必然崇尚本业抑制末业 ,用以遏制危乱的萌芽。这诚然是防微杜渐之治 ,不可不加以考察。

遏利第三

世人之论也 ,靡不贵廉让而贱财利焉 ,及其行也 ,多释廉甘利。之于人徒知彼之可以利我也 ,而不知我之得彼 ,亦将为利人也。知脂蜡之可明灯也 ,而不知其甚多则冥之。知利之可娱己也 ,不知其称而必有也。前人以病 ,后人以竞 ,庶民之愚而衰暗之至也。予故叹曰 :何不察也 ?愿鉴于道 ,勿鉴于水。象以齿焚身 ,螭以珠剖体 ;匹夫无辜 ,怀璧其罪。呜呼问哉 !无德而富贵者 ,固可豫吊也。

且夫利物莫不天之财也。天之制此财也 ,犹国君之有府库也。赋赏夺与 ,各有众寡 ,民岂得强取多哉 ?故人有无德而富贵 ,是凶民之窃官位盗府库者也 ,终必觉 ,觉必诛矣。盗人必诛 ,况乃盗天乎 ?得无受祸焉 ?邓通死无簪 ,胜、跪伐其身。是故天子不能违天富无功 ,诸侯不能违帝厚私劝。非违帝也 ,非违天也。帝以天为制 ,天以民为心 ,民之所欲 ,天必从之。是故无功庸于民而求盈者 ,未尝不力颠也 ;有勋德于民而谦损者 ,未尝不光荣也。自古于今 ,上以天子 ,下至庶人 ,蔑有好利而不亡者 ,好义而不彰者也。

昔周厉王好专利 ,芮良夫谏而不入 ,退赋《桑柔》之诗以讽 ,言是大风也 ,必将有隧 ,是贪民也 ,必将败其类。王又不悟 ,故

遂流死于彘。虞公屡求以失其国 ,公叔戌崇贿以为罪 ,桓魋不节饮食以见弑。此皆以货自亡 ,用财自灭。楚斗子文三为令尹 ,而有饥色 ,妻子冻馁 ,朝不及夕 ;季文子相四君 ,马不饔粟 ,妾不衣帛 ;子罕归玉 ,晏子归宅。此皆能弃利约身 ,故无怨于人 ,世厚天禄 ,令问不止。伯夷、叔齐饿于首阳 ,白驹、介推遁逃于山谷 ,颜、原、公析困饑于郊野 ,守志笃固 ,秉节不亏 ,宠禄不能固 ,威势不能移 ,虽有南面之尊 ,公侯之位 ,德义有殆 ,礼义不班 ,挠志如芷 ,负心若芬 ,固弗为也。是故虽有四海之主弗能与之方名 ,列国之君不能与之钧重 ,守志于□庐之内 ,而义溢于九州之外 ,信立乎千载之上 ,而名传乎百世之际。

故君子曰 :财贿不多 ,衣食不赡 ,声色不妙 ,威势不行 ,非君子之忧也。行善不多 ,申道不明 ,节志不立 ,德义不彰 ,君子耻焉。是以圣人智士之于子孙也 ,厉之以志 ,弗厉以诈 ,劝之以正 ,弗劝以诈 ,示之以俭 ,弗示以奢 ,胎之以言 ,弗胎以财。是故董仲舒终身不问家事 ,而疏广不遗赐金。子孙若贤 ,不待多富 ,若其不贤 ,则多以征怨。故曰 :无德而贿丰 ,祸之胎也。

昔曹霸有言 :“守天之聚 ,必施其德义。德义弗施 ,聚必有阙。”今□家赈而贷

乏 遗赈贫穷 恤矜疾苦 则必不□居富矣。《易》曰：“天道亏盈以冲谦。”故以仁义□于彼者 天赏之于此；以邪取于前者 衰之于后。是以持盈之道 挹而损之 则亦可以免于亢龙之悔、乾坤之愆矣。

【译文】

世人的言论 无不崇尚廉让而鄙视财利 当他执行的时候 大多放弃廉让而乐于财利 人只知贪财可以利己 而不知自己得到财货 也将成为他人图谋的对象。只知油脂可以使灯燃明 而不知油脂多了可以使灯熄灭。只知财利可以使自己欢乐 不知财富畜积多了必招来灾祸。前人认为是弊病 后人则竞相追逐 庶民百姓的愚昧而衰乱黑暗之世就要到了。我因此叹道：为什么不明察呢？希望用天的原则来加以鉴别 不要用水来加以鉴别。大象因为有牙齿而被焚身 蚌因为能生出珍珠而被剖开身体 百姓本来没有过错 就是因为怀藏一块玉璧才有了罪。唉呀听说了吗！没有德操而富贵的人 姑且可以事先去哀悼他的死了。

财物都是天所赐与的财富。天所制定的这些财富 就像国君之有府库一样。颁行赏赐和削除 各有多少不同 老百姓怎能去强取呢？所以一个官员没有德行而拥有富贵 就像凶恶的人窃取官位偷盗府库一样 终究会被察觉 察觉之后必遭杀戮。盗窃别人的财产必遭杀戮 何况窃取天所赐予的财富呢？能不引起祸患吗？邓通死的时候连一个簪子都不能随葬 羊胜、公孙诡还砍杀了他的尸体。所以帝王对百姓无功就不能违背天所赐予的丰厚财物 诸侯不能违背帝王赐予自己的私欢。不是违背帝王 不是违背天命。帝王以天为法式 天所想的是百姓 百姓有所要求 天必然会听从。所以无功于百姓而求得丰厚的赏赐 这未曾不是站在危险的颠顶上；有功于百姓而谦让的人 未尝不是光荣。从古到今，

上从帝王 下至百姓 没有好利而不灭亡的 没有好义而不扬名的。

过去周厉王好专利 芮良夫劝谏他而听不进去 退朝后作《桑柔》的诗来加以讽谏 说是大风吹 必将有路 是说贪民财者 其同类必失败。周厉王还不觉悟 所以被流放到彘地而死。虞国国君屡次向虞叔求玉 因此而失去了虞国 卫国公孙戌崇尚财富而获罪 宋国桓魋饮食没有节制而遭到讨伐。这些都是因贪于财货而自取灭亡 因财而自灭。楚国斗子文三次做令尹的大官 而面有饥饿的颜色 妻子受冻挨饿 朝不保夕 鲁国季文子三次辅佐国君 马不吃粮食 妻子不穿丝帛做的衣服 宋国子罕归还玉璧 齐国晏婴归还宅第。这些人都能放弃财利而约束自身 所以没有怨恨于人 是上天赐给他丰厚的禄位 声誉不断远扬。伯夷、叔齐饿死于首阳山 白驹、介子推逃匿于山谷之中 颜回、原宪、公析哀因挨饿于郊野 还保持志节坚定不移 执秉节操不损 尊宠的禄位不能改变他的志向 威势也无法移动他的节操 圣人虽有面南的尊严 公侯的地位 德义有危险 礼义不加区分 委曲自己的志向就像芷草不让发出香气 违背其心思就像芳草一样把香味吹走 固然不能那样做。所以虽然拥有四海的君主也不能给以正名。就是列国的君主也不能给他称量重量 坚守志向于庐室之内 而道义充满于九州以外 诚信树立于千年以上 而名声传流于百代之间。

所以君子说：财富不多 衣食不能供给 声色不美好 威势不通行 不是君子的忧愁。行善不多 表达道义不明 节操志向不能树立 德义不能彰明 是君子的耻辱。所以贤人志士对待他的子孙 是磨厉他们的意志 不磨厉意志就会欺诈 鼓励他们正直 不鼓励他们欺诈 告诉他们要提倡节俭 不告诉他们奢侈 赠送给他们言语 不赠送给他们财物。因此董仲舒终身不问家事 而疏广不遗留赠赐的金子。子孙如果贤能 不需要很多的财富。如果子孙不贤，

就是再多的财富也会招来怨恨。所以说：没有德操而财富丰厚，是灾祸的基始。

过去曹国僖负羁有言说：“要守护天所聚集的财物，必先要施行他的德义。德义不能施行，聚集的财富必然有所缺少。”今天或者有家中富裕而去很少借贷给别人，把财富赈给贫穷，矜恤疾苦之家，则必

不能久居富贵。《易》说：“天的原则是亏损那盈满的，培补那虚缺的。”因此把仁义赏给他们，天就顺从他们的意愿，用邪道索取在前，就会衰败于后。所以对待处于盛满地位的人，要抑制而使他谦退，就可以避免像升腾到极限的龙会有灾祸之困的后悔，乾卦和坤卦相乖戾的过失。

论荣第四

所谓贤人君子者，非必高位厚禄富贵荣华之谓也，此则君子之所宜有，而非其所以为君子者也。所谓小人者，非必贫贱冻饿辱阨穷之谓也，此则小人之所宜处，而非其所以为小人者也。

奚以明之哉？夫桀、纣者，夏、殷之君王也，崇侯、恶来，天子之三公也，而犹不免于小人者，以其心行恶也。伯夷、叔齐，饿夫也，傅说胥靡，而并伯虞虢也，然世犹以为君子者，以为志节美也。

故论士苟定于志行，勿以遭命，则虽有天下不足以为重，无所用不足以为轻，处隶圉不足以为耻，抚四海不足以为荣。况乎其未能相悬若此者哉？故曰：宠位不足以尊我，而卑贱不足以卑己。

夫令誉从我兴，而二命自天降之。《诗》云：“天实为之，谓何哉！”故君子未必富贵，小人未必贫贱，或潜龙未用，或亢龙在天，从古以然。今观俗士之论也，以族举德，以位命贤，兹可谓得论之一体矣，而未获至论之淑真也。

尧，圣父也，而丹凶傲；舜，圣子也，而叟顽恶；叔向，贤兄也，而鮒贪暴；季友，贤弟也，而庆父淫乱。论若必以族，是丹宜禅而舜宜诛，鮒宜赏而友宜夷也。论之不可必以族也若是。

晋祁奚有言：“鲧殛而禹兴，管、蔡为戮，周公□王。”故《书》称“父子兄弟不相及”也。幽、厉之贵，天子也，而又富有四

海。颜、原之贱，匹庶也，而又冻饿屡空。论若必以位，则是两王是为世士，而二处为愚鄙也。论之不可必以位也，又若是焉。

故曰：仁重而势轻，位蔑而义荣。今之论者，多此之反，而又以九族，或以所来，则亦远于获真贤矣。

昔自周公不求备于一人，况乎其德义既举，乃可以它故而弗之采乎？由余生于五狄，越蒙产于八蛮，而功施齐、秦，德立诸夏，令名美誉，载于图书，至今不灭。张仪，中国之人也；卫鞅，康叔之孙也，而皆谗佞反覆，交乱四海。由斯观之，人之善恶，不必世族；性之贤鄙，不必世俗。中堂生负苞，山野生兰芷。夫和氏之璧，出于璞石；隋氏之珠，产于蜃蛤。《诗》云：“采葑采菲，无以下体。”故苟有大美可尚于世，则虽细行小瑕曷足以为累乎？

是以用士不患其非国士，而患其非忠；世非患无臣，而患其非贤。盖无羁縻。陈平、韩信，楚俘也，而高祖以为藩辅，实平四海，安汉室；卫青、霍去病，平阳之私人也，而武帝以为司马，实攘北狄，郡河西。惟其任也，何卑远之有？然则所难于非此土之人，非将相之世者，为其无是能而处是位，无是德而居是贵，无以我尚而不秉我势也。

【译文】

所谓的贤人君子，并不是必定居于高位厚禄富贵荣华才叫做贤人君子，这只是

君子所应该有的，而不是这些就是做君子的条件。所谓的小人，并不是必须贫贱冻饿困辱穷苦才叫做小人，这是小人所应该相处的，而不是这些决定了做小人的条件。

怎么能说明它呢？桀、纣这二人，是夏朝、殷代的君主，崇侯、恶来，曾是天子手下的三公，而还不免为小人，因为他的思想行为是丑恶的。伯夷、叔齐，是受饿的人，传说是带绳索的奴隶，而井伯是从虞国虏获的俘虏，但是仍称他为君子，是因为他们的志节美好。

因此评论士人如果仅限于志行，不论他的遭遇命运，则虽有天下也不足以为重，无所用也不可以轻视，身处奴役养马的地位也不足以为耻，占有天下也不足以光荣。何况他们未能互相悬殊如此呢？所以说：尊崇的位置不足以为我所尊奉，而卑贱不足以使我所鄙视自己。

善美从我开始，而两种命运是自天而降临的。《诗经》说：“老天这样安排，我怎能奈何它！”因此君子未必富贵，小人未必贫贱，或像潜龙不用那样不利，或者像直龙在天那样吉祥，从古以来就是这样。如今观看平庸士人的言论，在宗族中推举有仁德之人，用地位命名贤人，这可以说是得体的言论之一，而未能达到言论至善至美的程度。

尧，是道德极高的父亲，尧的儿子丹朱就很凶恶傲慢；舜，是圣人的儿子，而他的儿子瞽叟就很愚妄凶恶；叔向，是一位贤达的兄长，而他的弟弟鲋就贪婪残暴；季友，是一位贤能的弟弟，而他的哥哥庆父则淫乱鲁国。而议论的人如果必定以族举德的话，而尧应禅位丹朱舜应该诛杀，鲋应该加以赏赐而季友应该杀掉了。如此言之，议论者就不可以因族举德了。

过去祁奚有言说：“鲧死之后而夏禹就兴起了，管叔、蔡叔被杀，周公就辅佐成王。”所以《书》称为“父子兄弟不相干”。周幽王、厉王的尊贵，贵为天子，

而又富有四海。颜渊、原宪的卑贱，贱为普通百姓，而又冻饿贫困。议论的人必以其位命贤，就是幽王、厉王使人教化他也可成为读书人了，而颜渊、原宪两位隐士不就成为愚鄙之人了。议论的人不可以必须以地位命贤，就像以上的事情就是这样。

所以说：仁义重而权势轻，地位轻而仁义重。当今议论的人，多与此相反，而又用九族，或论其所由来，这对获得真正的贤士就离得太远了。

过去从周公起就不求全责备于一个人，何况他的德义既然被推举，怎可因其他缘故而不采用呢？由余生长在戎狄，越人蒙出生于南蛮，而他们的功劳则施行于齐国和秦国，德义树立于中原。好的名声美誉，记载在图书中，至今不泯灭。张仪，是中原的人；卫鞅，是卫康叔的子孙，而都是佞邪反覆，相互变乱四海的人。由此来观察，人的善和恶，不必定是在大姓豪族之中；性情的贤和卑鄙，不必限定在社会风气方面。庭院中会生出茅草，山野之中也会生出芳香的兰芷。和氏璧出产于璞石之中；隋侯的珍珠，产于蚌蛤之中。《诗经》说：“采集葑菜和韭菜，不单要叶也要根。”所以假如有完美无缺的人尚在上，而虽然有细小毛病的人难道就成为累赘了吗？

所以选用士人不忧虑他不是国家的奇士，而忧虑的是他不忠；世上不忧虑没有臣子，而忧虑的是臣子不贤。没有笼络（下有脱文）。陈平、韩信，是从楚国俘虏来的，而汉高祖刘邦用为辅佐，平定了天下，安定了汉室；卫青、霍去病是平阳一个家奴的儿子，而汉武帝用为司马，北击匈奴，建立了河西郡。只要委任他，哪管卑贱疏远的区别呢？但是所难的是不是本土的人，不是将相世家出身的人，因为他没有这种能力而却居于此位，没有这种德操而处在这种富贵的位置上，不要因为是自己所崇尚的人而就能顺从自己的权

势。

贤难第五

世之所以不治者，由贤难也。所谓贤难者，非直体聪明服德义之谓也。此则求贤之难得尔，非贤者之所难也。故所谓贤难者，乃将言乎循善则见妒，行贤则见嫉，而必遇患难者也。

虞舜之所以放殛，子胥之所以被诛，上圣大贤犹不能自免于嫉妒，则又况乎中世之人哉？此秀士所以虽有贤材美质，然犹不得直道而行，遂成其志者也。

处士不得直其行，朝臣不得直其言，此俗化之所以败，暗君之所以孤也。齐侯之以夺国，鲁公之以放逐，皆败绩厌覆于不暇，而用及治乎？故德薄者恶闻美行，政乱者恶闻治言，此亡秦之所以诛偶语而坑术士也。

今世俗之人，自慢其亲而憎人敬之，自简其亲而憎人爱之者不少也。岂独品庶，贤材时有焉。邓通幸于文帝，尽心而不违，吮痂而无忤色。帝病不乐，从容曰：“天下谁最爱朕者乎？”邓通欲称太子之孝，则因对曰：“莫若太子之最爱陛下也。”及太子问疾，帝令吮痂，有难之色，帝不悦而遣太子。既而闻邓通之常吮痂也，乃惭而怨之。及嗣帝位，遂致通罪而使至于饿死。故邓通其行所以尽心力而无害人，其言所以誉太子而昭孝慈也。太子自不能尽其称，则反结怨而归咎焉。称人之长，欲彰其孝，且犹为罪，又况明人之短矫世者哉？

且凡士之所以为贤者，且以其言与行也。忠正之言，非徒誉人而已也，必有触焉；孝子之行，非徒吮痂而已也，必有驳焉。然则循行论议之士，得不遇于嫉妒之名，免于刑戮之咎者，盖其幸者也。比干之所以剖心，箕子之所以为奴，伯宗之以

死，郤宛之以亡。

夫国不乏于妒男也，犹家不乏于妒女也。近古以来，自外及内，其争功名妒过己者岂希也？予以惟两贤为宜不相害乎？然也，范雎绌白起，公孙弘抑董仲舒，此同朝共君宠禄争故耶？惟殊邦异途利害不干者为可以免乎？然也，孙臆修能于楚，庞涓自魏变色，诱以刖之；韩非明治于韩，李斯自秦作思，致而杀之。嗟士之相妒岂若此甚乎！此未达于君故受祸邪？惟见知为可以将信乎？然也，京房数与元帝论难，使制考功而选守；晁错雅为景帝所知；使条汉法而不乱。夫二子之于君也，可谓见知深而宠爱殊矣，然京房冤死而上曾不知，晁错既斩而帝乃悔。此材明未足卫身故及难邪？惟大圣为能无累乎？然也，帝乙以义故囚，文王以仁故拘。夫体至行仁义，据南面师尹卿士，且犹不能无难，然则夫子削迹，叔向縲绁，屈原放沉，贾谊贬黜，钟离废替，何敞束缚，王章抵罪，平阿斥逐，盖其轻士者也。

《诗》云：“无罪无辜，谗口敖敖。”“彼人之心，于何不臻？”由此观之，妒媚之攻击也，亦诚工矣！贤圣之居世也，亦诚危矣！

故所谓贤难也者，非贤难也，免则难也。彼大圣群贤，功成名遂，或爵侯伯，或位公卿，尹据天官，秉在帝心，宿夜侍宴，名达而犹有若此，则又况乎畎亩佚民、山谷隐士，因人乃达，时论乃信者乎？此智士所以钳口结舌，括囊共默而已者也。

且閭閻凡品，何独识哉？苟望尘剽声而已矣。观其论也，非能本閭閻之行迹，察臧否之虚实也；直以面誉我者为智，谄

谏己者为仁，处奸利者为行，窃禄位者为贤尔。岂复知孝悌之原，忠正之直，纲纪之化，本途之归哉？此鲍焦所以立枯于道左，徐衍所以自沉于沧海者也。

谚曰：“一犬吠形，百犬吠声。”世之疾此固久矣哉！吾伤世之不察真伪之情也，故设虚义以喻其心曰：今观宰司之取士也，有似于司原之佞也。昔有司原氏者，燎猎中野。鹿斯东奔，司原纵噪之。西方之众有遂豨者，闻司原之噪也，竞举音而和之。司原闻音之众，则反辍己之逐而往伏焉，遇夫俗恶之豨。司原喜，而自以获白瑞珍禽也，尽刍豢单困仓以养之。豕俯仰嚅呿，为作容声，司原愈益珍之。居无何，烈风兴而泽雨作，灌巨豕而恶涂渝，逐骇惧，真声出，乃知是家之艾豨尔。此随声逐响之过也，众遇之未赴信焉。

今世主之于士也，目见贤则不敢用，耳闻贤则恨不及。虽自有知也，犹不能取，必更待群司之所举，则亦惧失麟鹿而获艾豨。奈何其不分者也？未遇风雨之变者故也。俾使一朝奇政两集，则险隘之徒，闾茸之质，亦将别矣。

夫众小朋党而固位，谗妒群吠啮贤，为祸败也岂希？三代之以覆，列国之以灭，后人犹不能革，此万官所以屡失守，而天命数靡常者也。《诗》曰：“国既卒斩，何用不监！”呜呼！时君俗主不此察也。

【译文】

世道所以不能治理的原因，是因为做一个贤人难呀。所谓的做贤人难，并不是专指具有实行直道聪敏顺从德义就是贤人。这就是求贤难得的原因，并不是指贤人难做。因此所谓的贤人难做，是说拿言论修善自己的行为就会被别人嫉妒，他们对行贤的人们加以憎恨，而贤人就遭受祸难。

虞舜之所以被放逐而死，伍子胥之所以被吴王夫差所杀死，大圣大贤的人还不能自免于被嫉妒，则又何况中等之人呢？这就是贤士所以虽有贤才美质，而不能沿着正道行事，使他的志向成功。

隐士不得正直行事，朝臣不得正谏直言，这就是风俗所以败坏，昏君因此而孤立的原因。齐简公被陈恒所夺去国家，鲁昭公被孟氏所放逐，都是因为怕失败而无暇顾及自己被颠覆，而怎么能来得及治理国家呢？所以德薄的人不好听到美善的行为，政治紊乱的国君不愿听到如何治理的言论，这就是秦朝的灭亡是因为诛杀偶语坑杀儒士的结果。

如今普通的人，自己怠慢双亲而又憎恨别人尊敬他的双亲，自己轻慢双亲而又憎恨别人爱戴他的双亲的人为数不少。岂止一般的众庶之人，贤才也经常有这样的事情。邓通得幸于汉文帝，尽心效力而不违背他的旨意，用嘴吸吮文帝的脓疮而无怨恨之色。文帝有病不快乐，就从容地说：“普天之下谁最爱我？”邓通想称赞太子刘启的孝顺，就因此而答道：“都不如太子最爱陛下。”当太子问文帝的疾病时，文帝让他吸吮脓疮时，太子面带难色，文帝不高兴就遣去了太子。不久太子听说邓通经常吸吮脓疮，就很惭愧而怨恨他。当太子继承帝位后，于是招致邓通之罪而使他饿死。所以邓通的行为尽心尽力而不伤害他人，他的言论是赞美太子而昭明孝慈的。太子自己不能尽其职责，就反而结怨归罪于邓通。称赞别人的长处，想表彰他的孝心，况且还招来罪过，又何况指明别人的短处而纠正颓风陋习呢？

凡是士所以能称得上是贤的，是依照他的言论和行动。忠诚正直的言论，并非只是赞誉别人罢了，必定有所触动；孝子的行动，并非只是吸吮脓疮罢了，必须纯正贤明。但是修养自己行动言论的士人，能不遭遇嫉妒之名，避免杀戮之祸的，那就是很幸运的了。比干因此被剖腹挖心，

箕子因此被卖为奴隶，伯宗因直言被杀，郤宛因直言自杀。

国家不缺乏嫉妒的男子，就像家中不缺乏嫉妒的女子一样。从近古以来，从外自内，他们争功名嫉妒超过自己的人还少吗？我认为只有两贤相互称赞而不相互陷害是行不通的吗？是的，范雎拙短白起，公孙弘抑制董仲舒，这是因为他们同朝共君争夺宠信俸禄的缘故吗？那么不同的国家不同的途径利害不相干的人为什么也不能避免呢？是的，孙臆在楚国研习功能，庞涓在魏国就改变了颜色，诱骗他到了魏国而砍断了他的脚；韩非在韩国申明法治，李斯从秦国邀请他去，致使而被杀。唉呀士之相互嫉妒怎如此激烈呀！这是因为未明达于君主而遭受灾祸吗？只有见知于君主才可以取信吗？是的，京房数次和汉元帝论难的辩论，使元帝制定考察官吏功劳的制度而选拔太守；晁错素为汉景帝所赏识，使其条制汉法而不乱。这两个人对国君来说，可以说是见识深而受到特殊宠信的，但京房含冤而死而皇上还不知道，晁错既已被斩首而景帝才悔悟。这是因为才干智慧不足以保卫自身所以才累及遭难的吗？只有大圣的人才能避免此祸吗？是的，商汤因为对百姓有恩而被夏桀所囚禁，周文王因为对百姓施仁德被殷纣王加以拘禁。身体力行仁义，面南而坐统领公卿百官，尚且还不能没有困难，那么孔子隐居于卫国，叔向系于绳索，屈原被放逐投水，贾谊被贬黜，钟离意被废，何敞被束缚，王章被抵罪，平阿侯王仁被斥逐，这还是轻的呢。

《诗经》说：“我本无罪无辜，却众口交讟。”“那人的心，为何没有止境？”由此观察，妒忌谄媚者的攻击，也诚然很擅长此道！圣贤的人处于世上，也诚然太危险了！

因此以上说的贤人难做之事，并不是求贤困难，能避免世俗偏见就难了。那些大圣群贤，功成名就，或者爵位封侯封

伯，或者位居公卿，主据百官，在帝王心中早就晓得的人，常夜侍宴，名声远扬而尚且不可避免有偏见，又何况田间逸民，山谷中的隐士，因人就能通达，时论竟相信这吗？这就是智士所以钳口结舌而不言，封住口不说话罢了。

况且里巷中一般的人，有什么远见卓识呢？苟安于望尘听声罢了。观察他们的议论，不能根据他们在家中的行迹，作为考察好坏的虚实；只用当面恭维自己的人就认为是聪明，谄媚阿谀自己的人就是仁义，对待非法谋利的人认为是有才能，窃取禄位的人认为就是贤人。怎么会知道孝悌的根源，忠正的真谛，纲纪的变化，本途的归宿呢？这就是鲍焦所以树立枯木于道路的左侧，徐衍所以抱石自沉于大海的原因。

谚语说：“一犬吠形，百犬吠声。”用它来比喻只听声音不察真伪。世人憎恨它诚然很久了！我感伤世人不察真伪的实情，因此假设虚义用它来比喻众人的心情说：当今察看官吏推选士人，就像掌管兽类的官员去猎取野兽一样。过去有司原氏，举火猎兽于旷野之中。野鹿东奔，掌兽的官员就放声喊叫。西方的众人有驱逐野猪的，听到掌兽官员的喊声，竞相和合而喊叫。掌兽的官员听到大喊大叫的声音，就自己停止驱逐野兽，而伏在地上，就遇上了白色的野猪。掌兽的官员大喜，而自以为是获得了白色吉祥珍兽了。用尽草料加以喂养。野猪俯仰嚙呦鸣叫，叫出谄媚之声，掌兽的官员更加珍爱它。豢养没多久，烈风暴雨大作，大雨浇灌了巨猪身上的白土，白土被涮了下来，就改变了本来的颜色，猪惊骇，发出原来的真声，才知道是家中的公猪。这就是随声逐响的过错，众人遇见还不相信呢。

如今君主对于取士，眼见他们贤能而不敢用，耳闻其贤则恨不能用。虽然自己知道他们贤能还是不能取用，必等待百官的荐举，然而还怕失去麟鹿而获得的是公

猪。怎么不能分辨真假呢？因为未遇到风雨变化的缘故。假如一朝有特殊的政治风雨来临，而政治上的险恶之徒，品格卑贱的实质，也就将辨别出来了。

大小朋党勾结以巩固他们的地位，谄谗嫉妒群贤就像犬吠吃咬贤才一样，导致

灾祸败亡岂能少吗？夏商周三代的覆灭，列国的灭亡，后人谁也不能变更，这是众官所以屡次失职的原因，而天命弃取是有一定的。《诗经》说：“国家既已灭绝，为什么不察看！”唉呀！这是平庸的君主对此不明察的原因。

潜夫论第二卷

明暗第六

国之所以治者君明也 ,其所以乱者君暗也。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 ,其所以暗者偏信也。是故人君通必兼听 ,则圣日广矣 ;庸说偏信 ,则愚日甚矣。《诗》云 :“先民有言 ,詢于刍蕘。”

夫尧、舜之治 ,辟四门 ,明四目 ,通四聪 ,是以天下辐凑而圣无不照 ,故共、鯀之徒弗能塞也 ,靖言庸回弗能惑也。秦之二世 ,务隐藏己 ,而断百僚 ,隔捐疏贱而信赵高 ,是以听塞于贵重之臣 ,明蔽于嫉妒之人 ,故天下溃叛 ,弗得闻也。皆高所杀 ,莫敢言之。周章至戏乃始骇 ,阎乐进劝乃后悔 ,不亦晚矣 ! 故人君兼听纳下 ,则贵臣不得诬 ,而远人不得欺也 ;慢贱信贵 ,则朝廷谗言无以至 ,而洁士奉身伏罪于野矣。

夫朝臣所以统理 ,而多比周则法乱 ,贤人所以奉己 ,而隐遁伏野则君孤。法乱君孤而能存者 ,未之尝有也。是故明君莅众 ,务下言以昭外 ,敬纳卑贱以诱贤也。其无距言 ,未必言者之尽可用也 ,乃惧距无用而让有用也 ;其无慢贱 ,未必其人尽贤也 ,乃惧慢不肖而绝贤望也。是故圣王表小以厉大 ,赏鄙以招贤 ,然后良士集于朝 ,下情达于君也。故上无遗失之策 ,官无乱法之臣。此君民之所利 ,而奸佞之所患也。

昔张禄一见而穰侯免 ,袁丝进说而周勃黜。是以当涂之人 ,恒嫉正直之士 ,得一介言于君以矫其邪也 ,故上饰伪辞以障主心 ,下设威权以固士民。赵高乱政 ,恐恶闻上 ,及豫要二世曰 :“屡见群臣众议政事则黷黷且示短 ,不若藏己独断 ,神且尊严。天子称朕 ,固但闻名。”二世于是乃深自幽

隐 ,独进赵高。赵高入称好言以说主 ,出倚诏令以自尊。天下鱼烂 ,相帅叛秦。赵高恐惧 ,归恶于君 ,乃使阎乐责而杀 ,愿一见高不能而死。

夫田常囚简公 ,蹇齿悬泯王 ,二世亦既闻之矣。然犹复袭其败迹者何也 ? 过在于不纳卿士之箴规 ,不受民氓之谣言 ,自以己贤于简、湣 ,而赵高贤于二世也。故国已乱而上不知 ,祸既作而下不救。此非众共弃君 ,乃君以众命系赵高 ,病自绝于民也。

后末世之君危何知之哉 ? 舜曰 :“予违 ,汝弼。汝无面从 ,退有后言。”故治国之道 ,劝之使谏 ,宣之使言 ,然后君明察而治情通矣。

且凡骄臣之好隐贤也 ,既患其正义以绳己矣 ,又耻居上位而明不及下 ,尹其职而策不出于己。是以郤宛得众而子常杀之 ,屈原得君而椒、兰构谗 ,耿寿建常平而严延妒其谋 ,陈汤杀郅支而匡衡拔其功。

由此观之 ,处位卑贱而欲效善于君 ,则必先于宠人为仇矣。乘旧宠沮之于内 ,而已接贱欲自信于外 ,此思善之君 ,愿忠之士 ,所以虽并生一世 ,忧心相讷 ,而终不得遇者也。

【译文】

国家所以能得到治理是君主英明的原因 ,国家所以变乱是君主昏暗的原因。君主所以英明是因为他能多方听取意见 ,君主所以昏暗是他偏听偏信的缘故。因此君主通达多方听取意见 ,而圣明就日益宽广了 ,偏听偏信谗说 ,被愚弄就更甚了。《诗

经》说：“古人曾经有话说，凡事要请教割草砍柴的人。”

尧、舜治理天下，开四方元门，明四方之目，通四方之聪，所以天下人物聚集而圣明无所不照，因此像共工、鲧这样的恶人也不能加以阻塞，恭敬的谗言也不能迷惑他。秦朝的二世胡亥，听从赵高之言把自己隐藏于深宫，和百官隔离起来，疏远百姓而信任赵高，所以听闻堵塞于权贵之臣，明察掩蔽于骄横妒忌之人，所以天下溃逃叛乱，而不得知晓，后被赵高所杀，大臣不敢谈论此事。周章到达戏这个地方才开始惊骇起来，阎乐的进劝才使二世后悔，不也晚了吗！所以国君要多方听取采纳下面的意见，而权臣就不能诬陷他人了，而偏远地方人就不能被欺骗了，待慢百姓宠信权贵，朝廷就听不到善言，而廉洁之士只好献身伏罪于旷野了。

朝臣因为是总理天下的，而植党营私就乱法，贤人因为是奉信自己的，而隐蔽逃匿于山野国君就孤立了。法制废乱国君孤立而能生存的，未曾有过。所以明君治民理政，必须采纳下言用以招贤于外，敬纳卑贱之人用它来招诱贤人。君主不拒绝谏言，未必进谏的言论都能采用，君主不慢待卑贱的人，未必卑贱的人都有贤能，但惧怕慢待不贤的人就断绝了贤人的希望。因此圣王表彰小人以激励大人，赏赐鄙人以招来贤人，然后贤士才能聚集于朝中，下情才能上达于君主。因此上面没有失误的策略，官府没有乱法的大臣。这对君民都是有利的，而对奸佞之人就有祸患了。

过去张禄一见秦昭王穰侯魏冉就被免官，袁盎进谏汉景帝而周勃被罢黜。所以当权的人，常嫉妒正直的贤士，当权者得一离间之言就劝说君主用来掩饰自己的邪恶，因此上面的官员饰以虚假之辞用来蒙蔽君主之心，对下面设置威权以安定士民。赵高乱政，深怕他的罪恶被二世闻知，于是就预先要求二世说：“屡见群臣议论政事

就轻慢不敬，轻慢不敬就显示出自己的短处，不如把自己隐藏起来加以独断，这样就神圣而且尊严。天子称朕，只听其名就行了。”于是秦二世就把自隐居深宫，单独让赵高进去。赵高进入宫中好言称赞他用来谄媚二世，出来后依靠诏令而使自己尊贵无比。天下大乱之时，百姓相继率领反叛秦朝。赵高恐惧，就使阎乐责备二世而将他杀死，二世愿再见赵高一面而不准就被阎乐杀死了。

田常囚禁齐简公，踣齿悬绳吊死齐闵王，秦二世也既然听到过这些事情。但还再沿袭他们失败的轨迹这是什么原因呢？过错在于他不采纳卿士的规谏劝戒。不接受百姓流传的谚语，自以为自己贤于齐简公、齐闵公，赵高贤于田常、踣齿二臣。所以国家已乱而上面还不知道，祸患既然发生而臣下不去挽救。这不是百姓共同抛弃君主，而是二世把百姓的命运系之于赵高身上，其害是自绝于民众。

后来末世的君主为什么知道拒绝纳谏的危害呢？舜说：“我的过失，你去纠正辅佐。你不当面服从，退下来可以提意见。”所以治理国家的道理，勉励他使他规谏，宣传他使他说话，然后君主再明察而治国的事情就畅通了。

而且凡是骄横之臣就好隐蔽贤人，忧虑贤人用正义去纠正自己的错误，又耻于官居上位而明察事理不如下面，居其职而政策不出于自己之手。所以楚国郢宛甚得百姓信任而令尹子常却杀死了他，屈原甚得楚怀王信任而子椒、子兰构怨谄谗于他，耿寿昌建常平仓严延年嫉妒他的谋略，陈汤杀死郅支而匡衡轻视他的功劳。

从这里观察，地位处于卑贱而想效忠善待于君主，就必先与君主的宠臣为仇。依靠旧的宠臣将他阻止于内，然后与疏贱之人结信于外，这种思善的君子，希望尽忠的士人，所以他们虽然同生一世，忧心呼叫，而终究不得相遇。

考绩第七

凡南面之大务 ,莫急于知贤 ,知贤之近途 ,莫急于考功。功诚考则治乱暴而明 ,善恶信则直贤不得见障蔽 ,而佞巧不得逞其奸矣。

夫剑不试则利钝暗 ,弓不试则劲挠诬 ,鹰不试则巧拙惑 ,马不试则良弩疑。此四者之有相纷也 ,由不考试故得然也。今群臣之不试也 ,其祸非直止于诬、暗、疑、惑而已 ,又必致于怠慢之节焉。设如家人有五子十孙 ,父母不察精慥 ,则勤力者懈弛 ,而惰慢者遂非也 ,耗业破家之道也。父子兄弟 ,一门之计 ,犹有若此 ,则又况乎群臣总猥治公事者哉 ?《传》曰 :“ 善恶无彰 ,何以沮劝 ?” 是故大人不考功 ,则子孙惰而家破穷 ;官长不考功 ,则吏怠傲而奸兴 ;帝王不考功 ,则直贤抑而□伪胜。故《书》曰 :“ 三载考绩 ,黜陟幽明。” 盖所以昭贤愚而功能否也。

圣王之建百官也 ,皆以承天治地 ,牧养万民者也。是故有号者必称于典 ,名理者必效于实 ,则官无废职 ,位无非人。夫守相令长 ,效在治民 ;州牧刺史 ,在宪聪明 ;九卿分职 ,以佐三公 ;三公总统 ,典和阴阳 ;皆当考治以效实为王休者也。侍中、大夫、博士、议郎 ,以言语为职 ,谏诤为官 ,及选茂才、孝廉、贤良方正、惇朴、有道、明经、宽博、武猛、治剧 ,此皆名自命而号自定 ,群臣所当尽情竭虑称君诏也。

今则不然 ,令长守相不思立功 ,贪残专恣 ,不奉法令 ,侵冤小民。州司不治 ,令远诣阙上书讼。尚书不以责三公 ,三公不以让州郡 ,州郡不以讨县邑 ,是以凶恶狡猾易相冤也。侍中、博士谏议之官 ,或处位历年 ,终无进贤嫉恶拾遗补阙之语 ,而贬黜之忧。群僚举士者 ,或以顽鲁应茂才 ,以桀逆应至孝 ,以贪饕应廉吏 ,以狡猾应方正 ,以

谗谄应直言 ,以轻薄应敦厚 ,以空虚应有道 ,有器暗应明经 ,以残酷应宽博 ,以怯弱应武猛 ,以愚顽应治剧 ,名实不相副 ,求贡不相称。富者乘其材力 ,贵者阻其势要 ,以钱多为贤 ,以刚强为上。凡在位所以多非其人 ,而官听所以数乱荒也。

古者诸侯贡士 ,一适谓之好德 ,载适谓之尚贤 ,三适谓之有功 ,则加之赏。其不贡士也 ,一则黜爵 ,载则黜地 ,三黜则爵土俱毕。附下罔上者死 ,附上罔下者刑 ,与闻国政而无益于民者斥 ,在上位而不能进贤者逐。其受事而重选举 ,审名实而取赏罚也如此。故能别贤愚而获多士 ,成教化而安民氓。三代于世 ,皆致太平。圣汉践祚 ,载祀四八 ,而犹未者 ,教不假而功不考 ,赏罚稽而赦赎数也。谚曰 :“ 曲木恶直绳 ,重罚恶明证。” 此群臣所以乐总猥而恶考功也。

夫圣人为天口 ,贤人为圣译。是故圣人之言 ,天之心也。贤者之所说 ,圣人之意也。先师京君 ,科察考功 ,以遗贤俊 ,太平之基 ,必自此始 ,无为之化 ,必自此来也。

是故世主不循考功而思太平 ,此犹欲舍规矩而为方圆 ,无舟楫而欲济大水 ,虽或云纵 ,然不知循其虑度之易且速也。群僚师尹 ,咸有典司 ,各居其职 ,以责其效 ;百郡千县 ,各国其前 ,以谋其后 ,辞言应对 ,各缘其文 ,以□其实 ,则奉职不解 ,而陈言者不得诬矣。《书》云 :“ 赋纳以言 ,明试以功 ,车服以庸 ,谁能不让 ? 谁能不敬应 ?” 此尧、舜所以养黎民而致时雍也。

【译文】

凡是国君的大务 ,没有比知贤更急迫了 ,知贤的最近途径 ,没有比考核官吏的功绩更急迫了。功绩果真经过考核则治和乱就表现出来而可以明察了 ,善恶不欺则真

正的贤才就不能被遮蔽,而奸佞之人就不能逃脱其邪恶了。

剑不用利钝就不明,鹰不用巧笨就被迷惑,马不用良驽就被怀疑。这四件事之所以有所争论,是由于不考验试用的缘故而才这样的。当今群臣不加考试,其祸害不止于诬谄、昏暗、怀疑、迷惑罢了,又必然大开官吏怠慢的道路。假设家中的人有五个儿子十个孙子,父母不考察他们是能干还是怯懦,而勤奋用力的人就会懈怠松弛,而惰慢的人就会顺从过错,这是损业败家的道理。父子兄弟,一家的计议,还尚且如此,则又何况群臣治理纷杂众多的公事呢?《左传》说:“善恶不能彰明,怎能不败坏勤奋呢?”因此父兄们不考察功绩,则子孙就懈怠而家庭就会败穷,官长不考察功绩,而官吏就会懈怠傲慢而犯法作乱之事就会兴起,帝王不考察臣下功绩,而真正的贤人就会被压抑而诈伪之人就会盛大。所以《尚书》说:“三年考察功绩,昏暗和明智之人就会得到罢黜和提升。”这就可以昭明是贤还是愚而奖励有才能的人与劝勉没有才能的人。

圣王所建立的百官,都是上承天命下治国土,畜养万民的。因此有名号的人必著于典籍,名理的人必效法于实际,使名实相符,而官吏就不废弃他的职责,在位的人都称其职守。太守国相县令县长,功效在于治理百姓,州牧刺史,在于扩大视听;九卿分别其职责,用以辅佐三公;三公总理天下,理顺阴阳,都应当考治其功绩以效实用,宣扬天子的美德。侍中、大夫、博士、议郎;用言语作为他们的职责,用谏诤来做官,至于所推选的茂才、孝廉、贤良方正、惇朴、有道、明经、宽博、武猛、治剧,这些都是因名而自定其职责的,群臣应当尽情竭诚称举君王的诏命。

现在就不是这样,县令县长太守国相不想立功,贪残残暴专权自恣,不守法令,侵渔百姓,冤枉小民。州牧不加治理,使百姓远到宫廷上书诉讼。尚书不因此而责难

三公,三公不因此而责备州郡,州郡不因此而整顿县邑官员,因此凶恶狡猾的人很容易使百姓遭受冤屈,侍中、博士、谏官,有的处在官位上已超过一年,始终没有发表推荐贤才、憎恨恶人和补录缺漏的言论,却没有被贬罢黜的忧虑。百官荐举士人,或用愚昧鲁钝充当茂才,有的用凶暴背叛的人充当极孝,有的用贪得无厌的人充当廉洁,有的用狡猾的人充当方正,有的用阿谀谄媚的人充当直言,有的用轻薄的人充当敦厚,有的用空虚无德的人充当有道,有的用暗哑的人充当明经,有的用残酷的人充当宽博,有的用怯懦的人充当武猛,有的用愚顽的人去充当治剧,名实不能相副,求贤与贡举不能相称。豪富的人靠着他的财力得以进取,权贵之人靠着他的势力去阻止贤士,认为钱多就是贤才,以权势为上。凡是在官位的人大多不能胜任其职,这是造成混乱的原因。

古时候诸侯向君主推荐人才,一次合适的称为好德,再次合适的谓为崇尚贤能,三次合适的谓为有功,就加以赏赐。而不推荐人才的官员,一次就罢黜其爵位,再次就罢黜其封地,三次就爵位土地俱无。依附于下欺瞒于上的要处死,依附于上欺瞒于下的要行刑,参预国政而无益于百姓的人要斥责,处在上位而不能进贤的人要逐退。当他接受职事而重视选举,详查名实而严于赏罚也是这样。因而能区别贤愚而获众多贤士,成就教育感化而安定百姓。夏、商、周三代之世,治理都能达到太平。大汉建位以后,祀年三百六十余年,而还未竟,教化不到而功绩未课考,赏罚停留而屡次赦免赎罪。谚语说:“弯曲的木头厌恶直的绳子,重罚厌恶明证。”这是群臣所以乐于纷杂而厌恶考察功绩的缘故。

圣人是天的口舌,贤人为圣人传译旨趣。因此圣人的言论,是天的心思。贤人的说教,是圣人的心意。先师国君,课察考核功绩,用以延及贤俊,太平的根基,必从此开始,无为而治,必从此而来。

所以当今君主不依照考察功绩而想太平,这就如舍弃规矩而做方圆,没有船和浆而想渡过大河,虽说或许能成功,但不如依照自己的思考谋划更容易而且迅速。群僚百官,都有所掌,各居其职位,以责求他们做出成效;百郡千县,各以国家利益在前,然后加以谋划,言辞应对,各沿其文,以核

其实,百官奉职就不懈怠,而陈说的人就不能再欺骗了。《尚书》说:“应该听取他的言论,明察他的作事能力,有功就要用车马服饰酬劳他,谁敢不让呢?谁能不尊敬响应他呢?这是尧、舜所以养育众民而达到时和的原因。”

思贤第八

国之所以存者治也,其所以亡者乱也。人君莫不好治而恶乱,乐存而畏亡。然尝观上记,近古以来,亡代有三,秽国不数,夫何故哉?察其败,皆由君常好其所乱,而恶其所治,憎其所以存,而爱其所以亡。是故虽相去百世,县年一纪,限隔九州,殊俗千里,然其亡征败迹,若重规袭矩,稽节合符。故曰:虽有尧、舜之美,必考于《周颂》;虽有桀、纣之恶,必讥于《版》、《荡》。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夫与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与亡国同行者,不可存也。岂虚言哉!何以知人之且病也?以其不嗜食也。何以知国之将乱也?以其不嗜贤也。是故病家之厨,非无嘉饌也,乃其人弗之能食,故遂于死也。乱国之官,非无贤人也,其君弗之能任,故遂于亡也。夫生饌粳粱,旨酒甘醪,所以养生也,而病人恶之,以为不若菽麦糠糟欲清者,此其将死之候也。尊贤任能,信忠纳谏,所以为安也,而暗君恶之,以为不若奸佞闾茸谗谀之言者,此其将亡之征也。老子曰:“夫唯病病,是以不病。”《易》称“其亡其亡,系于苞桑。”是故养寿之士,先病服药,养世之君,先乱任贤,是以身常安而国永永也。

上医医国,其次下医医疾。夫人治国,固治身之象。疾者身之病,乱者国之病也。身之病待医而愈,国之乱待贤而治。治身有黄帝之术,治世有孔子之经。然病不愈

而乱不治者,非鍼石之法误,而《五经》之言诬也,乃因之者非其人。苟非其人,则规不圆而矩不方,绳不直而准不平,钻燧不得火,鼓石不下金,驱马不可以追速,进舟不可以涉水也。凡此八者,天之张道,有形见物,苟非其人,犹尚无功,则又况乎怀道术以抚民氓,乘六龙以御天心者哉?

夫治世不得真贤,譬犹治疾不得真药也。治疾当得真人参,反得支罗服,当得麦门冬,反得蒸穰麦。己而不识真,合而服之,病以侵剧,不自知为人所欺也。乃反谓方不诚而药皆无益于疗病,因弃后药而弗敢饮,而便求巫覡者,虽死可也。人君求贤,下应以鄙,与直不以枉。己不引真,受猥官之,国以侵乱,不自知为下所欺也。乃反谓经不信而贤皆无益于救乱,因废真贤不复求进,更任俗吏,虽灭亡可也。三代以下,皆以支罗服、蒸穰麦合药,病日剧而遂死也。

《书》曰:“人之有能,使循其行,国乃其昌。”是故先王为官择人,必得其材,功加于民德称其位,人谋鬼谋,百姓与能,务顺以动天地如此。三代开国建侯,所以传嗣百世,历载千数者也。

自春秋之后,战国之制,将相权臣,必以亲家。皇后兄弟,主婿外孙,年虽童妙,未脱桎梏,由借此官职,功不加民,泽不被下而取侯,多受茅土,又不得治民效能以报百姓,虚食重禄,素餐尸位,而但事淫侈,坐

作骄奢,破败而不及传世者也。

子产有言:“未能操刀而使之割,其伤实多。”是故世主之于贵戚也,爱其嬖媚之美,不量其材而授之官,不使立功自托于民,而苟务高其爵位,崇其赏赐,令结怨于下民,县罪于恶,积过既成,岂有不颠陨者哉?此所谓“子之爱人,伤之而已”哉!

先主之制,官民必论其材,论定而后爵之,位定然后禄之。人君也此君不察,而苟以亲戚色官之人典官者,譬犹以爱子易御仆,以明珠易瓦砾,虽有可爱好之情,然而其覆大车而杀病人也必矣。《书》称“天工人其代之”《传》曰:“夫成天地之功者,未尝不蕃昌也。”由此观之,世主欲无功之人而强富之,则是与天斗也。使无德况之人与皇天斗,而欲久立,自古以来,未之尝有也。

【译文】

国家所以能够存在是由于治理的结果,国家所以灭亡是由于变乱的结果。国君无不好言治理而厌恶变乱,乐于生存而畏惧危亡。但我曾观看上古之书,从近古以来,灭亡的朝代有夏商周三代,灭亡的国家无数,这是什么缘故呢?观察国家的败亡,都是由于君主平常喜好国家变乱,而厌恶国家的治理,为什么要憎恶其生存,而喜好其危亡。因此虽相离百代,远隔一世,绝隔九州,千里不同习俗,但它危亡的征兆失败的轨迹,就像因袭重复它的轨迹一样,合节合符。所以说:虽然有尧、舜的美德,必考察于《周颂》;虽然有夏桀、殷纣的罪恶,必讥谏于《版》、《荡》。以殷为借鉴还不远,就在夏代朝廷上。

和死人同一个病症的,不可生存;与亡国同行的,不可存在。怎能是虚言呢?为什么能知道人将有病呢?因为他不爱吃食物。为什么能知道国家将乱呢?以其不爱贤才。因此病人家中的厨窗内,并不是没有好吃的食品,是病人不能吃,所以就死

了。乱国的官员,并不是没有贤人,是国君不能任用他,所以就亡国了。生饭粳粮,美酒甜醪,是用来养生的,而病人厌恶它,认为不如用菽麦糟糠做成的冷饮,这是他将死的征兆。尊重贤人任用能人,听信忠言采纳谏议,是为了安定,而昏君厌恶它,认为不如奸佞卑贱谄谀之言好听,这是国家将要灭亡的征兆。老子说:“把缺点视为缺点,所以才没有缺点。”《易》称赞说:“其败亡其败亡,把它系在苞草桑枝上。”因此长寿的士人,有病先服药;长久统治的国君,首先要治理国家任用贤人,才能身常安国永保。

上等医生医治国家,其次下等医生医治疾病。而人治理国家,诚然和治身一样。疾是身体的病状。乱是国家的病症。身体的病状等待医治后才能全愈,国家的危乱要等待贤人而治。医治身体有黄帝的医术,治理国家有孔子制定的《五经》。但疾病不愈而危乱得不到治理,并非针灸之法错误,而《五经》之言诬罔,是因为治理者不是那种贤人。如果不是那种人,就规不圆而矩不方,绳子不直而准不平,钻燧得不到火,用橐扇火而不下金,驱马而不能追速,推舟不可以涉水。凡此八种,天所设之道,有形才能见物,如果不是那种人,还尚且无功,就又何况身怀道术用以安抚百姓,乘六龙以奉天的心思呢?

治理世道得不到真正的贤人,就像治病得不到真药一样。治病应当得到真人参,反而得到萝卜根;应当得到麦门冬,反而得到穠麦根。旋即不识真假,调和而服用,病就逐渐加重,不知自己被人所欺骗。于是反说药方不实而药都无益于治病,因而放弃后来的药而不敢饮用,进而便求巫治病,虽死应该。君主求贤荐举正直之人,下面以卑鄙违法之人应付,自己不识别真假,授于污秽之官。国家因此逐渐混乱,还不知自己被下面所欺骗。就反说经不可信而贤才都无益于拯救乱世,因此就废弃真正的贤人不再求贤,改任不学无术的官吏,

虽灭亡也是应该的。从三代以下,都用萝卜根、糠麦根调合药,病日甚而遂即死亡。

《尚书》说:“人有才能,使他修养自己的行为,国家就昌盛了。”因此先王为官选择人员,必得其才而用之,功劳施于百姓,道德和他的地位相称,通过咨询与人商议,通过卜筮与鬼商议,百姓也可以参与谋划,务顺其行以感动天地。三代开国建立诸侯的制度,所以能传继百代,历时一千余年。

从春秋以后,战国的制度,将相权臣,必然用亲家。皇后的兄弟,主婿外孙,年纪虽是幼童,尚未脱离襁褓,也因此给以官职,功不施于民,德泽不覆盖于下而被封侯,多接受白茅封土,又不能治理人民发挥效能以报效百姓,虚食国家俸禄,居位食禄而不尽职,空事淫侈,坐作骄奢,这是身遭破坏而不能传世的原因。

子产有言说:“一个人不会拿刀让他去割东西,他的伤害一定要多。”因此君主对于贵戚,爱他的宠幸谄媚的美丽,不衡量

他的才能而授予官职,不使他立功把自己委托于百姓,而草率给以高的爵位,崇高他的赏赐,使他结怨于百姓,系罪恶于下民,堆积过错既然成为这样,怎么能不坠落死亡呢?这就是所谓的“你喜爱一个人,不过是伤害他罢了”!

开国君主的制度,官吏必因才论定,论定之后再授给爵位,爵位确定后再给以俸禄。当今的君主就不考察这些,而苟且以子弟面目美好者为官而掌管官吏,就好像用爱子去交换御夫,用明珠去交换瓦片,虽有可以爱好的情趣,然而它能颠覆大车杀害病人,必定是这样。《尚书》称“天的职司用人可以代替它”,《左传》说:“能成就天地的功劳。未尝不繁茂昌盛。”从这观看,君主想让无功的人而富强,就是与天作对。使无德的人把德布施于民就是与皇天作对,而想长久立于不败之地,从古以来,未曾有过。

本政第九

凡人君之治,莫大于和阴阳。阴阳者,以天为本。天心顺则阴阳和,天心逆则阴阳乖。天以民为心,民安乐则天心顺,民愁苦则天心逆。民以君为统,君政善则民和治,君政恶则民冤乱。君以恤民为本,臣忠良则君政善,臣奸枉则君政恶。以选为本,选举实则忠贤进,选虚伪则邪党贡。选以法令为本,法令正则选举实,法令诈则选虚伪。法以君为主,君信法则法顺行,君欺法则法委弃。君臣法令之功,必效于民。故君臣法令善则民安乐,民安乐则天心慰,天心慰则阴阳和,阴阳和则五谷丰,五谷丰而民眉寿,民眉寿则兴于义,兴于义而无奸行,无奸行则世平,而国家宁、社稷安,而君尊荣矣。是故天心阴阳、君臣、民氓、善恶相辅至而代相征也。

夫天者国之基也,君者民之统也,臣者治之材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是故将致太平者,必先调阴阳,调阴阳者,必先顺天心,顺天心者,必先安其人,安其人者,必先审择其人。是故国家存亡之本,治乱之机,在于明选而已矣。圣人知之,故以为黜陟之首。《书》曰:“尔安百姓,何择非人?”此先王致太平而发颂声也。

否泰消息,阴阳不并,观其新聚,而兴衰之端可见也。稷、碣、皋陶聚而致雍熙,皇父、颺、躋聚而致灾异。夫善恶之象,千里合符,百世累迹,性相近而习相远。是故贤愚在心,不在贵贱;信欺在性,不在亲疏。二世所以共亡天下者,丞相、御史也。高祖所以共取天下者,繒肆、狗屠也。邙山之徒,钜野之盗,皆为名将。由此观之,苟得其

人不患贫贱,苟得其材,不嫌名迹。

远迹汉元以来,骄傲之臣,每受罪诛,党与在位,并伏辜者,常十二三。由此观之,贵宠之臣,未尝不播授私人进奸党也。是故王莽与汉公卿牧守夺汉,光武与汉之遗民弃士共诛。如贵人必贤而忠,贱人必愚而欺,则何以若是?

自成帝以降,至于莽,公卿列侯,下讫令尉,大小之官,且十万人,皆自汉所谓贤明忠正贵宠之臣也。莽之篡位,惟安众侯刘崇、东郡太守翟义思事君之礼,义勇奋发,欲诛莽。功虽不成,志节可纪。夫以十万之计,其能奉报恩,二人而已。由此观之,衰世群臣诚少贤也,其官益大者罪益重,位益高者罪益深尔。故曰:治世之德,衰世之恶,常与爵位自相副也。

孔子曰:“国有道,贫且贱焉,耻也;国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诗》伤“皎皎白驹,在彼空谷”;“巧言如流,俾躬处休。”盖言衰世之士,志弥洁者身弥贱,佞弥巧者官弥尊也。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同明相见,同听相闻,惟圣知圣,惟贤知贤。

今当涂之人,既不能昭练贤鄙,却又却于贵人之风指,胁以权势之属托,请谒阖门,礼赞辐辏,迫于目前之急,则且先之。此正士之所独蔽,而群邪之所党进也。

周公之为宰辅也,以谦下士,故能得真贤。祁奚之为大夫也,举仇荐子,故能得正人。今世得位之徒,依女妹之宠以骄士,借亢龙之势以陵贤,而欲使志义之士,匍匐曲躬以事己,毁颜谄谀以求亲,然后乃保持之,则贞士采薇冻馁,伏死岩穴之中而已尔,岂有肯践其阃而交其人者哉?

【译文】

凡是君主治国,莫大于协调阴阳。阴阳的事,是天的根本。天的心思顺畅则阴阳就协调,天心发怒阴阳就不和谐。天的心思是为了百姓。百姓安乐则天的心思就顺畅,百姓愁苦老天就发怒。百姓以君主

为总统,国君施行善政而百姓就和洽治理,君主施行恶政百姓就冤枉叛乱。君主以体恤百姓为根本,臣子忠诚善良则君政就美好,臣子邪恶不正直则君政就败坏。以选举为根本,选举真实则忠贤之人就会被进用,选举虚伪邪党就会被荐举。选举以法令为根本,法令正直选举就真实,法令有欺骗则选举就虚伪。法令以国君为主,君主信法则法令就会顺利推行,君主欺骗法令就会被丢弃。君臣使法令精善,必效力于民。因此君臣法令善美则百姓就安乐,百姓安乐则天心就得到安慰,天心安慰则阴阳就会协调,阴阳协调就五谷丰登,五谷丰登则百姓就长寿,百姓长寿则道义兴,道义兴则没有奸邪的行为,没有奸邪的行为则世道就平安了,而国家就安宁、社稷就安定了,而君主就尊荣了。所以天心阴阳、君臣、百姓、善恶相互辅佐得当而更加互相征召了。

百姓是国家的基础,君主是百姓的总统,臣子是治国的贤才。工匠想要搞好他的工作,一定要先搞好他的工具。因此将达到太平的人,必先协调阴阳,协调阴阳的人,必先顺从天心;顺从天心的人,必先安定他的百姓;安定百姓的人,必先审察选择他的人员。所以国家存亡的根本,治乱的关键,在于明选人才罢了。圣人知道它,所以把罢黜和进升作为首要的事情。《书》说:“你安定百姓,为什么挑不适当的人?”这是先王达到太平而发出颂扬之声的原因。

坏好生灭盛衰,阴阳不齐等,察看它的聚集,而兴衰的头绪就可见了。稷、契、皋陶集合在一起就可达到和乐,皇父、瞽瞍聚合在一起而就遭致灾难。善恶的象征,千里相符合,百代的迹像都相重迭,人的性情本来是相近的,因为习染不同就相距太远了。因此贤和愚在于思想,而不在于贵和贱,诚信和欺骗在于性情,而不在亲疏远近。秦二世所共亡天下,是因为丞相、御史。汉高祖所以共取天下,是因为有卖缯

的灌婴、屠狗的樊哙；骊山的刑徒黥布、钜野的盗贼彭越，都是名将。由此来观察，假如得到人，不怕贫贱；如果得到其才，不嫌疑他的事迹。

远的踪迹从汉朝元年以来，骄横尊贵之臣，每次有罪被杀，党羽在位置上的，并服其罪的，常有十之二三。由此观察，权贵宠幸之臣，未尝不传授私人进用奸党。因此王莽与汉朝公卿州牧郡守篡夺汉朝政权，光武帝刘秀和汉朝遗民及被弃之士共同诛杀王莽。如果富贵之人必贤而忠诚，卑贱的人必愚昧而欺骗，就为什么是这样呢？

自汉成帝以下，至于王莽，公卿列侯，下至县令县尉，大小官员，尚且十万人，都是汉所谓的贤明忠正贵宠之臣。王莽的篡位，只有安众侯刘崇、东郡太守翟义思念事奉君主的礼节，义勇奋发，想诛杀王莽。功劳虽然未能成功，志向节操可以记录。此以十万之人计算，而能奉上报恩的，仅此二人罢了。由这观察它，衰败之世群臣诚然缺少贤人，其官越大的人罪恶越重，地位越高的人罪恶越深。所以说：安定之世的道德，衰败之世的罪恶，常与爵位是相称的。

孔子说：“国家政治清明，自己贫贱，是耻辱；国家政治黑暗，自己富贵，也是耻

辱。”《诗经》哀伤“洁白光明的白驹，在那空空的深谷中。”“花言巧语如流，想做高官不愁。”是说衰败世道的士，志向更纯洁的人出身更卑贱，奸佞谄媚更花言巧语的人官职更加尊贵。人以类聚，物以群分，共同光明才能相见，共同的声音才能听见，只有圣明的人才能理解圣明，只有贤人才能理解贤才。

如今当权的人，既不能显扬练选贤士和卑鄙之人，但又附和贵人的旨意，被权势们的嘱托所胁迫，请托求见的堵塞家门，送礼的人从四面八方聚集，迫于当时着急的情况，其他之事暂且先搁下。这是正直的士人所被独自遮蔽，群邪之人能够结党而进的原因。

周公作为辅政大臣，用谦让礼贤下士，因而能得到真正的贤人。祁奚作为大夫，推举他的仇人和自己的儿子以代替自己，因此能得到正直的人。当今得到官位的人，依仗他的女儿妹妹的得宠用来傲慢士人，凭借直龙的势力用来欺凌贤人，而要使志士仁人，匍匐于地弯曲着身体以事奉自己，毁坏面孔谄谀他人以求得亲信，然后就保护扶持佐助他，而贞烈之士就只好采集野菜受冻挨饿，横尸于岩穴之中罢了，怎会有肯到他们上而去结交他呢？

潜叹第十

凡有国之君，未尝不欲治也，而治不世见者，所任不贤故也。世未尝无贤也，而贤不得用者，群臣妒也。主有索贤之心，而不得贤之术，臣有进贤之名，而无进贤之实，此以人君孤危于上，而道独抑于下也。

夫国君之所以致治者公也，公法行则轨乱绝。佞臣之所以便身者私也，私术用则公法夺。列士之所以建节者义也，正节立则丑类代。此奸臣乱吏无法之徒，所为日夜杜塞贤君义士之间，咸使不相得者也。

夫贤者之为入臣，不损君以奉佞，不阿众以取容，不堕公以听私，不挠法以吐刚，其明能照奸，而义不比党。是以范武归晋而国奸逃，华元反朝而鱼氏亡。故正义之士与邪枉之人不两立。而人君之取士也，不能参听民氓，断之聪明，反徒信乱臣之说，独用污吏之言，此所谓与仇选使，令囚择吏者也。

《书》云：“谋及乃心，谋及庶人。”孔子曰：“众好之，必察焉；众恶之，必察焉。”故

圣人之施舍也，不必任众，亦不必专己，必察彼己之为，而度之以义，或舍人取己，故举无遗失而政无废灭也。或君则不然，己有所爱，则因以断正，不稽于众，不谋于心，苟眩于爱，惟言是从，此政之所以败乱，而士之所以放佚者也。

昔纣好色，九侯闻之，乃献厥女。纣则大喜，以为天下之丽莫若此也，以问妲己。妲己惧进御而夺己爱也，乃伪俯而泣曰：“君王年即耆邪？明既衰邪？何貌恶之若此而覆谓之好也？”纣于是渝而以为恶。妲己恐天下之愈进美女者，因白“九侯之不道也，乃欲以此惑君王也。王而弗诛，何以革后？”纣则大怒，遂脯厥女而烹九侯。自此之后，天下之有美女者，乃皆重室昼闭，惟恐纣之闻也。赵高专秦，将杀二世，乃先示权于众，献鹿于君，以为骏马。二世占之曰：“鹿。”高曰：“马也。”二世收目独视，曰：“丞相误邪！此鹿也。”高终对以马。问于朝臣，朝臣或助二世而非高。高因白二世：“此皆阿主惑上，不忠莫大。”乃尽杀之。自此之后，莫敢正谏，而高遂杀二世于望夷，竟以亡。

夫好之与恶效于目，而鹿之与马者著于形者也，已又定矣。还至谗如臣妾之饰伪言而作辞也，则君王失己心，而人物丧我体矣。况乎逢幽隐囚人，而待校其信，不若察妖女之留意也；其辞贤不肖也，不若辨鹿马之审固也。此二物者，皆得进见于朝堂，暴质于心臣矣。及欢爱、苟媚、佞说、巧辨之惑君也，犹炫耀君目，变夺君心，便以好为丑，以鹿为马，而况于郊野之贤，阙外之士，未尝得见者乎？

夫在位者之好蔽贤而务进党也，自古而然。昔唐尧之大圣也，聪明宣昭，虞舜之大圣也，德音发闻。尧为天子，求索贤人，访于群后，群后不肯荐舜而反称共、鯀之徒，赖尧之圣，后乃举舜而放四子。夫以古圣之质也，尧聪之明也，舜德之彰也，君明不可欺，德彰不可蔽也。质鲜为佞，而位者尚直若彼。今夫列士之行，其不及尧、舜乎

达矣，而俗之荒唐，世法滋彰。然则求贤之君，哀民之士，其相合也，亦必不几矣。文王游畋，遇姜尚于渭滨，察言观志，而见其心，不谄左右，不谀群臣，遂载反归，委之以政，用能造周。故尧参乡党以得舜，文王参己以得吕尚，岂若殷辛、秦政，既得贤人，反决滞于仇，诛杀正直，而进任奸臣之党哉？

是以明圣之君于正道也，不专驱于贵宠，惑于嬖媚，不弃疏远，不轻幼贱，又参而任之。故有周之制也，天子听政，使三公至于列士献典，良史献书，师箴，瞽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无败也。

末世则不然，徒信贵人骄妒之议，独用苟媚蛊惑之言，行丰礼者蒙睨眄，论德义者见尤恶，于是谏臣又从以诋訾之法，被以议上之刑，此贤士之始困也。夫诋訾之法者，伐贤之斧也，而嫉妒者，噬贤之狗也。人君内秉伐贤之斧，权噬贤之狗，而外招贤，欲其至也，不亦悲乎！

【译文】

凡拥有国家的君主，未尝不想治理国家，而治理国家积年不见成效的原因，是所任用的人不贤明的缘故。世上未尝没有贤人，是贤人得不到任用，群臣嫉妒他。君主虽有求贤的心思，而没有得到贤人的方法，臣下有进贤的虚名，而没有进贤的实质，这将使君主孤立危急于上面，而道义独被抑压在下面。

国君之所以能达到治理是为了公正，公正的法治通行而内乱就断绝。阿谀奉承的臣子之所以方便自己是为了私利，为了私利而要手段，而公正的法制就被剥夺。贞烈之士所以建立节操是为了正义，正直的节操树立了而丑恶之类就被代替。这是奸臣乱吏不法之徒，使贤君义士之间日夜加以隔离阻塞，使他们不能相得益彰。

有德才的人作为臣子，不损害君主不

尊奉奸人,不阿谀众人,不取得别人欢喜,不坠怠公事,不听私言,不扰乱法制,不畏惧强暴,他的明察能照出奸佞,而仁义不私自营利。因此范武子回到晋国而奸人就逃跑了,宋国的华元返朝后鱼石、鱼府等就逃亡了。所以正义的士人与邪恶之徒势不两立。而君主的取士,不能参与听从百姓的声音,判断他的聪明,反而只信乱臣之说,独用污吏之言,这就是所说的与仇敌推选使臣,命令囚犯选择官吏。

《尚书》说:“咨询要达到别人的心上,咨询要达到百姓。”孔子说:“大家喜欢他,一定要去考察,大家厌恶他,也一定要去考察。”因此圣人的施舍,不要承担太多,也不要自己专权,要考察自己和他人的作为,而投之以德义,或放弃别人的意见而听从自己的意见,所以推荐就没有遗失而政事就不废弃。有的君主就不是这样,自己有所喜爱,就因此判断为正直,不考核于众人,不谋划于心,只迷惑于爱,只有他的言语才听从,这是政事所以败坏紊乱,而士人所以散失弃置的原因。

过去殷纣王喜好女色,九侯听说后,就把他的女儿献给纣王。纣王就大喜,认为天下的美女都不如她,而问妲己。妲己怕把她进献给纣王而夺去自己的宠爱,就假装低头而哭泣说:“君王的年纪将要老了吗?明天就要衰了吗?为什么面貌丑恶的却如此称之为美好呢?”殷纣王于是改变态度而以为丑恶。妲己恐怕天下还进献美女,因此就说:“九侯的无道,是要用美女迷惑君王。君王而没有杀他,如何革除后患?”纣王大怒,于是把他的女儿切成肉干而烹杀九侯。从此以后,天下有美女的人,就都重室白天紧闭其门,唯恐纣王听到消息。赵高专权于秦国,将要杀死秦二世,就先显示自己的权势于众官员,他进献给二世一头鹿,以为是骏马。二世窥视后说:“鹿。”赵高说:“马。”二世聚目注视,说:“丞相错了!这是鹿。”赵高始终回答说是马。二世问朝臣,朝臣有的帮助二世而非

议赵高。赵高向二世表白说:“这些人阿谀君主迷惑皇上,是最大的不忠。”就将他们全部杀死。从此以后,大臣不敢正谏,而赵高于是杀死二世于望夷宫,秦竟然灭亡。

好和恶呈现于眼前,就和鹿与马显现出形状一样,皆是已经肯定的事了。及至谄谀之臣嫉妒之妾巧饰虚伪之言和造作之辞,而君王也就失去了自己的主见,而人和物都丧失在自己手中。何况遇见被囚禁之人,还待核实其诚信,不如考察妖女那样留心,辨别贤才和不肖的人,不如辨别鹿和马那样坚定。这两种东西,都得以进见于朝堂,暴露其本质于心目之中。至于欢爱、苟同谄媚、谄谀取悦、巧言善辨以迷惑君主,还惑乱君主的耳目,改变君主的心思,就以美为丑,以鹿为马,而何况在郊野的贤人、宫门外面的士人,未曾看见妖女和鹿的人呢?

在官位的人好遮蔽贤才而专务推荐群党,自古以来就是这样。过去唐尧是大圣人,聪明显扬,虞舜是大圣人,歌颂的声音传布四方。尧做天子,求索贤人,访问于诸侯,诸侯不肯推荐舜而反称赞共工、鲧等人,依靠着尧的圣明,后来才推举舜而流放共工、驩兜、三苗和鲧四人。以古圣人的贤质,尧的聪明,舜德的彰明,君主英明就不被欺骗,道德彰明就不受蒙蔽。诚实者很少有谄媚之臣,而在官位者崇尚正直就像尧舜那样。当今贞烈之士的行为,他们赶不上尧、舜太远了,世俗的荒唐,代代效法润泽显扬。那么求贤的君主,怜悯百姓的贤士,心愿相合的,也必没有几个。周文王游猎,遇到姜尚于渭水之边,考察他言论观察他的志向,就看到了他的心,不咨询左右的人,不询问朝臣,于是用车载着他而回,委任他以政事,用他建立了周朝。所以尧检验于乡里的意见才得到了舜,周文王检验自己就得到了吕尚,怎么能像殷纣王、秦王政既得到了贤人,反而沉滞于仇人,诛杀正直之士,而推荐信任奸臣的党羽呢?

所以圣明的君主要实行正道,不专驱

使于宠贵之臣 ,迷惑于宠幸谄媚之人 ,要不遗弃疏远的人 ,不轻视幼童和卑贱的人 ,让他们参与而任用他们。因此周朝的制度 ,天子听政时 ,使三公下至贞烈之士献曲 ,良史献书 ,乐官劝谏 ,瞽人赋诗 ,矇人诵诗 ,众多的工匠谏诤 ,听取百姓流传的谚语 ,亲近之臣尽心规范 ,亲戚加以补充考察 ,乐官加以教诲 ,老年人加以修饰 ,然后君主再加以斟酌 ,所以政事通行而不致于失败。

末代君主就不是这样了 ,专信宠臣的

骄横嫉妒的议论 ,只用花言巧语谄媚蛊惑人心的言语 ,执行大礼的人蒙受憎恨 ,议论德操仁义的人被视为更恶 ,于是谄谀之臣又用诋毁诽谤之法 ,遭受议论排上之刑 ,这是贤士始终困辱的原因。诋毁诽谤之法 ,是砍伐贤士的斧子 ,而骄横嫉妒之臣 ,是吞吃贤士的恶狗。君主内有砍伐贤士的斧子 ,权掌吃贤的走狗 ,而外表却招纳贤才 ,要想让贤士去效忠于他 ,不是也很悲哀吗 !

潜夫论第三卷

忠贵第十一

世有莫盛之福 ,又有莫痛之祸。处莫高之位者 ,不可以无莫大之功。窃亢龙之极贵者 ,未尝不破亡也。成天地之大功者 ,未尝不蕃昌也。

帝王之所尊敬 ,天之所甚爱者 ,民也。今人臣受君之重位 ,牧天之所甚爱 ,焉可以不安而利之 ,养而济之哉 ? 是以君子任职则思利民 ,达上则思进贤 ,功孰大焉 ? 故居上而下不重也 ,在前而后不殆也。《书》称“天工人其代之” ,王者法天而建官 ,自公卿以下 ,至于小司 ,辄非天官也 ? 是故明主不敢以私爱 ,忠臣不敢以诬能。夫窃人之财 ,犹谓之盗 ,况偷天官以私己乎 ? 以罪犯人 ,必加诛罚 ,况乃犯天 ,得无咎乎 ?

五代建侯 ,开国成家 ,传嗣百世 ,历载千数 ,皆以能当天官 ,功加百姓。周公东征 ,后世追思 ,召公甘棠 ,人不忍伐 ,见爱如是 ,岂欲私害之者哉 ? 此其后之封君多矣 ,或不终身 ,或不期月 ,而莫陨坠 ,其世无者 ,载莫盈百 ,是人何也哉 ?

五代之臣 ,以道事君 ,以仁抚世 ,泽及草木 ,兼利外内 ,普天率土 ,莫不被德 ,其所安全 ,真天工也。是以福祚流衍 ,本枝百世。季世之臣 ,不顺天 ,而时主是谀 ,谓破敌者为忠 ,多杀者为贤。白起、蒙恬 ,秦以为功 ,天以为贼。息夫、董贤 ,主以为忠 ,天以为盗。此等之佞 ,虽见贵于时君 ,然上不顺天心 ,下不得民意 ,故卒泣血号咷 ,以辱终也。《易》曰 :“德薄而位尊 ,智小而谋大 ,力少而任重 ,鲜不及矣。”是故德不称其任 ,其祸必酷 ,能不称其位 ,其殃必大。

且夫窃位之人 ,天夺其鉴 ,神惑其心。

是故贫贱之时 ,虽有鉴明之资 ,仁义之志 ,一旦富贵 ,则背亲损旧 ,丧其本心。皆疏骨肉而亲便辟 ,薄知友而厚狗马。财货满于仆妾 ,禄赐尽于猾奴。宁见朽贯千万 ,而不忍赐人一钱 ;宁积粟腐仓 ,而不忍贷人一斗。人多骄肆 ,负债不偿 ,骨肉怨望于家 ,细民谤讟于道。前人以败 ,后争袭之 ,诚可伤也。

历观前世贵人之用心也 ,与婴儿等。婴儿有常病 ,贵臣有常祸 ,父母有常失 ,人君有常过。婴儿常病 ,伤饱也 ;贵臣常祸 ,伤宠也。父母常失 ,在不能已于媚子 ;人君常过 ,在不能已于骄臣。哺乳太多 ,则必掣纵而生痼 ,贵富太盛 ,则必骄佚而生过。是故媚子以贼其躯者 ,非一门也 ;骄臣用灭其家者 ,非一世也。或以背叛横逆不道 ,或以德薄不称其贵。文昌奠功 ,司命举过 ,观恶深浅 ,称罪降罚 ,或捕格斩首 ,或拉髀掣胸 ,陪死深阱 ,衔刀部市 ,僵尸破家 ,覆宗灭族者 ,皆无功于民氓者也。而后人贪权冒宠 ,蓄积无极 ,思登颠陨之台 ,乐循覆车之迹 ,愿裨福祚 ,以备员满贯者 ,何世无之 ?

当吕氏之贵也 ,太后称制而专政 ,禄产秉事而握权 ,擅立四王 ,多封子弟 ,兼据将相 ,外内磐结 ,自以虽汤、武兴 ,五霸作 ,弗能危也。于是废仁义而尚威虐 ,灭礼信而务谄诈。海内怨痛 ,人欲其亡 ,故一朝摩灭而莫之哀也。霍氏之贵 ,专相幼主 ,诛灭同僚 ,废帝立帝 ,莫之敢违。禹继父位 ,山、云屏事 ,诸婿专典禁兵 ,婚姻本族。王氏之贵 ,九侯五将 ,朱轮二十三。太后专政 ,秉权三世。莽为宰衡 ,封安汉公 ,居摄假号 ,

身当南面，卒以篡位，十有余年，自以居之已久，威立恩行，永无祸败，故遂肆心恣意，私近忘远，崇聚群小，重赋殍民，以奉无功，动为奸诈，托之经义，迷罔百姓，欺诬天地。自以我密，人莫之知，皇天从上鉴其奸，神明自幽照其态，岂有误哉！

夫鸟以山为卑而槽巢其上，鱼以渊为浅而穿穴其中，卒所以得之者饵也。贵戚惧家之不吉而聚诸令名，惧门之不坚而作铁枢，卒其以败者，非苦禁忌少而门枢朽也，常苦崇财货而行骄僭，虐百姓而失民心尔。

孔子曰：“不患无位，患己不立。”是故人臣不奉尊礼法，竭精思职，推诚辅君，效功百姓，下自附于民氓，上承顺于天心，而乃欲任其私知，窃君威德，以陵下民，反戾天地，欺诬神明，偷进苟得，以自奉厚，居累卵之危，而图泰山之安，为朝露之行，而思传世之功，譬犹始皇之舍德任刑，而欲计一以至于万也。岂不惑哉！

【译文】

世上没有盛大的福运，又没有不悲痛的灾祸。处在地位不高的人，不可以没有极大的功劳。我听说直龙极贵这件事，未曾不败亡的。成就天地有大功的人，未曾不繁荣昌盛的。

帝王所尊敬的，天所最喜爱的，是百姓。当今人臣接受君主的重位，治理天所最爱的百姓，哪里可以不安民利民，养育而救助百姓呢？因此君子在职位上就要考虑利民，通达于上就要考虑推荐贤人，功劳哪一个大？因此居于上位的人而不要使下面加重负担，在前面的人不要使后面的人感到危险。《尚书》称赞“天的职司人可以代替它”，君主效法天而建立百官，从公卿以下，直至很小的官员，不都是天官吗？所以英明的君主不敢用私爱，忠臣不敢以无能而自以为能。偷窃别人的钱财，还称之为盗，何况是偷窃天的官职以利己呢？因罪

侵犯他人，必加以杀罚，何况是触犯天威，怎么能没有罪过呢？

从唐、虞、夏、商、周五代建立诸侯，开创国家成立基业以来，已接续百代，经历一千余年，都是因为才能才当上百官，功劳施于百姓。周公东征，后人加以追思，人们怀念召公，不忍砍伐甘棠树，被爱戴如此，怎么要私自陷害他呢？这以后受封的贵族多了，或者不能终身享受，或者不到一年，而无不殒命坠落，而其能长久于世的人，见于记载的不超过百人，此人在哪里呢？

五代的臣子，用道义事奉君主，用仁德安抚世人，恩泽施于草木，兼利于内外，普天之下四海之内，无不覆盖着他的仁德，他所以安全，真是天功。所以福运流溢，子孙百世。末世的臣子，不顺从天命，而对当时的君主进行阿谀奉承，称破敌的人为忠诚，多进行杀戮的人为贤。白起、蒙恬，秦国认为有功劳，老天认为是贼。息夫、董贤，君主以为忠诚，老天认为是盗。此等之辈，虽然见贵于当时的君主，但对上不能顺从天的心思，下面得不到百姓的心意，因此终于悲痛哭泣号咷，以耻辱而死。《易》说：“德少而地位尊贵，才智少而谋划大，能力小而责任重大，很少能达到。”所以德义不和他的职位相称，其灾祸必然惨痛，才能不和他的地位相称，其灾难必然大。

而且窃取禄位的人，老天夺去他的明察，神灵感乱他的心思。因此贫贱的时候，虽然有贤明的天赋，仁义的志向，一旦富贵之后，就背叛亲戚损害故旧，丧失了他本来思想。都疏远他的骨肉而亲近宠爱的人，轻视知友而厚待狗马。财货积满于仆夫妻妾的手中，俸禄赏赐尽给狡猾的奴仆。宁肯看见穿钱的绳子成千上万的腐朽，而不忍心赏赐给别人一钱；宁肯看着积蓄的粮食腐烂在仓库里，而不肯借贷给别人一斗。人多骄奢放纵，负债不还，骨肉怨恨责望于家中，小民诽谤于道路。前人因此而失败，后来的人争着沿袭前人，实在可悲伤。

总观前代贵人的用心，与婴儿一样。

婴儿经常有病,贵臣经常有灾祸,父母经常有失误,君主经常有过错。婴儿常病,是伤于吃得太多;贵臣常有灾祸,是伤于被宠信。父母常有失误,在于不能止于溺爱儿子;君主常有过错,在于不能制止骄横的臣子。婴儿哺乳太多,就必放纵而使小儿惊风;富贵太盛,就必骄奢淫逸而产生灾祸。因此溺爱其子就伤害身体,并不是一家人做的事;骄奢淫逸之臣用以灭其家的,并非一代人的事。或者背叛大逆不道,或者德少不称其富贵。文昌星定其功,司命星检举其过错,观察罪过的深浅,举其罪降其罚,或捕杀斩首,或拉断肩膀牵引其胸,放尸于牢狱,刀砍于都市,僵尸败家,覆灭宗族的,都是无功于百姓的人。而后来的人贪权贪宠,蓄积没有极限,想登上仆倒死亡的台上,乐于顺着被颠覆车子轨迹走下去,甘愿厚其福运,以充数之极限的人,哪一代没有呢?

当吕氏富贵时,吕太后代行皇帝职权而专擅朝政,擅自封立四王,多封吕氏子弟,兼据有将相的职位,内外盘根错结,自认为虽商汤、周武王的兴盛,五霸的兴起,也不能加以危害。于是废弃仁义而崇尚威严苛虐,灭绝礼义而从事欺诈。天下怨恨,人人想逃亡,因此一旦磨灭而无人哀痛。霍氏尊贵,专相幼主,废掉皇帝又拥立皇帝,谁也不敢违背他。霍禹继承父亲的位置,霍山、霍云掌事,他的几个女婿专掌禁军,婚姻不出本族。王氏的富贵,有九人封

侯五人为大司马,乘朱轮车的二十三人。王太后专政,掌权三代。王莽为宰相,封为安汉公,代居皇帝位置号称假皇帝,身当居皇帝位,最终篡权,十有余年,自认为居皇帝位已久,威严树立恩惠施行,永远不会招祸失败,所以就尽情恣意,私于亲近忘记疏远,聚集群小,加重赋税殚尽民力,以供奉无功之人,动辄就是奸诈,又假托经义,迷惑欺罔百姓,欺骗诬陷天地。自以为很秘密,别人不知道,皇天从上面察其奸邪,神明从黑暗处照见其鬼态,怎么能有误呢?

鸟以山为低下而聚柴为巢于上,鱼以深潭为浅而穿穴于其中,最终能够得到它是因为有饵料。贵戚惧怕家庭不吉祥而制出诸多令名,惧怕门不坚固而制作铁门轴,最终所以败家的,并非苦于禁忌少而门轴腐朽,常常苦于崇尚财货而行动骄奢僭越,暴虐百姓而失去民心。

孔子说:“不忧虑自己没有地位,忧虑的是自己不能立身。”因此臣子不遵奉礼法,用尽精力思其职责,推诚布公辅佐君主,效力于百姓,下自靠近人民,上面承顺天的心思,而想听凭自己的私智,窃取君主的威严和仁德,以欺凌下民,反而暴戾于天地,欺骗诬陷神明,偷进苟且求得,用以厚养自己,居于累卵的危境,而图谋泰山之安固,就如在朝露上行走一样,而想让功名传于后世,就像秦始皇舍弃仁德而专用刑法一样,而想从一世至于万世。怎么能不困惑呢?

浮侈第十二

王者以四海为一家,以兆民为通计。一夫不耕,天下必受其饥者;一妇不织,天下必受其寒者。今举世舍农桑,趋商贾,牛马车舆,填塞道路,游手为巧,充盈都邑,治本者少,浮食者众。商邑翼翼,四方是极。今察洛阳,浮末者什于农夫,虚伪游手者什

于浮末。是则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妇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天下百郡千县,市邑万数,类皆如此,本末何足相供?则民安得不饥寒?饥寒并至,则安能不为非?为非则奸宄,奸宄繁多,则吏安能无严酷?严酷数加,则下安能无愁怨?愁怨者

多则咎征并臻,下民无聊,而上天降灾,则国危矣。

夫贫生于富,弱生于强,乱生于治,危生于安。是故明王之养民也,忧之劳之,教之诲之,慎微防萌,以断其邪。故《易》美“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七月诗》大小教之,终而复始。由此观之,民固不可恣也。

今民奢衣服,侈饮食,事口舌,而习调欺,以相诈给,比肩是也。或以谋奸合任为业,或以游敖博奕为事;或丁夫世不传犁锄,怀丸挟弹,携手遨游。或取好土作丸卖之,于弹外不可以御寇,内不足以禁鼠,晋灵好之以增其恶,未尝闻志义之士喜操以游者也。惟无心之人,群竖小子,接而持之,妄弹鸟雀,百发不得一,而反中面目,此最无用而有害也。或坐作竹簧,削锐其头,有伤害之象,傅以蜡蜜,有甘舌之类,皆非吉祥善应。或作泥车、瓦狗、马骑、倡排,诸戏弄小儿之具以巧诈。

《诗》刺:“不绩其麻,女也婆娑。”今多不修中馈,休其蚕织,而起学巫祝,鼓舞事神,以欺诬细民,荧惑百姓。妇女羸弱,疾病之家,怀忧愤愤,皆易恐惧,至使奔走便时,去离正宅,崎岖路侧,上漏下湿,风寒所伤,奸人所利,贼盗所中,益祸益崇,以致重者不可胜数。或弃医药,更往事神,故至于死亡,不自知为巫所欺误,乃反恨事巫之晚,此荧惑细民之甚者也。

或裁好缯,作为疏头,令工采画,雇人书祝,虚饰巧言,欲邀多福。或裂拆缯彩,裁广数分,长各五寸,缝绘佩之。或纺彩丝而縻,断截以绕臂。此长无益于吉凶,而空残灭缯丝,縻悖小民。或克削绮縠,寸窃八采,以成榆叶、无穷、水波之纹,碎刺缝紵,作为笥囊、裙衿、衣被,费缯百缣,用功十倍。此等之侔,既不助长农工女,无有益于世,而坐食嘉谷,消费白日,毁败成功,以完为破,以牢为行,以大为小,以易为难,皆宜禁者也。

山林不能给野火,江海不能灌漏卮。

孝文皇帝躬衣弋绋,足履革舄,以韦带剑,集上书囊以为殿帷,盛夏苦暑,欲起一台,计直百万,以为奢费而不作也。今京师贵戚衣服、饮食、车舆、文饰、庐舍,皆过王制,僭上甚矣。从奴仆妾,皆服葛子升越,簪中女布,细致绮縠,冰纨锦绣。犀象珠玉,虎魄玳瑁,石山隐饰,金银错镂,獐鹿履舄,文组彩縠,骄奢僭主,转相夸诤,箕子所唏,今在仆妾。富贵嫁娶,车駟各十,骑奴侍僮,夹轂节引。富者竞欲相过,贫者耻不逮及。是故一飧之所费,破终身之本业。

古者必有命民,然后乃得衣缯彩而乘车马。今者既不能尽复古,细民诚可不须,乃逾于古昔孝文;衣必细致,履必獐鹿,组必文采,饰袜必綸此,校饰车马,多畜奴婢。诸能若此者,既不生谷,又坐为蠹贼也。

子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时;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槨”,桐木为棺,葛采为缄,下不及泉,上不泄臭。后世以楸梓槐柏桧槨,各取方土所出,胶漆所致,钉细要,削除铲靡,不见际会,其坚足恃,其用足任,如此可矣。其后京师贵戚,必欲江南楠梓豫章榎楠,边远下土,亦竞相仿效。夫楠梓豫章,所出殊远,又乃生于深山穷谷,经历山岑,立千步之高,百丈之溪,倾倚险阻,崎岖不便,求之连日,然后见之,伐斫连月,然后讫,会众然后能动担,牛列然后能致水,油渍入海,连淮逆河,行数千里,然后到洛。工匠雕治,积累日月,计一棺之成功,将千万。夫既其终用,重且万斤,非大众不能举,非大车不能挽。东至乐浪,西至敦煌,万里之冲,相竞用之。此之费功伤农,可为痛心!

古者墓而不崇。仲尼丧母,冢高四尺,遇雨而堕,弟子请治之。夫子泣曰:“礼不修墓。”鲤死,有棺而无槨。文帝葬于芷阳,明帝葬于洛南,皆不藏珠宝,不造庙,不起山陵。陵墓虽卑而圣高。今京师贵戚,郡县豪家,生不极养,死乃崇丧。或至刻金镂玉,楠梓榎楠,良田造茔,黄壤致藏,多埋珍宝偶人车马,造起大冢,广种松柏,庐舍

祠堂,崇侈上僭。宠臣贵戚,州郡世家,每有丧葬,都官属县,各当遣吏赍奉,车马帷帐,贷假待客之具,竞为华观,此无益于奉终,无增于孝行,但作烦搅扰,伤害吏民。

今按鄙、毕之郊,文、武之陵,南城之垒,曾析之冢。周公非不忠也,曾子非不孝也,以为褒君显父,不在聚财,扬名显祖,不在车马。孔子曰:“多货财伤于德,弊则没礼。”晋灵厚赋以雕墙,《春秋》以为非君。华元、乐吕厚葬文公,《春秋》以为不臣。况于群司士庶,乃可僭侈主上,过天道乎?

景帝时,武原侯卫不害坐葬过律夺国。明帝时,桑民扞阳侯坐冢过制髡削。今天下浮侈离本,僭奢过上,亦已甚矣!

凡诸所讥,皆非民性,而竞务者,乱政薄化使之然也。王者统世,观民设教,乃能变风易俗,以致太平。

【译文】

君王以四海为一家,以百姓作为整体计划。一个农夫不耕田,天下必受其饥饿;一个妇女不纺织,天下必受其寒。如今全世间的人都舍弃农桑之业,趋向于做生意,牛马车子,填塞在道路上,游手作巧的人,充满大都小邑,治理农业的少,从事工商业的多。京师商邑整齐,处于四方的中心。如今察看京师洛阳,追逐浮利的工商业者十倍于农夫,虚伪游手好闲的人又十倍于工商业者。如此则一夫耕种土地,百人吃食于它,一妇种植桑树,百人依靠它穿衣,以一个人供奉一百个人,谁能供给?天下有百郡千县,市邑以万计,都像这样,农业和工商业怎么能满足供给?而百姓怎么不饥寒呢?饥寒一齐到来,而人怎么能不为非作歹呢?为非作歹就犯法作乱,犯法作乱的人繁多,而官吏怎能不严酷?严酷的刑罚数次加于百姓,而下面怎能没有愁怨呢?愁怨的人增多,灾祸的征兆并至,下面的百姓生活贫困,而上天就要降灾,而国家就危险了。

贫能转化为富,弱能转化为强,乱能转化为治,危能转化为安。因此明君养育百姓,要忧虑他们,教诲他们,在坏事还未显著或刚刚发生时就加以防止,不让它发展,以切断邪恶的根源。所以《周易》赞美“节制制度,不伤害财富,不危害百姓。”《七月诗》大小教诲它,自始至终。从这里观察,百姓本来就不可以放纵。

如今的百姓穿着华丽的衣服,吃着奢侈的饮食,专门从事于言辞,而熟悉欺骗,以互相欺诈,这样的人太多了。有的以谋奸合伙任侠为职业,有的以闲游掷采下棋为事业,有的成年农夫竟不扶犁锄,怀里藏着弹丸手里拿着弹弓,携手遨游。有的用好土制作弹丸卖出,对于弹丸来说,对外不可以抵御敌寇,对内不可以禁止老鼠,晋灵公喜好弹丸以增加他的罪恶,不曾听说志士仁人喜欢操持它以遨游的。只有没有心思的人,卑贱的小人,才交接而持有它,胡乱弹射鸟雀,百发而不得其一,反而射中面目,这是最无用而有害的。有的制作竹簧吹之,削尖其头部,有伤害的迹象,涂附以蜡蜜,有甜舌之类,这都是不吉祥善报的反应。有的做泥车、瓦狗、骑马、乐戏,这些戏弄小儿的东西都用其巧诈。

《诗经》讽刺“不缉麻线,在市场里跳舞。”如今的女子大多不整治家中的饮食,放弃蚕织,而开始学习巫祝下神,敲鼓舞蹈以事神,用来欺骗小民,眩惑百姓。妇女瘦弱,有疾病的家庭,心怀忧愁昏乱不安,容易产生恐惧,致使百姓找个方便的时间,离开正宅,奔走于崎岖的路侧,上漏下湿,遭受风寒的伤害,被奸人所利用,盗贼所中伤,更增加祸灾,以致造成严重疾病的不可胜数。有的放弃医药,甚至前往事神,因此导致死亡,还不知道自己被巫祝所欺骗,就反而只恨自己奉事巫祝太晚,这是眩惑小民更严重的事。

有的裁剪好的缙帛,作为头饰,令工采画,雇人书写祝辞,虚饰以巧言,想祈求多。有的撕裂缙彩,裁剪成数分,宽广各五寸,

缝起来绘上花纹作为佩带之物。有的纺成彩丝而束起来,截断浇臂系上。这最无益于避免吉凶,而白白遭踏缁丝,眩惑小民。有的刮削绮縠,刻切成八种彩色,使它成为榆叶形、无穷形、水波纹形,碎刺上花纹加以缝纫,作为盛东西笥囊、裙子短袄、衣被,费缁百缣,用功十倍。此等之辈,既不帮助良农巧女,又无益于世,坐食好谷,浪费时日,以毁败为成功,以完为破,以牢固为易脆,以大为小,以易为难,都应该加以禁止。

山上的林木不能给野火烧,江海中的水不能灌入盛酒的器中。汉文帝亲身穿着黑色的丝织品,脚穿用皮子做的鞋,用熟牛皮佩带剑,收集书函上的布用作殿中帷帐,盛夏苦于炎热,想建起一座台子,计算用钱百万,认为是奢侈浪费而没有建。如今京师中的贵戚,从衣服、饮食、车马、文饰、宅第房屋,都超过君主所制,订的制度,超过本分太甚了。跟随的奴仆妻妾,都穿葛越和筒中细布,细緻的绮縠,冰纨绵绣。用的是犀象珠玉、虎魄玳瑁,隐起为石山之文,金银错镂之器,用麋麋皮做的鞋子,外边的牙条绣以花纹,骄奢僭越君主,互相夸耀,商代箕子所哀叹的,如今都用在仆妾身上。富贵之家的嫁娶,有屏蔽的车子络绎不绝于路,骑奴侍童,夹毂在前引导。富者就想超过它,贫穷者耻于赶不上它。所以一次款待客人所费之钱,使自己的本业终身破败。

古时百姓能敬长怜幼,选择谦让,得命于其君的人,然后才可以穿缁彩的衣服,乘坐车马。如今既不能完全恢复古时的制度,小民也诚然不需这样,于是就超越过去。汉文帝衣服必用细布做成,鞋子必用麋麋之皮做成,丝织的带子必绣上文采,袜子必用细布,装饰车马,多畜养奴婢。诸如此类之事,既不能生长粮食,又徒然成为消耗粮食的蠹虫和伤害庄稼的害虫了。

有人说:古时的埋葬,仅厚厚的用柴草作葬具,埋于旷野之中,不封土堆不种植树林,丧期也没有一定的时间,后代的圣人

改变为用棺槨埋葬”,用桐木做棺材,用葛采封其口,深不到泉水,上面不泄露臭气。后来又用楸梓槐柏椿树做棺槨,各取地方所产木材,用胶漆涂涮,钉以细腰,削平磨光,不见缝隙,其坚固足可依靠,其用足可信任,这样就可以了。后来京师贵戚,必用江南櫟梓豫章梗桡,边远之地,也兢相效法。梗梓豫章,所出产的木材特别远,又生长深山峡谷之中,经过山崖,立于千步之高的地方,百丈的深谷,倾倚险阻,山路崎岖不便,寻找数日然后才能找见,砍伐连月然后才能完成,集合众人然后才能动担,用牛牵引然后才能到达水边,漕运入海,逆流而上从淮河到达黄河,运行数千里,然后才能到达洛阳。工匠加以雕刻整治,日积月累,计算下一棺的制成,用工将近千万。到了棺材最终使用时,重达万斤,不用大量的人力不能抬起它,不用大车就不能牵引它。东到乐浪,西到敦煌,万里之内,竞相使用它。这样费工伤害农业,甚可痛心!

古时的坟墓就不高。孔子的母亲死了,坟高四尺,遇到下雨就堕落,他的弟子请加以修理,孔子哭泣说:“礼制不修墓。”孔鲤死,有棺而没有槨。汉文帝埋葬于芷阳,汉明帝埋葬于洛阳南面,墓中都不藏珠宝,不建造陵庙,不起山陵。陵墓虽然卑下而圣德高。现在京师贵戚,郡县豪强之家,生前不尽力赡养,死了就崇尚丧葬。有的甚至雕刻金缕玉衣,棺槨用櫟梓梗桡,用良田造坟茔,黄肠緻密而埋藏,里面再埋藏金银珍宝偶人车马,建起大冢,广种松柏等树,房舍祠堂,崇侈僭越于上。宠臣贵戚,州郡世代有禄秩之家,每当有丧葬时,都官属县,各自派遣官更加以奉祠,车马帷帐,借贷待客用具,竞相华丽美观。这无益于奉终,不能增加孝顺的行为,只有增添麻烦搅扰他人,伤害官吏百姓。

如今审察周代郅、毕的郊祭,周文王、周武王的陵墓,南城的坟墓,曾析的坟冢。周公并不是不忠,曾子并不是不孝,称颂其君显扬父母的,不在于聚敛钱财,扬名显

祖,不在于车马。孔子说:“财货多了有伤于德义,弊败就没有礼制。”晋灵公重赋敛以雕饰墙壁,《春秋》称之为非君。华元、乐吕厚葬文公,《春秋》称之为不臣。何况众官和士庶百姓,就可以僭侈君主,超过天道吗?

汉景帝时期,武原侯卫不害因埋葬超过法律规定而坐罪封国被夺去。汉明帝

时,桑扈侯因坟墓超过制度被剃发为刑徒。如今天下虚浮奢侈脱离农业,僭奢超过上面,也太过份了吧!

凡是以上各种所讥讽的,都不是百姓的本性,而竞相崇尚的,是危乱的政治轻视教化所造成的。君主综理当世,观察民情而完备教化,就能移风易俗,可达到太平。

慎微第十三

凡山陵之高,非削成而崛起也,必步增而稍上焉。川谷之卑,非截断而颠陷也,必陂池而稍下焉。是故积上不止,必致嵩山之高;积下不已,必极黄泉之深。

非独山川也,人行亦然,有布衣积善不怠,必致颜、闵之贤;积恶不休,必致桀、跖之名。非独布衣也,人臣亦然,积正不倦,必生节义之志;积邪不止,必生暴戾之心。非独人臣也,国君亦然,政教积德,必致安泰之福;举措数失,必致危亡之祸。故仲尼曰:“汤、武非一善而王也,桀、纣非一恶而亡也。三代之废兴也,在其所积。积善多者,虽有一恶,是为过失,未足以亡。积恶多者,曾有一善,是为误中,未足以存。人君闻此,可以悚惧。布衣闻此,可以改容。”

是故君子战战栗栗,日慎一日,克己三省,不见是图。孔子曰:“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夭身。小人以小善谓无益而不为也,以小恶谓无伤而不去也,是以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也。”此蹶、踬所以迷国而不返,三季所以遂往而不振者也。

夫积微成显,积著成,鄂誉鄂誉,鄂致存亡,圣人常慎其微也。文王小心翼翼,武王夙夜敬止,思慎微眇,早防未萌,故能太平而传子孙。

且夫邪之与正,犹水与火不同原,不得并盛。正性胜,则遂重己不忍亏也,故伯夷

饿死而不恨。邪性胜,则怵怵而不忍舍也,故王莽窃位而不惭。积恶习之所致也。夫积恶习非久,致死亡非一也。世品人遂。

夫圣贤卑革,则登其福。庆封、伯有,荒淫于酒,沉湎无度,以弊其家。晋平殆政,惑以丧志,良臣弗匡,故俱有祸。楚庄、齐威,始有荒淫之行,削弱之败,几于乱亡,中能感悟,勤恤民事,劳精苦思,孜孜不怠,夫出陈应,爵命管苏,召即墨,烹阿大夫,故能中兴,强霸诸侯,当时尊显,后世见思,传为令名,载在图籍。由此言之,有希人君,其行一也,知己曰明,自胜曰强。

夫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此颜子所以称庶几也。《诗》曰:“天保定尔,亦孔之固。俾尔亶厚,胡福不除?俾尔多益,以莫不庶。”盖此言也,言天保佑王者,定其性命,甚坚固也。使汝信厚,何不治?而多益之,甚庶众焉。不遵履五常,顺养性命,以保南山之寿,松柏之茂也?

德辅如毛,为仁由己。莫与併蜂,自求辛螫。祸福无门,惟人所召。天之所助者顺也,入之所尚者信也,履信思乎顺,又以尚贤,是以吉无不利也。亮哉斯言!可无思乎?

【译文】

凡是山陵的高峻,不是削成而崛起的,必是逐步增高而稍稍向上的。河谷的卑

下,不是截断而下陷的,必是因为有陂池冲刷而稍稍向下的。因此向上堆积不停止,必然形成崇高的山;向下沉积不止,必然达到黄泉的深度。

并不是仅仅山川是这样,人的行为也是这样,有的百姓积善不懈怠,必然能达到像颜回、闵之骞那样贤达,积恶不休止,必然会达到像夏桀、盗跖那样的恶名。并不仅仅是百姓,臣子也会这样,积聚正直不厌倦,必能产生节义的志向,积聚邪恶不止,必然产生暴虐弑杀的心理。并非臣子如此,国君也会这样,在政治和教化上积聚仁德,必然能达到平安的福运,举动措施接连失误,必然导致危亡的灾祸。因此孔子说:商汤、周武王并不是做了一件好事才成为王的,夏桀、殷纣王并不是做了一件坏事才灭亡的。夏、商、周三代的衰微和兴盛,在于它的积习。积善多的,虽然有一件恶事,是谓过失,不足以灭亡。积恶多的,虽然有一件善行,可谓是误中,不足以生存。君主听到这些,可以使之恐惧。百姓听到这些,可以改变面色。

因此君子战栗恐惧,一天比一天谨慎,克制自己多次反省自己,不容易看到的应该加以警惕。孔子说:“善不积蓄不足以成名,罪恶不积累不足以灭亡自身。小人认为小善无益就不去做,小恶无伤就不去掉它,所以邪恶积累下来就不能掩盖,罪大就不能摆脱。”这是蹶、蹠所以迷乱国家而不知返回,夏、商、周三代之终于去而不能挽救了。

积微小而成显著,积累成为显著现象,就直言称赞;直言可以使国昌盛,圣人常常谨慎于微小之处。周文王小心谨慎,周武王早晚恭敬谨慎,考虑谨慎微小之事,及早防止发生于未萌芽之时,所以能达到太平而传于子孙。

而且邪气与正气,就和水与火一样不

同源。不能并行兴隆。正直的习性强胜,而就严于律己不忍毁坏,所以伯夷饿死而不怨恨。邪恶的习性强胜,即使奢侈过度而不忍舍弃,所以王莽窃取皇位而不惭愧。是积聚恶习所导致的。积恶习非一日而,致死亡也。世品人遂。

圣贤卑下恭敬,就可以增大他的福运。庆封、伯有,荒淫于酒,沉溺无度,因而祸败其家。晋平公懈怠政事,迷乱而丧其志节,良臣不匡扶他,所以都有灾祸。楚共王、齐威王,开始时有荒淫的行为,有地削兵弱之败,将近败亡。中间自己被感化觉悟,殷勤抚恤百姓之事,劳神苦思,孜孜不倦,将申侯驱逐出境,任命莞苏为上卿,召回即墨大夫,烹煮阿大夫,因此能中兴楚国和齐国,强霸于诸侯,当时就尊贵显扬,后世加以追思,流传成为好的名声,记载在图书中。由此说来,百姓和国君,其行为是一样的,知己叫做“明”,自胜叫做“强”。

自己有不善的行为未尝不知道,知道了不再从事,这是颜渊所以被称道的原因。《诗经》说:上天为你安定基础,国家平安很巩固。使你忠厚对待百姓,各种幸福都赐给你。使你得到很多财富,因此物产都富庶。”这些话,是说老天保佑辅佐君主,决定了他的性命,甚至很坚固。使你忠信厚道。为什么不能治理呢?而你得到很多益处,很富庶众多。行事尊守履行三纲五常,顺其志向以养性命,以保寿比南山,有松柏的常青茂盛。

小德轻如鸿毛,做仁德之事在于自己。不要和併蜂一样,自临于毒螫之中。祸福没有门路,是人们自己招引来的。得到老天帮助的人就顺利,被人们所崇尚的人就诚信,履行诚信考虑顺意,又崇尚贤人,所以就吉祥无不顺利。诚信呀这种言论!可以不思考吗?

实贡第十四

国以贤兴，以谄衰。君以忠安，以忌危。此古今之常论，而世所共知也。然衰国危君，继踵不绝者，岂世无忠信正直之士哉？诚苦忠信正直之道不得行尔。

夫十步之间，必有茂草，十室之邑，必有俊士。贤材之生，日月相属，未尝乏绝。是故乱殷有三仁，小卫多君子。以汉之广博，士民之众多，朝廷之清明，上下之修治，而官无直吏，位无良臣。此非今世之无贤也，乃贤者废锢而不得达于圣主之朝尔。

夫志道者少友，逐俗者多俦。是以举世多党而用私，竞比质而行趋华。贡士者，非复以其质干，准其才行也，直虚造空美，扫地洞说。择能者而书之，公卿刺史掾从事，茂才孝廉且二百员。历察其状，德侔颜渊、卜、冉，最其行能，多不及中。诚使皆如状文，则是为岁得大贤二百也。然则灾异曷为讥？此非其实之效。

夫说梁饭食肉，有好于面目，而不若粝粢藜烝之可食于口也。图西施、毛嫱，有悦于心，而不若丑妻陋妾之可御于前也。虚张高誉，强蔽疵瑕，以相诳耀，有快于耳，而不若忠选实行可任于官也。周显拘时，故苏秦；燕哱利虚誉，故让子之，皆舍实听声，呕哇之过也。

夫圣人纯，贤者驳，周公不求备，四友不相兼，况末世乎？是故高祖所辅佐，光武所将相，不遂伪举，不责兼行，亡秦之所弃，王莽之所捐，二祖任用以诛暴乱，成致治安。太平之世，而云无士，数开横选，而不得其真。甚可愤也！

夫明君之诏也若声，忠臣之和也当如响应，长短大小，清浊疾徐，必相和也。是故求马问马，求驴问驴，求鹰问鹰，求骠问骠。由此教令，则赏罚必也。

夫高论而相欺，不若忠论而诚实。且

攻玉以石，冶金以盐，濯锦以鱼，浣布以灰。夫物固有以贱治贵，以丑治好者矣。智者弃其所短而采其所长，故致其功，明君用士亦犹是也。物有所宜，不废其材，况于人乎？

夫修身慎行，敦方正直，清廉洁白，恬淡无为，化之本也。忧君哀民。独睹乱原，好善嫉恶，赏罚严明，治之材也。明君兼善而两纳之，恶行之器也，为金玉宝政之材刚铁用。无此二宝，苟务作异以求名，诈静以惑众，则败俗伤风。今世慕虚者，此谓坚白。坚白之行，明君所憎，而王制所不取。

是故选贤贡士，必考核其清素，据实而言，其有小疵，勿强衣饰，以壮虚声。一能之士，各贡所长，出处默语，勿强相兼，则萧、曹、周、韩之论，何足得矣？吴、邓、梁、窦之徒，而致十。各以所宜，量材授任，则庶官无旷，兴功可成，太平可致，麒麟可臻。

且燕小，其位卑，然昭王尚能招集他国之英俊，兴诛暴乱，成致治强。今汉土之广博，天子尊明，而曾无一良臣，此诚不愍兆黎之愁苦，不急贤人之佐治尔。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忠良之吏诚易得也，顾圣王欲之尔。

【译文】

国家因为有贤臣才兴盛，因为有谄媚的奸臣才衰亡。国君因为任用忠臣才安定，任用奸臣才危亡。这是古今以来的常理，是世人所共知的。但是衰败之国危亡之君继续不断出现，难道世上没有忠信正直的士人吗？诚然是苦于忠信正直之道不得通行罢了。

十步以内，必有茂盛的芳草，只有十

家的小邑，必有俊杰之士。贤才的生长，与日月相连，不曾缺少。紊乱的殷朝尚有三个贤人，小小的卫国尚有许多君子。而汉朝的土地广博，士子庶民很众多，朝廷的清明，上下的修整治理，而官员没有正直的人。在位的人没有良臣。这不是今世没有贤人，是贤人被废黜禁锢而不能上达于圣明君主的朝廷罢了。

有志于道的人缺少朋友，追逐世俗的人同辈就多。所以全世间之人结为朋党而营私，竞相违背朴实而趋向浮华。推荐人才的官员，不再依靠他们的诚信，按照他们的才能行事，故意假造空美之辞，为他们加以解脱。挑选他们的优点而加以书写，公卿大臣、刺史掾、从事，所推举的茂才、孝廉达到二百人。经过考核他们的行状、德行和颜渊、卜子夏、冉伯年相等的人，凡是他们所推荐的孝廉、茂才，大多赶不上普通的人，但是书写的却是如此行状，那就是一岁可以得到大贤人二百人了。那么灾异为什么不断发生以此来讥笑讽刺他们呢？这是荐举不实的原因。

有人喜欢精美的饭食，美好的面貌，而不如粗米劣菜可食于口。谋取西施，毛嫱，是为了喜悦于心，而不如丑陋的妻妾可以侍奉在面前。虚张崇高的声誉，勉强遮蔽缺点，以相迷惑炫耀，是为了快乐于耳，而不如忠诚推荐有真实才能的人可以胜任官职。周显王拘时，因此疏远苏秦；燕王贪虚名，因此让位于子之，都是舍弃真实顺从名声，欺世盗名的过错。

圣人纯洁，贤人驳杂，周公不求全责备于一人，文王四友的才能还不能相互兼备，何况末代呢？因此汉高祖所用的辅臣，光武帝所用的将相，不用虚假推荐之人，不责备才能兼顾，灭亡的秦朝所遗弃的人，王莽所抛弃的人，汉高祖、光武帝就任用他们去剪除暴乱，达到治理而且安宁。太平之世，而说没有贤士，数开大的选举，而得不到真正的人才，这是很可悲愤的事！

英明君主的诏命就像声音一样，忠臣的唱和也应当如响之应声，长短大小，清浊快慢，必定相应和。因此求马问马，求驴问驴，求鹰问鹰，求骠问骠。由此教化，就赏罚必信了。

高谈阔论而互相欺骗，不如忠诚正直的谈论那样诚实。而且加工玉要用石头，治理金子要用盐，洗涤锦要用水，洗涤布要用灰。物品固然有用贱治理贵的，用丑的东西治理好的东西。聪明的人抛弃自己的短处而采用自己的长处，可以达到成功。英明的君主擢用士人也是这样。物品都有其适应的地方，不应废弃它的材料，何况对于人呢？

努力提高自己的品德谨慎自己的行动，敦厚正直，清正廉洁，清静无所作为，是教化的根本。忧愁君主怜悯百姓，就能独见紊乱的根源，喜好善事憎恨坏事，赏罚严明，是治理国家的干才。英明的君主兼顾而并容，恶行之器，可使金玉贵政之材作为钢铁之用。没有这二宝，如果只图新奇以求虚名，欺诈清静以迷惑大众，就要伤风败俗。如今羡慕虚名，这就是所说的坚石、白马的辩论，坚白之说盛行，这是英明的君主所憎恨的，为王制所不能采取的。

因此选举贡纳贤士，必须考察核实他的真情实意，根据事实而言，他有小的缺点，不要在表面上强加伪饰，以壮大他的虚名。有一方面才能的士人，各贡举他的长处，出仕隐退静默言语，不要强使它相兼，像萧何、曹参、周勃、韩信之类的人，有什么难得的呢？吴汉、邓禹、梁统、窦融之辈，都可得到。各用他所适宜的地方。根据才能任以官职，则众多的官位就没有空缺，兴盛的大业就可成功，太平就可以达到，祥瑞之兽麒麟就可以到来。

况且燕国是个小国，其地位卑下，但燕昭王尚能招集他国英俊贤士，发动剪除暴乱，治理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如今汉

朝土地广博，天子位尊英明，而怎么没有一个良臣，这诚然是不哀怜亿万百姓的愁苦，不着急贤人的辅佐和治理。孔子说：

“他是不去想念，真的想念有什么遥远的呢？”忠诚善良的官吏诚然容易得到，看圣明的君王想不想得到他。

潜夫论第四卷

班禄第十五

太古之时，烝黎初载，未有上下，而自顺序，天未事焉，君未设焉。稍后矫虔，或相陵虐，侵渔不止，为萌巨害。于是天命圣人使司牧之，使之失性，四海蒙利，莫不被德，佥共奉戴，谓之天子。

故天之立君，非私此人也，以役民，盖以诛暴除害利黎元也。是以人谋鬼谋，能者处之。《诗》云：“皇矣上帝！临下以赫。监观四方，求民之瘼。惟此二国，其政不获。惟此四国，爰究爰度。上帝指之，憎其式恶。乃睠西顾，此惟与度。”盖此言也，言夏、殷二国之政不得，乃用奢夸廓大，上帝憎之，更求民之瘼圣人，与天下四国究度而使居之也。

前哲良人，疾口口无纪极也，乃惟度法象，明著礼秩，为优宪艺，县之无穷。故《传》曰：“制礼，上物不过十二，天之道也。”是以先圣籍田有制，供神有度，奉己有节，礼贤有数，上下大小，贵贱亲疏，皆有等威，阶级衰杀，各足禄其爵位，公私达其等级，礼行德义。

当此之时，九州之内，合三千里，尔八百国。其班禄也，以上农为正，始于庶人在官者，禄足以代耕，盖食九人。诸侯下士亦然。中士倍下士，食十八人。上士倍中士，食三十六人。大夫倍之，食七十二人。小国之卿，二于大夫。次国之卿，三于大夫。大国之卿，四于大夫，食二百八十八人。君各什其卿。天子三公采视公侯，盖方百里。卿采视伯，方七十里，大夫视子男，方五十里。元士视附庸，方三十里。功成者封。是故官政专公，不虑私家；子弟事学，不干

财利，闭门自守，不与民交争，而无饥寒之道，而不陷；臣养优而不隘，吏爱官而不贪，民安静而强力，此则太平之基立矣。乃惟慎贡选，明必黜陟，官得其人，人任其职，欽若昊天，敬授民时，同我妇子，饁彼南亩；上务节礼，正身示下，下悦其政，各乐竭己奉戴其上。是以天地交泰，阴阳和平，民无奸匿，机衡不倾，德气流布而颂声作也。

其后忽养贤而《鹿鸣》思，背宗族而《采蘋》怨，履亩税而《硕鼠》作，赋敛重而谭告通，班禄颇而《顾甫》刺，行人定而《绵蛮》讽，故遂耗乱衰弱。

及周室微而五伯作，六国弊而暴秦兴，背义理而尚威力，汰典礼而行贪叨，重赋敛以厚己，强臣下以弱枝，文德不获封爵，列侯不获。是以贤者不能行礼以从道，品臣不能无枉以从利。君又骤赦以纵贼，民无耻而多盗窃。

何者？威气加而化上风，患害切而迫饥寒，此藏纆所以不能诘其盗者也。《诗》云：“大风有隧，贪人败类。”尔之教矣，民斯效矣。”是故先王将发号施令，谆谆如也，惟恐不中而道于邪，故作典以为民极，上下共之，无有私曲，三府制法，未闻赦彼有罪，狱货惟宝者也。

是故明君临众，必以正轨，既无厌有，务节礼而厚下，复德而崇化，使皆阜于养生而竞于廉耻也。是以官长正而百姓化，邪心黜而奸匿绝，然后乃能协和气而致太平也。《易》曰：“圣人养贤以及万民。”为本，君以臣为基，然后高能可崇也；马肥，然后远能可致也。人君不务此而欲致太平，此

犹薄趾而望高墙，驥瘠而责远道，其不可得也必矣。

【译文】

远古的时候，众民刚刚开始，没有上下之分，而自为顺序，天还没有治事，君主还没有设立。稍后才有挠扰，或者互相欺凌虐待，侵夺财物不止，成为百姓的大害。于是天命令圣人使他加以治理，使百姓不失去本性，天下蒙受其利，无不受其德惠，天下百姓都拥戴他，这就称之为天子。

因此老天所设立的君主，并不是偏爱此人，是用他来驱使百姓，诛杀暴乱铲除祸害以利于百姓的。因此通过咨询与人商量，通过卜筮与鬼神商量，使有才能的人来加以处理。《诗经》说：“伟大呀上帝！观察下面很分明。监视四方的情况，以求百姓的痛苦。他们二个国家，政事不得人心，四方的国家，于是探讨谋划。上帝指责他们。憎恨二国作恶。就往西方顾看。这里可以经营图谋。”这些言论是说，夏、殷两国的政事不得人心，就用奢侈阔绰之人，上帝憎恶他们，就更更换能体察百姓疾苦的圣人，和天下四方共同谋划而使百姓安居。

前代有德才善良的人，疾恨奢侈阔绰不知纲纪的人，就只好取法于天，显明于礼制秩序，为此治理法则，使它成为无穷之规矩。因此《左传》说：“制定礼仪，上等物品的数字不超过十二，是天的原则。”因此以前的君主亲自耕田有制度，供神有制度，奉养自己有节制，礼贤下士是自然之理，上下大小，贵贱亲疏，威仪都有等级差别，等级以次递减，各足以保其爵位，公私都能达到其等级，尊卑有礼，各相适宜。

在那个时候，九州之内，共三千里，一千八百个国家。其位次俸禄，从一般百姓在官位的，俸禄足以代替耕种，可食封九人。从诸侯下至士人也是这样。中士的俸禄两倍于下士，可食封十八人。上士的俸禄两倍于中士，可食封三十六人。大夫再

加倍，食封七十二人。小国的卿，二倍于大夫。大国的卿，四倍于大夫，食封二百八十八人。君主各十倍于卿。天子下面的三公采邑比照公侯爵制，可方二百里。卿的采邑比照伯爵，方七十里。大夫比照子男爵制。方五十里。元士比照附庸，方三十里。功成者封土。所以国政专于公事，不考虑私家之事，弟子治学，不干预财利之事，闭门自守，不和百姓交往争利，就没有饥寒的道理，而不陷；臣子养尊处优而胸襟不狭隘，官吏爱官而不贪污，百姓就安静而下力气，这样太平的基础就建立了。就只有谨慎选举，明确决定官吏的升降，官吏得其人，人能胜任其职务，钦佩如天。不急慢地给予百姓耕种的时间，同我的老婆孩子，送饭到南亩；上面勉力从事礼节。正身率己用以显示下民。下面的百姓喜悦其政治，都乐于竭尽全力以奉戴上。天地交感而万物通，阴阳和平风调雨顺，老百姓就没有邪恶，北斗七星不倾斜，德运就流布而颂扬之声就振起了。

后来不重视养贤而《诗经·鹿鸣》就加以讽刺，背离宗族而《诗经·采蘋》就加以怨恨，实行按亩征税诗人才作《诗经·硕鼠》之诗；赋敛加重而谭大夫作《大东》之诗以告病，俸禄等次偏颇而《诗经·硕甫》加以讽刺，行人缺乏钱财而《诗经·绵蛮》而加以讥讽，因此就变乱衰弱。

到了周室衰微而五霸兴起，六国败而暴虐的秦朝兴起的时候，违背义理而崇尚武力，毁灭圣典礼制而行贪婪之心，加重赋敛而宽厚自己，权臣削弱下面的势力。用礼乐教化进行统治的人得不到封爵，列侯不能治民。所以贤人不能推行礼制从顺天道，众臣不能不枉法以营利。君主又数次赦免罪人而放纵盗贼，百姓没有廉耻就多成为盗窃的人。

这是为什么？暴戾之气增加就能转移上面的风气，祸害接近就迫于饥寒，这是臧纣所以不能究办盗贼的原因。《诗经》说：“大风刮时有来路，贪鄙之人是败类。”你

的教化,百姓都是这样效法。”因此先王即将发号施令,先教诲不倦,唯恐不中而导之于邪路,所以制作典籍作为百姓的准则,上下共同遵守,不要私自歪曲,三公府制定法律,未听说舍去他的罪恶,拿狱货为宝贝。

因此英明的君主统御百姓,必须端正法度,既不厌有,又要勉力从事法度礼制而宽厚百姓,恢复道德而崇尚教化,使他们都能宽厚于养生而去追逐廉耻。所以官员正

直而百姓的风俗就会转化,邪恶的思想被黜除而诈伪邪念就会断绝,然后才能协调和气而达到太平。《易》说:“圣人颐养贤人以及百姓。”国家以民为根本,君主以臣下为基础,基础宽厚了,然后才能崇高;马肥壮了,然后才能达到很远的地方。人君不勉力从事这些工作而想达到太平,这就像附于脚趾上而望高墙,千里马瘦弱而责其远道而跑,是必然不可能的。

述赦第十六

凡治病者,必先知脉之虚实,气之所结,然后为之方,故疾可愈而寿可长也。为国者,必先知民之所苦,祸之所起,然后设之以禁,故奸可塞国可安矣。

今日贼良民之甚者,莫大于数赦。赦赎数,则恶人昌而善人伤矣。奚以明之哉?曰:孝悌之家,修身慎行,不犯上禁,从生至死,无铄两罪,数有赦赎,未尝蒙恩,常反为祸。何者?正直之士之为吏也,不避强御,不辞上官。从事督察,方怀不快,而奸猾之党,又加诬言,皆知赦之不久,则且共横枉侵冤,诬奏罪法。今主上妄行刑辟,高至死徙,下乃沦冤,而被冤之家,乃甫当乞鞠告,故以信直,亦无益于死亡矣。

及隐逸行士,淑人君子,为谗佞利口所加诬覆冒,下土冤民,能至阙者,万无数人,其得省问者,不过百一,既对尚书,空遣去者,复十六七。虽蒙考覆,州郡转相顾望,留苦其事。春夏待秋冬,秋冬复涉春夏,如此行逢赦者,不可胜数。

又谨慎之民,用天之道,分地之利,择莫犯土,谨身节用,积累纤微,以致小过,此言质良盖民,惟国之基也。

轻薄恶子,不道凶民,思彼奸邪,起作盗贼,以财色杀人父母,戮人之子,灭人之门,取人之贿,及贪残不轨,凶恶弊吏,掠杀不辜,侵冤小民,皆望圣帝当为诛恶治冤,

以解蓄怨。反一门赦之,令恶人高会而夸诤,老盗服臧而过门,孝子见仇而不得讨,亡主见物而不得取,痛莫甚焉。故将赦而先暴寒者,以其多冤结悲恨之人也。

夫养稊稗者伤禾稼,惠奸究者贼良民。《书》曰:“文王作罚,刑兹无赦。”是故先王之制刑法也,非好伤人肌肤,断人寿命者也,乃以威奸惩恶除民害也。天下本以民不能相治,故为立王者以统治之。天子在于奉天威命,共行赏罚。故经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天罚有罪,五刑五用。”《诗》刺“彼宜有罪,汝反脱之。”古者惟始受命之君,承大乱之极,被前王之恶,其民乃并为敌仇,罔不寇贼消灭,奸究夺攘,以革命受祚,为之父母,故得一赦。继体以下,则无违焉。何者?人君配乾而仁,顺育万物以成大功,非得以养奸活罪为仁,放纵天贼为贤□也。

今夫性恶之人,居家不孝悌,出入不恭敬,轻薄慢傲,凶悍无辨,明以威侮侵利为行,以贼残酷虐为贤,故数陷王法者,此乃民之贼,下愚极恶之人也。虽脱桎梏而出囹圄,终无改悔之心,自诗以羸敖头,出狱蹶蹶,复犯法者何不然。

洛阳至有主谐合杀人者,谓之会任之家,受人十万,谢客数千。又重馈部吏,吏与通奸,利入深重,幡党盘牙,请至贵戚宠

臣,说听于上,谒行于下。是故虽严令、尹,终不能破攘断绝。何者?凡敢为大奸者,材必有过于众,而能自媚于上者也。多散苟得之财,奉以谄谀之辞,以转相驱,非有第五公之廉直,孰能不为顾?今案洛阳主杀人者,高至数十,下至四五,身不死则杀不止,皆以数赦之所致也。由此观之,大恶之资,终不可化,虽岁赦之,适劝奸耳。

或云:“三辰有候,天气当赦,故人主顺之而施德焉。”未必然也。王者至贵,与天通精,心有所思,意有所虑,未发声色,天为变移。或若休咎庶征,月之从星,此乃宜有是事。故见瑞异,或戒人主。若忽不察,是乃己所感致,而反以为天意欲然,非直也。

俗人又曰:“先世欲赦,常先遣马分行市里,听于路隅,咸云当赦,以知天之教也,乃因施德。”若使此言也而信,则殆过矣。夫民之性,固好意度者也,见久阴则称将水,见久阳则称将旱,见小贵则言将饥,见小贱则言将穰,然或信或否。由此观之,民之所言,未必天下。前世赎赦稀疏,民无觐觐。近时以来,赦赎稠数,故每春夏,辄望复赦,或抱罪之家,侥幸蒙恩,故宣此言,以自悦喜。诚令仁君闻此,以为天教而辄从之,误莫甚焉。

论者多曰:“久不赦则奸究炽,而吏不制,故赦赎以解之。”此乃招乱之本原,不察祸福之所生者之言也。凡民之所以轻为盗贼,吏之所以易作奸匿者,以赦赎数而有侥幸也。若使犯罪之人终身被命,得而必刑,则计奸之谋破,而虑恶之心绝矣。

夫良赎可,孺子可令姐,中庸之人,可引而下,故其谚曰:“一岁载赦,奴儿噫嗟。”言王诛不行,则痛癢之子皆轻犯,况狡乎?若诚思畏盗贼多而奸不胜故赦,则是为国为奸究报也。夫天道赏善而刑淫,天工人其代之,故凡立王者,将以诛邪恶而养正善,而以逞邪恶逆,妄莫甚焉。

且夫国无常治,又无常乱,法令行则国治,法令弛则国乱,法无常行,亦无常弛,君

敬法则法行,君慢法则法弛。昔孝明帝时,制举茂才,过阙谢恩,赐食事讫,问何异闻,对曰:“巫有剧贼九人,刺史数以窃郡,讫不能得。”帝曰:“汝非部南郡从事邪?”对曰:“是。”帝乃振怒,曰:“贼发部中而不能擒,然材何以为茂?”捶数百,便免官,而切让州郡,十日之间,贼即伏诛。由此观之,擒灭盗贼,在于法明,不在数赦。

今不显行赏罚以明善恶,严督牧守以擒奸猾,而反数赦以劝之,其文常曰:“谋反大逆不道诸犯,不当得赦皆除之,将与士大夫洒心更始。”岁岁洒之,然未尝见奸人冗吏,有肯变心悔服称诏者也。有司奏事,又俗以赦前之微过,妨今日之显举。然则改往修来,更始之诏,亦不信也。

《诗》讥“君子屡盟,乱是用长。”故不若希其令,必其言。若良不能了无赦者,罕之为愈,令世岁老古时一赦,则奸究之减十八九,可胜必也。昔大司马吴汉老病将卒,世祖问以遗戒,对曰:“臣愚不智,不足以知治,慎无赦而已矣。”

夫方以类聚,物以群分。人之情皆见乎辞,故诸言不当赦者,非修身慎行,则必忧哀谨慎而嫉毒奸恶者也。诸利数赦者,非不达赦务,则必内怀隐忧有愿为者也。人君之发令也,必咨于群臣,群臣之奸邪者,固必伏罪,虽正直吏,犹有公过,自非鬻拳、李离,孰肯刑身以正国?然则是皆接私计以论公政也。与狐议裘,无时焉可!

《传》曰:“民之多幸,国之不幸也。”夫有罪而备辜,冤结而信理,此天之正也,而王之法也。故曰:“无纵诡随,以谨无良。”若枉善人以惠奸恶,此谓“敛怨以为德。”先帝制法,论衷刺刀者。何则?以其怀奸恶之心,有杀害之意也。圣主有子爱之情,而是有杀害之意,故诛之,况成罪乎?

《尚书·康诰》:“王曰:于戏!封,敬明乃罚。人有小罪,匪省,乃惟终自作不典,戒尔,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杀。”言恶人有罪虽小,然非以过差为之也,乃欲终身行之,故虽小,不可不杀也。何则?是本顽凶

思恶而为之者也。“乃有大罪匪终，乃惟省哉，适尔，既道极厥罪，时亦不可杀”。言杀人虽有大罪，非欲以终身为恶，乃过误尔，是不杀也。若此者，虽曰赦之可也，金作赎形，赦作宥罪，皆谓良人吉士，时有过误，不幸陷离者尔。

先王议讞狱以制，原情论意，以救善人，非欲令兼纵恶逆以伤人也。是故《周官》差八议之辟，此先王所以整万民而致时雍也。《易》故观民设教，变通移时之议。今日救世，莫乎此意。

【译文】

凡是求医治病的人，必须先知道脉搏的虚实盛衰，气色的症结，然后为他开处方，因此疾病可以治愈而寿命可以长久。治理国家的人，必须先知道百姓所以痛苦，灾祸所以产生的原因，然后设法加以禁止，所以邪恶可以堵塞国家可以安定。

今天虐害良民百姓最大的，莫过于频繁的赦免罪犯，赦赎罪犯频繁，就会使恶人昌盛而好人受到伤害。怎么能说明它呢？说：孝悌的家庭，努力提高自己的品德修养，谨慎自己的行动，不违背上面的禁令，从生到死，没有极轻微的罪行；频繁地赦赎罪犯，对善良的人来说，不曾蒙受一点恩惠，经常反而成为灾祸。为什么呢？正直的士人做为官吏，不躲避强暴，不辞谢上面的官员。从事于督察工作，心里很不快乐，邪恶狡猾的朋党，又加以诬陷的言论，都知道刚赦免不久，而就要共同横加冤枉正直的士人，被诬告的人被依法惩处。如今君主胡乱执行刑法，重的至死或流放，轻的就沦为冤枉，而被冤枉的家庭，在开始时就乞求审讯罪人时仍能申诉其正直，而对已经被冤死的人也没有什么益处了。

至于隐逸之士，善良的君子，被花言巧语谗佞之人所诬陷覆没，边远地区的冤民，能到京城宫门的，一万个人中不到数人，其中能得到审问的，不超过百分之一，既对尚

书审讯之后。空遣而去的，又十分之六七。虽然蒙受稽考审察，而州郡转相观望，留连困苦其事。春夏等待秋冬，秋冬又经历春夏，如此行逢赦免的人，不可胜数。

再者谨慎小心的百姓，运用天的原则，把分配给自己的土地，生产出的财富，终日拔草疏土，防身节用，积累极细小的财产，而却导致小的过错，这些都是说善良正直的百姓，是国家的根本。

轻佻浮薄的恶人，杀人越货的恶民，思考那些奸邪之事，起来充当盗贼，因财货女色杀死他人父母，杀戮他人的儿子，灭绝他人全家，夺取他人财富，及至那些贪婪凶暴不守法度，凶恶舞弊的官吏，掠考杀害无辜百姓，侵害冤枉小民，都希望圣明的帝王为他们诛杀恶人治理冤狱，以解决积怨。反而使被告一家赦免，让恶人置酒盛宴而加以夸耀，老练的盗贼拿着赃物从门前经过，孝子看见仇人而不能报仇，失主看见被盗的财物而不能取回，这是极大的痛恨。所以将要赦免罪犯而首先使百姓突然忧惧，因为恶人与百姓所结的仇恨太多了。

培养稊稗那样的败草就会伤害禾苗庄稼，仁慈犯法的人就会虐害善良的人们。《尚书》说：“文王制作刑罚，杀不赦。”因此以前的君主制定刑法，并不是喜欢伤害人的肌肉皮肤，断绝人的寿命，是用它来威胁行奸犯科惩治恶人，为民除害的。天下本来以为百姓不能治理，因此为百姓设立君主加以统治。天子的任务在于奉行老天的威令，恭敬地实行赏罚。所以经典称“老天命令有仁德的人，给以五种服式五种色彩；老天处罚有罪的人，给以五种刑罚五种用途。”《诗经》说：“那人应该有罪，你反而赦免他。”古时由于开始接受天命的君主，承受大乱之后的困惫，遭受先王的罪恶，其百姓竟为仇敌，到处都是盗贼灭义犯法作乱互相侵夺，因变革天命接受国统，成为百姓的父母，所以得以赦免他们的罪行。继位以后，就不守信言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君主顺从天命就仁德，顺育万物就可

以成就大功,并不是得以养奸赦活罪人为仁德,放纵大贼为贤德。

如今天性好恶好声色的人,在家不遵守孝悌之道,出入不恭敬,轻薄傲慢,凶恶蛮横不变,明火执仗公然以威力侮辱侵夺财物作为自己的德行,以残害酷虐为贤,因此多次陷入王法之中的人,这就是残害百姓的人,是最愚笨极恶的人。虽然摆脱刑具而出牢狱,终究没有悔改之心,自以为凭借受煎熬出头,出狱后惊惧不安,又犯法的人为什么还这样。

洛阳甚至有家主合伙杀人的事,称之为合伙担保之家,容纳人十万,谢客就有数千人。又重礼赠送给各部门官吏,官吏与他们互通奸情,财货收入甚重,党羽盘根错节,犬牙相错,请求之人达至贵戚宠臣,游说探听于上面,请谒行走于下面。因此虽有厉害的县令、府尹,终究不能使这些奸邪之人被破坏断绝。这是为什么呢?凡是敢做大奸邪的人,他的才能必有超过众人之处,又能自己谄媚干上。多多散发苟且得来的不义之财,进奉以阿谀谄媚之辞,使他们互相驱使,除非有像第五伦那样的廉洁鲠直的官员,谁能不瞻前顾后徇私枉法呢?如今考察洛阳家主杀人的事,多者数十人,少者四五人,只要他不死杀人就不停止,都是因为多次赦免所导致的。从这观察,罪大恶极的人的本性,终究不能教化,虽然每年都赦免,恰好是劝人为奸了。

有的说:“日月星辰的运行有一定的时间,天气的变化应当大赦,所以君主应该顺从它而施行仁德。”未必是这样。君王极贵,他的精神与天相通,心里有所思考的,意念有所思虑的,虽然未显露于脸色,天象却已经发生变移。有的如吉凶的征候,月亮跟随星星,这是应该有的事情。所以显现祥瑞和灾异,是感悟告戒君主。假如忽视不加考察,以为是自己感悟所致,而反认为是天意要这样做,这就不公正了。

庸俗的人又说:“上代想大赦,经常先派马分别行视街道里巷,听于路旁,都说应

当大赦,而知道是天的教诲,于是因此施行仁德。”如果相信这种言论,就过于危险了。百姓的秉性,本来就好奇揣测,看见长久阴天就称将要发水,看见长久晴天就称将要大旱,看见东西稍贵就说将要产生饥荒,看见货物稍贱就说庄稼将要丰收,一般的人或相信或否定。从这观看,百姓所说的,未必都是天所显示的。前代赎罪赦免的很稀少,老百姓没有非分的企图。近代以来,赦免赎罪的次数多了。因此每年春夏,即希望再次赦免罪犯,有的获罪之家,侥幸蒙恩被赦,因此就宣传这种言论,用来使自己喜悦。诚然让仁人君子听到这种言论,认为是老天教诲而即顺从的,错误就大了。

评论的人多数认为说:“长久不赦免犯人为非作歹的人就猖狂起来,官吏就不能制止,因此用赦免赎罪的办法加以解决。”这就不能昭明治乱的根源,不能考察祸福产生的言论。凡是百姓所以能轻易成为盗贼,官吏所以容易为非作歹干犯法纪的事,因为赦免赎罪的多而有侥幸的希望。如果使犯罪的人终身加以追捕,捕到后就定其罪,就使奸人的计谋破坏,而考虑作恶的思想就断绝了。

赦免赎罪通行以后,儿童可以使放纵,平常的人,可以引导坠入小人之列,因此谚语说:“一年赦免,好人怨声载道。”说的是君主对坏人不实行诛杀,而悲伤瘀积之人都会轻易犯罪,何况狡猾的人呢?如果诚然是害怕盗贼多而奸人不可胜数因此加以赦免,就是为犯法的人报仇了。天的原则是赏赐善良的人而施刑于邪恶的人,天上的职事是人代替它作的,所以凡是设立君王的,将用他来诛灭邪恶而养育正直善良的人们,而用来炫耀邪恶的人,变乱没有比这再大了。

国家没有永久安定的,又没有永久不乱的,法令实行国家就安定,法令废弛国家就混乱,法令没有永久施行的,也没有永久废弛的,君主敬肃法令而法令就施行,君主怠慢法令而法令就废弛。过去汉明帝时

期,荆州地方官推举茂才,通过宫阙谢恩,赏赐吃食事毕以后,问茂才有什么特别之处,荆州官员回答说:“巫县有势力强大的盗贼九人,刺史数次督察郡县,终究不能捕获。”汉明帝说:“你不是州部南郡从事吗?”答道:“是。”明帝于是震怒,说:“盗贼起自州部之中而不能擒获,这样的才能怎么能称得上是茂?”用棍棒捶打数百下,便免去他的官职,并责备州郡,十天之内,盗贼就被诛杀。由这观察,擒灭盗贼,在于法令严明,不在于赦免的次数。

如今不显扬严行赏罚以昭明善恶,严厉督察州牧郡守以擒获邪恶扰乱的人,而反过来却多次大赦来勉励犯人,汉文帝说:“谋反大逆不道各种罪犯,不应当得到赦免的都赦除其罪,将和士大夫涤除内心邪恶除旧布新。”年年涤除内心邪恶,但未曾见邪恶的人和犯法的官吏,有肯改变思想悔过服罪赞许诏令的。官吏奏事,又有人要拿大赦前的小过,会妨碍今天的显达的选举。那么改变以往的错误以治理未来,也不会使人相信的。

《诗》讥讽“君子多次定盟言,祸乱因而更增添。”因而不如减少诏令,说了就一定要做到。如果极不能做到不赦免犯人,以稀少为较好,命令三十年仿照古时一赦,邪恶犯法之人就减少十之八九,可必操胜算。过去大司马吴汉因年老生病将要去世,光武帝问他遗留的戒训,吴汉回答说:“臣愚笨不聪明,不足以知晓治国之事,仅知谨慎不赦免犯人罢了。”

人各以其类相聚集,物各以其类相分别。人的情感都流露在言辞里面,因此各种议论不应当赦免的人,不是为了努力提高自己的品德谨慎自己的行为,就必定是忧愁悲伤谨慎而憎恨凶狠邪恶的人。各种议论大赦有利的人,不是不通达政务,就必定是心怀深忧有愿去这样做的人。君主发号施令,必定咨询于群臣,群臣中有邪恶的

人,固然必定服罪,虽然是正直的官吏,还有因公犯有过失的,自己又不是像鬻拳、李离那样的人,谁肯自己遭受杀身之祸以正国法呢?如此就是挟持私人的计谋而议论公事了。与狐狸商议制造狐皮衣服的事,何时才能可以成功呀!

《左传》说:“百姓多存侥幸,就是国家的不幸。”有罪就服其罪,冤仇了结而道理又得到了申明,这是天的纯正,是国家的法律。因此说:“不要纵容有阴谋的人,谨防其人不善良。”如果冤枉好人而仁慈邪恶的人,这就叫做“招来怨恨而反自以为德”。先帝制定法令对衣袖内藏有利刃的人要定罪。为什么呢?因为他怀有邪恶的念头,有杀害他人的意图。圣明的君主有慈爱的感情,你有杀害的意图,因此要诛杀他,更何况已成为罪犯呢?

《尚书·康诰》说:“康王说‘呜呼!封,敬肃显明之后就施以惩罚。人有小罪不省悟,如此就终于不遵守法制,告戒他,有其小罪,不能不杀。’”这是说邪恶的人有罪虽然很小,但不是因为有过错才这样做,是想终身实行法制,所以罪过虽小,不能不杀。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他本身贪婪凶狠思念邪恶才这样做的。“你有大罪不能终身,但此仅是过失,既然法律认为有罪,时世也不可杀。”是说杀人虽然有大罪,并不是要终身作恶,是过失误杀,是不能杀的。像过失杀人这样的事,虽说赦免其罪是可以的。用金赎罪,用赦宽宥其罪,都可以称为善良有才华的人,时有失误,不幸陷入进去罢了。

前代圣王审判定案的制度,是寻其本情给以定罪,用以拯救好人,并不是要让放纵邪恶叛逆的人来伤害人。因此《周官》对八种人给以减刑免刑,这是先王所以治理百姓而达到和谐的原故。《易》因此有观察民情推行教化,不墨守陈规的意见。今天拯救世人,最紧要的不过于此。

三式第十七

高祖定汉 ,与群臣约 ,自非刘氏不得王 ,非有武功不得侯。孝文皇帝始封外祖 ,因为典式 ,行之至今。孝武皇帝封爵丞相 ,以褒有德 ,后亦承之 ,建武乃绝。

传记所载 ,稷、苴、伯夷、皋陶、伯医 ,日受封土。周宣王时 ,辅相大臣 ,以德佐治 ,亦获有国。故尹吉甫作封颂二篇 ,其诗曰 :“ 虢虢申伯 ,王缵之事 ,于色于谢 ,南国于是式。”又曰 :“ 四牡彭彭 ,八鸾锵锵 ,王命仲山甫 ,城彼东方。”此言申伯、山甫文德致升平 ,而王封以乐土 ,赐以盛服也。

《易》曰 :“ 鼎折足 ,覆公餗 ,其刑渥。”此言公不胜任 ,则有渥刑也。是故三公在三载之后 ,宜明考绩黜刺 ,简练其材。其有稷、苴、伯夷、申伯、仲山甫致治之效者 ,封以列侯 ,令受南土八蛮之赐。其尸禄素餐 ,无进治之效、无忠善之言者 ,使从渥刑。是则所谓明德慎罚 ,而简练能否之术也。诚如此 ,则三公竞思其职 ,而百寮争竭其忠矣。

先王之制 ,继体立诸侯 ,以象贤也。子孙虽有食旧德之义 ,然封疆立国 ,不为诸侯 ,张官置吏 ,不为大夫 ,必有功于民 ,乃得保位 ,故有考绩黜刺九锡三削之义。《诗》云 :“ 彼君子兮 ,不素餐兮。”由此观之 ,未有得以无功而禄者也。当今列侯 ,率皆袭先人之爵 ,因祖考之位 ,其身无功于汉 ,无德于民 ,专国南面 ,卧食重禄 ,下殫百姓 ,富有国家 ,此素餐之甚者也。孝武皇帝患其如此 ,乃令酎金以黜之 ,而益多怨。

今列侯或有德宜子民 ,而道不得施 ,或有凶顽丑 ,不宜有国 ,而恶不上闻。且人情莫不以己为贤而效其能者 ,周公之戒 ,不使大臣怨乎不以。《诗》云 :“ 驾彼四牡 ,四牡项领。”今列侯年砵以来 ,宜皆试补长吏墨绶以上 ,关内侯补黄绶 ,以信其志 ,以旌其

能。其有韩侯、邵虎之德 ,上有功于天子 ,下有益于百姓 ,则稍迁位益土 ,以彰有德。其怀奸藏恶尤无状者 ,削土夺国 ,以明好恶。

且夫列侯皆剖符受策 ,国大臣也 ,虽身在外 ,而心在王室。宜助聪明与智贤愚 ,以佐天子。何得坐作奢僭 ,骄育负责 ,欺枉小民 ,淫恣酒色 ,职为乱阶 ,以伤风化而已乎 ?诏书横选 ,犹乃特进 ,而不令列侯举 ,此于主德大洽 ,列侯大达 ,非执术督责总览独断御下方也。今虽未使典始治民 ,然有横选 ,当循王制 ,皆使贡士 ,不宜阙也。

是诚封三公以旌积德 ,试列侯以除素餐 ,上合建侯之义 ,下合黜刺之法。贤材任职 ,则上下蒙福 ,素餐委国 ,位无凶人。诚如此 ,则诸侯必内思制行而助国矣。今则不然 ,有功不赏 ,无德不削 ,甚非劝善惩恶 ,诱进忠贤 ,移风易俗之法术也。

昔先王抚世 ,选练明德 ,以统理民 ,建正封不过百 ,取法于震 ,以为贤人聪明不是过也 ;又欲德能优而所治纡 ,则职修理而民被泽矣。今之守相 ,制地千里 ,威权势力 ,盛于列侯 ,材德明义 ,未必过古 ,而所治逾百里 ,此以所治多荒乱也。是故守相不可不审也。

昔宣皇帝兴于民间 ,深知之 ,故常叹曰 :“ 万民所以安田里无忧患者 ,政平讼治也。与我共此者 ,其惟良二千石。”于是明选守相 ,其初除者 ,必躬见之 ,观其志趣 ,以昭其能 ,明察其治 ,重其刑赏。奸宄减少、户口增息者 ,赏赐金帛 ,爵至封侯。其耗乱无状者 ,皆衔刀沥血于市。赏重而信 ,罚痛而必 ,群臣畏劝 ,竞思其职。故能致治安而世升平 ,降凤皇而来麒麟 ,天人悦喜 ,符瑞并臻 ,功德茂盛 ,立为中宗。由此观之 ,牧守大臣者 ,诚盛衰之本原也 ,不可不选练

也,法令赏罚者,诚治乱之枢机也,不可不严行也。

昔仲尼有言:“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今者刺史、守相,率多怠慢,违背法律,废忽诏令,专情务利,不恤公事。细民冤结,无所控告,下土边远,能诣阙者,万无数人,其得省治,不能百一。郡县负其如此也,故致敢延期,民日往上书。此皆太宽之所致也。

《噬嗑》之卦,下动上明,其《象》曰:“先王以明罚敕法。”夫积怠之俗,赏不隆则善不劝,罚不重则恶不惩。故凡欲变风改俗者,其行赏罚者也,必使足惊心破胆,民乃易视。

圣主诚肯明察群臣,竭精称职有功效者,无爱金帛封侯之费,其怀奸藏恶别无状者,图铁□钺之决。然则良臣如王成、黄霸、龚遂、邵信臣之徒,可比郡而得也,神明瑞应,可期年而致也。

【译文】

高祖刘邦奠定了汉朝基业,和群臣约定,不是刘氏不得封王,没有武功不得封侯。到汉文帝时开始封外祖父为侯,因而成为制度法式,实行到了今天。汉武帝封爵丞相为列侯,用它褒奖有德的人,后来也加以承袭,到光武帝时才断绝。

据传记所记载,稷、契、伯夷、皋陶、伯医,都授给过封土。周宣王时期,辅助大臣,用德辅佐治理,也获得有封国。因此尹吉甫作封颂二篇,他的诗说:“勤勉的申伯,君王使他继其事,往修都邑于谢地,把南方来统治。”又说:“四匹大马又高又壮,鸾铃响叮当,周王命令仲山甫,前往筑城在东方。”这是说申伯、仲山甫用礼乐教化百姓而达到升平,而君主分封给他乐土,赏赐给整齐的衣冠。

《易》说:“鼎足太轻,不堪重负,以致折断。倾覆王公的美味嘉餚,弄得满地狼

藉。这是凶险之兆。”这是说公务不能胜任,就有重刑。因此三公在任满三年以后,应显明考核成绩进行罢黜分开,磨练其才能。而有稷、契、伯夷、申伯、仲山甫那样能达到治理成效的,封给列侯,让他受南土之封,有八鸾之赐。其居官位食禄而不尽职的,没有治理成效,没有忠诚善良言语的人,使他顺从重刑。诚如这样所说显明仁德慎重刑罚,就是磨练人才能否的策略。诚然是这样,而三公竞相考虑其职责,而百官争着竭尽其忠心。

前代圣王的制度,继承以立诸侯,用来效法先人的贤德。子孙虽然有依赖先人遗业过活之利,但封疆土立国家,不是为了诸侯,设置官吏,不是为了大夫,必须有功于民,才能保持其地位,因此有考核成绩罢黜与升陟,赐给九锡与三削其地之利。《诗》说:“那些贵族老爷们,不是白吃闲饭吗!”从这里观察,没有能以无功而受禄的。如今的列侯,大概都是承袭先人的封爵,因袭已故的祖宗爵位,他本身无功于汉朝,无德于百姓,专擅封国南面而坐。不劳而食重禄,下面竭尽百姓的财富,富有其封国,这是不劳而坐食之极的人。汉武帝忧虑此事,就让他们在祭祀宗庙时献金助祭用来减少他们的财富,他们更加怨恨。

如今列侯或者有仁德善爱其百姓,而治理不能施行,或者有凶狠愚笨丑恶,不应当有封国,而罪恶不能传报到天子那里。况且人的心情无不认为自己德行好能够实现其才能的,周公的警告,不让大臣抱怨没被信用。《诗》说:“驾车的四匹雄马,喂养成粗大的颈子。”如今列侯三十年以来,都应试补长吏以上官员给以铜印黑绶,关内侯补铜印黄绶,用来申明他的志向,用来表彰他的才能。如果他有韩侯、邵虎那样的仁德,可以上报其功劳于天子,对下有益于百姓,就逐渐迁升他的爵位和增加封土,用来表彰他的仁德。而怀藏邪恶更没有成绩的人,削去其封土夺去封国,用来彰明好坏。

况且列侯都是与帝王剖开符节接受策命的,是国家的大臣,虽然身在外地,而心思却在王室。应该帮助聪敏推举有智慧贤能的人,用来辅助天子。怎么能够自作奢侈僭越,骄傲自满辜负其责,欺骗冤枉小民,沉溺放纵于酒色,专门制造祸乱。用来伤害风俗教化罢了呢?诏书特拜,就如同特进一样,而不让列侯举士,这对于君主的仁德不能融洽,列侯不能通达,不是用策略督责总览独断以统治下面。如今虽未能派官员治理百姓,仍有特拜,应当遵循国家的制度,都使他们推举人才,不应该缺少。

因此真用封爵三公来表彰他所积聚的仁德,来检验列侯,罢除不劳而坐食的人,这对上合乎建国封侯的威仪,对下合乎罢黜贬斥的法令。那么贤才才能任职,上下就受其福分,让不劳而坐食的人退让而抛弃在一边,官位就没有凶恶的人了。诚然是这样,而诸侯必然思考君王命令的通行而能辅助国家。如今就不是这样,列侯有功不进行赏赐,没有仁德也不削封爵不削封土,更不是劝善惩恶,引进忠直善良,移风易俗的法术了。

过去先代圣王据有世间,选择有明德的人进行分封,以统辖管理百姓,建立正封不过百里,效法于雷震之象,因为贤人聪敏不是过错;又要德才优秀而所管理的事务细少,就可以使职务有条理而百姓受其德泽了。如今的郡守国相,控制地域千里,威权势力,超过列侯,才智德义,未必超过古人,而所治理的土地却超过百里,因此在其所管辖的地域大多出现荒废紊乱的状况。所以郡守国相不可不加以审查。

过去汉宣帝兴起于民间,深知民间疾苦,因此经常感叹说:“广大百姓所以能安定在田里没有忧愁祸患的原因,是由于政治升平狱讼得到治理的缘故。与我共同这样的,只有良好的官吏二千石了。”于是明察挑选郡守国相,其中最初任命的人,必亲自接见他,观察他的志向兴趣,以昭明他的

才能,明察他的治理,严罚厚赏。犯法作乱的人减少,户口增加的,赏赐给金帛,爵位可到封侯。其昏昧不明无成绩的人,都被砍头流血于市。赏赐隆重就使人相信,处罪痛苦就使人必定畏惧,群臣畏惧引以为戒,就竞相考虑其职责。所以就能达到治理安定而世道升平,凤凰降临而麒麟来奔。天和人都喜悦,吉祥的征兆一齐都到,功劳仁德美盛,尊号为中宗。从这观察,作为州牧郡守的大臣,诚然是国家兴衰的根本原因,不可不严格挑选,法令赏罚的事,诚然是治理乱政的关键所在,不能不严格执行。

过去孔子曾经说过:“施政宽大百姓就怠慢,怠慢就要用严厉加以纠正。严厉了百姓就会受到伤害,伤害了就要施行宽大政策。用宽大来调节严厉,用严厉来调节宽大,政事因此协调。”如今的刺史、郡守、国相,大多数都怠慢于政事,与法律相违背,败坏忽视诏令,专心谋取私利,不忧虑公事。小民冤屈成结,没有控告的地方,边远地区的百姓,能到达宫门告状的,一万个人中不到数人,其中能得到审察的,不能达到百分之一。郡县依仗其权势到了如此地步,所以竟敢延期,百姓每天都向上面上书告状。这都是施政太宽大所造成的恶果。

《噬嗑》这卦,是说下面敢于行动,而上面就明察机宜,它的《象》说:“先王想以严明的治政,从而明察其刑罚,修正其法律。”滞留怠慢的恶习,赏赐不隆重就不能劝善,惩罚不重恶习就禁止不了。因此凡是要移风易俗的人,而实行赏罚的,必使他们胆战心惊,百姓就容易效法了。

圣明的君主如果愿意明察群臣,对于竭尽全力胜任其职具有功效的人,不要爱惜金钱布帛封侯的费用,而胸怀邪恶,罪不可言状的人,必然受到砧□斧钺的诛杀。如此就像良臣王成、黄霸、龚遂、召信臣等人,就可以连郡而得,神明吉祥的征兆,一年就可到来。

爱日第十八

国之所以为国者,以有民也;民之所以为民者,以有谷也;谷之所以丰殖者,以有人功也;功之所以能建者,以日力也。治国之日舒以长,故其民闲暇而力有余;乱国之日促以短,故其民困务而力不足。

所谓治国之日舒以长者,非谒羲和而令安行也,又非能增分度而益漏刻也。乃君明察而百官治,下循正而得其所,则民安静而力有余,故视日长也。所谓乱国之日促以短者,非谒羲和而令疾驱也,又非能减分度而损漏刻也。乃君不明则百官乱而奸宄兴,法令鬻而役赋繁,则希民困于吏政,仕者穷于典礼,冤民□狱乃得直,烈士交私乃见保,奸臣肆心于上,乱化流行于下,君子载质而车驰,细民怀财而趋走,故视日短也。

《诗》云:“王事靡盬,不遑将父。”言在古闲暇而得行孝,今迫促不得养也。孔子称庶则富之,既富则教之。是故礼义生于富足,盗窃起于贫穷,富足生于宽暇,贫穷起于无日。圣人深知,力者乃民之本也,而国之基,故务省役而为民爱日。是以尧敕羲和,钦若昊天,敬授民时,邵伯讼不忍烦民,听断棠下,能兴时雍而致刑错。

今则不然。万官挠民,令长自衙,百姓废农桑而趋府廷者,非朝哺不得通,非意气不得见,讼不讼辄连月日,举室释作,以相瞻视,辞人之家,辄请邻里应对送饷,比事讫,竟亡一岁功,则天下独有受其饥者矣,而品人俗士之司典者,曾不觉也。郡县既加冤枉,州司不治,令破家活,远诣公府。公府不能照察真伪,则但欲罢之以久困之资,故猥说一科,令此注百日,乃为移书,其不满百日,辄更造数,甚违邵伯讼棠之义。此所谓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虽多亦奚以为者也。

孔子曰:“听讼,吾犹人也。”从此观之,中材以上,皆议曲直之辨,刑法之理可;乡亭部吏,足以断决,使无怨言,然所以不者,盖有故焉。

《传》曰:“恶直丑正,实繁有徒。”夫直者贞正而不挠志,无恩于吏。怨家务主者结以货材,故乡亭与之为排直家,后反复时吏坐之,故共枉之于庭。以赢民与豪吏讼,其势不如也。是故县与部并,后有反复,长吏坐之,故举县排之于郡。以一人与县讼,其势不如也。故郡与县并,后有反复,太守坐之,故举郡排之于州。以一人与一郡讼,其势不如也。故州与郡并,而不肯治,故乃远诣公府尔。公府不能察,而苟欲以钱刀课之,则贫弱少货者终无以旷旬满祈。豪富饶钱者取客使往,可盈千日,非徒百也。治讼若此,为务助豪猾而镇贫弱也,何冤之能治?

非独乡部辞讼也。武官断狱,亦皆始见枉于小吏,终重冤于大臣。怨故未仇,辄逢赦令,不得复治,正士怀冤结而不得信,猾吏崇奸宄而不痛坐。郡县所以易侵小民,而天下所以多饥穷也。

除上天感动,降灾伤俗,但以人功见事言之,今自三府以下,至于县道乡亭,及从事督邮,有典之司,民废农桑而守之,辞讼告诉,及以官事应对吏者,一人之,日废十万人,人复下计之,一人有事,二人获饷,是为日三十万人离其业也。以中农率之,则是岁三百万口受其饥也。然则盗贼何从消,太平何从作?

孝明皇帝尝问:“今旦何得无上书者?”左右对曰:“反支故。”帝曰:“民既废农远来诣阙,而复使避反支,是则又夺其日而冤之也。”乃敕公车受章,无避反支。上明圣主为民爱日如此,而有司轻夺民时如

彼盖所谓有君无臣,有主无佐,元首聪明,股肱怠惰者也。《诗》曰:“国既卒斩,何用不监!”伤三公居人尊位,食人重禄,而曾不肯察民之尽瘁也。

孔子病夫“未之得也,患不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者。今公卿始起州郡而致宰相,此其聪明智虑,未必暗也,患其苟先私计而后公义尔。《诗》云:“莫肯念乱,谁无父母!”今民力不暇,谷何以生?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嗟哉,可无思乎!

【译文】

国家其所以称为国家,是因为有百姓;百姓其所以称为百姓,是因为有粮食,粮食其所以充实,因为是人的力量;人功其所以能够创立,因为有白天的力量。治理国家的时日舒畅而且长久,所以其百姓闲暇而力量有余,紊乱国家的时日紧迫而短暂,所以其百姓就困乏而力量不足。

所谓治理国家的时日舒畅而且长久的事,不能请羲和主持四时而令节气慢慢地走,又不能增加日月运行的分度以及漏刻的时辰。但君主明察而百官就有秩序,下面遵循正道就得到适当的安置,百姓就安静而力量就有剩余,因此就显示出日长了。所谓乱国的时日紧迫而短暂的事,不能请羲和主持四时节气疾速地前进,又不能减少日月运行的分度以及漏刻的时辰。但君主昏暗而百官就废乱,邪恶就兴起,法令就会被出卖,而徭役赋税就繁苛,百姓困窘于吏政,审察的人困于歪曲礼制,冤民因讼得贿赂官员才能买到公正,有志于功业的人也要交通私人才能被保,奸臣恣意妄行于上,乱政败俗流行于下,君子装载着东西驱车逃跑,小民怀抱着财物而疾速逃走,所以就显示出天短了。

《诗》说:“国家大事不巩固,无暇还家养父母。”是说在古时候闲暇时才能行孝,赡养父母,如今在紧迫急促情况下不能赡养父母。孔子称赞人口多就让他们富裕起

来,已经富裕起来了就教育他们。因此礼义产生于富足,盗窃起源于贫穷,富裕产生于宽松闲暇,贫穷起源于没有时日。圣人深知,功力乃是百姓的根本,才能是国家的基础,所以务必节省徭役而为百姓爱惜时日。所以尧告戒羲和,敬佩苍天,敬授给百姓时间,邵伯不忍心烦劳百姓,所讼决断于棠树之下,能与时和谐而达到刑法搁置不用。

今天就不是这样。众多官员骚扰百姓,县令县长变幻莫测以眩惑百姓,百姓废弃农桑而奔赴官府的人,不吃过早饭不能进去,不赠送东西不能见面,诉讼不诉讼就得连续日月,百姓全家放弃农桑操作,以互相看望,诉讼之家,即请邻居酬答赠送,等到事情完毕以后,竟然一年没有收获,而天下将受其饥饥了,而众人平庸之士掌管刑狱,却不曾察觉。郡县既然加以冤枉,州中主管官员也不加审理,让他破家苟活,远到三公之府。公府不能明察真伪,而不过是要疲惫他得以久困他的资财,因此多设一科,让他超过百日,才为他移书,其不满百日的,即使再次遇上大赦,这样很违背邵伯听讼于甘棠树下的原义。这就是所说的背诵《诗》三百篇,授给他政事,不通达,虽然背诵再多也不会有什么作为。

孔子说:“审理诉讼,我和别人差不多。”由此观察,中等才能以上的人,都可以参加评议是非曲直的争论,刑法的准则;乡亭部界的官吏,足以审断决狱,使他们没有怨言。但是所以不是这样,大概是有原因的。

《左传》说:“灾害正直,这样的人很多。”正直的人坚定不移而不弯曲其志向,不亲爱于官吏。怨仇之家用财货贿赂主事的人,因此乡亭与怨仇之家合伙排挤正直之家,然后就出现反复时日官吏使正直之家坐罪,因此共同排挤正直之家于县庭。拿瘦弱之民与豪强官吏相诉讼,其权势不能相比。因此县与部合在一起,后又反复时日,长吏使正直之家坐罪,因此全县排挤

正直之家于郡府。拿一人与一县相诉讼，其权势不能相比。因此郡与县合在一起，后又反复时日，太守使正直之家坐罪，因此全郡排挤正直之家于州府。拿一人与一郡相诉讼，其权势不能相比。因此州与郡合在一起，而不肯审理诉讼，因此只好远到三公之府了。三公府不能明察，就苟且想用金钱考验正直之家，而贫弱缺少财富之家最终不得以才旷时满期。豪富有钱之家，雇人使他前往，一天可多达千钱，而不是百钱。这样审理诉讼，就造成帮助了豪强奸猾之人而镇压了贫困弱小之家，什么冤枉能得到治理呢？

不仅仅乡部诉讼是这样。武官在审理判决罪案时，也都开始被小吏冤枉，最终被大臣重冤，怨仇未等到结案，即遇到大赦的诏令，不能再重新审理。纯正之士怀结怨仇而不能申诉，奸猾的官吏崇尚犯法而不能痛加治罪。这是郡县所以容易侵害小民，而天下所以多灾荒穷困的原因。

除了上天感动，降下灾害毁伤农作物之外，仅以人祸而论，有如下事实。如今从三公府以下，至于县道乡亭，以及从事督邮和主管官员，百姓废弃农桑而等候着诉讼，审理告诉其冤主后，冤主还要因官事酬答官吏，一人所废弃的时间，等于一天停止十万人干活，再往下计算一下，一人有事，

二人护送粮饷，这样一天就有三十万人脱离本业。通常以中等农户计算，就是每年有三百万口受其饥饿。那么盗贼如何能消除，太平从何处作起呢？

汉明帝曾经问道：“今天为什么没有上书的人呢？”左右大臣回答说：“因为今天是不吉利的缘故。”明帝说：“老百姓既然废弃农业远道而来到宫阙之下，而再使他们避开不吉利的日子，这是又夺去他们的时日而冤枉他们了。”就宣敕公车官员接受章奏，不要避开不吉利的日子。圣明的君主为百姓爱惜时日尚且如此，而官吏却那样轻夺民时，大概是所谓的有君无臣，有君主而没有辅助，元首聪敏，臣子怠慢懒惰的原因。《诗》说：“国家既已要灭绝，却为什么不监察！”是哀伤三公高居尊位，食人之厚禄，而曾经不肯考察老百姓的憔悴困苦。

孔子责备“没有得到职位的时候，生怕得不到，已经得到了，又怕失去它”如今公卿大臣开始起自州郡而达到宰相的职位，这是他的聪敏明智的思考，未必昏暗，怕的是他苟且首先私自谋划而后激起共愤罢了。《诗》说：“没人制止这乱世，谁无父母不忧心！”如今民力没有闲暇之时，五谷怎么能生长呢？如果百姓的用度不够，君主怎么会够呢？唉呀，这可以不思考吗？

潜夫论第五卷

断讼第十九

五代不同礼 ,三家不同教 ,非其苟相反也 ,盖世推移而俗化异也。俗化异则乱原殊 ,故三家符世 ,皆革定法。高祖制三章之约 ,孝文除克肤之刑 ,是故自非杀伤盗臧 ,文罪之法 ,轻重无常 ,各随时宜 ,要取足用劝善消恶而已。

夫制法之意 ,若为藩篱沟堑以有防矣 ,择禽兽之尤可数犯者 ,而加深厚焉。今奸宄虽众 ,然其原少 ;君事虽繁 ,然其守约。知其原少奸易塞 ,见其守约政易持。塞其原则奸宄绝 ,施其术则远近治。

今一岁断狱 ,虽以万计 ,然辞讼之辩 ,斗贼之发 ,乡部之治 ,狱官之治者 ,其状一也。本皆起民不诚信 ,而数相欺诒也。舜敕龙以谗说殄行 ,震惊朕师 ,乃自上古患之矣。故先慎己喉舌 ,以元示民。孔子曰 :“乱之所生也 ,则言语以为阶。”小人不耻不仁 ,不畏不义。“脉脉规规 ,常怀奸唯 ,昧冒前利 ,不顾廉耻 ,苟且中 ,后则榆解奴抵 ,以致祸变者 ,比屋是也。

非唯细民为然 ,自封君王侯贵戚豪富 ,尤多有之。假举骄奢 ,以作淫侈 ,高负千万 ,不肯偿责。小民守门号哭啼呼 ,曾无怵惕慚怍哀矜之意。苟崇聚酒徒无行之人 ,传空引满 ,啾啾骂詈 ,昼夜鄂鄂 ,慢游是好。或殴击责主 ,入于死亡 ,群盗攻剽 ,劫人无异。虽会赦赎 ,不当复得在选辟之科 ,而州司公府反争取之。且观诸敢妄骄奢而作大责者 ,必非救饥寒而解困急 ,振贫穷而行礼义者也 ,咸以崇骄奢而奉淫湎尔。

《春秋》之义 ,责知诛率。孝文皇帝至寡动 ,欲任德 ,然河阳侯陈信坐负六月免

国。孝武仁明 ,周阳侯田彭祖坐当轹侯宅而不与免国 ,黎阳侯邵延坐不出持马 ,身斩国除。二帝岂乐以钱财之故而伤大臣哉 ?乃欲绝诈欺之端 ,必国家之法 ,防祸乱之原 ,以利民也。故一人伏正罪而万家蒙乎福者 ,圣主行之不疑。永平时 ,诸侯负责 ,辄有削绌之罚。此其后皆不敢负民 ,而世自节俭 ,辞讼自消矣。

今诸侯贵戚 ,或曰敕民慎行 ,德义无违 ,制节谨度 ,未尝负责 ,身洁规避 ,志厉青云。或既欺负百姓 ,上书封租 ,愿且偿责 ,此乃残掠官民 ,而还依县官也 ,其诬罔慢易 ,罪莫大焉。

《孝经》曰 :“陈之以德义而民兴行 ,示之以好恶而民知禁。”今欲变巧伪以崇美化 ,息辞讼以闲官事者 ,莫若表显有行 ,痛诛无状 ,导文、武之法 ,明诡诈之信。

今侯王贵戚不得浸广 ,奸宄遂多。岂谓每有争斗辞讼 ,妇女必致此乎 ?亦以传见。凡诸祸根不早断绝 ,则或转而滋蔓 ,人若斯邪。是故原官察之所以务念 ,臣主之所以忧劳者 ,其本皆乡亭之所治者 ,大半诈欺之所生也。故曰 :知其原少则奸易塞也 ,见其守约则政易持也。

或妇人之行 ,贵令鲜洁 ,今以适矣 ,无颜复入甲门 ,县官原之 ,故令使留所既入家。必未昭乱之本原 ,不惟贞洁所生者之言也。贞女不二心以数变 ,故有匪石之诗 ;不枉行以遗忧 ,故美归宁之志。一许不改 ,盖所以长贞洁而宁父兄也。其不循此而二三其德者 ,此本无廉耻之家 ,不贞专之所也。若然之人 ,又何丑吝 ?轻薄父兄 ,淫僻

妇女,不惟义理,苟疏一德,借本治生,逃亡抵中,乎以致于刳腹芟颈灭宗之祸者,何所无之?

先王因人情喜怒之所不能已者,则为之立礼制而崇德让;人所可已者,则为之设法禁而明赏罚。今市卖勿相欺,婚姻无相诈,非人情之不可能者也。是故不若立义顺法,遏绝其原。初虽慚吝于一人,然其终也,长利于万世,小惩而大戒,此所以全小而济顽凶也。

夫立法之大要,必令善人劝其德而乐其政,邪人痛其祸而悔其行。诸一女许数家,虽生十子,更百赦,勿令得蒙一还私家,则此奸绝矣。不则髡其夫妻,徙千里外剧县,乃可以毒其心而绝其后,奸乱绝则太平兴矣。

又贞洁寡妇,或男女备具,财货富饶,欲守一醮之礼,成同穴之义,执节坚固,齐怀必死,终无更许之虑。遭值不仁世叔,无义兄弟,或利其娣币,或贪其财贿,或私其儿子,则强中欺嫁,处迫胁遣送,人有自缢房中,饮药车上,绝命丧驱,孤捐童孩。此犹迫胁人命自杀也。

或后夫多设人客,威力胁载,守将抱执,连日乃缓,与强掠人为妻无异。妇人软弱,猥为众强所扶与执迫,幽厄连日,后虽欲复修本志,婴绢吞药。

【译文】

唐、虞、夏、商、周五代的礼制不同,夏、商、周三家的政教不同,并不是它们不相同,大概是时代推移而风化不同。风化不同而变乱的根源就不同,因此夏、商、周三家统治当世以后,都改变原有的法制。汉高祖制定三章的约法,汉文帝废除伤害肌体的肉刑,所以自然不是为了杀伤盗贼,犯罪的法律条文,轻重变化不定,各随时间而适宜,要取决于完备劝勉善良禁止邪恶罢了。

制定法律的意思,就如做篱笆挖濠沟

陷坑加以防备一样,选择禽兽突出而数次侵犯的,而加深加厚它。如今犯法作乱的人虽然很多,但其根源少,国家的事务虽然繁杂,但得其要领。知道根源少邪恶就容易堵塞,看见官员得其要领政事就容易掌管。堵塞了根源而犯法作乱的人就断绝了,再施以策略而远近就可以治理了。

如今一年决断狱讼,虽然以万数计算,但是诉讼的治理,群贼的暴发,乡部的治理,狱官的决断,其情况是一样的。本来都起因于百姓不忠诚信任,而互相欺骗。舜命令龙因谗言害事,惊乱我众而任命为纳言,而且从上古就忧虑它。因此先谨慎任用自己的大臣,用以显示百姓。孔子说:“变乱之所以产生,言语是招引灾祸的阶梯。”小人不以不仁义为可耻,不以不道义而畏惧。”奸人惊恐而视,经常怀有奸诈,贪图前面的财利,而不顾廉耻。苟且中,后就偷懈奴抵,因此而遭受灾祸的人,家家户户都是这样。

并不仅百姓是这样,从封君王侯贵戚豪富之家,更多有这样的事情。借推举人才而骄傲奢侈,因而开始放荡安逸的生活,负债高达千万,不肯偿还。小民守候在官府门前呼号啼哭,官吏不曾有戒惧怜悯之心。苟且聚集酒徒品行不好之人,将酒斟满传空,然后啁啾责骂,昼夜不休,浪荡遨游是其爱好。或殴打债主,以致于死亡,群盗攻击抢劫,劫人财物。虽逢赦免赎罪,不应当再在选举辟除之科,而州中主管官员和三公府反而争着取他。姑且观察他们敢于妄自骄傲奢侈而敢借大债的人,必不是为了拯救饥寒而解除困急,赈济贫穷而实行礼义的人,都是因为崇尚骄傲奢侈而遵奉沉迷于酒色的人。

《春秋》一书的评论,是谴责知情的人诛杀首恶的人。汉文帝极少私欲,专务以仁德教化百姓,但河阳侯陈信因超过六个月不偿还欠别人的债务而坐罪免除封国。汉武帝仁德圣明,周阳侯田彭祖因不归还轺侯薄昭的宅第而坐罪免除封国,黎侯邵延

因拒不出牡马以供军用,身遭被斩封国被削除。这两位皇帝怎么能以乐于钱财的原因而伤害大臣呢?是要断绝欺诈的开端,肯定国家的法律,防止祸乱产生的根源,以便利百姓。所以一人伏罪而万家蒙受福运,圣明的居主实行而不惑疑。汉明帝永平时期,诸侯欠债,即有削夺贬退的惩罚。从此以后官吏都不敢拖欠百姓钱财,而世人自然就节俭了,诉讼自然就消失了。

如今诸侯贵戚,有的告诫本身谨慎自己的行动,仁德道义不要违犯,帝王的命令符节要谨慎度量,未曾欠债,自身洁白如璧,志气直飞青云。有的既然欺负百姓,上书皇上封存自己的租税,愿意尚且偿还债务,这是残酷掠夺官吏百姓,而还想依仗天子的宠爱以自保其身,其诬蔑欺骗轻慢侮辱之举,罪恶没有比这再大了。

《孝经》说:“用宣扬仁德道义的办法就可以使百姓兴起品行,用显示好和坏的办法就可以使百姓知道法令和习俗应该禁止的事项。”如今要改变巧言伪饰的行为用来崇尚美好的风化,息除诉讼用以安闲官事的,不如显扬有品行的人,痛诛没有善行的人,引导他用汉文帝、汉武帝的办法,阐明对虚伪欺诈的惩罚。

如今王侯贵戚不能侵广,犯法作乱的人就多。凡是各种祸乱产生的根源不及早断绝,就又转相滋生蔓延,人也是这样。因此原来的官员之所以要急于明察,君主之所以忧患劳苦这事,其根本原因都是乡亭所审理的诉讼,有一大半是因为欺诈所产生的。所以说:察知其根源少而奸邪就容易堵塞,见他们得其要领政事就容易管理。怎么能说每有争斗诉讼,妇女必参与此事呢?也因此被传见。

又妇女的品行,贵在让她自身贞洁,如今已经出嫁他人了,没有脸面再入自己家门,县官原谅她,因此让她留住既已进入之家。这未能昭明治理的本源,这不仅仅是贞洁之女所天生的言论。贞烈的女子没有二心以数变其志,因此有我心不是磐石的

诗作,不冤枉品行不遗留给父母忧愁,所以赞美回家安慰父兄的志向。竟许诺不改其志,大盖是因为要助长贞洁和回家安慰父兄的志气。其不遵循此道而三心二意的人,这本来就是没有廉耻的家庭,不贞烈专一的所在了。如此之人,又是什么缘故凶恶怨恨呢?轻薄父兄,放纵男女之间的不正当关系,不思义理,苟且疏远仁德,借本钱做生意谋生计,逃亡抵赖负债。最终招致剖腹杀头毁灭祖宗祸害的事,怎么会有呢?

先代圣王因为人的性情喜怒是所不能消除的,就为他们建立礼制而崇尚仁德谦让;人能控制喜怒哀乐,就为他们设立法禁而严明赏罚。如今市肆中买卖不互相欺骗,婚姻不相互讹诈,并不是人的性情不可能的事。因此不如建立道义顺从法治,遏制断绝其根源。最初虽然惭愧耻辱于一个人,但到了最终,长久有利于万代。小的惩罚而大的告诫,这是为了保全有小过的人而制止贪婪凶恶的人。

建立法制的要旨,一定要使善人提倡他的仁德而乐于政事,让邪恶的人痛恨他的祸害而悔恨他的行为。如一女许配数家,虽然生育十个儿子,经过百次赦免,不要让她得以隐瞒一次归还私家,如此奸邪认就绝迹了。不然就剃去他们夫妻的头发,迁徙到千里以外政务繁重的县去,就可以苦其心绝其后,奸邪变乱就灭绝而太平就可以兴起了。

又有坚贞纯洁的寡妇,有儿女具备,家中财产富饶,想遵守不再改嫁的礼节,成全死则同穴的道义,保持贞节坚固,共同怀有必死之誓言,始终没有再嫁的考虑。但遭到不仁道的叔父,没有德义的兄弟,有的贪图寡妇再婚的聘礼,有的贪图寡妇的财产,有的偏爱寡妇的儿子,就强逼欺骗她再嫁,急迫威胁遣送,寡妇有的在房中上吊自杀,有的饮毒药于车上,断绝性命丧失身躯,单独舍弃孩童。这如同威逼胁迫命令寡妇自杀一样。

有的后夫多次谋划妇女为客,用威力胁迫装载而回,看护的人加以扶抱管理,连日才缓和下来,这与强夺妇人为妻没有差别。妇人软弱没有力量,苟且被很多强壮

的人所扶持举迫,连日囚禁于狭隘之处,后来虽然想再修本来的贞节志向,上吊吞毒药也晚了。

衰制第二十

无慢制而成天下者,三皇也;画则象而化四表者,五帝也;明法禁而和海内者,三王也。行赏罚而齐万民者,治国也;君立法而下不行者,乱国也;臣作政而君不制者,亡国也。

是故民之所以不乱者,上有吏;吏之所以无奸者,官有法;法之所以顺行者,国有君也;君之所以位尊者,身有义也。义者君之政也,法者君之命也。人君思正以出令,而贵贱贤愚莫得违也,则君位于上,而民氓治于下矣。人君出令而贵臣骄吏弗顺也,则君几于弑,而民几于乱矣。

夫法令者,君之所以用其国也。君出令而不从,是与无君等。主令不从则臣令行,国危矣。

夫法令者,人君之衔辔垂策也,而民者,君之舆马也。若使人臣废君法禁而施己政令,则是夺君之辔策,而己独御之也。愚君暗主托坐于左,而奸臣逆道执辔于右,此齐驺马繻所以沈胡公于具水,宋羊叔牂所以弊华元于郑师,而莫之能御也。是故陈恒执简公于徐州,李兑害主父于沙丘,皆以其毒素夺君之辔策也。《文言》故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其所由来者渐矣,由变之不早变也。”是故妄违法之吏,妄造令之臣,不可不诛也。

议者必将以为刑杀当不用,而德化可独任。此非变通者之论也,非叔世者之言也。夫上圣不过尧、舜,而放四子,盛德不过文、武,而赫斯怒。《诗》云:“君子如怒,乱庶遄沮;君子如祉,乱庶遄已。”是故君

子之有喜怒也,盖以止乱也。故有以诛止杀,以刑御残。

且夫治世者若登丘矣,必先蹶其卑者,然后乃得履其高,是故先致治国,然后三王之政乃可施也;道齐三王,然后五帝之化乃可行也;道齐五帝,然后三皇之道乃可从也。

且夫法也者,先王之政也;今也者,己之命也。先王之政所以与众共也,己之命所以独制人也,君诚能授法而时贷之,布令而必行之,则群臣百吏莫敢不悉心从己令矣。己令无违,则法禁必行矣。故政令必行,宪禁必从,而国不治者,未尝有也。此一弛一张,以今行古,以轻重尊卑之术也。

【译文】

没有法律制度而成就天下的人,是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画图象就可以感化很远的地方的人,是五帝;严明法禁而和谐天下的人,是夏禹、商汤、周文王。施行赏罚而使百姓齐心的,是由于国家得到治理;君主建立法制而下面不执行,是国家变乱的原因;臣子当政而君主不加制止,是国家灭亡的原因。

因此百姓所以能不变乱的事情,是因为上面有官吏管理他们;官吏之所以没有奸邪的事,因为官吏受法令的约束;法令所以能顺利施行的事情,是因为国家有君主;君主所以能处以尊贵的位置,因为他本身有德义。德义是君主的政事,法令是君主的命根。君主考虑纯正以发出诏令,而贵贱贤愚的人都不敢违背,才能使君主处于

上面 ,而百姓被治理于下面。人君发出诏令而宠贵之臣骄横之吏不顺从 ,而君主就几乎被杀 ,而百姓几乎就变乱了。

法令这事 ,君主是因为用它来治国的。君主发出的诏令而不顺从 ,等于没有君主。君主的诏令不顺从而臣下的命令通行 ,国家就危险了。

法令这事 ,是君主驾御马的衔轡椎鞭 ,而老百姓这事 ,是君主的车子和乘马。如果使臣子废弃君主的法制禁令而实施自己的政令 ,就是夺去君主的缰绳和鞭子 ,而自己单独驾御车马。愚昧之君昏暗之主寄坐于左边 ,而奸臣迎道执拿缰绳于右边 ,这就像齐国驺马濡沉溺胡公于具水 ,宋国的羊斟所以能败华元于郑国的军队 ,而不能抵御。因此陈恒捉拿齐简公于徐州 ,李兑陷害主父于沙丘宫 ,都是蓄谋已久要夺君主的缰绳和鞭子。《文言》因此说 :“ 臣子弑杀他的君主 ,儿子弑杀他的父亲 ,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 ,所以出现这种局面是逐渐发展的结果 ,由于这种逐渐的变化不能及早加以明察。”所以胡乱违法的官吏 ,胡乱制作命令的臣子 ,不可不加以诛罚。

评论的人必将认为刑杀应当不用 ,而仁德教化可以独自任用。这不是不墨守成陈规的人的言论 ,不是救世的人的言论。

德才最高的人不会超过尧、舜 ,而尧、舜还流放四个人 ,美盛的品德超不过周文王、周武王 ,而文王赫然发怒。《诗》说 :“ 君子听信谗言如果发怒 ,祸乱或者可以停止 ,君子如能任用贤人 ,祸乱就能很快平定。”因此君子也有喜怒 ,大概是为了停止祸乱。所以有用杀戮停止杀戮 ,用刑罚防御残暴。

况且治理世道的事和登山一样 ,必须首先踩踏其低的地方 ,然后才能登到高处。所以先达到治理国家 ,然后三王的政教才可以施行 ,道德和三王一样 ,然后五帝的教化才可实施 ,道德和五帝一样 ,然后三皇的道德才可以追随。

况且法制这事 ,是先代圣王的政体 ,诏令这事 ,是自己所掌握的。先代圣王的政体因为是和百姓所共同拥有的 ,自己的诏令因为是独自控制他人的 ,君主诚然能把规矩制度给予下面而且时时加以宽免 ,宣告的命令必定实行 ,群臣百官就不敢不尽心服从自己的命令了。自己的命令都不违背 ,而法律禁令必定能实行。因此政令能通行 ,法律禁令必能随之而实行 ,而国家不能得到治理的事 ,不曾有过。这是宽严相济 ,依照今天的情况来推行古代的法制 ,是用轻重尊卑的策略。

劝将第二十一

太古之民 ,淳厚敦朴 ,上圣抚之 ,恬淡无为 ,体道履德 ,简刑薄威 ,不杀不诛 ,而民自化 ,此德之上也。德稍弊薄 ,邪心孳生 ,次圣继之 ,观民设教 ,作为诛赏 ,以威劝之 ,既作五兵 ,又为之宪 ,以正厉之。《诗》云 :“ 修尔舆马 ,弓矢戈兵 ,用戒作则 ,用逖蛮方。”故曰 :兵之设也久矣。涉历五代 ,以迄于今 ,国未尝不以德昌而以兵强也。

今兵巧之械 ,盈乎府库 ,孙、吴之言 ,聒乎将耳 ,然诸将用之 ,进战则兵败 ,退守则

城亡。是何也哉 ?曰 彼此之情 ,不闻乎主上 ,胜负之数 ,不明乎将心 ,士卒进无利而自退无畏 ,此所以然也。

夫服重上阪 ,出驰千里 ,马之祸也。然节马乐之者 ,以王良足为尽力也。先登陷阵 ,赴死严敌 ,民之祸也。然节士乐之者 ,以明君可为效死也。凡人所以肯赴死亡而不辞者 ,非为趋利 ,则因以避害也。无贤鄙愚智皆然 ,顾其所利害有异尔。不利显名 ,则利厚赏也 ;不避耻辱 ,则避祸乱也。非此

四者,虽圣王不能以要其臣,慈父不能以必其子。明主深知之,故崇利显害以与下市,使亲疏贵贱贤鄙愚智,皆必顺我令乃得其欲,是以一旦军鼓雷霆,旌旗并发,士皆奋激,竞于死敌者,岂其情厌久生,而乐害死哉?乃义士且以徼其名,贪夫且以求其赏尔。

今吏从军败没死公事者,以十万数,上不闻吊唁嗟叹之荣名,下又无禄赏之厚实,节士无所劝慕,庸夫无所贪利。此其所以人怀沮解,不肯复死者也。

军起以来,暴师五年,典兵之吏,将以干数,大小之战,岁十百合,而希有功。历察其败,无他故焉,皆将不明于变势,而士不功于死敌也。其士之不能死也,乃其将不能效也,言赏则不与,言罚则不行,士进有独死之祸,退蒙众生之福。此其所以临阵亡战,而竞思奔北者也。

孙子曰:“将者,智也,仁也,敬也,信也,勇也,严也。”是故智以折敌,仁以附众,敬以招贤,信以必赏,勇以益气,严以一令。故折敌则能合变,众附爱则思力战,贤智集则英谋得,赏罚必则士尽力,勇气益则兵势自信,威令一则惟将所使。必有此六者,乃可折冲擒敌,辅主安民。

前羌始反时,将帅以定令之群,藉富厚之蓄,据列城而气利势,权十万之众,将勇杰之士,以诛草创新叛散乱之弱虏,击自至之小寇,不能擒灭,辄为所败,令遂云蒸起,合从连横,扫涤并、凉,内犯司隶,东寇赵、魏,西钞蜀、汉,五州残破,六郡削迹。此非天之灾,长吏过尔。

孙子曰:“将者,民之司命,而国家安危之主也。”是故诸有寇之郡,太守令长不可以不晓兵。今观诸将,既无断敌合变之奇,复无明赏必罚之信,然其士民又甚贫困,器械不简习,将恩不素结,卒然有急,则吏以暴发虐其士,士以所拙遇敌巧。此为将吏驱怨以御仇,士卒缚手以待寇也。

夫将不能劝其士,士不能用其兵,此二者与无兵等。无士无兵,而欲合战,其败负

也,理数也然。故曰:其败者,非天之所灾,将之过也。

饶士处世,但患无典尔。故苟有土地,百姓可富也;苟有市列,商贾可来也;苟有士民,国家可强也;苟有法令,奸邪可禁也。夫国不可以外治,兵不可从中御。郡县长吏,幸得兼此数者之断已,而不能以称明诏安民氓哉,此亦陪克闾茸,无里之尔。

夫世有非常之人,然后定非常之事,必道非常之失,然后见。是故选诸有兵之长吏,宜踔蹠豪厚,越取幽奇,材明权变,任将帅者。不可苟惟基序,或阿亲戚,使典兵官。此所谓以其国与敌者也。

【译文】

远古时候的百姓,淳朴敦厚,德才最高的人安抚他们,清静而无所作为。体察道义履行仁德,简化刑罚减轻威权,不杀戮不诛罚,而百姓自己就被教化,这是仁德最高上的,后来逐渐产生了轻微的弊端,邪恶之心孳生,仅次于上圣的人加以继承,观察民情,推行教化,作为诛罚和赏赐,用威仪鼓励百姓,既已制造五种兵器,又为此而制作了法令,用治罪来劝勉他们。《诗》说:“修好你的车马,以及弓箭刀枪,用来戒备战争,用来治服蛮邦。”所以说:军队的设置很久远了。经历唐虞夏商周五代,以至于今天,国家未曾不因仁德昌盛而军队强大的。

如今精巧的兵器,积满于府库,孙子、吴起兵家的言论,嘈杂于将领耳朵,但是诸将用起它来,进攻就兵败,退守就失掉城池。这是什么原因呢?说:敌我双方的情况,君主并不知晓,胜负的计算,将领的心中不明确,士兵进攻不能获胜就擅自退却,这就是用兵失败的原因。

驾御沉重的车子上山坡,驰骋千里之外,马就遭祸害了。但是良马所乐意的。遇到王良就足以乐为尽力。冲锋先登陷阵,去死于厉害的敌人之下,是百姓的祸

害。但有气节之士乐于这样,认为可以为英明的君主效力致死。凡是人们所以肯去死亡而不推辞,不是为了谋取私利,就是为了躲避祸害。不论是贤明鄙贱愚昧聪明的人都是这样,视其各自的利害不同罢了。没有利可以扬名,如有利可以得到丰厚的物资,不逃避耻辱,就逃避祸乱。不是这四种原因,虽然是圣明的君主也不能求得他的臣子,就是慈祥的父亲也不能一定得到他的儿子。英明的君主深知这些道理,所以崇尚显明利害关系而与下面相交换,使亲近、疏远、贵宠、贫贱、贤德、庸俗、愚昧、聪明的人,都能顺从我的命令才能得到他所要得到的东西,因此一旦军鼓震天动地,旌旗齐发,将士都奋发激昂,竞相和敌人拼命的人,怎么能说他们厌恶长久生存,而乐于空死呢?就是仁义之士尚且求取其名声,贪鄙的人尚且求其赏赐。

如今吏民从军因失败而死于公事的,数以十万计,上面不传报吊唁叹息他的荣耀之名,下面又没有丰厚的赏赐,忠节之士又不能提倡仰慕,庸俗之人没有他所贪图的利益。这就使人心沮丧懈怠,不肯再去冒死了。

自从军事行动开始以来,军队战守在外蒙受风雨霜露已经五年,执掌军队的官吏,将以千计,大小战斗,一年千余回,而很少成功。普遍考察其失败的原因,没有其他的缘故,都是将领不明白变化的态势,而不鼓励士卒与敌人死战。其士卒不能拼死战斗,是其将领无能的缘故,言称奖赏而不给与,言称惩罚而不执行,士卒进攻只有独自去死的祸患,退可蒙受众生的福运。这是军队临阵不战,而竞相考虑脱逃败走的事。

孙武说:“作为将领的人,要具备智谋、仁德、尊敬、诚实、勇敢、严格。”因此智谋可以揣度敌人,仁德可以增加将士的爱戴,尊敬可以招纳贤才,诚实可以有功必赏,勇敢可以增加勇气,严格可以统一命令。因此揣度敌人就能联合变化,士兵归

附其爱戴就思考努力作战,贤才智谋汇集诡秘的计谋就可以得到,赏罚必信士卒就竭尽其力,勇气增加就可以使兵势倍增,威令统一就可以为将领所使用。必须具备这六件事,才可以折冲敌人的阵势将敌人擒获,辅佐君主安定民心。

以前西羌开始反叛时,将帅率领郡守县令之众,凭借着富足积蓄,占据各城而处于有利的形势,拥有十万之众,率领勇敢俊杰之士,用以讨伐无组织无纪律初次叛乱的弱敌,攻击自来的小寇,不能擒获消灭,即被打败,让它竟能云升雾起,合纵连横,扫荡涤除并、凉二州,向内进犯司隶,向东掠夺赵国和魏郡,向西抄掠蜀郡和汉中郡,使五州残破,六郡人迹罕见。这不是天灾,是长吏的过错。

孙武说:“作为将领的人,是掌管百姓性命的官员,是国家安危的主持人。”因此各有寇贼之郡,太守县令县长不可不通晓兵法。如今观察各郡郡守。既没有揣度敌人连合变化的奇特策略,又没有严明的奖赏惩罚的诚信,但各郡士子百姓又很贫困,兵器又没有练习操作,郡守的恩惠平常又不给予百姓,突然发生紧急情况,而官使用暴力征发虐待其军士,军士以自己的笨拙遭遇到敌人的灵巧。这就是将吏驱使怨恨的人以戍御仇敌,士卒束缚着手以等待敌寇了。

将领不能勉励他的将士,将士不能用他的兵卒,这两件事和没有兵一样。没有将士没有兵卒,而想协调作战,军队的失败,是自然的道理。所以说:军队的失败,不是天所降的灾祸,是将领的过错。

德才优厚的士人立身处世,而忧虑的是没有掌管的官员。因此假如有土地,百姓就可以富裕;假如有交易的市肆,商贾就可以来到这里进行买卖;如果有士农工商各种人,国家就可以强盛;假如有法令,邪恶犯法之事就可以禁止。国家政事不可以从外面治理,军队之事不可以从中间用它。郡县长吏,侥幸能得兼任此数项以判断自

己,然而不能用称赞圣明的诏令来安抚百姓,这也是因为他聚敛贪狠卑鄙,无赖之极罢了。

世上只有异乎寻常的人,然后才能平定异乎寻常的事件,必由于异乎寻常的失败,然后才有异乎寻常的功劳。因此推选

各拥有兵权的长吏,应推选高超有德才威望的人,超擢幽隐奇特的人,才干明于机智应变,任用为将帅。不可苟且仅按顺序选拔人才,或者阿附于亲戚,使他掌管官兵。这就是所说的把国家送给敌人的事。

救边第二十二

圣王之政,普覆兼爱,不私近密,不忽疏远,吉凶祸福,与民共之,哀乐之情,怒以及人,视民如赤子,救祸如引手烂。是以四海欢悦,俱相得用。

往者羌虜背叛,始自凉、并,延及司隶,东祸赵、魏,西钞蜀、汉、五州残破,六郡削迹,周回千里,野无子遗,寇钞祸害,昼夜不止,百姓灭没,日月焦尽。而内郡之士不被殃者,咸云当且放纵,以待天时。用意若此,岂人心哉!

前羌始反,公卿师尹咸欲捐弃凉州,却保三辅,朝廷不听。后羌遂侵,而论者多恨不从惑议。余窃笑之,所谓媿亦悔,不媿亦悔者尔,未始识变之理。地无边,无边亡国。是故失凉州,则三辅为边;三辅内入,则弘农为边;弘农内入,则洛阳为边。推此以相况,虽尽东海犹有边也。今不厉武以诛虜,选材以全境,而云边不可守,欲先自割,示便寇敌,不亦惑乎!

昔乐毅以博博之小燕,破灭强齐,威震天下,真可谓良将矣。然即墨大夫以孤城独守,六年不下,竟完其民。田单帅穷卒五千,击走骑劫,复齐七十余城,可谓善用兵矣。围聊、莒连年,终不能拔。此皆以至强攻至弱,以上智图下愚,而犹不能克者何也?曰:攻常不足,而守恒有余也。前日诸郡,皆据列域而拥大众。羌虜之智,非乃乐毅、田单也;郡县之厄,未若聊、莒、即墨也。然皆不肯专心坚守,而反强驱劫其民,捐弃仓库,背城邑走。由此观之,非苦城乏粮

也,但苦将不食尔。

折冲安民,要在任贤,不在促境。齐、魏却守,国不以安。子婴自削,秦不以在。武皇帝攘夷柝境,面数千里,东开乐浪,西置燉煌,南逾交趾,北筑朔方,卒定南越,诛斩大宛,武军所向,无不夷灭。今虜近发封畿之内,而不能擒,亦自痛尔,非有边之过也。唇亡齿寒,体伤心痛,必然之事,又可疑焉?君子见机,况已著乎?

乃者,边害震如雷霆,赫如日月,而谈者皆讳之,曰:森并窃盗。浅浅善靖,俾君子怠,欲令朝廷以寇为小,而不蚤忧,害乃至此,尚不欲救。谚曰:“痛不著身言忍之,钱不出家言与之。”假使公卿子弟有被羌祸,朝夕切急如边民者,则竟言当诛矣。

今苟以己无惨怛冤痛,故端坐相仍,又不明修守御之备,陶陶闲淡,卧委天□。羌独往来,深入多杀,己乃陆陆,相将诣阙,谐辞礼谢,退云状,会坐朝堂,则无忧国哀民,恳恻之诚,苟转相顾望,莫肯违止,日晏时移,议无所定,己且须后。后得小安,则恬然弃忘。旬时之间,虜复为害,军书交驰,羽檄狎至,乃复怔忡如前。若此以来,出入九载,庶曰式臧,覆出为恶,徊徊渍渍,当何终极!《春秋》讥“郑弃其师”,况弃人乎?一人吁嗟,王道为亏,况百万之众,叫号哭泣,感天心乎?

且夫国以民为基,贵以贱为本。是以圣王养民,爱之如子,忧之如家,危者安之,亡者存之,救其灾患,除其祸乱。是故鬼方

之伐,非好武也,獯鬻于攘,非贪土也,以振民育德,安疆宇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自彼氐、羌,莫不来享,普天思服,行苇赖德。况近我民蒙祸若此,可无救乎?

【译文】

圣明君主的政治,普遍覆盖兼爱,不偏爱、亲近密切的人,不忽略疏远的人,不管是吉凶祸福,都和百姓共同承受,悲伤快乐的情感,宽宥用于他人,把百姓看成是自己的赤子,拯救灾祸就像伸手而烂那样急迫。所以天下欢悦,都能相同得用。

以前西羌背叛朝廷,开始起自凉州,并州,蔓延到司隶,向东祸害赵国、魏郡,向西抄掠蜀郡、汉中郡,使五州残破不堪,六郡人迹罕见,周围一千余里,旷野没有遗留,侵犯掠夺的祸害,昼夜不停止,百姓灭绝死亡,日月焦尽。而内郡没有被祸殃的士人,都说应当暂且放纵他们,以等待天命。如此用意,难道还有人心吗!

以前西羌开始反叛时,公卿师尹等官员都要舍弃凉州,确保三辅的安全,朝廷不听这种意见。后来西羌于是侵扰,而议论的人多恨没有听从以前的惑疑之论。我私下讥笑他们,所谓谋划也懊悔,不谋划也有懊悔的人,未能开始就认识变通的道理。地不能没有边界,没有边界就亡国。因此失去凉州,而三辅就成为边界;从三辅往内地入侵,而弘农郡就成了边界;从弘农再经内入侵,而洛阳就成了边界。按此情况类推下去,虽然尽到东海也还是有边界。如今不劝勉武功用以诛灭敌虏,不选举贤才用来守护全境,而却说边界不可保守,想先自己割去边境之地,向敌寇示弱,不也令人惑疑吗!

过去乐毅以忧苦不安的小小燕国,攻破灭亡强大的齐国,威震天下,真可以说是良将了。但是即墨大夫拿孤城独自坚守,六年燕军攻不下它,竟保全了该城人民。田单率领穷困的士卒五千人,击败骑劫,恢

复齐国七十余座城池,可以说是善于用兵的了。田单围攻聊城接连一年,最终未能攻下。这些都是用极强去进攻极弱,用上等的智慧去图谋下等的愚人,而还不能攻克是什么原因呢?说:进攻常有不足,而守卫经常有余。前些时候各郡,都能据守各城并拥有大众。西羌敌虏的智谋,并不像乐毅、田单那样,郡县的险要,也不是如聊、莒、即墨所能相比。但是都不肯专心坚守,而反过来强迫驱使士卒去劫夺其百姓,丢弃仓库,离开城邑逃走。从这里观察,并不是苦城缺粮,仅仅是苦了将领不能饱食罢了。

抵御敌人安定民众,关键在于任用贤人,不在于急促保境。齐国、魏国退却保守,国家不得安宁。子婴自己削去国土,秦朝不复存在。汉武帝排除夷狄开拓国境,面积数千里,东面开辟乐浪,西面设置敦煌郡,南面越过交趾,北面修筑朔方城,终于平定南越,诛杀大宛国。

往昔的事情,边境的祸害如雷震耳一样,显耀和日月一样,而谈论的人都避讳它,说是鼠窃狗盗之事。见识短浅之人善于安定,使君子怠慢,要让朝廷认为寇掠是小事,而不早加忧虑,祸害以至于此,尚且不肯救援。谚语说:“痛疼不明显于自身就说忍耐它,钱不出家门就说给它。”假使公卿大臣的子弟有遭西羌陷害的,就会朝夕急切和边境居民一样,就竟相谈论应当诛讨西羌了。

如今苟且认为自己没有忧伤冤屈痛苦,因此安坐依旧,又不明白修治沟濠壁垒以备守御的道理,整日快乐陶陶无事漂游,伏卧推卸自己的责任。西羌独能往来,深入多杀军民,自己就随众附和,将相进入宫阙,调和言辞礼谢而退,退后又没有善状,会坐朝堂,而没有忧虑国家哀伤百姓诚恳怜悯的诚意,苟且互相观望,不肯驳议,日晚时移,议论不能有所确定,自己暂且待后。后来稍微得到安宁,就安然忘记放弃此事。十天之间,敌寇再次为害,军情文书

交相驰骋,征调军队的文书更至,才又惶惧和以前一样。如此以来,出入九年,也许说可以改悔,谁知又出来作恶,雍容自得,到底什么时候才算完!《春秋》讥讽“郑国丢弃其军队”,何况是丢弃人民呢?一人呜呼,仁义毁坏,何况百万之众,叫号哭泣,难道不感动天意吗?

况且国家以百姓为根基,富贵以贫贱为根本。所以圣明的君主养育百姓,爱他和自己的儿子一样,忧虑国家和自己的家

庭一样,处于危险的人要安定他,逃亡的人要使他生存下来,拯救他们的灾难,解除他们祸乱。因此商朝的武丁讨伐鬼方,并不是他好用武力,扫除獫狁,并不是贪图土地,是振救万民施行德教,安定疆土。古时候,天子守卫在于四夷,从那遥远的氐羌,不敢不前来进贡,普天之下都想归附。《行苇》是歌颂仁德泽及草木。何况近来我国百姓蒙受战祸如此,可是没有救援他们哪?

边议第二十三

明于祸福之实者,不可以虚论惑也;察于治乱之情者,不可以华饰移也。是故不疑之事,圣人不谋;浮游之说,圣人不听。何者?计不背见实而更争言也。是以明君先尽人情,不独委夫良将,修己之备,无恃于人,故能攻必胜敌,而守必自全也。

羌始反时,计谋未善,党与未成,人众未合,兵器未备,或持竹木枝,或空手相附,草食散乱,未有都督,甚易破也。然太守令长,皆奴怯畏,不敢击。故令虏遂乘胜上强,破州灭郡,日长炎炎,残破三辅,覃及鬼方。若此已积十岁矣。百姓被害,迄今不止。而痴儿騃子,尚云不当救助,且待天时。用意若此,岂人也哉!

夫仁者恕己以及人,智者让功而处事。今公卿内不伤士民灭没之痛,外不虑久兵之祸,各怀一切,所脱避前,苟云不当动兵,而不复知引帝王之纲维,原祸变之所终也。

《易》制御寇,《诗》美薄伐,自古有战,非乃今也。《传》曰:“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谁能去兵?兵所以威不轨而昭文德也,圣人所以兴,乱人所以废。”齐桓、晋文、宋襄,衰世诸侯,犹耻天下有相灭而已不能救,况皇天所命四海主乎?晋、楚大夫,小国之臣,犹耻己之身而有相侵,况天子三公典世任者乎?公刘仁德,广被行

苇,况含血之人,已同类乎?一人吁嗟,王道为亏,况灭没之民百万乎?《书》曰:“天子作民父母。”父母之于子也,岂可坐观其为寇贼之所屠剥,立视其为狗豕之所啖食乎?

除其仁恩,且以计利言之。国以民为基,贵以贱为本。愿察开辟以来,民危而国安者谁也?下贫而上富者谁也?故曰:“夫君国将民之以,民实瘠,而君安得肥?”夫以小民受天永命,窃愿圣主深惟国基之伤病,远虑祸福之所生。

且夫物有盛衰,时有推移,事有激会,人有变化。智者揆象,不其宜乎!孟明补阙于河西,范蠡收责于姑胥,是以大功建于当世,而令名传于无穷也。

今边陲搔扰,日放族祸,百姓昼夜望朝廷救己,而公卿以为费烦不可。徒窃笑之,是以晏子“轻囷仓之蓄而惜一杯之钻”何异?今但知爱见薄之钱谷,而不知未见之待民先也,知徭役之难动,而不知中国之待边宁也。

《诗》痛“或不知叫号,或惨惨劬劳。”今公卿苟以己不被伤,故竟割国家之地以与敌,杀主上之民以喂羌。为谋若此,未可谓知,为臣若此,未可谓忠,才智未足使议。

且凡四海之内者,圣人之所以遗子孙

也,官位职事者,群臣之所以寄其身也。传子孙者,思安万世;寄其身者,各取一阕。故常其言不久行,其业不可久厌。夫此诚明君之所微察也,而圣主之所独断。今言不欲动民以烦可也。即然,当修守御之备。必今之计,令虏不敢来,来无所得;令民不患寇,既无所失。今则不然,苟惮民力之烦劳,而轻使受灭亡之大祸。非人之主,非民之将,非主之佐,非胜之主者也。

且夫议者,明之所见也;辞者,心之所表也。维其有之,是以似之。谚曰:“何以服?莫若听之。”今诸言边可不救而安者,宜诚以其身若子弟补边太守令长丞尉,然后是非之情乃定,救边乃无患。边无患,中国乃得安宁。

【译文】

明察祸福问题的实在内容的人,不可用虚假的言论来迷惑人;审察治乱实情的人,不可用浮华伪装来动摇人。因此明辨的事情,圣明之人不去谋划,没有事实根据的浮游之说,圣明的人不听。为什么呢?是清算不靠事实而还争着议论的事。所以英明的君主先尽力于人情,不单独是委任良将,修理自己的装备,不依靠他人,所以能进攻必战胜敌人。而守卫必能保全自己。

西羌开始反叛时,计谋还没有完善,党与还没有具备,人民大众还没有集结,兵器还没有装备,有的手持竹木树枝,有的空手相互搏斗,用草搭的房舍散乱不堪,没有率兵打仗的都护总督,很容易被攻破。但是太守县令县长,都恐惧怯懦不敢讨击羌人。因此让敌人于是乘胜自强,攻破灭绝州郡,日益兴盛,伤害破坏三辅地区,蔓延到远方。这样已经滞留十年了。百姓被害,至今仍未有停止。而无知之儿呆傻之子,尚且说不应当救助,暂且等待天命。用意如此,难道还是人吗!

仁德之人以仁爱之心宽宥自己也宽宥

别人,聪明的人推让功劳而处理事务。如今公卿大臣对内不忧伤士人百姓灭绝消失的痛苦,对外不考虑长久用兵的祸害,各怀暂时之计不顾长久打算,并非一切毕决断于目前,假如说不应当用兵,就是不再掌握帝王的法令,是祸乱终究发生的原因。

《易》有利于防御敌寇,《诗》赞美军队开往边疆讨伐獠狁,自古以来就有战争,并非单独是今天。《传》说:“上天生出了金、木、水、火、土五种材料,百姓全部使用了它们,缺少一种都不可以,谁能够去掉兵器呢?兵器是用来威慑越规而宣扬文德的,圣明的人由于武力而兴起,作乱的人由于武力而被废弃。”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这些衰落世道的诸侯,还羞耻天下互相攻杀灭亡而不能救助,何况老天所任命的天下君主呢?晋国、楚国大夫,小国的臣子,还羞耻不能用自己的身体而去制止互相侵略,何况天子的三公大臣执掌当世重任的人呢?周朝的祖先公刘仁德,施惠于草木而不让践踏,何况有血有肉的人和自己同类的人呢?一人呜呼,就亏损于用仁义治天下的王道,何况消灭吞没百姓百万呢?《书》说:“天子是百姓的父母。”父母对儿子来说,怎么能够坐观百姓被敌寇所屠杀,站在那里看着他们的尸体被猪狗所吞吃呢?

除了仁德恩义之外,姑且用计算其利益而论。国家以百姓为基础,富贵以贫困为根本。希望观察从天地开辟以来,百姓危急而国家安宁的人有谁呢?下面贫困而上面富贵的人又有谁呢?所以说:“国君率领百姓与他们相处百姓实在瘠贫,而国君怎么能够富足呢?”因为小民接受天命才能长寿,我私下希望圣明的君主深思国家根本伤病,长远考虑祸福所产生的根源。

况且事物都有兴盛有衰败的时候,季节也有转移,事情的趋势有阻遏有会合,人也会有变化。聪明的人揣度其现象,不也很适宜吗!孟明补缺于河西之地,范蠡归罪勾践于姑苏,因此大功建立于当世,而美

好的名声留传无穷。

如今边境受到西羌骚扰,天天都遭受灭族的祸害,百姓日夜盼望朝廷能拯救自己,而公卿大臣认为费用庞大烦杂不可用兵。但我私下耻笑他们,是和晏婴“轻视粮仓的积蓄粮食而又吝惜一杯羹汤”有什么不同呢?如今只见到爱惜计簿上钱粮的数字,而不知道百姓首先期待的是什么;只知徭役难以兴动,而不知道中国期待着边境的安宁。

《诗》痛恨“有人听不见呼号,有人忧忿地操劳”。如今公卿大臣认为自己没有被伤害,因此竞相割让国家的土地给与敌人,让他们杀害君主的百姓给饥饿的羌人。作如此的谋划,不能说是聪明,做臣子的都像这样,不能称为忠诚,德才智慧不足不可使评论是非。

凡是普天之下的人,都是圣人所遗留的子孙,凡是官位职掌事务的事,都是群臣之所以寄身的地方。凡是传给子孙的人,都希望万民安宁;凡是寄身于官位的人,都想各取一任之官。因此他的言论常恐不能

长久推行,他的事业常恐不能长久安定。这是诚恳英明的君主所应该仔细察看的,而圣明的君主所应该独自决断的。如今议论不要用繁苛的徭役去惊动百姓是可以的。即使如此,也应当修理守备以防御敌人。必用如今的计划,使敌人不敢来犯,就是来犯也无所获得,使百姓不忧虑敌寇,既然这样就不会有所失误。如今就不是这样,苟且惧怕民力的烦杂劳苦,就轻而易举地使他们遭受灭亡的大祸。就不是百姓的君主,不是人民的将领,不是君主的辅佐,不是克敌制胜的君主了。

况且议论边事的人,是明显所见到的;而辩解的人,是发自内心所表现出来的。只有德才都具备,君子续嗣才适宜。谚语说:“如何可以驾御争讼?不如听之任之。”如今各自议论边事可以不救援而自然就安定的人,诚然应当用他自己的子弟去补充边境太守县令县长县丞县尉的职位,然后是非的真实情形就可以肯定了,救援边境就没有祸患了。边境没有祸患,中国就可以得到安宁了。

实边第二十四

夫制国者,必照察远近之情伪,预祸福之所从来,乃能尽群臣之筋力,而保兴其邦家。

前羌始叛,草创新起,器械未备,虏或持铜镜以象兵,或负板案以类楯,惶惧扰攘,未能相持。一城易制尔,郡县皆大炽。及百姓暴被殃祸,亡失财货,人哀奋怒,各欲报仇,而将帅皆怯劣软弱,不敢讨击,但坐调文书,以欺朝廷。实杀民百则言一,杀虏一则言民,或虏实多而谓之少,或实少而谓之多。顷侧巧文,要取便身利己,而非独忧国之大计,哀民之死亡也。

又放散钱谷,殫尽府库,乃复以民假货,强夺财货。千万之家,削身无余,万民

匱竭,因随以死亡者,皆吏所饿杀也。其为酷痛,甚于逢虏。寇钞贼虏,忽然而过,未必死伤。至吏所搜索剽夺,游踵涂地,或覆宗灭族,绝无种类,或孤妇女,为人奴婢,远见贩卖,至今不能自活者,不可胜数也。此之感天致灾,尤逆阴阳。

且夫土重迁,恋慕坟墓,贤不肖之所同也。民之于徙,甚于伏法。优法不过家一人死尔。诸亡失财货,夺土远移,不习风俗,不便水土,类多灭门,少能还者。代马望北,狐死首丘,边民谨顿,尤恶内留。虽知祸大,犹愿守其绪业,死其本处,诚不欲去之极。太守令长,畏恶军事,皆以素非此土之人,痛不著身,祸不及我家,故争郡县

以内迁。至遣吏兵,发民禾稼,发彻屋室,夷其营壁,破其生业,强劫驱掠,与其内入,捐弃羸弱,使死其处。当此之时,万民怨痛,泣血叫号,诚愁鬼神而感天心。然小民谨劣,不能自达阍廷,依官吏家,迫将威严,不敢有摯。民既夺失业,又遭蝗旱饥馑,逐道东走,流离分散,幽、冀、兖、豫、荆、扬、蜀、汉,饥饿死亡,复失大半。边地遂以丘荒,至今无人。原祸所起,皆吏过尔。

夫土地者,民之本也,诚不可久荒以开敌心。且扁鹊之治病也,审闭结,而通郁滞,虚者补之,实者泻之,故病愈而名显。伊尹之佐汤也,设轻重而通有无,损积余以补不足,故殷治而君尊。贾谊痛于偏枯蹙瘁之疾。今边郡千里,地各有两县,户财置数百,而太守周回万里,空无人民,美田弃而莫垦发,中州内郡,规地拓境,不能半边,而口户百万,田亩一全,人众地荒,无所容足,此亦偏枯蹙瘁之类也。

《周书》曰:“土多人少,莫出其材,是谓虚土,可袭伐也。土少人众,民非其民,可匱竭也。”是故土地人民必相称也。今边郡多害而役剧,动入祸门。不为兴利除害,有以劝之,则长无与复之,而内有寇戎之心。西羌北虏,必生窥欲,诚大忧也。

百工制器,咸填其边,散之兼信,岂有私哉?乃所以固其内尔。先圣制法,亦务实边,盖以安中国也。譬犹家人遇寇贼者,必使老小羸软居其中央,丁强武猛卫其外。内人奉其养,外人御其难,蛩蛩距虚,更相恃仰,乃具安存。

诏书法令:二十万口,边郡十万,岁举孝廉一人,员除世举廉吏一人。羌反以来,户口减少,又数易太守,至十岁不得举。当职勤劳而不录,贤俊蓄积而不悉,衣冠无所凯望,农夫无所贪利,是以逐稼中实,莫肯就外。古之利其民,诱之以利,弗胁以刑。《易》曰:“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是故建武初,得边郡,户虽数百,令岁举孝廉,以召来人。今诚宜权时令边郡举孝一人,廉吏世举一人,益置明经百石一人,内郡人将妻

子来占著,五岁以上,与居民同均,皆得选举。又募运民耕田入谷,远郡千斛,近郡二千斛,拜爵五大夫。可不欲爵者,使食信贾于内郡。如此,君子小人各有所利,则虽欲令无往,弗能止也。此均苦乐,平徭役,充边境,安中国之要术也。

【译文】

控制国家的人,必定明察远近的情实真伪,预见祸福所产生的由来,才能尽用群臣的体力,才能够保卫兴盛国家。

以前西羌开始叛乱,事情开始新起的时候,器械尚未具备,敌人有的手持铜镜用来象征兵器,有的背负木板桌案用来类似藤牌,恐惧混乱,不能相持。一座城池容易控制,郡县未加注意,以至寇贼大盛。到了百姓猛烈地遭受祸殃,丢失财物,人们怀藏奋击愤怒之心,都想报仇,而将帅都胆怯软弱,不敢讨伐攻击敌人,仅坐在那里调发文书,用来欺骗朝廷。实际上敌人杀害一百个百姓就仅说一个,杀死一个敌人就说一百个敌人,有的敌人实际上很多而谎称说少,有的实际上很少而谎称敌人很多。这种倾斜巧妙的文书,要害是取决于方便自身有利于自己,而不是单独为了忧虑国家的大计,哀伤百姓的死亡。

官吏又发放分散钱财粮谷,竭尽府库蓄积,但又纵容百姓借货,强夺百姓的财产。成千上万的家庭,削减自身一无所余,万民匱乏力竭,因此随之而死亡的人,都是因为被官吏所饥饿而自杀的。官吏所作所为的暴虐惨痛,更甚于遇上敌人。敌寇的抄掠,很迅速就过去了,不一定就死伤。至于官吏的搜索劫夺,旋转其脚跟可使人肝脑涂地,有的被覆灭宗族,断绝其后嗣;有的孤独妇女,去做别人的奴婢,远被贩卖,至使不能自活的人,不可胜数。这是百姓的怨气感动老天而降此灾难,更背逆阴阳的协调。

况且百姓安于故土不愿轻易迁居异

地,爱慕祖宗坟墓,贤明的人和不贤明的人都是这样。百姓害怕迁徙,甚于犯法被处死刑。犯法不过家中一人处死罢了。凡失去财产,夺去土地远迁他乡的人,不习惯当地风土人情,不服水土,和灭门之祸没有多少不同,很少有能回来的人。代地之马望着北方,狐死还望着它的窑穴,都是不忘本的意思。边地百姓谨慎老实易受欺骗,更厌恶留在内地。虽然知道遭此大祸,还是愿意守住他的残余的家业,死在本来的地方,真心实意不想到很远的地方去。太守县令县长,畏惧厌恶打仗,都认为自己向来不是这里的人士,痛苦没有落到自己身上,灾难没有涉及自家,因此争相破坏郡县让百姓内迁。甚至派遣官吏士兵,割掉百姓的庄稼,撤除百姓的房屋,夷平墙壁,破坏百姓的生产作业,强驱劫掠,与他们入居内地,丢弃瘦弱,使他们死于原地。正当这时,万民怨恨悲痛,哭出血来叫号不止,这种场面,确实使鬼神发愁而感动天的心情。但百姓弱小,不能自己到达宫廷,依靠官吏之家,又迫于他们的威严,怎么能不惧怕呢。百姓既然被夺去土地失去户业,又遭到蝗虫干旱饥饿困乏,沿着道路东走,流离分散于各地,幽州、冀州、兖州、豫州、荆州、扬州、蜀郡、汉中郡,饥饿死亡,又损失大半。边境之地终于荒废,到今天还没有人烟。探究灾祸所起的原因,都是官吏的过错。

土地的事,是百姓的根本,确实不能长久荒废用来开通敌人的心窍。况且扁鹊的治病方法,察明闭结的原因而使血脉郁结滞留畅通,视其虚实,虚弱就补养,灾火旺盛就加以排泄,因此疾病痊愈而名字显扬。伊尹辅佐商汤,设置调节物物品控制物价的机构以通有无,减少蓄积多余的东西用以补充不足,因此商朝就得到治理而国君就尊贵。贾谊痛恨天下倒悬百姓痼疾、面瘁的病苦。如今边郡千里,每郡之地各有两县,户口才设置数百,而太守守土周围万里,空无百姓,肥沃的土地丢弃而不开垦,中原内郡,规划土地开拓境界,没有边

郡的一半大,而户口百万,而田地却不具备,人口众多土地狭小,没有容足的地方,这也是痼疾痼腿面瘁之类的痛苦,

《周书》说:“土地多人口少,不出有才能的人,所以称为虚土,可以讨伐。土地稀少人口众多,百姓不是百姓,可以使他们匮乏力竭。”因此土地和人民必须相称。如今边郡多害而徭役繁重,一举一动就俱入祸门。官吏不为百姓兴利除害,有人加以劝导,却长期不能恢复,而内部就产生寇掠之心。西羌向北虏掠,必生窥伺可乘的欲望,这诚然是最大的忧虑了。

各种工匠所制造的器械,都长久用于边境,散发出去其利兼倍,怎么会产生私心呢?其目的就是为了巩固其内地。前代的圣人制定法律,也必须充实边疆,是用来安稳中原。就像家里人遇到贼寇一样,必使老少瘦弱的人居于中央,强壮勇敢的护卫在外面。妻妾供奉他们的饭食,男人抵御其灾难,互相依靠,愈加相互凭借依靠,都可以安存了。

诏书法令规定:内地二十万口人,边远之郡十万口,每年应当推举孝廉一人,孝廉满三十人就推举廉吏一人。从西羌反叛以来,户口减少,又数次更换太守,到了十年还不能推举孝廉。担任职务勤劳辛苦而不被录用。贤良俊秀之士蓄积而不知道,士大夫不能有所企望,农夫不能贪图利益,因此逐除禾稼中的灾害,也不肯趋向外地。古时候治理百姓的人,用利来诱导他们,而不用刑罚来胁迫他们。《易》说:“先王取法于周流八方的风,观察民情,推行教化。”因此汉光武帝建武初年,取得边郡以后,户口虽然仅有数百,命令他们每年要推举教廉,用它来招来百姓。如今确实应当衡量时势让边郡推举孝廉一人,廉吏三十人推举一人,每百户增置明经一人,内郡人口率妻子来边地著于名籍的人,五年以后,和边地居民一样,都可以参加选举。再招募运送物资的人耕种边境土地输谷于国家。远郡一千斛,近郡二千斛,可以拜爵五

大夫。其中不愿拜爵的人,可以给他以双倍于内郡的价钱俸禄。这样,君子小人各有所利,就是虽想叫他不边郡,也不能制

止了。这是平均苦乐,平摊徭役,充实边境,安定中国的重要策略。

潜夫论第六卷

卜列第二十五

天地开辟有神民,民神异业精气通。行有招召,命有遭随,言凶之期,天难谶斯。圣贤虽察不自专,故立卜筮以质神灵。孔子称“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智”。又曰:“君子将有行也,问焉而以言,受其命而向。”是以禹之得皋陶,文王之取吕尚,皆兆告其象,卜底其思,以成其吉。

夫君子闻善则劝乐而进,闻恶则循省而改尤,故安静而多福;小人闻善,闻恶即慑惧而妄为,故狂躁而多祸。是故凡卜筮者,盖所问吉凶之情,言兴衰之期,令人修身慎行以迎福也。

且圣王之立卜筮也,不违民以为吉,不专任以断事。故《鸿范》之占,大同是尚。《书》又曰:“假尔元龟,罔敢知吉。”《诗》云:“我龟既厌,不我告犹。”从此观之,蓍龟之情,倘有随时俭易,不以诚邪?将世无史苏之材,识神者少乎?及周史之筮敬仲,庄叔之筮穆子,可谓能探赜索隐,钩深致远者矣。使献公早纳史苏之言,穆子宿备庄叔之戒,则骊姬、竖牛之谗,亦将无由而入,无破国危身之祸也。

圣人甚重卜筮,然不疑之事,亦不问也。甚敬祭祀,非礼之祈,亦不为也。故曰:“圣人不烦卜筮”;“敬鬼神而远之”。夫鬼神与人殊气异务,非有事故,奈何于我?故孔子善楚昭之不祀河,而恶季氏之旅泰山。今俗人策于卜筮,而祭非其鬼,岂不惑哉!

亦有妄传姓于五音,设五宅之符第,其为诬也甚矣!古有阴阳,然后有五行。五帝右据行气,以生人民,载世远,乃有姓名敬民。名字者,盖所以别众猥而显此人尔,非以纪五音而定刚柔也。今俗人不能推纪本祖,而反欲以声音言语定五行,误莫甚焉。

夫鱼处水而生,鸟据巢而卵。即不推其本祖,谐音而可,即呼鸟为鱼,可内之水乎?呼鱼为鸟,可栖之木邪?此不然之事也。命驹曰犊,终必为马。是故凡姓之有音也,必随其本生祖所王也。太皞木精,承岁而王,夫其子孙咸当为角。神农火精,承荧惑而王,夫其子孙咸当为征。黄帝土精,承镇而王,夫其子孙咸当为宫。少皞金精,承太白而王,夫其子孙咸当为商。颛顼水精,承辰而王,夫其子孙咸当为羽。虽号百变,音行不易。

俗工又曰:“商家之宅,宜西出门。”此复虚矣。五行当出乘其胜,入居其隩乃安吉。商家向东入,东入反以为金伐木,则家中精神日战斗也。五行皆然。又曰:“宅有宫商之第,直符之岁。”既然者,于其上增损门数,即可以变其音而过其符邪?今一宅也,同姓相代,或吉或凶;一官也,同姓相代,或迁或免;一宫也,成、康居之日以兴,幽、厉居之日以衰。由此观之,吉凶兴衰不在宅明矣。

及诸神祇太岁、丰隆、钩陈、太阴将军

之属,此乃天吏,非细民所当事也。天之有此神也,皆所以奉成阴阳而利物也,若人治之有牧守令长矣。向之何怒?背之何怨?君民道近,不宜相责,况神致贵,与人异礼,岂可望乎?

且欲使人而避鬼,是即道路不可行,而室庐不复居也。此谓贤人君子秉心方直,精神坚固者也。至如世俗小人,丑妾婢妇,浅陋愚戇,渐染既成,又数扬精破胆。今不顺精诚所向,而强之以其所畏,直亦增病尔。何以明其然也?夫人之所以为人者,非以此八尺之身也,乃以其有精神也。人有恐怖死者,非病之所加也,非人功之所辜也。然而至于遂不损者,精诚去之也。孟贲狎猛虎而不惶,婴儿畏蝼蚁而发闻。今通土或欲强羸病之愚人,必之其所不能,吾又恐其未尽善也。

移风易俗之本,乃在开其心而正其精。今民生不见正道,而长于邪淫逛惑之中,其信之也,难卒解也。惟王者能变之。

【译文】

自从天地开辟以来就有神和民,民和神各异其事业而灵气相通。行为会招来荣辱,命运有大小不同,吉凶的日期,天也很难相信这些。圣明贤达的虽然考察而不自己专断,因此设立卜筮以询问神灵。孔子称“蓍草的功能是圆通而且神奇,卦的品德是方正而且机智”。“君子将有所行动,则进行卜筮,将所占之事加以探问,蓍策就会受命解答,如同声响产生回音。”所以夏禹能得到皋陶,周文王能取得吕尚,都是占卜的征兆告诉其显现卦象,是占卜才使其思考,因以成为吉兆。

君子听到赞许的话就欢乐而进取,听到厌恶的话就依照它反省而改掉过失,因此能安静而多福;小人听到赞许的话,……听到厌恶的话就恐惧害怕而胡作非为,因此轻狂急躁而多祸。所以凡是卜筮的人,大概所询问的是吉凶祸福的情况,说的是

兴盛衰败的时间,让人修养自身谨慎行事用以迎接福运。

圣明的君主所以设立卜筮,以不违背民意认为就是吉,不能专用卜筮来决断事情。因此《洪范》的占卜,是崇尚大同的。《书》又说:“凭借你的大龟,不能知道是吉兆。”《诗》说:“我的大龟既已厌倦,不再告诉以吉凶。”从这里观察,蓍草龟壳的情感,尚或跟随时间有凶险平安,不认为是诚信吗?将来世上没有史苏这样占卜的才能,认识神的人就少了吗?如周史官占卜陈敬仲,庄叔占卜穆子,可以称为能探求复杂的现象追索隐秘的事理,寻绎深奥的本源,推究遥远的事态。假使晋献公及早采纳史苏的言论,穆子及早防备庄叔的劝戒,而骊姬、竖牛的谗言,也将无从而入,就没有国破身危的灾祸了。

圣人很重视卜筮,但不怀疑的事情,也不问卜。圣人很敬肃祭祀,不合礼制的祈祷,也不去作它。所以说:“圣人不烦劳卜筮”;严肃地对待鬼神,但并不打算接近他。“鬼神和人有不同的习气不同的事务,除非有事故,对我又会怎么样呢?所以孔子赞许楚昭王不去祭祀黄河,而厌恶季氏去祭祀泰山。如今平庸之人亲近于卜筮,而祭祀的并不是鬼神,怎么能不让人疑惑不解呢!

也有乱传姓氏出于宫、商、角、征、羽五音的,用五音设置五宅以附着宅第,这种欺骗性就更大了!从自古以来就有阴阳,然后才有金、木、水、火、土五行。五帝各根据它为天行使灵气,因此才产生人民,年代久远之后,才有姓名不敢怠慢百姓。名字的事,大概是因为要区别众多的人而显扬此人罢了,并不是用来记录五音而制定刚柔的。如今平庸的人不能推算记录自己的祖宗,反而想用声音言语来正定五行姓氏,错误没有比这更大了。

鱼处于水中才能生存,鸟依靠着巢穴才能产卵。如若不推算其自身祖宗,调和声音就可以了,就可以呼鸟为鱼,可以容纳

到水中吗？叫鱼为鸟，可以让鱼棲栖在树上吗？这是很自然的道理。命名马驹叫牛犊，终究必定是马。因此凡是姓之有声音，必随其本身承继其祖宗而王的。太皞是木精，是承继木星而王的，他的子孙的姓氏都应当与角声有关。神农氏是火精，承继火星而王，他的子孙的姓氏都应当是征声有关。黄帝是土精，是承继土星而王，他的子孙的姓氏都应当与宫声有关。少皞是金星，是承继金星而王的，他的子孙的姓氏都应当与商声有关。颛顼氏是水精，是承继水星而王的，他的子孙的姓氏都应当是羽声有关。虽然名号千变万化，声音行而不变。

平庸的工匠又说：“商家的宅第，应该向西开门。”这更虚妄了。按照五行相生相克的道理，出门应当趁其相克之势，进入要居于深室之中，只有深居简出，才能平安吉祥。商家向东入，东入反而认为是金伐木，而家中心神日益颤抖。五行都是这样。又说：“宅第有宫商不同的等第，应当在子时施符于门上，以驱使鬼神实现人的愿望。”既然是这样，于自家门上增加或减少门数，就可以改变五音而超过符咒了吗？如今同是一处宅第，同姓相互取代，有吉有凶；同是一种官职，同姓相互取代，有的升官有的被免职；同是一座宫廷，周成王、周康王居住在那里就一日比一日兴盛，周幽王、周厉王居住在那里就一日比一日衰败。从这里观察，吉凶兴衰不在于居住在什么地方，这是很明白的道理。

如各种神祇太岁神、丰隆雷神、钩陈神、太阳将军之类，这是天上的官吏，不是小民所应当事奉的。天上有这些神，都是因为它们要事奉阴阳而有利于万物的，就和人治而设有州牧郡守县令县长一样。偏爱它何故发怒？违背它何故怨恨？君主和臣民相距很近，不应该互相责备，何况神很尊贵，和人有不同的礼仪，怎么可以期望呢？

尚且要使人躲避鬼，即是靠近道不可行走，而庐舍房屋不再能居住。这是说贤人君子秉性正直，精神坚强的人。至于当代平庸小人，丑姜卑妇，浅陋愚笨的人，逐渐受到影响既成积习，又屡次扬弃精诚恫吓破胆。如今不顺从精诚所向的人，而强迫他按照他所畏惧的去做，就故意使他增加患苦而已。怎么能说明这样呢？人所以称为人，并不是只有八尺长的身躯，是因为他有精神。人有因为恐惧而死的，并不是疾病所加给他的，并不是人力所加害于他的。然而有的人甚至于听任病情发展，因为他失去了精诚。孟贲玩耍猛虎而不畏惧，婴儿害怕蝼蚁而发出喊叫。如今通达事理的读书人或者想强逼病体瘦弱的愚昧之人，必定是他所不能的，我又担心他不能尽善尽美。

移风易俗的根本，就在于打开他的心窍而端正他的精神。如今百姓生下来就不见正道，而成长于邪恶淫乱欺骗迷惑之中，使他相信这些，很难突然解除。只有君王能改变这种风俗。

巫列第二十六

凡人吉凶，以行为主，以命为决。行者，己之质也；命者，天之制也。在于己者，固可为也；在于天者，不可知也。巫觋祝请，亦其助也，然非德不行。巫史祝祈者，盖所以交鬼神而救细微尔，至于大命，未如

之何。譬民人之请谒于吏矣，可以解微过，不能脱正罪。设有人于此，昼夜慢侮君父之教，干犯先王之禁，不克己心，思改过善，而苟骤发请谒，以求解免，必不几矣。不若修己，小心畏慎，无犯上之必令也。故孔子

不听子路,而云“丘之祷久矣”。《孝经》云:“夫然,故生则亲安之,祭则鬼享之。”由此观之,德义无违,鬼神乃享;鬼神受享,福祚乃隆。故《诗》云:“降福穰穰,降福简简,威仪板板。既醉既饱,福禄来反。”此言人德义美茂,神歆享醉饱,乃反报之以福也。

虢公延神而亟亡,赵婴祭天而速灭,此盖所谓神不歆其祀,民不即其事也。故鲁史书曰:“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楚昭不穰云,宋景不移咎,子产距裨灶,邾文公违卜史,此皆审己知道,身以俟命者也。晏平仲有言:“祝有益也,诅亦有损也。”季梁之谏隋侯,宫之奇说虞公,可谓明乎天人之道,达乎神明之分矣。

夫妖不胜德,邪不伐正,天之经也。虽时有违,然智者守其正道,而不近于淫鬼。所谓淫鬼者,闲邪精物,非有守司真神灵也。鬼之有此,犹人之有奸言卖平以干求者也。若或诱之,则远来不止,而终必有咎。鬼神亦然,故申繻曰:“人之所忌,其气炎以取之。人无衅焉,妖不自作。”是谓人不可多忌,多忌妄畏,实致妖祥。

且人有爵位,鬼神有尊卑。天地山川、社稷五祀,百辟卿士有功于民者,天子诸侯所命祀也。若乃巫覡之谓独语,小人之所望畏,土公、飞尸、咎魅、北君、衔聚、当路、直符七神,及民间缮治微蔑小禁,本非天王所当惮也。

旧时京师不防,动功造禁,以来吉祥应瑞,子孙昌炽,不能过前。且夫以君畏臣,以上需下,则必示弱而取陵,殆非致福之招也。

尝观上記,人君身修正赏罚明者,国治而民安;民安乐者,天悦喜而增历数。故《书》曰:“王以小民受天永命。”孔子曰:“天之所助者顺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顺,又以尚贤,是以自天□之,吉无不利。”以最却凶灾而致福善之本也。

【译文】

凡是人的吉凶,以所作所为为主导,因

命运而决定。行为的事,是自己的诚信,命运的事,是天所制定的。在于自己的诚信,固然可以有所作为;在于天的制定,不能知道它。巫覡的祝祷请求,也是有帮助的,但是没有仁德不行。巫史祝祷的事,大概是因为能和鬼神相交而救细微罢了,至于天命,我是没有办法的。比方人民请托求见于官吏,可以解除小的过错,不能解脱治罪。假如有人这样,日夜简慢轻侮君主的教诲,触犯先代圣王的法禁,不克制自己心思,想改过易善,而苟且骤然发送请谒,以求解脱,必定不会有希望,不如努力提高自己的品德,小心谨慎,不触犯禁令就行了。所以孔子不听子路的劝告,而说“我孔丘早就祈祷过了”。《孝经》说:“既然是这样,所以要生存下来就亲近安定他,祭祀而鬼神享受它。”由这观察,不违背道德仁义,鬼神才享受它;鬼神接受享祀,福运才盛大。所以《诗》说:“赐福赐得很丰厚,赐福赐得很大,威仪庄重堂皇。既醉而且饱享,重新赐给他福运。”这是说人的道德仁义美好茂盛,鬼神享受祭品既醉又饱,才反而报答以福运。

虢公聘请神而急速灭亡,赵婴祭祀神灵而迅速死亡,这大概是因为神不享受他的祭祀,百姓不做他交给的事情。所以鲁国的史官书写说:“国家将要兴起,听从于百姓;国家将要灭亡,听从于神灵。”楚昭王不祈祷于云,宋景公不转移灾祸,子产拒绝裨灶用玉祈祷除去火灾,邾文公违背卜史的话而迁都,这些都是详知自己晓得道理,努力提高自己的品德用以等待天命的人。晏平仲曾说:“祝祷有好处,诅咒也有损害。”季梁劝谏随侯,宫之奇劝说虞公,可以称为明察天人感应的道理,通达神明的职分了。

怪异不能战胜仁德,邪恶不能讨伐正直,这是天之常道。虽然时有违犯,但是聪明的人能遵守正道,而不接近于邪恶之鬼。所谓邪恶的鬼,是闲邪怪物,没有守护真神灵。这样的鬼,就像人用邪恶的言论品评

人物以有所求那样。如加以迷惑利诱,就会远来不止,而终究必有灾祸。鬼神也是这样,所以申繻说:“一个人所畏惧的事,是由他自己的气焰决定的,人没有衅隙可乘,妖孽不会自己起来作怪。”是说人不能有太多的禁忌,禁忌太多就胡乱惧怕,实在招致怪异不祥。

况且人有爵位的高低,鬼神有上下尊卑的区别。天地山川、社神稷神五种不同的祭祀,诸侯卿士有功于百姓的人,是天子诸侯所规定祭祀的。如此巫覡的请求祈祷的言语,是小人埋怨责备畏惧的,土公、飞尸、咎魅、北君、衔聚、当路、直符等七神,以及民间缮治微小的禁忌,本来不是天子所应当畏惧的。

以往京师不设防备,动工制造禁忌,以求吉祥的征兆,使子孙昌盛,不能太甚于以前。况且因为国君畏惧臣下,因为上面畏惧下面,就必定显示出软弱而以下凌上,这恐怕不能招致福运了。

我曾观看上世古书,君主修身正行赏罚严明的,国家得到治理而百姓安乐;百姓安乐,老天就喜悦而增加帝王继承的次第。所以《书》说:“君王治国安民百姓就接受老天的长命。”孔子说:“天所帮助的,必然是合适的;人所帮助的,必然是忠信的人。履行诚信,考虑到顺应天道,再加上尊敬贤人,因此上天就会保佑他,处处吉祥无不顺利。”这是最能退却灾害而招致福善的根本了。

相列第二十七

《诗》所谓“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是故人身体形貌皆有象类,骨法角肉各有分部,以著性命之期,显贵贱之表,一人之身,而五行八卦之气具焉。故师旷曰“赤色不寿”,火家性易灭也。《易》之《说卦》:“《巽》为人多白眼”,相扬四白者兵死,此犹金伐木也。《经》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圣人有见天下之至赜,而拟诸形容,象其物宜。”此亦贤人之所察,纪往以知来,而著为宪则也。

人之相法,或在面部,或在手足,或在行步,或在声响。面部欲溥平润泽,手足欲深细明直,行步欲安稳覆载,音响欲温和中宫。头面手足,身形骨节,皆欲相副称。此其略要也。

夫骨法为禄相表,气色为吉凶候,部位为年时,德行为三者招,天授性命决然。表有显微,色有浓淡,行有薄厚,命有去就。是以吉凶期会,禄位成败,有不必要。非聪明慧智,用心精密,孰能以中?

昔内史叔服过鲁,公孙敖闻其能相人

也,而见其二子焉。叔服曰:“谷也食子,难也收子,谷也丰下,必有后于鲁。”及穆伯之老也,文伯居养,其死也,惠叔典哭。鲁竟立献子,以续孟氏之后。及王孙说相乔如,子上几商臣,子文忧越椒,叔姬恶食我,单襄公察晋厉,子贡观邾鲁,臧文听御说,陈咸见张,贤人达士,察以善心,无不中矣。及唐举之相李兑、蔡泽,许负之相邓通、条侯,虽司命班禄,追叙行事,弗能过也。

虽然,人之有骨法也,犹万物之有种类,材木之有常宜。巧匠因象,各有所授,曲者宜为轮,直者宜为舆,檀宜作辐,榆宜作毂,此其正法通率也。若有其质,而工不材,可如何?故凡相者,能期其所极,不能使之必至。十种之地,膏壤虽肥,弗耕不获;千里之马,骨法虽具,弗策不致。

夫觚而弗琢,不成于器;士而弗仕,不成于位。若此者,天地所不能贵贱,鬼神所不能贫富也。或王公孙子,仕宦终老,不至于谷。或庶隶厮贱,无故腾跃,穷极爵位。

此受天性命,当必然者也。《诗》称“天难忱斯”,性命之质,德行之招,参错授受,不易者也。

然其大要,骨法为主,气色为候。五色之见,王废有时。智者见祥,修善迎之,其有忧色,循行改尤。愚者反戾,不自省思,虽休征见相,福转为灾。于戏君子,可不敬哉!

【译文】

《诗》所说“老天生下众百姓,有事物就有法则。”因此人的身体相貌都有相似之处,骨法角肉各占有整体的一部分,用来显出性命的期限,显露出贵贱的标记,一个人的身体和五行八卦之气相具备。所以师旷说“赤红色的人不长寿”,火性的人容易没灭。《易》的《说卦》:“《巽》卦为人多如侵没黑珠的白眼”,互相传扬说目有四白的人兵死,这就像金伐木一样。《经》说:“近处则取法于人体的各部分,远处则取法于万物的各种形象。”圣人用来显示天下万物繁杂的现象,并用象征某种意义的符号比拟其表象,形象地体现出事物的特征。”这也是贤人所应明察的,是为了记住以前的事情以知后来的事情,而撰写为法令。

推测人的气数命运的相法,有的在面部上,有的在手上和脚上,有的在于行步,有的在于声音。面部要宽平润泽,手脚上的纹要深细明显正直,行步要安稳如天地,声音要温和如正宫。头面手足,身形骨节,都要相称。这是相法的简略要领。

骨法认为骨相特征是人的福相表现,人的气色是观察人的吉凶的占验,部位是年时,道德品行是以上三者的标准,天授给人们的性命就是这样。表现有显著有轻微,颜色有浓厚有淡薄,命运有去有留。所以吉凶没有约定期限,官职有成功有失败,有不必要。不是聪明智慧的人,虽然用心精密,谁能认为是适合呢?

过去内史叔服经过鲁国,公孙敖听说他能观察人的面相以判定吉凶祸福,就让他两个儿子出来见他。叔服说:“文伯可以供养您,惠叔可以安葬您。文伯的下颌丰满,必定有后嗣在鲁国昌大。”到了公孙敖年老的时候,由文伯供养他,到公孙敖死的时候,由惠叔掌管丧礼。鲁国竟然立文伯的儿子献子,来继承孟氏的后代。如王孙说给乔如相面,子上观察商臣的面相,子文忧虑越椒,叔姬厌恶食我,单襄公观察晋厉公,子贡观礼于邾鲁,臧文仲听从御说之言,陈咸见张,圣贤之人通达之士,观察都用善心,没有不观察对的。如唐举给李兑、蔡泽相面,许负给邓通、周勃相面,虽然是掌其性命班发俸禄,追述他们的事迹的人,也不能超过许负。

虽然如此,人还是有骨法的,就像万物有许多种类,木材有永久的适应性一样。能工巧匠根据木材形状,各有所传授,弯曲的木材适宜做车轮,直的木材适宜于做车子,檀木适宜于做车轮的辐,榆木适宜于做毂,这是它正当的法则通常的标准。如果有其质体,而工匠不能加以裁制,又能怎么样呢?因此凡是相面的人,能期望他可以达到,而不能使他必然达到。完善种植的土地,土地虽然很肥沃,不耕种它最终不能收获,能行千里的马,骨相虽然具备,不鞭策马也不能到达。

觚不加以雕琢,就不能成为酒器,士人不去做官,就不能具备官位。这样的人,天地不能使他贵贱,鬼神也不能使他贫富,有的王公孙子,任职到老死,也不能得到爵禄。有的奴隶服役,没有原因就飞黄腾达,达到最高的爵位。这是接受老天的命运,应当是必然的事。《诗》称为“天意莫测难相信”,性命的事就像射箭一样,德行之事也如此,杂乱不齐互相交接,不是容易的事。

然而相法的大概要领,以骨法为主,以气色为症候。五种颜色的表现,是兴旺是废灭都有一定的期限。聪明的人能呈现吉

祥 ,修养仁德而迎接它 ,如有忧虑的面色 ,
就修正自己错误的行为而加以改正。愚昧

的人反而暴戾 ,虽然吉兆见于面相 ,福运也
会转为灾祸。呜呼君子 ,可以不敬肃吗 !

潜夫论第七卷

梦列第二十八

凡梦：有直，有象，有精，有想，有人，有感，有时，有反，有病，有性。

在昔武王，邑姜方震太叔，梦帝谓己：“命尔子虞，而与之唐。”及生，手掌曰“虞”，因以为名。成王灭唐，遂以封之。此谓直应之梦也。《诗》云：“维熊维罴，男子之祥；维虺维蛇，女子之祥。”“众维鱼矣，实维丰年；旃维旗矣，室家蓁蓁。”此谓象之梦也。孔子生于乱世，日思周公之德，夜即梦之。此谓意精之梦也。人有所思，即梦其到；有忧即梦其事。此谓记想之梦也。今事，贵人梦之即为祥，贱人梦之即为妖，君子梦之即为荣，小人梦之即为辱。此谓人位之梦也。晋文公于城濮之战，梦楚子伏己而监其脑，是大恶也。及战，乃大胜。此谓极反之梦也。阴雨之梦，使人厌迷，阳旱之梦，使人乱离，大寒之梦，使人怨悲，大风之梦，使人飘飞。此谓感气之梦也。春梦发生，夏梦高明，秋冬梦熟藏。此谓应时之梦也。阴病梦寒，阳病梦热，内病梦乱，外病梦发，百病之梦，或散或集。此谓气之梦也。人之情心，好恶不同，或以此吉，或以此凶。当务自察，常占所从。此谓性情之梦也。

故先有差忒者，谓之精，昼有所思，夜梦其事，乍吉乍凶，善恶不信者，谓之想，贵贱贤愚，男女长少，谓之人，风雨寒暑谓之感，五行王相谓之时，阴极即吉，阳极即凶，谓之反，观其所疾，察其所梦，谓之病，心精好恶，于事验，谓之性，凡此十者，占梦之大略也。

而决吉凶者之类以多反，其何故哉？

岂人觉为阳，人寐为阴，阴阳之务相反故邪？此亦谓其不甚者尔。借如使梦吉事而已意大喜乐，发于心精，则真吉矣。梦凶事而已意大恐惧忧悲，发于心精，即真恶矣。所谓秋冬梦死伤也，吉者顺时也。虽然，财为大害尔，由弗若勿梦也。

凡察梦之大体：清洁鲜好，貌坚健，竹木茂美，宫室器械新成，方正开通，光明温和，升上向兴之象皆为吉喜，谋从事成。诸臭汗腐烂，枯槁绝雾，倾倚征邪，剝削不安，闭塞幽昧，解落坠下向衰之象皆为，计谋不从，举事不成。妖孽怪异，可憎可恶之事皆为忧。图画恤胎，刻镂非真，瓦器虚空，皆为见欺诒。倡优俳優，侯小儿所戏弄之象，皆为欢笑。此其大部也。

梦或甚显而无占，或甚微而有应，何也？曰：本所谓之梦者，困不了察之称，而懵懵冒名也。故亦不专信以断事。人对计事，起而行之，尚有不从，况于忘忽杂梦，亦可必乎？惟其时有精诚之所感薄，神灵之所告者，乃有占尔。

是故君子之异梦，非妄而已也，必有事故焉。小人之异梦，非乘而已也，时有祲祥也。是以武丁梦获圣而得传说，二世梦白虎而灭其封。

夫奇异之梦，多有故而少无为者矣。今一寝之梦，或屡迁化，百物代至，而其主不能究道之，故占者有不中也。此非占之罪也，乃梦者过也。或言梦审矣，而说者不能连类传观，故其善恶有不验也。此非书之罔，乃说之过也。是故占梦之难者，读其书为难也。

夫占梦必谨其变故,审其征候,内考情意,外考王相,即吉凶之符,善恶之效,庶可见也。

且凡人道见瑞而修德者,福必成,见瑞而纵恣者,福转为祸;见妖而骄傲者,祸必成,见妖而戒惧者,祸转为福。是故太姒有吉梦,文王不敢康吉,祀于群神,然后占于明堂,并拜吉梦。修省戒惧,闻喜若忧,故能成吉以有天下。虢公梦见蓐收赐之上田,自以为有吉,囚史嚚,令国贺梦。闻忧而喜,故能成凶以灭其封。

《易》曰:“使知惧,又明于忧患与故。”凡有异梦感心,以及人之吉凶,相之气色,无问善恶,常恐惧修省,以德迎之,乃其逢吉,天禄永终。

【译文】

凡是梦有以下几种类型:有直接感应之梦,有象征之梦,有意志精诚之梦,有记想之梦,有人位之梦,有物极必反之梦,有感气之梦,有应时之梦,有因病之梦,有性情之梦。

在过去周武王时,邑姜才怀上胎儿太叔,梦见上天对自己说:“命令你的儿子叫虞,而给以唐地。”到生下太叔时,手纹有“虞”字,因此给他起了这样的名字。成王灭掉唐国,就把唐地封给太叔。这说的是直接感应而生梦。《诗》说:“梦中见到熊与罴,就是生男好吉兆;梦见蜥蜴和长蛇,也是生女好吉兆。”梦见蝗虫变为鱼,要遇到丰收的年成;梦见龟旗变鸟旗,子孙众多庆有余。”这说的象征之梦。孔子生于乱世,每天都想起周公的仁德,晚上睡觉就梦见周公。这是说意志精诚就会做梦。人所想什么,而就梦见什么到来;有忧愁的事就梦见忧愁的事。这是说所记所想就产生梦。如今一件事,尊贵的人梦见它就成为吉祥,卑贱的人梦见它就成为妖孽,君子梦见它变成了荣耀,小人梦见它就成了耻辱。这是说人的地位不同所做的梦也不同。晋

文公在城濮之战时,梦见楚成王伏在自己身上吸饮自己的脑浆,是大恶的征兆。到战斗时,就大胜楚国的军队。这是物极必反之梦。阴雨天做梦,使人厌恶迷惑;旱天做梦,使人乱离;大冷天做梦,使人怨恨悲伤;大风天做梦,使人飘飘欲飞。这是因气候的感染而做梦。春天梦见万物出生,夏天梦见自己住在高敞明亮的地方,秋冬季节梦见万物成熟收藏。这是适应时节之梦。阴病梦见寒冷,阳病梦见暑热,内病梦见变乱,外病梦见兴起,因各种病所做的梦,有的分散有的集中。这是因为病气所做的梦。人的心情,有好恶的不同,有的因此吉祥,有的因此凶恶。应当各自明察,常占梦问其所从。这说的是因情性而做的梦。

因此先有欠缺失常的人,称之为精;白天有所思,夜里就梦见其事,忽然是吉,忽然是凶,善恶都不信的人,称之为想;贵贱贤愚,男女长幼,称之为入;风雨寒暑称之为感受;五行王相相克称之为四时;阴的极边就是吉,阳的极边就是凶,这称之为相反;观察他的疾病,观察他所梦见的人和事,称之为病;心灵的好恶,和事情相验证,这称之为情性;凡是这十种现象,是占卜梦的大概情况。

而决定吉凶的事大抵多相反,是什么原因呢?难道是人睡醒为阳,人睡眠为阴,阴阳一定要相反的缘故吗?这也称为不甚理解它而已。假如梦到吉祥事情而能使自己太快乐,发自于心灵,就真的成为吉祥的事了。梦到凶事而自己的心情太恐惧忧伤,发自于心灵,就真的成了恶事了。所说的秋冬梦见死伤的事,吉祥的可以顺从四时。虽然这样,财富成为大害了,尚且不如不做梦。

凡是考察梦的要领:清洁鲜明完好,体魄坚强健全,竹木茂盛美好,宫室器械新近制成,方正开通,光明温和,上升兴盛的表现都是吉利欢喜的象征,谋利就能听从事情就能成功。诸如臭气污秽腐烂,枯干混

乱,倾斜违邪,割鼻断足不安,闭塞黑暗,解落坠下衰败的表现都是凶恶的象征。计谋不能实行,举事不能成功。妖孽怪异,可憎可恶的事都是忧虑。谋划卵胎,刻镂不真实,瓦器虚实,都是被欺骗。乐舞戏谑,以及少年儿童所戏弄的法式,都是欢笑。这是其大致的类型。

梦有的很显著而没有占验,有的很不明显却有应验,这是什么原因呢?回答说:本来所称的梦的事,是因困倦于昏睡之中矐矐而得的,是矐矐胡涂冒名之称呼。因此也不要专信它以决定事情。人治理商议事情,起来就去行动,尚且还有不成功的,何况在模模糊糊杂乱的梦中,也可以必然成功吗?只有他时时被精诚所感迫,被神灵所请求的人,乃能占应而已。

因此君子奇异的梦,并不是虚妄罢了,必有吉兆。小人奇异的梦,并不是凶暴罢了,必有意外的灾祸。因此武丁梦见获得圣人而就得到了传说,秦二世梦见白虎而灭亡了他的国家。

奇异的梦,多有原因而很少有意义的。如今一睡之梦,有的屡次变化,各种事物更替而至,而其主人不能推求它的规律,所以占梦的人不能占得中肯。这不是占梦的罪过,是做梦的人的过错。有的说梦明悉了,而说的人不能结合种类传送观看,因此他

的善恶不应验。这不是占梦书的欺骗,是说的人的过错。所以占梦难的事,读占梦书更难。

占梦必须谨慎梦的变化的缘故,审察梦的发生发展情况的迹象,从内部考察它的情意,从外部考察它相克的原因,就吉凶于此符合,善恶于此见效,差不多就可以见到了。

况且凡是为人之道见到祥瑞而修养自己仁德的人,福运必能成功,看到祥瑞而放纵的人,福运就转为灾祸;看见妖孽而放纵侮弄的人,灾祸必定具备,看见妖孽而谨慎防备的人,灾祸就会转为福运。因此太姒有吉祥的梦,周文王不敢乐其吉,祭祀于群神,然后占卜于明堂,并拜谢吉祥的梦。修身反省恐惧,听到喜讯如同忧愁,因此能具备吉祥而有天下。虢公梦见蓐收赐给他上等田地,自以为有了吉兆,囚禁史嚚,下令让全国庆贺吉梦。听到忧愁的事而喜悦,所以能具备凶兆而灭其封国。

《易》说:“确定吉凶使人有所警惧,使人明于忧患和变故。”凡是有奇异的梦感怀于心,以及人的吉凶,面相的气色,不用问善恶,时常畏惧修身反省,用仁德去迎接它,才能使他遇到吉祥,上天赐予他的禄位才会永远保存下来。

释难第二十九

庚子问于潜夫曰:“尧、舜道德,不可两美,实若韩子戈伐之说邪?”

潜夫曰:“是不知难而不知类。今夫伐者盾也,厥性利;戈者矛也,厥性害。是戈为贼,伐为禁也,其不俱盛,固其术也。夫尧、舜之相于,人也,非戈与伐也,其道同仁,不相害也。舜、伐何如弗得俱坚?尧、伐何如不得俱贤哉?且夫尧、舜之德,譬犹偶烛之施明于幽室也,

前烛即尽照之矣,后烛入而益明。此非前烛昧而后烛彰也,乃二者相因而成大光,二圣相德而致太平之功也。是故大鹏之动,非一羽之轻也;骐驎之速,非一足之力也。众良相德,而积施乎无极也。尧、舜两美,盖其则也。”

伯叔曰:“吾子过矣。韩非之取矛盾以喻者,将假其不可两立,以诘尧、舜之不得并之势。而论其本性之仁与贼,不亦

失是譬喻之意乎？”

潜夫曰：“夫譬喻也者，生于直告之不明，故假物之然否以彰之。物之有然否也，非以其文也，必以其真也。今子举其实文之性以喻，而欲使鄙也释其文，鄙也惑焉。且吾闻阴对阳，谓之强说；论西诘东，谓之强难。子若欲自必以则昨反思，然后求，无苟自强。”

庚子曰：“周公知管、蔡之恶，以相武庚，使肆厥毒，从而诛之，何不仁也？若其不知，何不圣也？二者之过，必处一焉。”

潜夫曰：“书二子挟庚子父以叛，然未知其类之与？抑抑相反？且天知桀恶而帝之夏，又知纣恶而王之殷，使虐二国，残贼下民，多纵厥毒，灭其身，亦可谓不仁不知乎？”

庚子曰：“不然。夫桀、纣者，无亲于天，故天任之而勿忧，诛之而勿哀。今管、蔡之与周公也，有兄弟之亲，有骨肉之恩，不量能而使之，不堪命而任之，故曰异于桀、纣之与天也。”

潜夫曰：“皇天无亲，帝王继体之君，父事天。王者为子，故父事天也。率土之民，莫非王臣也。将而必诛，王法公也。无偏无颇，亲疏同也。大义灭亲，尊王之义也。立弊之天为周公之德因斯也。过此而往者，示之或知。”

秦子问于潜夫曰：“耕种，生之本也；学问，业之末也。老聃有言：‘大丈夫处其实，不居其华。’而孔子曰：‘耕也，馁在其中；学也，禄在其中。’敢问今使举世之人，释耨耒而程相群于学，何如？”

潜夫曰：“善哉问！君子劳心，小人劳力。故孔子所称，谓君子尔。今以目所见，耕，食之本也。以心原道，即学又耕之本也。《易》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天反德者为灾。”

潜夫曰：“呜呼！而未之察乎？吾语

子。夫君子也者，其贤宜君国而德宜子民也。宜处此位者，惟仁义人，故有仁义者，谓之君子。昔荀卿有言：‘夫仁也者爱人，爱人，故不忍危也；义也者聚人，聚人，故不忍乱也。’是故君子夙夜箴规，蹇蹇匪懈者，忧君之危亡，哀民之乱离也。故贤人君子，推其仁义之心，爱之君犹父母也，爱居世之民犹子弟也。父母将临颠陨之患，子弟将有陷溺之祸者，岂能墨乎哉！是以仁者必有勇，而德人必有义也。

“且夫一国尽乱，无有安身。《诗》云：‘莫肯念乱，谁无父母。’言将皆为害，然有亲者忧将深也。是故贤人君子，即忧民，亦为身作。夫盖满于上，沾溥在下，栋折榱崩，惧有厥患。故大屋移倾，则下之人不待告令，各争其柱之。仁者兼护人家者，且自为也。《易》曰：‘王明并受其福。’是以次室倚立而叹嘯，楚女揭幡而激王。仁惠之恩，忠爱之情，固能已乎？”

【译文】

庚子问潜夫说：“尧、舜的道德标准，不能两全其美，实质上就像韩非子的矛盾之说一样吗？”

潜夫驳诉说：“凡是不知道诘难就不知道事物的种类。如今讨伐的人就像盾一样，其特性是利于人；戈就是矛，其特性是害人。于是矛就成了贼寇，伐是为了禁止贼寇，两者不能都强盛，诚然是其策略了。尧、舜之间的相互厚爱，是人，不是矛和盾，他们志同道合，不相互加害。舜、盾为什么不能都坚固呢？尧、矛为什么不能都贤呢？况且尧、舜的仁德，就像一对蜡烛而燃明于暗室一样，前面的蜡烛尽照亮暗室，而后面的蜡烛使其更加明亮。这并不是说前面的蜡烛不明而是后面的蜡烛彰明的，是这两支蜡烛相同因而成为大的光明的，这二位圣人相得而兴致太

平之功。因此大鹏鸟的飞动，并不是一根羽毛使其能轻飞的；良马的快速，不是一足的力量。众多的优良之士相得，而所积累的仁德可以施之不尽。尧、舜两全其美，大概是应该效法的。”

伯叔诘难说：“您说得太过了。韩非子采取矛盾之说加以比喻的事，将假设其不可两立，以诘难尧、舜不得同时有其权力。而论述他们的本性是仁和贼，不也有失这种比喻的真意吗？”

潜夫说：“比喻的事，产生于坦率告诉他而不明白，所以假借事物的肯定和否定以彰明它。事物有肯定和否定，并不依照它的修饰，必定依照它的真实情况。如今你举出它的真实和修饰的本性加以比喻，而要用鄙陋去解释它的修饰，鄙陋也会迷惑不解。况且我所说问阴而回答是阳，称之为强辞夺理；议论西而诘难东，称之为勉强其难。你如果想自必以则昨反思，然后去索求，不苟同就自强。”

庚子说：“假如周公知道管叔、蔡叔的恶迹，还用二人相殷纣王的儿子武庚，使他二人放纵毒害人民，从而把他们二人杀死，为什么这样不仁德呢？如果周公不知道他二人的恶迹，为什么那样不贤圣呢？这二者的过错，周公必居其一。”

潜夫说：“书上说管叔、蔡叔挟持武庚禄父加以叛乱，然而周公不知道他们是同类吗？抑抑相反？况且老天知道桀的罪恶而还让他称帝于夏朝，又知道纣的罪恶而还让他称王于殷朝，使他二人暴虐于二国，残害下面的百姓，多放纵害民，灭其身，也可以说天不仁不义吗？”

庚子说：“不是这样。桀、纣这二人，对老天来说没有什么亲情，因此老天听凭他而不忧虑，受到诛灭而老天不哀伤他。而管叔、蔡叔和周公，有兄弟的亲情，不衡量他二人的才能而加以使用，不能胜任使命而任用他，所以说周公任用管叔、蔡叔与天听任桀、纣是有区别的。”

潜夫说：“皇天对人来说没有什么亲

疏之分，帝王是继位的君主，用侍奉父亲之礼来对待天。帝王称为儿子，所以对待天就像侍奉父亲一样。天下土地上的百姓，无不是帝王的臣民。拿到他就必加以诛灭，国家的法律是公平的。不偏不斜，亲疏都一样。大义灭亲，尊奉帝王的威仪。立即使他倒下是天认为周公的仁德就是这样。超过了这些范围，就不是我所能知道的了。”

秦子问潜夫说：“耕种之事，是生活的根本；学习问难，是末业，老聃有言说：‘大丈夫对待事物讲求实在，而不讲求华丽的外表。’孔子说：‘耕田，常常饿着肚皮，学习常常得到俸禄。’我冒昧地问如今使全世的人，都放下农器不去耕种而群起效法学习，又怎么样呢？”

潜夫说：“问的好！君子用智，小人用力。因此被孔子所称赞，称他为君子罢了。如今我亲自看见，耕种，是吃饭的根本。我用心推究它的根本道理，而学习又是耕种的根本。《易》说：‘将天道，概括为阴与阳；将地道，概括为柔和刚；将人道，概括为仁和义。’天违反时令就成为灾害。”

潜夫说：“唉呀！你没有观察吗？我告诉你。作为君子的人，他的贤能适宜于君临一国而他的仁德适宜于老百姓。应该处此地位的人，只有仁义之人，所以具有仁义的人，称之为君子。过去荀卿有言说：‘仁义的人是爱护人的，爱护人，因此不忍心危害人；仁义的人是会集人的，会集人，因此不忍心百姓离乱的。’所以君子从早晨到夜里都加以规谏劝告，不避艰险不懈努力的，忧愁君主的危亡，哀伤百姓的离乱。因此贤人君子，推置他的仁义之心，爱护君主就像爱护父母一样，爱护居于当世的百姓就像爱护自己的子弟一样。父母将面临死亡的忧患，子弟将有淹死之祸的人，怎能默默不言呢！所以爱人的必勇敢，而施德于人的必仁义。”

“况且一国都离乱了，就没有安身之处了。《诗》说：‘没人制止这乱世，谁没有父母不忧愁。’说的是都将遭受祸害，但有骨肉亲情的人忧愁就更深。因此贤人君子，既忧愁百姓，也是为了自身。推其缘由，大概像房屋上面漏水，浸湿于下面，梁折椽坏，惧怕产生祸患。所以大

屋倾倒，而下面的人不等待命令，各争其支柱。仁德的人还兼护人和家的，而且也为了自己。《易》说：‘君主英明众人都获得他的福运。’所以鲁国次室之女因柱子偏于一边而嗟叹呼叫，楚国的女子持旗而愤激楚王。仁惠的恩情，忠爱的激情，怎么能停止呢？”

潜夫论第八卷

交际第三十

语曰：“人惟旧，器惟新。昆弟世疏，明友世亲。”此交际之理，人之情也。今则不然，多思远而忘近，背故而向新；或历载而益疏，或中路而相捐，悟先圣之典戒，负久要之誓言。斯何故哉？退而省之，亦可知也。势有常趣，理有固然。富贵则人争附之，此势之常趣也；贫贱则人争去之，此理之固然也。

夫与富贵交者，上有称举之用，下有货财之益。与贫贱交者，大有赈贷之费，小有假借之损。今使官人虽兼桀、跖之恶，苟结驷而过士，士犹以为荣而归焉，况其实有益者乎？使处子虽苞颜、闵之贤，苟被谒而造门，人犹以为辱而恐其复来，况其实有损者乎？

故富贵易得宜，贫贱难得适。好服谓之奢僭，恶衣谓之困厄，徐行谓之饥馁，疾行谓之逃责，不候谓之倨慢，数来谓之求食，空造以为无意，奉贄以为欲贷，恭谦以为不肖，抗扬以为不德。此处子之羁薄，贫贱之苦酷也。

夫处卑下之位，怀《北门》之殷忧，内见谪于妻子，外蒙讥于士夫。嘉会不从礼，饯御不逮众，货财不足以合好，力势不足以杖急。欢忻久交，情好旷而不接，则人无故自废疏矣。渐疏则贱者逾自嫌而日引，贵人逾党而忘之。夫以逾疏之贱，伏于下流，而望日忘之贵，此《谷风》所为内摧伤，而介推所以赴深山也。

夫交利相亲，交害相疏。是故长誓而废，必无用者也。交渐而亲，必有益者也。俗人之相于也，有利生亲，积亲生爱，积爱

生是，积是生贤，情苟贤之，则不自觉心之亲之，口之誉之也。无利生疏，积疏生憎，积憎生非，积非生恶，情苟恶之，则不自觉心之外之，口之毁之也。是故富贵虽新，其势日亲，贫贱虽旧，其势日疏，此处子所以不能与官人竞也。世主不察朋交之所生，而苟信贵臣之言，此洁士所以独隐翳，而奸雄所以党飞扬也。

昔魏其之客，流于武安，长平之吏，移于冠军，廉颇、翟公，载盈载虚。夫以四君之贤，借旧贵之夙恩，客犹若此，则又况乎生贫贱者哉？惟有古烈之风，志义之士，为不然尔。恩有所结，终身无解；心有所矜，贱而益笃。《诗》云：“淑人君子，其仪一兮，心如结兮。”故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雕，世隘然后知人之笃固也。

侯嬴、豫让，出身以报恩，鱄诸、荆轲，奋命以效用。故死可为也，处之难尔。庞勋、勃貂，一旦见效，亦立为义报，况累旧乎？故邹阳称之曰：“桀之狗可使吠尧，跖之客可使刺由。”岂虚言哉？俗士浅短，急于目前，见赴有益则先至，顾无用则后背。是以欲速之徒，竞推上而不暇接下，争逐前而不遑恤后。是故韩安国能遗田蚡五百金，而不能赈一穷；翟方进称淳于长，而不能荐一士。夫安国、方进，前世之忠良也，而犹若此，则又况乎末涂之下相哉？此奸雄所以逐党进，而处子所以愈拥蔽也。非明圣之君，孰能照察？

且夫怨恶之生，若二人偶焉。苟相对也，恩情相向，推极其意，精诚相射，贯心达髓，爱乐之隆，轻相为死，是故侯生、豫子刎

颈而不恨。苟相背也,心情乖互,推极其意,分背奔驰,穷东极西,心尚未快,是故陈余、张耳老相全灭而无感痛。从此观之,交际之理,其情大矣。非独朋友为然,君臣夫妇亦犹是也。当其欢也,父子不能间;及其乖也,怨仇不能先,是故圣人常慎微以敦其终。

富贵未必可重,贫贱未必可轻。人心不同好,度量相万亿。许由让其帝位,俗人有争县职,孟轲辞禄万钟,小夫贪于升食。故曰:鸛鷀群游,终日不休,乱举聚跼,不离蒿茅。鸿鹄高飞,双别乖离,通千达万,志在陂池。鸾凤翱翔黄历之上,徘徊太清之中,随景风而飘摇,时抑扬以从容,意犹未得,啾啾然长鸣,蹶号振翼,陵朱云,薄斗极,呼吸阳露,旷旬不食,其意尚犹嗟嗟如也。三者殊务,各安所为。是以伯夷采薇而不恨,巢父木栖而自愿。由斯观诸,士之志量,固难测度。凡百君子,未可以富贵骄贫贱,谓贫贱之必我屈也。

《诗》云:“德輶如毛,民鲜克举之。”世有大难者四,而人莫之能行也,一曰恕,二曰平,三曰恭,四曰守。夫恕者仁之本也,平者义之本也,恭者礼之本也,守者信之本也。四者并立,四行乃具,四行具存,是谓其贤。四本不立,四行不成,四行无一,是谓小人。

所谓恕者,君子之人,论彼恕于我,动作消息于心;己之所无,不以责下,我之所有,不以讥彼,感己之好敬也,故接士以礼,感己之好爱也,故遇人有恩;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善人之忧我也,故先劳人,恶人之忘我也,故常念人。凡品则不然,论人不恕己,动作不思心;无之己而责之人,有之我而讥之彼;己无礼而责人敬,己无恩而责人爱,贫贱则非人初不我忧也,富贵则是我之不忧人也。行己若此,难以称仁矣。

所谓平者,内怀鵠鵠之恩,外执砥矢之心,论士必定于志行,毁誉必参环境效验,不随俗而雷同,不遂声而寄论;苟善所在,

不讥贫贱,苟恶所错,不忌富贵;不谄上而慢下,不厌故而敬新。凡品则不然,内偏颇于妻子,外僭惑于知友;得则誉之,怨则谤之;平议无壕的,讥誉无效验;苟阿贵以比党,苟剽声以群吠;事富贵如奴仆,视贫贱如佣客;百至秉权之门,而不一至无势之家。执心若此,难以称义矣。

所谓恭者,内不敢傲于室家,外不敢慢于士大夫;见贱如贵,视少如长;其礼先入,其言后出;恩义无不答,礼敬无不报;睹贤不居其上,与人推让;事处其劳,居从其陋;位安其卑,养甘其薄。凡品则不然,内慢易于妻子,外轻侮于知友;聪明不别真伪,心思不别善丑;愚而喜傲贤,少而好陵长;恩意不相答,礼敬不相报;睹贤不相推,会同不能让,动欲择其佚,居欲处其安,养欲擅其厚,位欲争其尊;见人谦让,因而嗤之,见人恭敬,因而傲之,如是而自谓贤能智慧。为行如此,难以称忠矣。

所谓守者,心也。有度之士,情意精专,心思独睹,不驱于险墟之俗,不惑于众多之口;聪明悬绝,秉心塞渊,独立不惧,遁世无闷,心坚金石,志轻四海,故守其心而成其信。凡器则不然,内无持操,外无准仪,倾侧险波,求同于世,口无定论,不恒其德,二三其行。秉操如此,难以称信矣。

夫是四行者,其轻如毛,其重如山,君子以为易,小人以为难。孔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仁斯至矣。”又称:“知德者鲜”。俗之偏党,自古而然,非乃今也。凡百君子,竞于骄僭,贪乐慢傲,如贾一倍,以相高。苟能富贵,虽积狡恶,争称誉之,终不见非;苟处贫贱,恭谨,祇为不肖,终不见是。此俗化之所以浸败,而礼义之所以消衰也。

世有可患者三。三者何?曰:情实薄而辞称厚,念实忽而文想忧,怀不来而外克期。不信则惧失贤,信之则诳误人。此俗士可厌之甚者也。是故孔子疾夫言之过其行者《诗》伤“蛇蛇硕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颜之厚矣”。

今世俗之交也,未相照察而求深固,探怀扼腕,拊心祝诅,苟欲相护论议而已,分背之日,既得之后,则相弃忘。或受人恩德,先以济度,不能拔举,则因毁之,为生瑕衅,明言我不遗力,无奈自不可尔。《诗》云:“知我如此,不如无生。”先合而后忤,有初而无终,不若本无生意,强自誓也。

君子屡盟,乱是用长。大人之道,周而不比,微言相感,掩若同符,又焉用盟?孔子恂恂,似不能言者,又称“闇闇言,惟谨也。”士贵有辞,亦憎多口。故曰:“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与其不忠,刚毅木纳,尚近于仁。

呜呼哀哉!凡今之人,言方行圆,口正心邪,行与言谬,心与口违,论古则知称夷、齐、原、颜,言今则必官爵职位,虚谈则知以德义为贤,贡荐则必阀阅为前。处子虽躬颜、闵之行,性劳谦之质,秉伊、吕之才,怀救民之道,其不见资于斯世也,亦已明矣!

【译文】

俗话说:“人只追求旧的,器物只追求新的。兄弟一生互相疏远,朋友一生互相亲近。”这是人们互相交际的道理,是人之常情。如今就不是这样,大多想念远的而忘记近的,离开旧的而偏爱新的,有的历年而更加疏远,有的中途就被抛弃,背逆前代圣人的法则禁制,违背旧约的誓言。这是什么缘故呢?退下来加以反省,也是可以知道的。这是形势的必然趋势,这是固然的道理。人富贵了就争着依附他,这是势所必然的趋势;人贫贱了就争着脱离他,这是自然的道理。

与富贵的人相往来应酬的人,向上有炫耀的用途,对下有增加财货的益处。与贫贱相交往的人,大的有救济的费用,小的有借出的损失。如今即使官吏兼有夏桀、盗跖的恶名,如果车马众多而探望士人,士人还以为光荣而归附他,何况他确实得到了利益呢?使隐士虽然有包容颜渊、闵子

骞的贤能,如果穿着粗布衣服到他的门上,他还认为是耻辱而唯恐他再来,何况确实是被伤害的人呢?

因此富贵容易取得归往,贫贱难于取得适宜。穿着美好的衣服称为奢侈僭越,穿着粗劣的衣服称之为穷困,慢慢的行走称之为饥饿,快步行走称之为逃债,不等待称之为傲慢,频繁来的人称之为要饭,空手而至认为无意,供奉礼物认为是借贷,恭敬谦虚认为是不贤,高尚显扬认为是没有仁德。这是对隐士的束缚,对贫贱的暴虐。

处于卑下地位的人,怀着像《诗·北门》那样的心烦意乱,家里妻子责骂我,外面蒙受士大夫的讽刺。吉庆之会召客不能随礼,招待朋友不及众人,朋友交际财货不足以合好,势力不足以使有急事的人所依恃。欢欣久交朋友,感情虽好旷日持久而不接触,而朋友就无故自然疏远了。逐渐疏远就越是贫贱自嫌而引退,贵人越勉力从事于结党而就忘记被疏远的人。因为越疏远而贫贱的人,只好伏在下游,而责备天日忘记了富贵,这就像《诗·谷风》那样被妻子所讥刺伤害,而介之推所以逃至深山的原因。

互相有利就相亲相爱,互相伤害就互相疏远。因此长久的誓言就被废止,必然没有作用的。交往循序渐进就亲密,是必有好处的。平庸之辈的相厚,有利就化生为亲情,积累了亲情就化生为爱,爱积累了就化生为是,是积累了就化生为贤,感情如果认为是贤,就不自觉的心里要亲近他,口里夸奖他。交往没有利就化生疏远,积累了疏就化生憎恶,积累了憎恶就化生非议,积累了非议就化生毁恶,情感如果发展到毁恶的地步,就不自觉的在心里产生异心,用口毁伤他。所以富贵了唯独喜欢新的,这样势必日益亲近他,贫贱了唯独喜欢旧的,这样势必要日益疏远他,这是隐士所以不能和官吏相争逐的原因。当世之主不明察朋友交际变化的原因,苟且听信贵臣一面之词,这是贞洁之士所以独自隐蔽起来,

而奸人的首领所以能结党飞扬跋扈的原因。

过去魏其侯窦婴的宾客,流归于武安侯田蚡;长平侯卫青手下的官吏,转移到了冠军侯霍去病的手下;廉颇、翟公,宾客再满再空。拿这四人的贤能,凭借着旧贵平常的恩情,宾客还尚且如此,而又何况生于贫贱之家的人呢?只有上古贞烈之士的遗风,有志于仁义之士,才不这样罢了。恩惠有所连结,就终身无法解开;心中有所同情,贫贱的人更加忠实。《诗》说:“善良的君子,威仪不改变,心肠结实坚定。”所以岁寒然后才知道松柏的雕谢,世道狭隘然后才知道人的忠诚。

侯嬴、豫让,能挺身而出报答别人的恩情,鱄诸、荆轲奋不顾命以效用于别人。因此死可以做到,决定这样做就难了。庞涓、貂勃,一旦被别人收买,也能立即为义气而报答别人,何况是旧交呢?所以邹阳称赞说:“夏桀的狗可使他吠咬帝尧,盗跖的宾客可以使他刺杀子路。”怎么是虚言呢?平庸之士见识浅短,急于眼前的事情,见到有利之事就抢先而至,回过头来一看没有用处就后退了。因此想要快的人,竞相推崇上面而没有时间接待下面,竞相追逐向前而没有时间忧虑后面。所以韩安国能赠给田蚡五百金,而不能赈济给一个穷人;翟方进称赞淳于长,而不能推荐一个士人。韩安国、翟方进,是前代的忠良大臣,而还这样,而又何况处于绝路下位的人呢?这就是奸人的首领所以追逐结党而进,而隐士所以更加壅塞蒙蔽。除非圣明的君主,谁能明察呢?

况且恩怨的产生,就像二人相对一样。假如二人相对,恩情相接近,推究它的意思,对精诚的相互追求,贯穿于心达至骨髓;爱和乐的深厚,轻的可以相互为他人而死,因此侯嬴、豫让割颈而不悔恨。假如二人相背离,心情违逆,推究它的意思,必定分离奔驰,极东极西,心里还尚不愉快,因此陈余、张耳终于互相擒灭而不感到痛心。

从这观察,交际的道理,它的情理太大了。不仅朋友是这样,君臣夫妻也是这样。当他们欢乐时,父子也不能离间他们;到他们互相违逆时,就是怨仇的人也不能比他最靠前了。所以圣人常常谨慎微小的事情以敦厚其终结。

富贵不必重视,贫贱不可轻视。人心有不同的爱好,度量可以称亿万斤重的东西。许由让去他的帝位,平庸之人有的争着去做县官;孟轲辞去万钟的禄位,小人贪于升斗的粮食。所以说:“鹤鹑成群地游动,终日不止,乱飞聚集,离不开蒿茅。鸿鹄高飞,双别未见期限,通达千万里,志向在于陂池。鸾凤翱翔于万仞之上,徘徊于天空之中,随瑞风而飘摇,时上时下从容而飞,意思还有所未得,就喈悦然而长鸣,动号振羽,凌驾于飞云,轻升于无极,呼吸朝露,旷日不食,其意尚且还不满足。这三者不同的爱好,各自安于自己的所为。所以伯夷采集野菜充饥而不悔恨,巢父棲栖于树上而是自愿的。由此加以观察,士人的志向度量,固然难于测度。凡是诸位君子,不可以用富贵骄横于贫贱,称贫贱必须屈服于我。

《诗》说:“德行如毛发,百姓很少能举它。”世上有四种大难,而人不能执行,一是宽恕,二是平直,三是恭敬,四是行事。宽恕是仁德的根本,平直是道义的根本,恭敬是礼仪的根本,行事是守信用的根本。这四者都建立了,这四种行为才都存在,这就叫真正的贤才。这四项根本不建立,这四种行为不具备,这四种行为不具备一种,就是所说的小人。

所谓宽恕的事,作为君子的人,评论他人自己要宽恕,一举一动就考虑于心中;自己所不具备的,不用责怪下面,自己所具备的,不要讽刺他人;感动自己所尊敬的人,因此接待士人要用礼仪,感动自己所亲爱的人,因此对待人要有恩惠;自己要站得住,同时也使别人站得住,自己要事事行得通,同时也要使别人事事行得通,善良的人

忧愁自己,因此首先忧愁别人,邪恶的人忘记自己罪过,因此常常想念别人的罪过。平凡的人就不是这样,评论他人自己不加宽恕,一举一动不加思虑,自己所不具备的而责怪于别人,自己具备的就讥讽别人;自己没有礼仪而责怪别人要尊敬自己,自己无恩无义而责怪别人要亲爱自己;贫贱而不是别人当初不忧愁自己,富贵而是自己不忧愁别人。行为对自己来说尚且如此,很难达到称为仁的要求了。

所谓平直之事,内心怀着像鴈鹄养子那样的恩情,外面保持平直之心里,评论士人必须限于志向和操行,诽谤或赞誉必定参考于效验,不跟随世俗而雷同,不随声而依附于别人的评论,如果善还存在的话,就不讥讽贫贱,如果恶被搁置下来,就不嫉妒富贵,不谄媚于上而怠慢于下,不厌恶旧的而崇尚新的。平庸的人就不是这样,对内不平正于妻子,对外不信任知己朋友,相亲悦就赞誉他,相怨恨就诽谤他,评议没有目标,讥讽赞誉没有效验,阿谀富贵结为朋党,劫声而群叫,侍奉富人和奴仆一样,视贫贱和雇用的人一样,上百次到权贵之门,而连一次也不到无势力的家门。本性如此,就难以称义了。

所谓恭敬的事,对内不敢傲慢于家室,对外不敢傲慢于士大夫,接触贫贱的人和接触富贵的人一样,接触年少的人和接触年长的人一样,使用礼仪时要先于别人,使用言语时要后于别人,对别人的恩情要给以回报,对别人的礼敬要给以报答,见到贤人不处在他的上面,对人要推让,对事情要任劳任怨,居住要从简从陋,对待职位要乐于在下面,对待养生要情愿微薄。平庸之人就不是这样,对内轻侮于妻子,对外轻侮于知己朋友,闻见不辨别真假,思想不辨别善恶,愚昧的人而却喜欢傲慢贤人,年少的人而却喜好欺凌年长的人,恩情不去报答,礼敬不去回报,看见贤人不相推让,会合在一起不能相让,行动就想选择奢侈,居住就想安逸,养生就想独揽其丰厚,职位就想争

取到尊贵,看见别人谦让,因而发出嗤笑之声,看见别人恭敬,因而傲慢他,这样还自认为贤能智慧。所做所为这样,很难称之为忠信了。

所谓守的事,就是守心的意思。有法度的士人,情意精专,思想独见于明旷之道,不驱使于危险的俗流之中,不迷惑于众多人的言语,闻见悬殊,诚心为国深谋远虑,遭受变故能守节不屈,隐居不仕,清静淡泊,心思坚定和金石一样,志气轻于四海,因此能坚守他的信心而成就他的诚信。平庸的人就不是这样,对内不坚持操行,对外不按照礼节,倾斜险恶,只求苟同于世,言辞没有固定的议论,不能保持其德行,三心二意。执掌操行如此,很难称之为忠信了。

具有以上四种行为的人,小人轻如鸿毛,君子重如山丘,君子认为容易,小人认为难。孔子说:“仁德难道离我们很远吗?我要仁德,仁德就来了。”又说:“知道仁德的人很少”。平庸之人偏于结党,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并不是只有今天。凡是诸位君子,竞相于骄横僭越,贪图安乐傲慢,如做买卖利益三倍,以比高下。如果能富贵,虽然积累很多罪恶,也争着称赞他,最终必不见非议,如果处于贫贱地位,恭谨,认为不贤,最终也不见称是。这就是因为世俗的变化而逐渐浸染败坏,而礼仪也因此而消失衰败的原因。

世俗所可以忧虑的地方有三种情况。这三种情况是什么呢?说:情感实在很微薄而言辞赞许却不刻薄,思念实际上已经破灭而却掩饰相爱,心里怀着不来的思想而外表却遵守日期。不诚信而怕失去贤才,信任他而贻误别人。这是平庸之士很被人厌恶的地方。所以孔子耻辱那些言论超过行动的人,《诗》哀伤那些“浅薄夸张的大话,不顾行动信口胡说,巧言如奏笙簧那样好听,脸皮太厚了。”

如今交际的风俗习惯,没有互相明察而就求于深固结交,伸手就握住别人手腕,

拍着心口咒诅,苟且想要互相维护议论罢了,离散之时,既得利益之后,就互相抛弃忘记。有的受到别人恩德,先用它渡过困难,如果不能被选举,就因此而诽谤别人,就产生事端,明言我不遗余力,自己无可奈何。《诗》说:“早知道我是这样,还不如不生我。”先融洽后违逆,有始而没有终,不如本无兴趣,何必勉强自作誓言呢。

君子多次定立盟誓之言,祸乱因此更加久长。居于高位的人的道德,是团结而不是勾结,用精微的言辞相互感动,意气相合没有缝隙,又何必用盟誓呢?孔子谦恭谨慎,又称“有话便明白而流畅地说出来,只是说得很少”。士人崇尚有言辞的人,

也厌恶议论多的人。所以说:“文采和朴实配合适当,然后才是个君子。”与其不忠,刚毅果断朴质言语不轻易出口,这样就接近于仁德。

唉呀,真可哀叹呀!凡是如今之人,说的是方的行的是圆的,口是正的心是邪恶的,行动和言语相谬误,议论古代的事就只知称赞伯夷、叔齐、原宪、颜渊,言说今天的事就必定是官爵职位;空谈就知道以德义为贤,荐举人才时就必定首先讲究门第经历。隐士虽然亲自效法颜渊、闵子骞的行为,性情有勤劳谦让的实质,执掌有伊尹、吕尚的才能,怀有救民的道德,也不被见用于当世,这也很明显了。

明忠第三十一

人君之称,莫大于明;人臣之誉,莫美于忠。此二德者,古来君臣所共愿也。然明不继踵,忠不万一者,非必愚暗不逮而恶名扬也,所以求之非其道尔。

夫明据下起,忠依上成。二人同心,则利断金。能知此者,两誉俱具。要在于明操法术,自握权秉而已矣。所谓术者,使下不得欺也;所谓权者,使势不得乱也。术诚明,则虽万里之外,幽冥之内,不得不求效;权诚用,则远近亲疏,贵贱贤愚,无不归心矣。周室之末则不然,离其术而舍其权,怠于己而恃于人。是以公卿不思忠,百僚不尽力,君王孤蔽于上,兆黎冤乱于下,故遂衰微侵夺而不振也。

夫帝王者,其利重矣,其威大矣。徒悬重利,足以劝善;徒设严威,可以惩奸。乃张重利以诱民,操大威以驱之,则举世之人,可令冒白刃而不恨,赴汤火而不难,岂云但率之以共治而不宜哉?若鹰野鸟也,然猎夫御之,犹使终日奋击而不敢怠,岂有人臣而不可使尽力者乎?

《诗》云:“伐柯代柯,其则不远。”夫神

明之术,具在君身,而君忽之,故令臣钳口结舌而不敢言。此耳目所以蔽塞,聪明所以不得也。制下之权,日陈君前,而君释之,故令群臣懈弛而背朝。此威德所以不照,而功名所以不建也。

《诗》云:“我虽异事,及尔同僚。我即尔谋,听我敖敖。”夫恻隐人皆有之,是故耳闻啼号之音,无不为之惨凄悲怀而伤心者;目见危殆之事,无不为之灼怛惊而赴救之者。君臣义重,行路礼轻,过耳悟目之交,未恩未德,非贤非贵,而犹若此,则又况于北面称臣被宠者乎?

是故进忠扶危者,贤不肖之所共愿也。诚皆愿之而行违者,常苦其道不利而有害,言未得信而身败尔。历观古来爱君忧主敢言之臣,忠信未达,而为左右所鞠按,当世而覆被,更为否愚恶状之臣者,岂可胜数哉?孝成终没之日,不知王章之直,孝哀终没之日,不知王嘉之忠也。此后贤虽有忧君哀主之情,忠诚正直之节,然犹且沉吟观听行己者也。

鸣鹤在阴,其子和之。相彼鸟矣,犹求

友声。故人君不闻精诚以示贤忠,贤忠亦无以得达。《易》曰:“王明并受其福。”是以忠臣必待明君及能显其节,良吏必得察主乃能成其功。君不明,则大臣隐下而遏忠,又群司舍法而阿贵。

夫忠言所以为安也,不贡必危,法禁所以为治也,不奉必乱。忠之贡与不贡,法之奉与不奉,其秉皆在于君,非臣下之所能为也。是故圣人求之于己,不以责下。

凡为人上,法术明而赏罚必者,虽无言语而势自治。治势一成,君自不能乱也,况臣下乎?法术不明而赏罚不必者,虽日号令,然势自乱。乱势一成,君自不能治也,况臣下乎?是故势治者,虽委之不乱,势乱者,虽勤之不治也。尧、舜恭己无为而有余,势治也;胡亥、王莽驰骛而不足,势乱也。故曰:善者求之于势,弗责于人。是以明王审法度而布教令,不行私以欺法,不黷教以辱命,故臣下敬其言而奉其禁,竭其心而称其职。此由法术明而威权任也。

夫术之为道也,精微而神,言之不足,而行有余;有余,故能兼四海而照幽冥。权之为势也,健悍以大,不待贵贱,操之者重;重,故能夺主威而顺当世。是以明君未尝示人术而借下权也。孔子曰:“可与权。”是故圣人显诸仁,藏诸用,神而化之,使民宜之,然后致其治而成其功。功业效于民,美誉传于世,然后君乃得称明,臣乃得称忠。此所谓明据下作,忠依上成,二人同心,其利断金也。

【译文】

对君主的赞许,没有比英明再美了;对臣下的赞誉,没有比忠诚再美了。这两种仁德的人,自古以来是君臣所共同的愿望。但是英明不延下来,忠臣就不到万分之一的人,并不是君主一定愚暗而恶名远扬的结果,所以是他索求忠臣的方不对罢了。

明君依靠下面而兴起,忠臣依靠上面而形成。君臣同心一意,就没有什么困难

不能克服的。君臣能晓得这些道理,两者都能完全得到赞誉。其关键在于明操法术,自己掌握着权力罢了。所谓术的事情,使下面不能欺骗;所谓权的事情,使用权力不能紊乱。术果真显明之后,就是虽然处于万里以外,暗昧之内的人,也不得不来要求效忠于国家,权力果真加以运用,而远近亲疏,贵贱贤愚等各类的人,没有不归向朝廷的。周朝末年就不是这样,君主脱离了术而放弃了他的权力,轻慢自己而依靠别人。因此公卿大臣不思尽忠,百官不尽力,君王被孤主蒙蔽于上面,亿万百姓被冤枉变乱于下面,所以周室衰微互相侵夺而不能振兴了。

作为帝王的人,他的权利很重,他的威严很大。只要悬赏重利,足能劝善;只要设置严厉的刑威,就可以惩治奸邪。于是设置重利用以诱导百姓,依靠大的威严来驱使百姓,而所有的人,可以令他们冒死而不怨恨,赴汤蹈火而不作难,怎么能说只率领他们共同治理国家而不合适呢?就像鹰那样,本来是一种野鸟,但打猎的人驾御着牠,更加使牠终日奋击而不敢怠慢,怎么不能使臣子尽力的呢?

《诗》说:“砍斧柄砍斧柄,这个法则并不远。”神灵的术数,都在君主身上,而君主忽略了它,由此让大臣闭口不敢讲话。这就是耳目所以被遮蔽堵塞,智慧所以不能得到的原因。控制下面的权力,每天都陈设在君主面前,而君主却丢掉它,所以让大臣懈怠松弛而背乱朝政。这是威权仁德所以不能照亮下面,而功名所以不能树立的原因了。

《诗》说:“我们职务虽不同,你我都是同僚。我来和你共同商议,听我话时你骄傲。”怜悯的心情人人都有它,因此当耳朵听到啼叫的声音,没有不为他凄惨悲伤而伤心的,眼睛看见危险的事情,没有不为他烧伤痛苦所震惊而前去营救的。君臣之间情谊深重,行路的人礼仪很轻薄,短暂之间的交际,没有恩情没有仁德,不是因为贤不

是因为贵,而还尚且如此,而又何况于北面称臣被受到恩宠的人呢?

因此进忠扶危的事,贤和不贤的人所共同愿意的。诚然都愿意而行动却违背的人,常遗憾他的方法不利而有害,言论没有得到信任就身败名裂罢了。普遍观察自古以来爱护忧虑君主敢于进言的大臣,忠信之情还没达到,而就被君主左右的人所穷究考问,当时就被覆没,更被愚昧邪恶没有善状的大臣所陷害,这样的事情怎么能数清呢?汉成帝临死之时,还不知道王章的正直,汉哀帝临死之时,还不知道王嘉的忠诚。以后贤臣虽有忧虑哀伤君主的情意,忠诚正直的节操,仅尚且犹豫观望听从罢了。

老鹤在树荫下鸣叫,小鹤在旁边附和。看看那些小鸟,是求朋友的声音。因此君主不敞开精诚之心用它显示于贤忠之人,贤忠之人也无法能得到通达。《易》说:“君王英明大家都获得好处。”因此忠臣必期待明君才能显示他的节操,良吏必须得到明察的君主才能成就他的功劳。君主不明,而大臣就隐藏在下面而遏制他的忠心,更使官吏舍弃法制而阿谀贵戚。

忠诚的言论所以能成为安定国家的原因,得不到进达就必然危险了,刑罚禁令所以能成为治理国家的原因,不奉行它就必然产生祸乱。忠诚言论的进达和不进达,法令的奉行和不奉行,它的权秉都操在君主手中,不是臣下所能做到的。所以圣人要严于责己,而不责怪下面。

凡是做君主的,法术一旦显明就必定实行赏罚,虽然没有言语而威势就自然而

治了。治理的形势一旦形成,君主自己就不能乱了,何况是臣下呢?法术不明而赏罚也必不能严明,虽然整天发号施令,而威势自乱。变乱的形势一旦形成,君主自己不能加以治理,何况是臣下呢?因此掌握势治的君主,虽然听任它而威势仍然不乱;威势发生变乱,虽然勤劳也不能治理。尧、舜谦恭自己无所作为而还使百姓有余,这是势治的结果,胡亥、王莽奔走趋赴而不足,因为势治发生了变乱。因此说:善于治理国家的人求之于势治,而不责怪于别人,所以英明的君主明悉法律制度而发布教令,不行偏私用来欺骗法令,不轻慢教令用来侮辱命令,所以臣下能敬奉君主的言论而奉行君主禁令,竭尽其心奉行他的职务。这是由于法术显明而威权胜任了。

法术作为方法,精微而神妙,用言语不足以说明它,而执行起来就用不完它,用不完,因此能兼顾天下而照亮暗昧。权力作为势治,强健勇猛而大,不管贵贱,操持它的人权就重,权重,因此能夺去君主的威势而顺从世俗。所以英明的君主把术藏于胸中不给人看而借给别人就失去权力。孔子说:“不可给他权力。”所以圣人明显表现出来的是仁爱,隐藏难知的是生成万物的功能,加以神妙的改造,使人民感到适宜,然后达到治理而成就他的功业。功业献于百姓,美好的赞誉传于当世,然后君主才能称为英明,臣子才能称为忠诚。这就是所说的明君依靠下面而兴起,忠臣依靠上面而形成,君臣同心一意,没有什么困难不可克服的事。

本训第三十二

上古之世,太素之时,元气窈冥,未有形兆,万精合并,混而为一,莫制莫御。若斯久之,翻然自化,清浊分别,变成阴阳。

阴阳有体,实生两仪,天地壹郁,万物化淳,和气生人,以统理之。

是故天本诸阳,地本诸阴,人本中和。

三才异务 ,相待而成 ,各循其道 ,和气乃臻 ,机衡乃平。

天道曰施 ,地道曰化 ,人道曰为。为者 ,盖所谓感通阴阳而致珍异也。人行之动天地 ,譬犹车上御驰马 ,蓬中擢舟船矣。虽为所覆载 ,然亦在我何所之可。孔子曰 :“时乘六龙以御天。”言行君子所以动天地也 ,可不慎乎 ?”以此观之 ,天□其兆 ,人序其勋 《书》故曰 :“天功人其代之。”如盖理其政以和天气 ,以臻其功。

是故道德之用 ,莫大于气。道者 ,气之根也。气者 ,道之使也。必有其根 ,其气乃生 ;必有其使 ,变化乃成。是故道之为物也 ,至神以妙 ;其有功也 ,至强以大。天之以动 ,地之以静 ,日之以光 ,月之以明 ,四时五行 ,鬼神人民 ,亿兆丑类 ,变异吉凶 ,何非气然 ?

及其乖戾 ,天之尊也气裂之 ,地之大也气动之 ,山之重也气徙之 ,水之流也气绝之 ,日月神也气蚀之 ,星辰虚也气陨之 ,旦有昼晦 ,宵有 ,大风飞车拔树 ,僨电为冰 ,温泉成汤 ,麟龙鸾凤 ,螫贼蜚蝗 ,莫不气之所为也。

以此观之 ,气运感动 ,亦诚大矣。变化之为 ,何物不能 ?所变也神 ,气之所动也。当此之时 ,正气所加 ,非唯于人 ,百谷草木 ,禽兽鱼鳖 ,皆口养其气。声入于耳 ,以感于心 ,男女听 ,以施精神。资和以兆𦍋 ,民之胎 ,含嘉以成体。及其生也 ,和以养性 ,美在其中 ,而畅于四腴 ,实于血脉 ,是以心性志意 ,耳目精欲 ,无不贞廉洁怀履行者。此五帝三王所以能画法像而民不违 ,正己德而世自化也。

是故法令刑赏者 ,乃所以治民事而致整理尔 ,未是以兴大化而升太平也。夫欲历三王之绝迹 ,臻帝、皇之极功者 ,必先原元而本本 ,兴道而致和 ,以淳粹之气 ,生敦庞之民 ,明德义之表 ,作信厚之心 ,然后化可美而功可成也。

【译文】

在上古的时代 ,形成天地的时候 ,阴阳二气浑纯幽暗 ,没有形体征候 ,万精合并 ,混而为一 ,不能控制不能驾御。如此太久了 ,很快自己变化了 ,清浊分离 ,变成阴阳。阴阳有区别 ,产生了天地 ,天地鼓荡 ,万物变化为成双成对 ,和气就产生了人 ,而圣人加以管理。

因此天本来是阳 ,地本来是阴 ,人本本是中和。这三种才质有不同的任务 ,互相具备才能成功 ,各自遵循自己的原则 ,和气才能达到 ,枢要机关才能平衡。

天的原则是施予 ,地的原则是化生万物 ,人的原则是有所作为。有所作为的事 ,大概是因为诚心而感通阴阳所以才使珍异之物到来。人的行为感动天地 ,就像在车上驾御马 ,在船篷之上划舟一样。虽然被天地所养育 ,但也在如何作为了。孔子说 :“羲和驾御着六条飞龙在天空中有规律地运行。”言论和行动是君子用以影响天地万物的工具 ,怎么能不谨慎呢 ?”从这里观察 ,天呈现吉祥的征兆 ,人奖励其功 ,《书》因此说 :“天的功劳君主代替它。”大概治理其政事要谐和天气 ,用来达到他的功业。

因此道德的体用 ,没有比谐和阴阳二气再大了。道这事 ,是阴阳二气的根本。阴阳二气这事 ,是道的使用。道必有根源 ,阴阳二气才会产生道 ,道必然要使用 ,万物的变化才可以形成。因此把道作物质看待 ,很神奇巧妙 ;把道作为功能看待 ,很强很大。天所以动 ,地所以静 ,太阳所以发出光 ,月亮所以明 ,四时五行 ,鬼神人民 ,亿万丑众 ,吉凶的变化 ,为什么离不开阴阳二气呢 ?

到了阴阳二气不和谐时 ,天的尊严能被气所破裂 ,地的广大能被气所震动 ,山的重量能被气所移动 ,水的流动能被气所堵绝 ,日月之神能被气所亏蚀 ,星辰虚宿能被

气所坠落,白天能使昏暗,夜里能使明亮,大风可以使车飞起树拔根,积电可使它成为冰雹,温泉可以成汤,麟龙鸾凤,螫贼蜚蝗,无一不是气使它生成的。

从这里观察,阴阳二气的运行感动,也的确太大了。天地间的运动变化,人世间的言语行动,什么事物不能使它变化呢?所变化的太神奇了,这是阴阳二气使它所变动的。正当这个时候,正气所施予的,不仅是对于人,各种谷物草木,禽兽鱼鳖,都是谐和调养其气。乐声传入于耳朵后,然后才能感动于心,男女听到它,用来增加精神。人怀胎以后,用资财和谐以喜兆胎儿,包含嘉言以成礼。到婴儿生下来后,和睦

以养婴儿之本性,美德就在婴儿之中存在,而流畅于四肢,充实于血脉,因此心性志意,耳目情欲,无不正直廉洁并怀有履行的志向。这是五帝三王所以能画出模仿的形象而百姓就不敢违背,端正自己的德行而世人自己就被感化了。

因此法令刑赏的事,就是因为它能治理民事而达到整顿罢了,不足以成就大的教化而提高太平。而想超过三王的特殊功绩,达到帝、皇的极大功劳的人,首先必须原原本本,兴人道而达到谐和,用淳粹精妙的阴阳二气,产生敦厚高大的百姓,显明德义的标准,兴起诚信忠厚之心,然后教化可以赞美而功业就可以成就了。

德化第三十三

人君之治,莫大于道,莫盛于德,莫美于教,莫神于化。道者所以持之也,德者所以苞之也,教者所以知之也,化者所以致之也。民有性,有情,有化,有俗。情性者,心也,本也。化俗者,行也,末也。末生于本,行起于心。是以上君抚世,先其本而后其末,顺其心而理其行。心精苟正,则奸匿无所生,邪意无所载矣。

夫化变民心也,犹政变民体也。德政加于民,则多滌畅姣好坚强考寿,恶政加于民,则多罢癯□病天昏札瘥。故《尚书》美“考终命”,而恶“凶短折”。国有伤明之政,则民多病目;有伤聪之政,则民多病耳;有伤贤之政,则贤多横夭。夫形体骨干为坚强也,然犹随政变易,又况乎心气精微不可养哉?《诗》云:“敦彼行苇,羊牛勿践履。方苞方体,惟叶萋萋。”又曰:“鸢飞厉天,鱼跃于渊。恺悌君子,胡不作人?”公刘厚德,恩及草木,羊牛六畜,且犹感德,仁不忍践履生草,则又况于民萌而有化者乎?君子修其乐易之德,上及飞鸟,下及渊鱼,无不欢忻悦豫,则又况于土庶而有仁

者乎?

圣深知之,皆务正己以为表,明礼以为教,和德气于未生之前,正表仪于咳笑之后。民之胎也,合中和以成,其生也,立方正以长。是以为仁义之心,廉耻之志,骨著脉通,与体俱生,而无粗秽之气,无邪淫之欲。虽放之大荒之外,措之幽冥之内,终无违礼之行,投之危亡之地,纳之锋镝之间,终无苟全之心。举世之人,行皆若此,则又乌所得亡夫奸乱之民而加辟哉?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仪形文王,万邦作孚。此姬氏所以崇美于前,而致刑措于后也。

是故上圣不务治民事而务治民心,故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导之以德,齐之以礼,务厚其情而明则务义,民亲爱则无相伤害之意,动思义则无奸邪之心。夫若此者,非法律之所使也,非威刑之所强也,此乃教化之所致也。圣人甚尊德礼而卑刑罚,故舜先敕契以敬敷五教,而后命皋陶以五刑三居。是故凡立法者,非以司民短而诛过误,乃以防奸恶而救祸败,检淫邪而内正道尔。

《诗》云：“民之秉夷，好是懿德。”故民有心也，犹为种之有园也。遭和气则秀茂而成实，遇水旱则枯槁而生孽。民蒙善化，则人有士君子之心，被恶政，则人有怀奸乱之虑。故善者之养天民也，犹良工之为曲鼓也。起居以其时，寒温得其适，则一荫之曲鼓尽美而多量。其遇拙工，则一荫之曲鼓皆臭败而弃捐。今六合亦由一荫也，黔首之属犹豆麦也，变化云为，在将者尔。遭良吏则皆怀忠信而履仁厚，遇恶吏则皆怀奸邪而行浅薄。忠厚积则致太平，奸薄积则致危亡。是以圣帝明王，皆敦德化而薄威刑。德者所以修己也，威者所以治人也。上智与下愚之民少，而中庸之民多。中民之生世也，犹铄金之在炉也，从穹变化，惟冶所为，方圆薄厚，随熔制尔。

是故世之善否，俗之薄厚，皆在于君。上圣和德气以化民心，正表仪以率群下，故能使民比屋可封，尧、舜是也。其次躬道德而敦慈爱，美教训而崇礼让，故能使民无争心而致刑错，文、武是也。其次明好恶而显法禁，平赏罚而无阿私，故能使民辟奸邪而趋公正，理弱乱以致治强，中兴是也。治天下，身处汗而放情，怠民事而急酒乐，近顽童而远贤才，亲谄谀而疏正直，重赋税以赏无功，妄加喜怒以伤无辜，故能乱其政以败其民，弊其身以丧其国者，幽、厉是也。

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我则改之。”《诗》美“宜鉴于殷，自求多福”。是故世主诚能使六合之内，举世之人，咸怀方厚之情，而无浅薄之恶，各奉公正之心，而无奸险之虑，则羲、农之俗，复见于兹，麟龙鸾凤，复畜于郊矣。

【译文】

君主的政治，没有比原则再大了，没有比仁德再盛了，没有比教化再美了，没有比变化再神奇了。原则可以操持它，仁德可以包容它，教化可以主持它，变化可以达到

它。百姓有性情，有情欲，有变化，有习惯。情性之事，是思想，是根本。变化习惯的事，是行动，是末。末事产生于根本，行动起源于思想。上代君主治理当世，首先考虑的是根本，然后才是末事，顺从其心理，顺从其行动。心情如果端正，而邪恶的行为就不能发生，邪恶的思想就不能掩饰。

变化民心，就像改变人的身体一样。有益于人民的政治措施施于百姓，就多有通达、美好、坚强、长寿的事；凶险的政治措施施于百姓，就多有腰曲背隆、胸突向仰、短命死亡、疾疫。所以《尚书》赞美“年老善终”，而厌恶“不幸短命夭折”。国家有伤于清明的政治，而百姓的眼睛就会因病不明；有伤于明智的治理，而百姓多有耳病；有伤于贤明的治理，而贤人就多意外夭折。人的形体骨干是坚强的，但也随着政治的变易而变移，又何况心气精微而不可涵养呢？《诗》说：“茅草聚生于路旁，别放牛羊来踩伤，它刚出土形成苇草，叶子嫩绿才长成。”又说：“老鹰飞翔于天空，游鱼跳跃在深渊。快乐平易的君子，为什么不培育人才？”公刘有宽厚的仁德，恩惠泽及草木，牛羊六畜，尚且还感激他的仁德，仁爱，不忍践踏生草，而又何况对于民众而没有转化的人呢？君子修养他的快乐平易的仁德，上至飞鸟，下至深渊中的游鱼，无不欢欣喜悦，而又何况对士民和百姓而没有仁德的人呢？

圣人深知这些道理，都务必端正自己，用以作为表率，申明礼仪用以作为教化，谐和仁德阴阳二气于人没有出生之前，端正表率礼仪于婴儿啼哭之后。人的怀胎，是汇聚中和而成的；人的出生，要树立端平正直用来成长。所以有仁义的心思，廉耻的志向，骨附着血脉而通，与身体共长，而没有污浊之气，没有邪恶淫乱的欲望。虽然放在最荒远的地方以外，置之于昏暗之内，最终没有违背礼仪的行动，投放在危亡之地，进入锋利的剑刃之间，始终没有苟活的思想。全世之人，行为都是这样，而又为什

么会有邪乱之民而加罪呢？上天所欲做的事，没声音没有味，只要效法文王，万邦对你会信任。这是姬氏所以崇尚美德于前，而致使刑法搁置不用的原因。

因此上古圣人的事务不是治理民事而是治理民心，所以说：“审理诉讼，我和别人差不多。一定要使诉讼的事情完全消灭才好！”用道德来诱导他们，用礼教来整顿他们，务必宽厚他的性情而让他明白其中的道理，百姓互相亲爱就没互相伤害的心意，行动时要思考道义就没有奸邪之心。如果能这样，不是法律所能驱使的。不是严刑所能强迫的，这是教化所达到的结果。圣人很尊重仁德礼仪而鄙视刑罚，所以舜先命令契以敬施五常之教，而后命令皋陶使用五刑三次迁居。因此凡是立法的人，不是用来探察百姓的短处而诛杀有过错的人，是用来防范邪恶而拯救祸乱，检举奸邪而归于正道罢了。

《诗》说：“百姓遵守常道，都爱好美德。”因此百姓有心，就像种子有了种植的园地。遇到阴阳二气谐和就茂盛而结成果实，遇到水旱灾害就枯萎而生虫害。百姓承受美好的教化，而百姓就有士君子之心；百姓遭受恶政，而人就怀有邪乱的思虑。所以美好的教化能养育天下的百姓，就像好的工人能做出曲豆豉一样。举事动作按时，寒温得适宜，而一荫室的曲豆豉可以尽美而且量多。如遇到笨拙的工人，而一荫室的曲豆豉都会发臭败坏而被抛弃。如今天地四方就和一个荫室一样，老百姓就像豆豉一样，天地间的运动变化，在于带领的人罢了。遇到善良的官吏就都怀有忠诚信任之心而履行仁义宽厚，遇到邪恶的官吏就都怀奸邪之心而行为浅薄。忠厚的行为积累多了就可以达到太平。奸邪浅薄的行

为积累多了，就导致危亡。所以圣明的帝王，都敦厚德化而轻薄威刑。仁德是因为修养自己的，威刑是因为治理人的。上智与下愚的人很少，而平常的人就很多。平常的生于世上，就像熔化的金子在炉中一样，跟随模具而变化，根据冶炼者意愿所做，方圆薄厚，随意熔铸罢了。

因此世道的善和不善，世俗的厚和薄，关键都在君主身上。上古的圣人谐和仁德和阴阳二气用来感化百姓的心思，以身作则用来要求臣下，因此可使百姓每屋都可封赏，尧、舜就是这样做的。其次是帝王亲身具备道德而宽厚慈爱，美化教导训诲而崇尚以礼相让，所以能使百姓没有争斗之心而致使刑法搁置不用，周文王、周武王就是这样做的。其次是帝王能明示好恶而显扬法律禁令，公平赏罚而不偏私，所以能使百姓避开邪恶而趋向公正，治理衰弱败乱，以达到强盛，这是中兴的君主。君主治理天下，自身处于污秽之中而恣意纵情，怠慢民事而急于荒耽酒乐，亲近顽钝无知之人而疏远贤能有才干的人，亲近谄媚阿谀之人而疏远正直的人，加重赋税用来赏赐给没有功劳的人，胡乱加以喜怒来伤害无辜的人，所以能变乱他的政事用来败坏他的百姓，疲困自己用以丧失他的国家的人，周幽王、周厉王就是这样的人。

孔子说：“几个人一块走路，其中一定有一个可以为我所取法的人。我选取那些优点而学习，看出那些缺点，我就加以改正。”《诗》赞美“应该以殷为借鉴，以求多种福分。”因此君主果真能使天下之内，全世的人，都怀有广厚的情感，而没有一点邪恶的思念，各自奉献公正之心，而没有诈伪狠毒的思虑，而伏羲、神农时的风俗，就可以再现于今天，麟龙鸾凤，再畜养于郊外了。

五德志第三十四

自古在昔,天地开辟。三皇迭制,各树号谥,以纪其世。天命五代,正朔三复。神明感生,爰兴有国。亡于慢以,灭于积恶。神微精以,天命罔极。或皇冯依,或继体育。太皞以前尚矣。迪斯用来,颇可纪录。虽一精思,议而复误。故撰古训,著《五德志》。

世传三皇五帝,多以为伏羲、神农为二皇,其一者或曰燧人,或曰祝融,或曰女娲。其是与非,未可知也。我闻古有天皇、地皇、人皇,以为或及此谓,亦不敢明。凡斯数,其于五经,皆无正文。故略依《易·系》,记伏羲以来,以遗后贤。虽多未必获正,然罕可以浮游博观,共求厥真。

大人迹出雷泽,华胥履之生伏羲。其相曰角,世号太皞。都于陈。其德木,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作八卦,结绳为网以渔。

后嗣帝喾,代颛顼氏。其相戴干,其号高辛。厥质神灵,德行祇肃,迎送日月,顺天之则,能叙三辰以周民。作乐《六英》。世有才子八人:伯翳、仲堪、叙猷、季仲、伯虎、仲雄、叔豹、季狸,忠肃恭懿,宣慈惠和,天下之人谓之八元。

后嗣姜嫄,履大人迹生姬弃。厥相披颀。为尧司徒,又主播种,农植嘉谷。尧遭水灾,万民以济。故舜命曰后稷。初,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植百谷,故立以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之兴也,以弃代之,至今祀之。

太妊梦长人感己,生文王。厥相四乳。为西伯,兴于岐。断虞、芮之讼而始受命。武王骍齿,胜殷遏刘,成周道。姬之别封众多,管、蔡、成、霍、鲁、卫、毛、聃、郇、雍、曹、滕、毕、原、酆、郇,文之昭也。邰、晋、应、韩,武之穆也。凡、蒋、邢、茆、祚、祭,周公之胤也。周、召、虢、吴、随、邠、方、印、息、潘、养、滑、镐、宫、密、荣、丹、郭、杨、逢、管、唐、韩、杨、觚、栾、甘、鳞虞、王氏,皆姬姓也。

有神龙首出常羊,感任姒,生赤帝魁

隗。身号炎帝,世号神农,代伏羲氏。其德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是始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耨。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后嗣庆都,与龙合婚,生伊尧。代高辛氏。其眉八彩。世号唐。作乐《大章》。始禅位。武王克殷,而封其胄于铸。

含始吞赤珠,刻曰“玉英生汉”,龙感女媧,刘季兴。

犬电绕枢照野,感符宝,生黄帝轩辕。代炎帝氏。其相龙颜,其德土行。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作乐《咸池》。是始制衣裳。

后嗣握登,见大虹,意感生重华虞舜。其目重瞳。事尧,尧乃禅位,曰:“格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厥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乃受终于文祖。世号有虞。作乐《九韶》。禅位于禹。武王克殷,而封胡公妫满于陈,庸以元女大姬。

大星如虹,下流华渚,女节梦接,生白帝摯青阳。世号少皞。代皇帝氏,都于曲阜。其德金行。其立也,凤皇适至,故纪于鸟。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祝鸠氏司徒也,雉鸠氏司马也,尸鸠氏司空也,爽鸠氏司寇也,鹁鸠氏司事也。五鸠,鸠民者也。五雉为五工正,利器用,夷民者也。是始作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有才子四人,曰重、曰该、曰修、曰熙,实能金木及水,故重为勾芒,该为蓐收,修及熙为玄冥。恪恭厥业,世不失职,遂济穷桑。

后嗣修纪,见流星,意感生白帝文命戎禹。其耳参漏。为尧司空,主平水土,命山川,画九州,制九贡。功成,赐玄珪,以告勋于天。舜乃禅位,命如尧诏,禹乃即位。作乐《大夏》。世号夏后。

传嗣子启。启子太康、仲康更立。兄弟五人,皆有昏德,不堪帝事,降须洛汭,是谓五观。

孙相嗣位,夏道浸衰。于是后羿自鉏

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灭桀。妃后缙方娠,逃出自窦,奔于有仍,生少康焉。为仍牧正。

羿恃己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兽;弃武罗、伯因、熊髡、龙圉,而用寒浞。浞,柏明氏谗子弟也。柏明氏恶而弃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为己相。浞行媚于内,施赂于外,愚弄于民,虞羿于田,树之诈匿,以取其国家,外内咸服。羿犹不悛,将归自田,家众杀而烹之,以食其子。子不忍食诸,死于穷门。

靡奔于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浇及豷,恃其谗慝诈伪,而不德于民,使浇用师,灭斟灌及斟寻氏,处豷于过,处浇于戈,使椒求少康。逃奔有虞,为之胞正。虞思妻以二妃,而邑诸纶,有田一成,有众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谋,以收夏众,抚其官职。靡自有鬲收二国之烬,以灭浞,而立少康焉。乃使女艾诱浇,使后杼诱豷,遂灭过、戈,复禹之绩,祀夏配天,不失旧物。十有七世而桀亡天下。

武王克殷,而封其后于杞,或封于缙。又封少皞之胄于祁。

浇才力盖众,骤其勇武而卒以亡。故南宫括曰:“羿善射,浇荡舟,俱不得其死也。”

姒姓分氏,夏后、有扈、有南、斟寻、汭、辛、褒、费、戈、冥、缙,皆禹后也。

摇光如月正白,感女枢幽防之宫,生黑帝颛顼。其相骀干。身号高阳,共号共工。代少皞氏。其德水行,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承少皞衰,九黎乱德,乃命重黎讨训服。历象日月,东西南北。作乐《五英》。有才子八人,苍舒、隤凯、檮杌、大临、龙降、庭坚、仲容、叔达,齐圣广渊,明允笃诚,天下之人谓之八凯。共工氏有子曰勾龙,能平九土,故号后土,死而为社,天下祀之。

娥简吞燕卵生子契,为尧司徒,职亲百姓,顺五品。

扶都见白气贯月,意感生黑帝子履,其相二肘。身号汤,世号殷。致太平。

后衰,乃生武丁。即位,默以不言,思道三年,而梦获贤人以为师。乃使以梦像求之四方侧陋,得傅说,方以胥靡筑于傅岩。升以为大公,而使朝夕规谏。恐其有懈怠也,则敕曰:“若金,用汝作砺;若济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时大旱,用汝作霖雨。启乃心,沃朕心。若药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视地,厥足用伤。尔交修余,无弃!”故能中兴,称号高宗。及帝辛而亡,天下谓之纣。

武王封微子于宋,封箕子于朝鲜。

子姓分氏,殷、时、来、宋、扈、萧、空同、北段,皆汤后也。

【译文】

从古代观察过去,从开天辟地以来。三皇更迭制度,各自建立谥号,用以记载世代。天命五代圣王,正朔再三改变。神明感应产生人类,于是兴起国家。灭亡于轻侮,灭亡于积恶太深。神灵精妙细微,天命没有极限。有的凭依皇天,有的继承其位。太皞以前太远了。由此以来,大致可以记录。虽然专一精思,议论还会有错误。因此撰写古训,著成《五德志》。

后世传说的三皇五帝,大多认为伏羲、神农为二皇,而其他的一皇有的说是燧人,有的说是祝融,有的说是女娲。它的是与非,不可得知。我听说古时候有天皇、地皇、人皇,认为或者涉及这种称谓,也不敢明确。凡此数皇,它在五经之中,都没有正式文字记载。所以简略的依据《周易·系辞》,记载伏羲以来的事迹,以遗给后来的贤人。虽然很多未必获得正确,然而很少可以供漫游博览,共同求其真实。

大人的足迹出自雷泽,华胥踩上它而生伏羲。伏羲的相貌额骨中央部分隆起,世号太昊。建都于陈。以木德而王,用龙记事,所以设置各部门长官都用龙来命名。曾制作八卦,结绳而织成网,用以捕取鱼类。

他的后来的继承人帝誉,取代颡顼而称王。他的相貌头方如斗,他的号叫高辛。高辛氏生来就资质神灵,他的德行广大敬肃,迎送日月,顺从天的原则,能记述星辰以亲和百姓。制作音乐叫《六英》。他一生有才子八人:伯奋、仲堪、叙猷、季仲、伯虎、仲雄、叔豹、季狸,他们忠诚、庄重、恭敬、纯美、通达、慈祥、仁爱、谦和,天下的人称赞他们是八元。

他的后来继承人姜嫄,践踏了大人的足迹而生姬弃。他的相貌是头骨隆起分出。曾做尧的司徒,又主持播种,劝勉繁殖茁壮的庄稼。尧时遭受水灾,老百姓得以救济。所以舜命名他叫后稷。当初,烈山氏据有天下,他的儿子叫柱,能繁殖谷物,因此被立为稷,从夏朝以上就祭祀他。周朝的兴起,就以弃代替柱,至今仍然祭祀后稷。

太妊梦见长人与自己感应相通,生下周文王。他的长相有四乳。做西伯的官,兴起于岐山。因决断虞国、芮国的诉讼而开始接受西伯的任命。周武王刚强,战胜殷朝铲除强暴,成就周朝的道义,姬姓别的分封很多,管、蔡、郕、霍、鲁、卫、毛、聃、郕、雍、曹、滕、毕、原、酆、郇,称文王为昭。邰、晋、应、韩,称武王为穆。凡是蒋、邢、茅、胙、祭,都是周公的后代。周、召、虢、吴、随、邠、方、印、息、潘、养、滑、镐、宫、密、荣、丹、郭、阳、逢、管、唐、韩、杨、狐、栾、甘、鲜虞、王氏,都是姬姓。

有神龙头出自常羊,感交于任姒,生下赤帝魁隗。自号炎帝,世号神农,取代伏羲氏。他用火记事,所以设置各部门长官都用火字命名。开始砍削木头作为耜,髹曲木头作为耒耨。中午时开市贸易,招来天下百姓,聚集天下货物,互相交易后就散去,各自得到所需要的东西。

神农氏的后代庆都,与龙结婚,生下伊尧。取代高辛氏。他的眉毛呈八字形。因封唐天下称叫他陶唐氏。制作有乐曲叫《大章》。开始让位于虞。周武王灭掉商

朝,而封他的后裔于铸。

含始吞下红色的珠子,上面刻有“玉英生汉”的字样,刘邦的母亲媪与龙感交,刘氏兴起。

大雷电缠绕户枢照亮野外,感交于符宝,生下黄帝轩辕。取代炎帝氏。他的相貌像龙颜,因为火生土,他是土德。用云记事,所以设置各部门长官都用云字命名。制作音乐叫《咸池》。从此才开始制做衣裳。

黄帝的后代握登,看见大虹,意想所感应而生下重华虞舜。他的眼睛中有两个瞳子。服事于尧,尧就让位,说:“来你这位舜!上天的大命已经落到你的身上了。诚实地保持着正确,假如天下的百姓都陷于困苦贫穷,上天给你的禄位也会永远终止。”就死于尧的祖庙。天下称号他为有虞。制作音乐叫《九韶》。让位于禹。周武王克灭商朝,而封胡公妣满于陈,把他的女儿大姬许配给胡公。

有一颗大的星星像虹一样,向下流于华渚,女节做梦接住了它,生下白帝摯青阳。天下称号他是少皞。取代皇帝氏,建都于曲阜。以金为德。他即位的时候,凤鸟恰好到来,所以就用鸟开始记事。凤鸟氏就是掌管天文历法的官,玄鸟氏是掌管春分秋分的官,伯赵氏是掌管夏至冬至的官,青鸟氏是掌管立春立夏的官,丹鸟氏是掌管立秋立冬的官。祝鸠氏是主管教导民众的司徒,鵲鸠氏是主管法制的司马,鵯鸠氏是主管水利土地的司空,爽鸠氏是主管平定盗贼的司寇,鹁鸠氏是主管农事的司事。这五鸠,是鸠聚百姓的。这五雉是五种管理手工业的官,改善器物用具,统一尺度容量,让百姓得到平均的。是时开始制作文字,百官利用文字处理政务,百姓通过文字了解往事。他有才能的儿子四人,叫重、叫该、叫修、叫熙,能够管理金木和水,派重做句芒,该做蓐收,修和熙做玄冥。恭敬各自的职业,世代不失职守。帮助少皞氏成功。

少皞氏的后代修己,看见流星,意有感交而生白帝文命戎禹。他的耳朵有三个孔隙。做尧的司空官,主管平定水土的事务,命名山川划分九州,制定九种土贡的制度。这些事情成功以后,舜赏赐给他黑色的玉符节,把他的功勋告诉给天。舜就让位于禹,诏命和尧的诏命一样,禹于是即天子之位。制作乐章叫《大夏》。天下称他为夏后。

禹传位给他的嫡长子启。启的儿子太康、仲康相互更迭继位。他们兄弟五人,都有昏愤的德行,不能胜任帝王的事务,降低停留于洛汭,因此称为五观。

启的孙子相继承帝位,夏朝从此逐渐衰败。于是后羿从鉅地迁徙到穷石,依靠夏朝的百姓而取得了夏朝政权,杀了夏朝的君主相。夏后相的妻子后缙正怀孕,从墙洞里逃出去,逃回她的娘家有仍国,在那里生下少康。少康长大后在有仍国做管理畜牧的官。

后羿依仗着自己善射的技术,不重视治理百姓的事,而沉溺于打猎,他抛弃了武罗、伯因、熊髡、龙圉等贤臣,而重用寒浞。寒浞,是伯明氏的善进谗言的子弟。寒国国君伯明氏丢弃了他。后羿收留了他,信任并加以使用他,作为自己的辅佐。寒浞对内取媚于后羿的宫妾,对外广施财物给后羿的左右大臣,愚弄百姓,而使后羿沉溺于打猎,扶植奸诈邪恶势力,来夺取后羿的国家,外部和内部都顺服。后羿还是不改,将从打猎的地方回朝,被寒浞收买的家众把他杀死并烹煮了他,让他的儿子吃。后羿的儿子不忍心吃,又把他的儿子杀死在穷国的城门口。

靡逃到有鬲氏。寒浞占有了后羿的家室和妻妾,生下浇和豷,他仗着邪恶伪诈,对百姓不施恩德,派浇率领军队,灭掉斟灌和斟寻氏,让尧住在过地,让豷住在戈地,派椒索求少康。少康逃奔到有虞氏,做了有虞氏掌管膳食的官。有虞氏的国君虞思把两个女儿嫁给少康为妻,把少康封到纶

邑,给他十里方圆的地方,有五百人的兵力,能布施恩惠给百姓,并开始谋划恢复国家的大事,用来收罗夏朝的旧人,按夏朝的官制分派给他们官职。靡从有鬲氏那里收集两国的遗民,来灭掉寒浞,而立少康为帝。少康派遣女艾去侦察浇的动态,派季杼去诱骗浇的弟弟豷,于是灭掉浇的有过国和豷的戈国,恢复了夏禹的事业,少康祭祀夏朝的祖先和天帝,没有失掉夏朝的天下。经过十七世到夏桀时而夏朝灭亡。

周武王灭掉商朝以后,而分封商朝的后代于杞地,有的分封到缙地。又分封少皞的后代于郟地。

浇的才能和力量都超过众人,屡次显露他的勇武而终于灭亡。所以南宮括说:“羿擅长射箭,浇擅长水战,都没有得到好死。”

姒姓的分支,有夏后氏、有扈氏、有南氏、斟寻氏、泊瀼氏、辛氏、褒氏、费氏、戈氏、冥氏、缙氏,都是夏禹的后代。

摇光星和月亮一样纯白,感交女枢幽防的宫室,生下黑帝颛顼。他的相貌躯干并齐。自号高阳,天下称他为共工。取代少皞氏,因为金生水,故称水德,用水记事。所以设置各部门长官都用水命名。顺承少皞氏的衰弱,九黎族变乱仁德,就命令重黎讨伐不顺服的人。推算日月的运行,东西南北,日月所照到的地方,无不磨厉奋发。制作乐章《五英》。生有才能的人八人,苍舒、隤凯、檮杌、大临、龙降、庭坚、仲容、叔达,他们忠正、通达、宽宏、深远、明达、守信、厚道、诚实,天下的百姓称他们为八凯。共工氏生有儿子叫句龙,能平定九州,所以号称后土,死了以后成为土地神,天下的百姓都祭祀他。

简狄吞下燕子的卵以后生下契,做尧管理民户土地的司徒官,他忠于职守亲和百姓,顺从五常。

扶都看见白气贯穿着月亮,心意感交生下黑帝的儿子履,他的相貌是有两个臂肘。自己称号为汤,天下号为殷。能达

到太平。

后来商朝衰弱,才生下武丁。武丁即位后,默默不言,思考治理的方法长达三年,而做梦得到贤良的人用以为师,就派人按梦中的图像索求于四面八方隐蔽之处,得到传说,正以奴隶建筑在傅岩。提升他为大公,而使朝夕用忠正之言相劝诫。恐怕他有惧怕懈怠的心理,就命令他说:“如果是金子,就用你做磨砺的石头;如果是要渡过大河,就用你做船和桨;如果天时大旱,就用你做霖雨。开启你的心思,浇灌我

的心田。如果药不能治瞑眩愤乱之症,其病就不会痊愈;如果赤着脚不看地,脚就会受伤。你教导修正于我,不要抛弃我!”所以武丁能达到中兴商朝的目的,号称高宗。到了帝辛时候商朝就灭亡了,天下称他是殷纣王。

周武王分封商朝的微子于宋,分封箕子于朝鲜。

子姓的分支,有殷氏、时氏、来氏、宋氏、扈氏、萧氏、空同氏、北段氏,都是商汤的后代。

潜夫论第九卷

志氏姓第三十五

昔者圣王现象于乾坤 ,考度于神明 ,探命历之去就 ,省群臣之德业 ,而赐性命氏 ,因彰德功。传说民之彻官百 ,王公之子弟千世能听其官者 ,而物赐之姓 ,是谓百姓。姓有彻品十 ,于王谓之千品。昔尧赐契姓子 ,赐弃姓姬 ,赐禹姓姒 ,氏曰有夏 ,伯夷为姜 ,氏曰有吕。下及三代 ,官有世功 ,则有官族 ,邑亦如之。后世微末 ,因是以为姓 ,则不能改也 ,故或传本姓 ,或氏号邑谥 ,或氏于国 ,或氏于爵 ,或氏于官 ,或氏于字 ,或氏于事 ,或氏于居 ,或氏于志。若夫五帝三王之世 ,所谓号也 ;文、武、昭、景、成、宣、戴、桓 ,所谓谥也 ;齐、鲁、吴、楚、秦、晋、燕、赵 ,所谓国也 ;王氏、侯氏、王孙、公孙 ,所谓爵也 ;司马、司徒、中行、下军 ,所谓官也 ;伯有、孟孙、子服、权子 ,所谓字也 ;巫氏、匠氏、陶氏 ,所谓事也 ;东门、西门、南宫、东郭、北郭 ,所谓居也 ;三乌、五鹿、青牛、白马 ,所谓志也 ;凡厥姓氏 ,皆出属而不可胜纪也。

卫侯灭邢 ,昭公娶同姓 ,言皆同祖也。近古以来 ,则不必然。古之赐姓 ,大谛可用 ,其余则难。周室衰微 ,吴、楚僭号 ,下历七国 ,咸各称王。故王氏、王孙氏、公孙氏及氏谥官 ,国自有之 ,千八百国 ,谥官万数 ,故元不可同也。及孙氏者 ,或王孙之班也 ,或诸孙之班也 ,故有同祖而异姓 ,有同姓而异祖。亦有杂厝 ,变而相入 ,或以母姓 ,或避怨仇。夫吹律定姓 ,惟圣能之。今民散久 ,鲜克达音律。天主尊正其祖。故且略纪显者 ,以待士合揖损焉。

伏羲姓风 ,其后封任、宿、须胸、颛臾四

国 ,实司大皞与有济之祀 ,且为东蒙主。鲁僖公母成风 ,盖须胸之女也。季氏欲伐颛臾 ,而孔子讥之。

炎帝苗胄 ,四岳伯夷 ,为尧典礼 ,折民惟刑 ,以封申、吕。裔生尚 ,为文王师 ,克殷而封之齐 ,或封许、向 ,或封于纪 ,或封于申。申城在南阳宛北序山之下 ,故《诗》云 :“ 亶亶申伯 ,王荐之事 ,于邑于序 ,南国为式。”宛西三十里有吕城。许在颍川 ,今许县是也。姜戎居伊、洛之间 ,晋惠公徙置陆浑。州、薄、甘、戏、露、怡 ,及齐之国氏、高氏、襄氏、隰氏、士强氏、东郭氏、雍门氏、子雅氏、子尾氏、子襄氏、子渊氏、子乾氏、公旗氏、翰公氏、贺氏、卢氏 ,皆姜姓也。

黄帝之子二十五人 ,班为十二 :姬、酉、祁、己、滕、葳、任、拘、厘、姁、嫫、衣氏也。当春秋 ,晋有祁奚 ,举子荐仇 ,以忠直著。莒子姓己氏。夏之兴 ,有任奚为夏车正 ,以封于薛 ,后迁于邳 ,其嗣仲虺居薛 ,为汤左相。王季之妃大任 ,及谢、章、昌、采、祝、结、泉、卑、遇、狂大氏 ,皆任姓也。姁氏女为后稷元妃 ,繁育周先。姁氏封于燕 ,有贱妾燕姁 ,梦神与之兰曰 :“ 余为伯儵 ,余尔祖也。是以有国香 ,人服媚。”及文公见姁 ,赐兰而御之。姁言其梦 ,且曰 :“ 妾不才 ,幸而有子 ,将不信 ,敢征兰乎 ?”公曰 :“ 诺。”遂生穆公。姁氏之别 ,有阚、尹、蔡、光、鲁、雍、断、密须氏。及汉 ,河东有郅都 ,汝南有郅君章 ,姓音与古姁同 ,而书其字异 ,二人皆著名当世。

少皞氏之世衰 ,而九黎乱德 ,颛顼受之 ,及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 ,命火正黎司地

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夫黎、颛、项氏裔子吴回也。为高辛氏火正,淳耀天明地德,光四海也,故名祝融。后三苗复九黎之德,尧继重、黎之后不忘旧者,羲伯复治之。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别其分主,以历三代,而封于程。其在周世,为宣王大司马《诗》美“王谓尹氏,命程伯休父”。其后失守,适晋为司马,迁自谓其后。

祝融之孙,分为八姓:己、秃、彭、姜、妘、曹、斯、半。己姓之嗣颺叔安,其裔子曰董父,实其好龙,能求其嗜欲以饮食之,龙多归焉。乃学扰龙,以事帝舜。赐姓曰董,氏曰蒙龙,封诸腰川。腰夷、彭姓豕韦,皆能驯龙者也。蒙龙逢以忠谏,桀杀之。凡因祝融之子孙,己姓之班,昆吾、籍、扈、温、董。

秃姓腰夷、蒙龙,则夏灭之。彭姓彭祖、豕韦、诸稽,则商灭之。姜姓会人,则周灭之。

妘姓之后封于郾、会、路、逼阳。郾取仲任为妻,贪冒爱恠,蔑贤简能,是用亡邦。会在河、伊之间,其君骄奢啻俭,减爵损禄,群臣卑让,上下不临。诗人忧之,故作《羔裘》,闵其痛悼也;《匪风》,冀君先教也。会仲不悟,重氏伐之,上下不能相使,禁罚不行,遂以见亡。路子婴儿,娶晋成公姊为夫人,酆舒为政而虐之。晋伯宗怒,遂伐灭路。荀谿武子伐灭逼阳。曹姓封于邾,邾颜子之支,别为小邾,皆楚灭之。

半姓之裔熊严,成王封之于楚,是谓粥熊,又号粥子。生四人,伯霜、仲雪、叔熊、季紃。紃嗣为荆子,或封于夔,或封于越。夔子不祀祝融、粥熊,楚伐灭之。公族有楚季氏、列宗氏、斗强氏、良臣氏、耆氏、门氏、侯氏、季融氏、仲熊氏、子季氏、阳氏、无钩氏、蔦氏、善氏、阳氏、昭氏、景氏、严氏、婴齐氏、来氏、来纆氏、即氏、申氏、讵氏、沈氏、贺氏、咸氏、吉白氏、伍氏、沈瀛氏、余推氏、公建氏、子南氏、子庚氏、子午氏、子西氏、王孙、田公氏、舒坚氏、鲁阳氏、黑肱氏、皆

半姓也。

楚季者,王子敖之曾孙也。蚩冒生蔦章者,王子无钩也。令尹孙叔敖者,蔦章之子也。左司马戍者,庄王之曾孙也。叶公诸梁者,戍之第三弟也。楚大夫申无畏者,又氏文氏。

初,纣有苏氏以妣己女而亡殷。周武王时,有苏忿生为司寇而封温。其后洛邑有苏秦。

高阳氏之世有才子八人,苍舒、隤凯、擣戴、大临、龙降、庭坚、仲容、叔达,天下之人谓之八凯。

后嗣有皋陶,事舜。舜曰:“皋陶!蛮夷滑夏,寇贼奸宄,女作士。”其子伯翳,能议百姓以佐舜、禹,扰驯鸟兽,舜赐姓嬴。

后有仲衍,鸟体人言,为夏帝大戊御。嗣及费仲,生恶来、季胜。武王伐纣,并杀来。

季胜之后有造父,以善御事周穆王。穆王游西海忘归,于是徐偃作乱,造父御,一日千里,以征之。王封造父于赵城,因以为氏。其后失守,至于赵夙,仕晋卿大夫,十一世而为列侯,五世而为武灵王,五世亡赵。恭叔氏、邯郸氏、訾辱氏、婴齐氏、楼季氏、卢氏、原氏,皆赵嬴姓也。

恶来后有非子,以善畜,周孝王封之于秦,世地理以为西陲大夫,汧秦亭是也。其后列于诸侯,□世而称王,六世而始皇生于邯郸,故曰赵政。及梁、葛、江、黄、徐、莒、蓼、六、英、皆皋陶之后也。钟离、运掩、菟裘、寻梁、修鱼、白置、飞廉、密如、东灌、良、时、白、巴、公巴公巴、剡、复、蒲,皆嬴姓也。

帝尧之后为陶唐氏。后有刘累,能畜龙,孔甲赐姓为御龙,以更豕韦之后。至周为唐杜氏。周衰,有隰叔子违周难于晋国,生子舆,为李,以正于朝,朝无闲官,故氏为士氏,为司空,以正于国,国无败绩,故氏司空,食采随,故氏随氏。士蔦之孙会,佐文、襄,于诸侯无恶,为卿,以辅成、景,军无败政,为成率,居傅,端刑法,集训典,国无奸民,晋国之盗逃奔于秦。于是晋侯为请冕

服于王,王命随会为卿,是以受范,卒谥武子。武子文,成晋、荆之盟,降兄弟之国,使无间隙,是以受郇、栎。由此帝尧之后,有陶唐氏、刘氏、御龙氏、唐杜氏、隰氏、士氏、季氏、司空氏、随氏、范氏、郇氏、栎氏、彘氏、冀氏、穀氏、蕃氏、扰氏、狸氏、傅氏。楚令尹建尝问范武子之德于文子,文子对曰:“夫子之家事治,言于晋国,竭情无私,其祝史陈信不愧,其家事无猜,其祝史不祈。”建归,以告,康王曰:“神人无怨,宣夫子之股肱五君,以为诸侯主也。”故刘氏自唐以下汉以上,德著于世,莫若范会之最盛也。斯亦有修己以安人之功矣。武王克殷,而封帝尧之后于铸也。

帝舜姓虞,又为姚,居妫。武王克殷,而封妫满于陈,是为胡公。陈袁氏、咸氏、鬬氏、庆氏、夏氏、宗氏、来氏、仪氏、司徒氏、司城氏,皆妫姓也。

厉公孺子完奔齐,桓公说之,以为工正。其子孙大得民心,遂夺君而自立,是谓威王,五世而亡。齐人谓陈田矣。汉高祖徙诸田关中,而有第一至第八氏。丞相田千秋、司直田仁,及杜阳田先、碭田先,皆陈后也。武帝赐千秋乘小车入殿,故世谓之车丞相。及莽自谓本田安之后,以王家故更氏。莽之行诈,实以田常之风。敬仲之支,有皮氏、占氏、沮氏、与氏、猷氏、子氏、鞅氏、梧氏、坊氏、高氏、芒氏、禽氏。

帝乙元子微子开,纣之庶兄也。武王封之于宋,今之睢阳是也。宋孔氏、祝其氏、韩献氏、季老男氏、巨辰、经氏、事父氏、皇甫氏、华氏、鱼氏、而董氏、艾、岁氏、鸠夷氏、中野氏、越椒氏、完氏、怀氏、不第氏、冀氏、牛氏、司城氏、冈氏、近氏、止氏、朝氏、勃氏、右归氏、三伋氏、王夫氏、宜氏、征氏、郑氏、目夷氏、鳞氏、臧氏、虺氏、沙氏、黑氏、圉龟氏、既氏、据氏、砖氏、己氏、成氏、边氏、戎氏、买氏、尾氏、桓氏、戴氏、向氏、司马氏,皆子姓也。

闵公子弗父何生宋父,宋父生世子,世子生正考父,正考父生孔父嘉,孔父嘉生子

木金父,木金父降为士,故曰灭于宋。金父生祁父,祁父生防叔,防叔为华氏所逼,出奔鲁,为防大夫,故曰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为鄆大夫,故曰鄆叔纥,生孔子。

周灵王之太子晋,幼有成德,聪明博达,温恭敦敏。谷洛水斗,将毁王宫,王欲壅之。太子晋谏,以为不顺天心,不若修政。晋平公使叔誉聘于周,见太子,与之言,五称而三穷,逡巡而退,归告平公曰:“太子晋行年十五,而誉弗能与言,君请事之。平公遣师旷见太子晋。太子晋与语,师旷服德,深相结也。乃问旷曰:“吾闻太师能知人年之长短。”师旷对曰:“女色赤白,女声清汗,火色不寿。”晋曰:“然。吾后三年将上宾于帝,女慎无言,殃将及女。”其后三年而太子死。孔子闻之曰:“惜夫!杀吾君也。”世人以其豫自知去期,故传称王子乔仙。仙之后,其嗣避周难于晋,家于平阳,因氏王氏。其后子孙世喜养性神仙之术。

鲁之公族,有螭氏、后氏、众氏、臧氏、施氏、孟氏、仲孙氏、服氏、公山氏、南宫氏、叔孙氏、叔仲氏、子我氏、子士氏、季氏、公鉏氏、公巫氏、公之氏、子干氏、华氏、子言氏、子驹氏、子雅氏、子阳氏、东门氏、公析氏、公石氏、叔氏、子家氏、荣氏、展氏、乙氏,皆鲁姬姓也。

卫之公族,石氏、世叔氏、孙氏、宁氏、子齐氏、司徒氏、公文氏、析龟氏、公叔氏、公南氏、公上氏、公孟氏、将军氏、子强氏、强梁氏、卷氏、会氏雅氏、孔氏、赵阳氏、田章氏、孤氏、王孙氏、史龟氏、羌氏、羌宪氏、邃氏,皆卫姬姓也。

晋之公族郤氏,又班为吕,郤芮又从邑氏为冀,后有吕錡,号驹伯。郤犇食采于苦,号苦成叔,郤至食采于温,号曰温季,各以为氏。却氏之班,有州氏、祁氏。伯宗以直见杀,其子州犁奔楚,又以郤宛直而和,故为子常所妬,受诛。其子□奔吴为太宰,怨祖祢之行仍正直遇祸也,乃为谄谀而亡

吴。凡郤氏之班,有冀氏、吕氏、苦成氏、温氏、伯氏、靖侯之孙栾宾,及富氏、游氏、贾氏、狐氏、羊舌氏、季夙氏、籍氏,及襄公之子孙□,皆晋姬姓也。

晋穆侯生桓叔,桓叔生韩万,传晋大夫,十世而为韩武侯,五世为韩惠王,五世而亡国。襄王之孽孙信,俗人谓之韩信都。高祖以信为韩王孙,以信为韩王,后徙王代,为匈奴所攻,自降之。汉遣柴将军击之,斩信于参合,信妻子亡入匈奴中。至景帝,信子颓当及孙赤来降,汉封颓当为弓高侯,赤为襄城侯。及韩嫣,武帝时为侍中,贵幸无比。案道侯韩说,前将军韩曾,皆显于汉。子孙各随时帝分阳陵、茂陵、杜陵。及汉阳、金城诸韩,皆其后也。信子孙余留匈奴中者,亦常在权宠,为贵臣。及留侯张良,韩公族姬姓也。秦始皇灭韩,良弟死不葬,良散家资千万,为韩报仇,击始皇于博浪沙中,误椎副车。秦索贼急,良乃变姓为张,匿于下邳,遇神人黄石公,遗之兵法。及沛公之起也,良往属焉。沛公使与韩信略定韩地,立横阳君城为韩王,而拜良为韩信都。信都者,司徒也。俗前音不正,曰信都,或曰申徒,或胜屠,然其本共一司徒耳。后作传者不知“信都”何因,强妄生意,以为此乃代王为信都也。凡桓叔之后,有韩氏、言氏、婴氏、祸余氏、公族氏、张氏,此皆韩后姬姓也。昔周宣王亦有韩侯,其国也近燕,故《诗》云:“普彼韩城,燕师所完。”其后韩西亦姓韩,为魏满所伐,迁居海中。

毕公高与周同姓,封于毕,因为氏。周公之薨也,高继职焉。其后子孙失守,为庶世。及毕万佐晋献公,十六年使赵夙御戎,毕万为右,以灭耿灭魏封万,今之河北县是也。魏颗又氏令狐。自万后九世为魏文侯。文侯孙砮为魏惠王,五世而亡。毕阳之孙豫让,事智伯,智伯国士待之,豫让亦以见知之恩报智伯,天下纪其义。魏氏、令狐氏、不雨氏、叶大夫氏、伯夏氏、魏强氏、豫氏,皆毕氏本姬姓也。

周厉王之子友封于郑。郑恭叔之后,

为公文氏。轩氏、驷氏、丰氏、游氏、国氏、然氏、孔氏、羽氏、良氏、大季氏。十族之祖,穆公之子也,各以字为姓。及伯有氏、马师氏、褚师氏,皆郑姬姓也。

太伯君吴,端垂衣裳,以治周礼。仲雍嗣立,断发文身,裸以为饰。武王克殷,分封其后于吴,令大赐北吴。季札居延州来,故氏延陵季子。阖闾之弟夫概王奔楚堂谿,因以为氏。此皆姬姓也。

郑大夫有冯简子。后韩有冯亭,为上党守,嫁祸于赵,以致长平之变。秦有将军冯劫,与李斯俱诛。汉兴,有冯唐,与文帝论将帅。后有冯奉世,上党人也,位至将军,女为元帝昭仪,因家于京师。其孙衍,字敬通,笃学重义,诸儒号之曰“德行雍雍冯敬通”,著书数十篇,孝章皇帝爱重其文。

晋大夫郇息事献公,后世将中军,故氏中行,食采于智。智果谏智伯而不见听,乃别族于太史为辅氏。

晋大夫孙伯□实司典籍,故姓籍氏。辛有二子董之,故姓董氏。

《诗》颂宣王,始有“张仲孝友”,至春秋时,宋有张白蔑矣。惟晋张侯、张老,实为大家。张孟谈相赵襄子以天智伯,遂逃功赏,耕于负山。后魏有张仪、张丑。至汉,张姓滋多。常山王张耳,梁人。丞相张苍,阳武人也。东阳侯张相如。御史大夫张汤,增定律令,以防奸恶,有利于民,又好荐贤达士,故受福□。子安世为车骑将军,封富平侯,敦仁俭约,矜遂权而好阴德,是以子孙昌炽,世有贤胤,更封武始,遭王莽乱,享国不绝,家凡四公,世著忠孝行义。前有丞相张禹,御史大夫张忠,后有太尉张酺,汝南人,太傅张禹,赵国人。司邑间里,无不有张者。河东解邑有张城,有西张城,岂晋张之祖所出邪?

偃姓舒庸、舒鸠、舒龙、舒共、止龙、郈、臧、参、会、六、院、隼、高国,庆姓樊、尹、骆,曼姓邓、优,归姓胡、有、何,蒧姓滑、齐,猗

姓棲、疏、御姓署、香、汤、嵬姓饶、攘、刹、隗姓赤狄、姁姓白狄，此皆大吉之姓。

齐有鲍叔，世为卿大夫。晋有鲍癸。汉有鲍宣，累世忠直，汉名臣。汉酈生为使者，弟商为将军，今高阳诸酈为著姓。昔仲山甫亦姓樊，谥穆仲，封于南阳。南阳者，在今河内。后有樊倾子。曼姓封于邓，后因氏焉。南阳邓县上蔡北有古邓城，新蔡北有古邓城。春秋时，楚文王灭邓。至汉有邓通、邓广。后汉新野邓禹，以佐命元功封高密侯。孙太后□性慈仁严明，约敕诸家莫得权，京师清静，若无贵戚，勤思忧民，昼夜不怠。是以遭羌兵叛，大水饥馑，而能复之，整平丰穰。太后崩后，群奸相参，竟加譖润，破坏邓氏，天下痛之。鲁昭公母家姓归氏。汉有隗嚣季孟。短即戎氏，其先本出黄帝。

及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陶氏、繁氏、骑氏、饥氏、樊氏、荼氏，皆殷氏旧姓也。汉兴，相国萧何封酈侯，本沛人，今长陵萧其后也。前将军萧望之，东海、杜陵萧其后也。御史大夫有繁延寿，南郡襄阳人也，杜陵、新丰繁其后也。

周氏、邵氏、毕氏、荣氏、单氏、尹氏、缁氏、富氏、巩氏、苕氏，此皆周室之世公卿家也。周、召者，周公、召公之庶子，食二公之采，以为王吏，故世有周公、召公不绝也。尹者，本官名也，若宋有太师，楚有令尹、左尹矣。尹吉甫相宣王者大功绩，《诗》云，“尹氏太师，维周之底”，也。单穆公、襄公、顷公、靖公，世有明德，次圣之才，故叔向美之以后必繁昌。

苦城，城名也，在盐池东北。后人书之为“枯”，齐人闻其音，则书之曰“库成”，漱煌见其字，呼之曰“车成”；其在汉阳者，不喜“枯”、“苦”之字，则更书之曰“古成氏”。堂谿，谿谷名也，在汝南西平。禹字子启者，启开之字也。前人书堂谿误作“启”，后人变之，则又作“开”。古漆雕开、公冶长，前人书“雕”从易，滑作“周”，书“治”复误作“蛊”，后人又传作“古”，或复

分为古氏、成氏、堂氏、开氏、公氏、冶氏、漆氏、周氏。此数氏者，皆本同末异。凡姓之离合变分，固多此类，可以一况，难胜载也。

《易》曰：“君子以类族辨物”；“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学以聚之，问以辩之。”故略观世纪，采经书，依国土，及有明文，以赞贤圣之后，班族类之祖，言氏姓之出，序此假意二篇，以贻后贤今之焉也。

【译文】

过去的圣明君王观察景象于天地，思虑推测于神明，探索命运的成功和失败，省察群臣道德业绩，而赐姓命氏，因此表彰他的功德。传说称人民所遵循的官吏上百，王公的子弟的诚实能顺从其官吏的人，用物赐给他姓，这叫做百姓。姓所遵循的等级有十，对王公来说有上千等级。过去尧赐命契姓子，赐命弃姓姬，赐命禹姓姁，氏叫有夏，伯夷为姜姓，氏叫有吕。以下到了夏、商、周三代，累世做官而有功绩，后人就以官名为氏族，封邑也是这样。后代虽然衰微，也因此以为姓，就不能改变了。所以有的传于本姓，有的氏号以封邑为称谓，有的就氏号于他的封国，有的氏号于他的封爵，有的氏号于他的官职，有的氏号于他的字，有的氏号于他所做的事，有的氏号于他所居住的地方，有的氏号于他的职事。就像五帝三王之世，所谓称号，有文、武、昭、景、成、宣、戴、桓，所谓谥号，有齐、鲁、吴、楚、秦、晋、燕、赵，所谓以封国为氏的，有王氏、侯氏、王孙、公孙，所谓以官爵为氏的，有司马、司徒、中行、下军，所谓以官职为氏的，有伯有、孟孙、子服、叔子，所谓以字为氏的，有巫氏、匠氏、陶氏，所谓以事为氏的，有东门、西门、南宫、东郭、北郭，所谓以居住为氏的，有三乌、五鹿、青牛、白马，所谓以志为氏的，凡是姓氏，凡是这些归属而不能胜记。

卫侯毁灭掉邢国，鲁昭公娶同姓吴国女子为妻，说这些都是同祖。近古以来，就

不一定是这样。古代的赐姓,大致可用,其余的就很难了。周室衰弱以后,吴国、楚国僭越周天子的尊号,后来经历七国,都各自称王。所以王氏、王孙氏、公孙氏以及用氏谥官,各国自己都有,共一千八百个国家,所谥的官上万数,本来刚开始时不能相同的。至于孙氏这样的姓,有的是从王孙分出的,有的是从诸孙分出的,因此有同一个祖先而不同姓的,有同一个姓而不是同一个祖宗。也有杂乱没有章法的,由于变化而入于他姓,有的从母姓,有的是为了躲避怨仇而改姓。用吹奏音律来定姓,只有圣人能做到。如今百姓散乱已久,很少能够通晓音律。定姓要尊重纯正他的祖宗。因此暂且记其显著的姓,用来等待参考于别人。

伏羲姓风,他的后代分封于任、宿、须句、颛臾四国,让他掌管太昊和有济氏的祭祀,而且让他主持东蒙山的祭祀。鲁僖公的母亲成风,是须句国的女子。季氏想讨伐颛臾国,因此孔子讥讽他。

炎帝的后氏,四岳伯夷,是尧时掌管制度礼仪的官,决断民事独用刑罚,因以分封于申、吕。他的后代生下吕尚,做了周文王的老师,武王克商之后被分封于齐,有的被分封于许、向,有的被分封于纪,有的被分封于申。申城在南阳宛北序山之下,所以《诗》:“申伯为卿士勤勉,王使申伯继其事,往修都邑在谢地,把南方来统治。”宛县的西面三十里有吕城。许地在颍川,就是如今的许县。姜戎居住在伊水、洛水之间,晋惠公将姜戎迁徙到陆浑。州、薄、甘、戏、露、怡,以及齐国的国氏、高氏、襄氏、隰氏、士氏、强氏、东郭氏、雍门氏、子雅氏、子尾氏、子襄氏、子渊氏、子乾氏、公旗氏、翰公氏、贺氏、卢氏,都是姜姓。

黄帝的儿子二十五人,分别为十二:姬、酉、祁、己、滕、葳、任、苟、厘、姁、嫫、依氏。当春秋之时,晋国有祁奚,因为能推举自己的儿子和推荐仇人,以忠诚正直著名。莒子姓己氏。夏代的兴起,有奚仲为夏朝

管理车子的官,因此封于薛,后来迁徙到邳,他的后代仲虺就居于薛地,做商汤的左相。王季的妻子大任,以及谢、章、吕、采、祝、结、泉、毕、过、狂大氏,都是任姓。姁氏女为后稷正妻,繁衍生育了周朝的祖先姜嫄。结氏分封于燕,郑文公有一贱妾叫燕姁,梦见神给自己一枝兰花,说:“我是伯儵,我是你的祖先。因此兰花在全国为第一香,人们就会像喜爱兰花一样喜爱你。”到了文公见到燕姁,给她一枝兰花而让燕姁陪他侍寝。燕姁和文公说她所做的梦,并说:“妾不才,侥幸怀有孩子,别人要不相信,敢用兰花做为征信吗?”文公说:“好。”于是生下郑穆公。姁氏的分别,有阚、尹、蔡、光、鲁、雍、断、密须氏。到了汉朝,河东有郅都,汝南有郅恽,姓的声音与古姁字相同,而书写其字就不同了,他二人都著名于世。

少皞氏的衰弱,而九黎族变乱其德政,颛顼接受帝位以后,就命令南正重掌管天而留意于神,命令火正黎掌管地而留意于百姓,使它恢复原来的状况,不要互相侵犯轻慢,这就叫“绝地通天”。黎,是颛顼的后代吴回。做高辛氏管火的官,使天地之德大放光明,光照天下,因此叫“祝融”。后来三苗又恢复九黎的德行,尧继承重、黎以后不忘过去的事,让羲伯又再加以治理。所以重黎氏世代掌管天地,以重黎氏分出的主支,已经三代,而分封于程地。他的支系在周代时,做周宣王大司马的官,《诗》赞美“宣王对尹吉甫说,分封程伯休父”。他的后代失去了职守,到晋国做司马的官,汉代的司马迁自称是他的后代。

祝融的子孙,分别为八姓:己、董、彭、姜、坛、曹、斟、牟。己姓的后代有皋繇国国君叔安,他的后代子孙叫董父,实在很喜欢龙的,他能了解龙的嗜好要求来饲养龙,所以许多龙都归附他。于是就服饲养龙,用来服事帝舜。帝舜赐给他姓叫董,氏叫豢龙,封他于豢川,豢夷、彭姓豕韦,都是能驯服龙的。豢龙逢用忠言劝谏夏桀,夏桀把

他杀了。凡是因为祝融的子孙,己姓的分别,有昆吾、苏、扈、温、董。

秃姓媿夷、蒙龙,而夏朝把它灭亡了。彭姓彭祖、豕韦、诸稽,而商朝把它灭亡了。姜姓会人,而周朝把它灭亡了。

妘姓的后代封于郾、会、路、逼阳。郾国国君会仲娶仲任为妻,贪图财利吝啬,轻视贤才怠慢能人,因此而使国家灭亡。会国在黄河、伊水之间,会国的国君骄横贪婪吝啬,减少爵位丧失俸禄,群臣因地位低下而责备,上下都不能治理。诗人忧虑它,所以作了《羔裘》的诗,怜悯而而悲伤他《匪风》,希望君主先实施教化。会仲不觉悟,重氏讨伐他,上下不能相互使用,禁罚之令不能实行,于是被灭亡。路子婴儿,聚晋成公的姐姐为夫人,酆舒执政后杀了她。晋国的伯宗一怒之下,于是讨伐灭掉路国。晋国的荀跣、士会率兵伐灭逼阳。曹姓封于邾,邾是颜氏的一支,又别为小邾,都被楚国所灭。

牟姓的后代熊绎,周成王封他于楚,因此称为粥熊,又称粥子。熊绎生有儿子四人,伯霜、伯雪、叔熊、季紃。紃的后代为荆子,有的封于夔,有的封于越。夔子不祭祀祝融、粥熊,楚国讨伐灭掉了它。楚国的同族有楚季氏、列宗氏、斗强氏、良臣氏、斗耆氏、侯氏、季融氏、仲熊氏、子季氏、阳氏、无钩氏、蔦氏、善氏、昭氏、景氏、严氏、婴齐氏、来氏、来纣氏、即氏、申氏、钧氏、沈氏、贺氏、箴氏、吉白氏、伍氏、沈穢氏、余推氏、公建氏、子南氏、子庚氏、子午氏、子西氏、王孙、田公氏、舒坚氏、鲁阳氏、黑肱氏,都是牟姓。

楚季这个人,是王子敖的曾孙子。蚩冒生下蔦章这个人,就是王子无钩。令尹孙叔敖这个人,是蔦章的儿子。左司马沈尹戌这个人,是楚庄王的曾孙子。叶公诸梁这个人,是沈尹戌的第三子。楚国大夫申无畏这个人,又姓文氏。

起初,殷纣王时,有苏氏以妣己送给纣

有宠,而把殷朝灭亡。周武王时,有苏忿生做了周朝主管刑狱诘盗的司寇官而封于温。后来洛阳有苏秦。

在高阳氏的时候,有才子八人,苍舒、隤凯、擣戴、大临、龙降、庭坚、仲容、叔达,天下的人称赞他们是八凯。

高阳氏的后代有皋陶,服事于舜。舜说:“皋陶!蚩尤作乱,延及蛮夷中原各地,到处是寇贼犯法抢掠,你做掌刑狱的官。”他的儿子伯翳,能选择各种东西以辅佐舜、禹,能调驯鸟兽,舜赐给他姓嬴。

后来有仲衍,人的面孔口像鸟嘴,为殷帝大戊驾御车子。他的后代到了费仲时,生下恶来、季胜。周武王讨伐殷纣王时,一并把恶来也杀了。

季胜的后代有造父,因擅长驾御车马而服事周穆王。周穆王游西海留恋忘归,于是徐偃王作乱反叛周朝,造父驾御车马,日行千里,以征伐徐偃王。周穆王封造父于赵城,因此以为赵氏。他的后代失去其职守,到了赵夙,做了晋国的卿大夫,传到十一代而成为诸侯,又过了五代而是赵武灵王,又过了五代被秦国所灭亡。恭叔氏、邯郸氏、訾辱氏、婴齐氏、楼季氏、卢氏、原氏,都是赵嬴姓。

恶来的后代有非子,因为擅长畜牧,周孝王把他封到秦地,世地理以为西陲大夫,汧秦亭是他的封地,后来就列于诸侯,二十五代而称王,称王后的第六代而秦始皇生于邯郸,因此叫赵政。至于梁、葛、江、黄、徐、莒、蓼、六、英等国,都是皋陶的后代。钟离、运掩、菟裘、将梁、修鱼、白冥、飞廉、密如、东灌、良、时、白、巴、公巴公巴、剡、复、蒲,都是嬴姓。

帝尧的后代是陶唐氏。他的后代有刘累,能饲养龙,孔甲赐给他姓为御龙,用他代替豕韦的后代。到了周朝为唐杜氏。周室衰弱后,有隰叔子为躲避周朝祸难而逃到晋国,生下儿子舆,做掌刑狱的官,因公正于朝廷,朝中没有闲官,因此氏为士氏,又做掌管土木工程的司空官,因正直于国

中,使国家的事业不败坏,因此氏司空,食封于随,因此氏随氏。士蔦的孙子士会,辅佐晋文公、晋襄公,对诸侯没有二心,做执掌军军的卿官,以辅佐晋成公、晋景公,使军队的政务没有败坏,做景公军队的元帅,居傅位,端正刑法,聚集解释常法,使国家没有奸民,晋国的盗贼逃奔到了秦国。于是晋侯请求周王给他加礼服,周王命令随会做周朝卿士,因此受封于范,死后加谥号为武子。随会的儿子随文,达成晋、楚结盟,和同兄弟之国,使兄弟之国没有裂缝,因此受封于郇、栢。由此帝尧的后代,有陶唐氏、刘氏、御龙氏、唐杜氏、隰氏、士氏、季氏、司空氏、随氏、范氏、郇氏、栢氏、彘氏、冀氏、穀氏、薳氏、扰氏、狸氏、傅氏。楚令尹屈原曾问范武子的仁德于赵武,赵武对他说:“他老人家家族中的事情治理得很好,在晋国的言论,竭尽忠诚没有私心。他的祝史祭祀,向鬼神陈述情况真实内心无愧。他家中没有可猜疑的事情,他的祝史也不向鬼神祈求。”屈原回到楚国,把这些话告诉给康王,康王说:“神和人没有怨恨,他老人家辅佐五位君主,使晋国成为诸侯的首领。”因此刘氏从陶唐氏以下到汉朝以上,仁德显著于世,都不如范会最兴盛了。这也是他有修养自己安定别人的功劳了。武王灭掉商朝,而封帝尧的后代于祝。

帝舜姓虞,又姓姚,居于妫地。周武王灭掉商朝,而封妫满于陈地,他就是胡公。陈国的袁氏、咸氏、召氏、庆氏、夏氏、宗氏、来氏、仪氏、司徒氏、司城氏,都是妫姓。

陈厉公的后生陈完逃奔到齐国,齐桓公很高兴,让他做了主管百工的工正的官。他的子孙大得民心,到他的九世孙陈和时,便夺取了齐国国君的权力,到陈和的孙子便称齐威王,又过了五代而齐国灭亡。齐国人把陈氏也称为田氏。汉高祖刘邦将各田氏迁徙到关中,而有第一到第八氏。丞相田千秋、司直田仁,以及杜阳田先、碭田先,都是陈氏的后代。汉武帝赏赐给田千秋小车入殿,所以为世人称车丞相。到了

王莽他自称是田安的后代,田安失国后,齐人称之为王家,莽因王家的缘故而更姓王。王莽以此进行欺詐,而事实上则有田常的风度。田敬仲的分支,有皮氏、占氏、沮氏、与氏、猷氏、子宋氏、鞅氏、梧氏、坊氏、高氏、芒氏、禽氏。

商代帝乙的长子微子开,是殷纣王的旁支哥哥。周武王把他封到宋地,就是今天的睢阳。宋国的孔氏、祝其氏、韩献氏、李老氏、老男氏、华季老氏、事父氏、皇甫氏、华氏、鱼氏、而乡氏、艾氏、雍氏、鵠夷氏、中野氏、楚牟氏、完氏、怀氏、不第氏、冀氏、牛氏、司城氏、罔氏、近氏、止氏、朝氏、勃氏、右师氏、三伋氏、王夫氏、宣氏、征氏、郑氏、目夷氏、鳞氏、臧氏、虺氏、沙氏、黑氏、围龟氏、既氏、获氏、砖氏、己氏、成氏、边氏、戎氏、买氏、尾氏、桓氏、戴氏、向氏、司马氏,都是子姓。

宋闵公的儿子弗父何生下宋父,宋父生下世子,世子生下正考父,正考父生下孔父嘉,孔父嘉生下儿子木金父,木金父降为士,所以说灭亡于宋国。木金父生下祁父,祁父生下防叔,防叔被华氏所逼迫,出逃到鲁国,做防邑大夫,所以称为防叔。防叔生下伯夏,伯夏生下叔梁纥,做鄆邑大夫,因此称鄆叔纥,鄆叔纥生下孔子。

周灵王的太子晋,从幼小时就有盛大的仁德,聪敏通达,温和恭敬敦厚奋勉。谷水和洛水相互冲击,将毁坏周朝宫室,周灵王要堵塞它。太子晋劝谏他,因为不顺从天的心思,不如修养政治。晋平公派叔誉朝聘于周,看到太子晋,与他谈话,五次赞许,三次追问,迟疑不决而退,叔誉回到晋国告诉晋平公说:“太子晋已经历十五岁了,而臣不能和他谈话,你请安排罢。”晋平公就派师旷去见太子晋。太子晋和他谈话,师旷佩服他的仁德,深相结纳。就问师旷说:“我听说太师能知道人寿的长短。”师旷回答说:“你的面色红白,你的声音清大,赤色不长寿。”太子晋说:“是这样。我后来三年内将死亡于天帝,你谨慎不要言

语,不然灾祸将殃及你自身。”从此以后三年太子晋死。孔子听说后说:“可惜呀!杀我君主。”当时因为他预先知道自己的死期,所以都传称王子乔升仙了。升仙之后,他的后代为逃避周朝祸难到了晋国,居住在平阳,因此姓王氏。后来他的子孙世代都喜好修身养性成仙的方术。

鲁国的同族,有螭氏、后氏、众氏、臧氏、施氏、孟氏、仲孙氏、子服氏、公山氏、南宫氏、叔孙氏、叔仲氏、子我氏、子士氏、季氏、公鉏氏、公巫氏、公之氏、子革氏、华氏、子言氏、子拘氏、子雅氏、子阳氏、东门氏、公析氏、公石氏、叔氏、子家氏、荣氏、展氏、乙氏,都是鲁国的姬姓。

卫国的同族,有石氏、世叔氏、孙氏、宁氏、子齐氏、司徒氏、公文氏、析龟氏、公叔氏、宫南氏、公上氏、公孟氏、将军氏、子强氏、强梁氏、卷氏、会雅氏、孔氏、赵阳氏、田章氏、孤氏、王孙氏、史龟氏、羌师氏、羌宪氏、邃氏,都是卫国的姬姓。

晋国的同族郤氏,又别为吕氏,郤芮又从他所封的封邑冀为冀氏,他的后代有却吕錡,号驹伯。却犇的食邑在苦地,因号苦成叔,却至食邑在温地,号叫温季,各自为姓。郤氏的别支,有州氏、祁氏。州伯宗因为正直被杀,他的儿子州犁逃奔到了楚国,又因郤宛正直而和气,因此被子常所嫉妒,被子常所杀害。他的儿子郤□逃到吴国做太宰的官,苦于祖宗父亲之行仍正直遭祸,就被阿谀奉迎的人所陷害而死于吴。凡郤氏的别支,有冀氏、吕氏、苦成氏、温氏、伯氏、靖侯宜臼的孙子栾宾,以及富氏、游氏、贾氏、狐氏、羊舌氏、季夙氏、籍氏,以及晋襄公的子孙□,都是晋国的姬姓。

晋穆侯生下桓叔,桓叔生下韩万,做了晋国的大夫,传了十代而是韩武子,又传了八代而为韩惠王,又传了五世被秦国所灭亡。韩襄王的庶孙韩信,一般的人称他韩信都。汉高祖刘邦认为韩信是韩王的孙子,就用他做了韩王,后迁徙到代地称王,被匈奴所进攻,自己投降了匈奴。汉朝派

遣柴将军进攻韩信,把韩信杀死于参合。韩信的妻子逃到匈奴那里。到文帝时,韩信的兒子頹当及他的孙子韩赤前来投降,汉朝封頹当为弓高侯,韩赤为襄城侯。到了韩嫣时,汉武帝任命他做了侍中,富贵宠幸不能和他相比。案道侯韩说,前将军韩曾,都显名于汉朝。他们的子孙各随所事的皇帝迁居于陵阳、茂陵、杜。至于汉阳、金城等地的韩姓,都是他们的后代。韩王信的子孫余留在匈奴的人,也常处在掌权宠贵的地位,成为贵臣。至于留侯张良,是韩国同族姬姓。秦始皇灭掉韩国,张良的弟弟死后没有埋葬,就散发家资财达千万,为韩国报仇,袭击秦始皇于博浪沙中,铁锥误中秦始皇的副车。秦始皇索求贼人很紧急,张良就改变姓张,藏匿于下邳,遇到神人黄石公,遗留给他兵法书籍。到沛公刘邦起义反秦时,张良就前往归属他。刘邦派他和韩信去占领韩国的旧地,立横阳君成为韩王,而任命张良为韩信都。信都,就是司徒。民间声音不正,说信都,或说申徒,或说胜屠,但其根本只有一个司徒。后来作传的人不知“信都”是什么原因,勉强妄自生意,认为这就是代王为信都。凡是桓叔的后代,有韩言氏、韩婴氏、褐余氏、公族氏、张氏,这些都是韩国的后代姬姓。过去周宣王时也有韩侯,他的封国地方接近于燕国,所以《诗》说:“真大呀那韩城,平安时民众所筑成。”后来朝鲜亦姓韩,被魏满所讨伐,迁居到海中。

毕公高是周文王的儿子,分封于毕地,因此以毕为姓。周公死后,毕公高继承了周公的职位。他后来的子孙失去职守,成了一般百姓。到毕万时曾辅佐晋献公,献公十六年派赵夙统率军队,毕万为兵车的右卫,鲁闵公元年因灭掉耿国和魏国将魏国赏赐给毕万,魏国就是今天的河北县。魏颖又姓令狐。从毕万以后至九代为魏文侯。魏文侯孙魏碭为魏惠王,后来过了五代魏国灭亡。毕阳的孙子豫让,服事于智伯,智伯以全国最杰出的人物对待他,豫让

也以知遇之恩来报答智伯,天下的人记住他的侠义之心。魏氏、令狐氏、不雨氏、叶大夫氏、伯夏氏、魏强氏、豫氏,都是毕氏,本来是姬姓。

周厉王的儿子姬友分封于郑。郑恭叔的后代为公文父。轩氏、驷氏、丰氏、游氏、国氏、然氏、孔氏、羽氏、良氏、大季氏。这十族的祖先,都是穆公的后代,各以字为姓。至于伯有氏、马师氏、褚师氏,都是郑国的姬姓。

太伯做了吴国国君,穿着礼服,推行周礼。仲雍继承他,剪断头发身上刺着花纹,裸体作为装饰。周武王灭掉商朝,分封他的后代于吴国,令大封赐于北吴。季札居住在延州来,因此号称延陵季子。阖闾的弟弟夫概王逃奔到楚国的堂溪,因此以为堂溪氏。这些都是姬姓。

郑国的大夫有叫冯简子的,后来韩国有冯亭,做上党郡守,嫁祸于赵国,因此遭致长平的变故。秦国有将军冯劫,和李斯都被杀害。汉朝兴起后,有冯唐和汉文帝一起议论使用将帅的道理。后来又有冯奉世,是上党人,他达到将军的地位,他的女儿做了汉元帝的昭仪,因此他家居在京城。他的曾孙冯衍,字敬通,忠于学习敬重义气,众儒生称他叫“德行谐和冯敬通”,著书数十篇,汉章帝爱好敬重他的文章。

晋国大夫郇息服事晋献公,他的后代荀林父曾统帅过中军,因此姓中行氏,食邑在智这个地方,所以姓智。智果劝谏智伯而没有被智伯接受,就从智族中分出属于太史为辅氏。

晋国大夫孙伯□掌管晋国典籍,因此当了晋国执政大臣,所以姓籍氏。周大夫辛有第二个儿子董来到晋国做大史,籍□和他共同掌管典籍,因此有董姓。

《诗》歌颂周宣王,才开始有“张仲孝悌友好”之称,到了春秋时期,宋国有张弋。只有晋国的张侯、张老,才是大家。张孟谈辅佐赵襄子以攻智伯,于是为了逃避功劳赏赐,就耕种于负山。后来魏国有张仪、张

丑。到了汉朝,张姓增加很多。常山王张耳,是梁地人。丞相张苍,是阳武人。东阳侯张相如。御史大夫张汤,曾增加制定律令,以防止奸邪,有利于百姓,又喜好推荐贤达的士人,所以享受福运。他的儿子张安世任车骑将军,封为富平侯,敦厚仁德检朴节约,疏远权力而喜好暗中帮助别人,所以子孙昌盛,世有贤明的后代,后来遭受王莽的乱政,张安世的第五代孙张纯还更封为始武侯,享受封国不绝,张家共有四公,世代都显名于忠孝行义。洛阳有丞相张禹,御史大夫张忠;长安有太尉张酺,是汝南人,太傅张禹,是赵国人。司隶部所属的邑和闾里,没有不姓张的。河东郡解邑有东张城,西张城,难道是晋国张姓祖先所出生的地方吗?

偃姓有舒庸、舒鸠、舒龙、舒共、舒鲍、酈、繇、蓼、会、六、皖、裴、鬲等国,滕姓有樊、尹、骆,曼姓有酈,归姓有胡、洧、何,箴姓有滑、济,拘姓有栖、疏,御姓有署、番、汤,嬖姓有饶、穰、谷,隗姓,有赤狄、姁姓有白狄,这些都是上古的姓氏。

齐国有鲍叔,后代为卿大夫。晋国有鲍癸。汉代有鲍宣,屡世忠直,为汉代名臣。汉代的酈生曾是刘邦的使者,他的弟弟酈商为将军,如今高阳的各酈姓都成了大姓。过去仲山甫也姓樊,死后谥号为穆仲,封地于南阳。南阳,在今河内郡。后代有樊顷子。曼姓分封于邓,后代因此而为邓姓。南阳邓县上蔡北有古时邓城,新蔡北有古时邓城。春秋时期,楚文王十二年灭掉邓国。到汉朝时候有邓通、邓广汉。东汉有新野邓禹,因辅佐光武帝据有首功,封为高密侯。他的孙女邓太后本性仁慈严明,约束各邓氏不得擅权,京师为之清静,就像没有贵戚一样,勤奋思考忧虑百姓,昼夜不敢怠慢,因此遭受羌兵叛乱,大的水灾使百姓饥馑困乏,而邓太后能加以恢复,整顿平定之后使庄稼获得丰收。邓太后死后,成群的邪恶之人竞相弹劾,加以谗毁,破坏邓氏的名誉,天下的人为她悲伤。鲁

昭公的母亲家姓归氏。汉代有隗嚣、季孟。桓就是大戎氏,他的祖先本出于黄帝。

至于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陶氏、繁氏、骑氏、饥氏、樊氏、施氏,都是殷民旧姓。汉朝兴起以后,相国萧何封为酈侯,本来是沛县人,如今长陵萧氏是他的后代。前将军萧望之,东海、杜陵萧氏是他的后代。御史大夫有繁延寿,是南郡襄阳人,杜陵、新丰繁氏是他的后代。

周氏、邵氏、毕氏、荣氏、单氏、尹氏、刘氏、富氏、巩氏、苕氏,这些都是周朝时候公卿之家。周、召,是周公、召公的妾所生的儿子,食周公、召公的封邑,因此成为周朝的官吏,所以世代有周公、召公不绝。尹,本来是官职名称,和宋国有太宰,楚国有令尹、左尹一样。尹吉甫辅佐周宣王有显著的功绩,《诗》说:“尹氏做太师的官,你是国家的柱石”。襄公、顷公、靖公、单穆公,世代都有明德,有仅次于德才高超的、上圣的才能,所以晋国的叔向赞美他们的后代必定繁衍昌盛。

苦城,是城的名字,在盐池东北。后来的人书写或作“枯”;齐地的人听其音,就

书写它叫“库成”;敦煌人看见其字,呼它叫“车成”;而在汉阳的人,不喜欢“枯”、“苦”这字,就又书写它叫“古成氏”。堂谿,本来是溪谷的名字,在汝南郡吴房境内。禹的儿子启。本来是启开的启。前人书写堂谿误作“启”字,后人避汉景帝之讳,又加以改变,就又写作“开”字。古代的漆雕开、公冶长,前人书写“雕”字为了简易,减少成“周”字,书写“冶”字又误写作“盅”字,后来的人又转写为“古”字,或者又分为古氏、成氏、堂氏、开氏、公氏、冶氏、漆氏、周氏。这数种姓氏,都是本同末异。凡是姓的离合变分,固然多属这一类,可以看到一般情况,难于都记载在这里。

《易》说:“君子分析物类,辨明情状”,“广泛的了解古人的嘉言善行,来培养自己的德行”;“君子通过学习来积累知识,通过诂疑来辨明是非”。所以简略的观看世间的记载,采集经书,依照封地,以及有明确记载,用来赞明贤圣的后代,分别姓氏种类的宗祖,论述姓氏的出处,叙述这两篇的喻意,用来遗留给后来的贤人参考罢了。

潜夫论第十卷

叙录第三十六

夫生于当世,贵能成大功,太上有立德,其下有立言。闾茸而不才,先器能当官,未尝服斯役,无所效其勋。中心时有感,援笔纪数文,字以缀愚情,财令不忽忘。刍蕘虽微陋,先圣亦咨询。草创叙先贤,三十六篇,以继前训,左丘明《五经》。

先圣遗业,莫大教训。博学多识,疑则思问。智明所成,德义所建。夫子好学,海人不倦。故叙《赞学》第一。

凡士之学,贵本贱末。大人不华,君子务实。礼虽媒绍,必载于贄。时俗趋末,惧毁术,故叙《务本》第二。

人皆智德,苦为利昏。行污求荣,戴盆望天。为仁不富,为富不仁。将修德行,必慎其原。故叙《遏利》第三。

世不识论,以士卒化,弗问志行,官爵是纪。不义富贵,仲尼所耻。伤俗陵迟,遂远圣述。故叙《论荣》第四。

惟贤所苦,察妒所患,皆嫉过己,以为深怨。或因类衅,或空造端。痛君不察,而信谗言。故叙《贤难》第五。

原明所起,述暗所生,拒谏所败,祸乱所成。当涂之人,咸欲专君,壅蔽贤士,以擅主权。故叙《明暗》第六。

上览先王,所以致太平,考绩黜陟,著在《五经》。罚赏之实,不以虚名。明豫德音,焉问扬庭。故叙《考绩》第七。

人君选士,咸求贤能。群司贡荐,竞进下材。憎是掎克,何官能治?买药得贗,难以为医。故叙《思贤》第八。

原本天人,参连相因,致和平机,述在于君,奉法选贤,国自我身。奸门窃位,将谁督察?故叙《本政》第九。

览观古今,爰暨书传,君皆欲治,臣恒乐乱。忠佞混淆,各以类进,常苦不明,而信奸论。故叙《潜叹》第十。

夫位以德兴,德贵忠立,社稷所赖,安危是系。非夫说直贞亮,仁慈惠和,事君如天,视民如子,则莫保爵位,而全令名。故叙《忠贵》第十一。

先王理财,禁民为非。《洪范》忧民,《诗》刺末资。浮伪者众,本农必衰。节以制度,如何弗议?故叙《浮侈》第十二。

积微伤行,怀安败名,明莫恣欲,而无悛容。足以愎谏,闻善不从。微安召辱,终必有凶。故叙《慎微》第十三。

明主思良,劳精贤知。百僚阿党,不核真伪,苟崇虚誉,以相诋曜,居官任职,则无功效。故叙《实贡》第十四。

圣人养贤,以及万民。先王之制,皆足代耕。增爵损禄,必程以顷。先益吏俸,乃可致平。故叙《班禄》第十五。

君忧臣劳,古今通义。上思治平,下易竭惠。贞良信士,咸痛数赦。奸宄繁兴,但以赦故。乃叙《述赦》第十六。

先王御世,兼秉威德,赏有建侯,罚有刑渥。赏重禁严,臣乃敬职。将修太平,必循此法。故叙《三式》第十七。

民为国基,谷为民命。日力不暇,谷何为盛?公卿师尹,卒劳百姓。轻夺民时,诚可愤诤!故叙《爱日》第十八。

观吏所治,斗讼居多。原祸所起,诈欺所为。将绝其末,必塞其原。民无欺诒,世乃平安。故叙《断讼》第十九。

五帝三王,优劣有情。虽欲超皇。当先治平。必世后仁,仲尼之经。遭衰奸牧,

得不刑？故叙《衰制》第二十。

圣王忧勤，选练将帅，授以铁钺，假以权贵。诚多蔽暗，不识变势，赏罚不明，安得不败？故叙《劝将》第二十一。

蛮夷猾夏，古今所患。尧、舜忧民，皋陶御叛，宣王中兴，南仲征边。今民日死，如何不蕃？故叙《救边》第二十二。

凡民之情，与君殊戾，不能远虑，各取一制，苟挟私议，以为国计。宜寻其言，以诘所谓。故叙《边议》第二十三。

边既远门，太守擅权。台阁不察，信其奸言，令坏郡县，殴民内迁。今又丘荒，虑必生心。故叙《实边》第二十四。

天生神物，圣人则之。蓍龟卜筮，以定嫌疑。俗工浅源，莫尽其才。自大非贤，何足信哉？故叙《卜列》第二十五。

《易》有史巫，《诗》有工祝。圣人先成，民后致力。兆黎劝乐，神乃受福。孔子不祈，以明在德。故叙《巫列》第二十六。

五行八卦，阴阳所生，稟气醇厚，以著其形。天题厥象，人实奉成。弗修其行，福祿不臻。故叙《相列》第二十七。

《诗》称吉梦，书传亦多，观察行事，占验不虚。福从善来，祸由德痛，吉凶之应，与行相须。故叙《梦列》第二十八。

论难横发，令道不通。后进疑惑，不知所从。自昔庚子，而有责云。予岂好辩？将以明真。故叙《释难》第二十九。

朋友之际，义存六纪，摄以威仪，讲习王道，善其久要，贵贱不改。今民迁久，莫之能奉。故叙《交际》第三十。

君有美称，臣有令名，二人同心，所愿乃成。宝权神术，勿示下情，治势一定，终莫能倾。故叙《明忠》第三十一。

人人情通，气感相和，善恶相征，异端变化。圣人运之，若御舟车，作民精神，莫能含嘉。故叙《本训》第三十二。

明王统治，莫大身化，道德为本，仁义为佐。思心顺政，责民务广，四海治焉，何有消长？故叙《德化》第三十三。

上观大古，五行之运，咨之《诗》《书》，

考之前训。气终度尽，后代复进。虽未必正，可依传问。故叙《五德志》第三十四。

君子多识，前言往行。类族变物，古有斯姓。博见同□□□□□□□□□□□□□□。故叙《志氏姓》第三十五。

【译文】

人生于当世，可贵之处能成就大的功劳，最高的是树立德行，其次是树立言论。我地位卑贱而没有才能，没有才能能当官，未曾服卑贱之役，不能报效自己功劳。心中时有感触，拿笔记下数篇文章，用文字拼合自己的愚昧情感，才令我没有忘记。草野之人虽然浅陋，前代圣人也要咨询于他。开始叙述前代圣贤，共三十六篇，以继承前人训导，左丘明《五经》。

前代圣人所遗留的业绩，没有比教导训诲再大了。要有广博的学问和知识，有怀疑的地方就思考提出问题。聪敏明达就能成功，仁德道义就能建立。孔子好学，教导别人永不疲倦。所以叙述《赞学》第一篇。

凡是士人的治学，要贵本贱末。大人治学不务华丽的外表，君子治学重视实质。学礼虽然要引导继承，但必须再送礼物，以示诚意。而时俗趋向末利，惧怕败坏圣人的策略。因此叙述《务本》第二篇。

人都有智慧德行，苦于被私利所冲昏头脑。行为污秽去求取荣耀，戴着盆去仰望天。要仁爱便不能发财致富，要发财致富的人就便不能仁德。将修养自己的德行，必须慎重对待其本源。因此叙述《遏利》第三篇。

世俗之人没有见识主张，以为士应当以族论位，不问他的志向德行，以官爵为根本。不行仁义而富贵的，为孔子所耻辱。伤风败俗世道衰败，于是疏远圣人的原则。因此叙述《论荣》第四篇。

凡是想贤才的忧苦，考察妒嫉的危害，都嫉妒过自己，以结为深怨。有的因为有

可乘的机,有的凭空制造事端。痛恨君主不能明察,而听信谗言。因此叙述《贤难》第五篇。

推究圣明所以能兴起,追寻昏暗所以能产生,拒绝纳谏所以导致失败,祸乱所以形成的原因。当权的人,都想专擅君主,堵塞蒙蔽贤士,用来专擅主上的权力。因此叙述《明暗》第六篇。

上观前代圣王,所以能达到清平,在于考核臣下的功绩而进行罢免或升迁,要明显于《五经》。赏罚要实事求是,不图虚名。宣扬自己的好声誉,于是大公无私。因此叙述《考绩》第七篇。

君主选拔士人,都索求贤能之士。百官推荐士人,竟然进献下等才能的人。憎恨搜括百姓的人,什么官吏能治理?买药得到的是伪劣假冒产品,很难医治病人。因此叙述《思贤》第八篇。

根源在于天人相应,连贯相通,才能达到天下和政教平,权术的运用在君主,尊奉法规选取贤才,是国家的根本。奸人之类窃取权位,用谁来督察他们?因此叙述《本政》第九篇。

博览通观古今,至于书传所载,君主都想治理好国家。而臣下则乐于变乱。忠诚和奸佞的人互相混杂,各以其族类而进,君主苦于不明,而听信邪言。因此叙述《潜叹》第十篇。

地位因仁德而兴,仁德贵在忠诚的建树,国家所以依赖,安危所关涉的事。除非是正直贞洁,仁慈柔和,服事君主像服事天一样,看待百姓像自己的儿子一样,就不能保持他的爵位,而保全他的名声。因此叙述《忠贵》第十一篇。

前代圣王整理财政,禁止百姓为非作歹。《洪范》忧虑百姓,《诗》讽刺末利资财。浮华奢侈伪饰的人多了,农业这个根本就必然衰败。调节其制度,为什么不使他们非议呢?因此叙述《浮侈》第十二篇。

积累微小的缺点必然伤害自己的德行,贪恋享乐必然要败坏自己的名声,长期

策划放纵情欲,而毫无悔改的表现。甚至达到不接受劝谏,听到善言而不顺从。微小的享乐就会招来侮辱,最终必然凶险。因此叙述《慎微》第十三篇。

英明的君主思念良臣,劳神苦思索求贤智之人。百官朋党阿私,不仔细查考真伪,苟且崇尚虚伪的声誉,以互相欺骗夸耀,居官任职,而没有功效。因此叙述《实贡》第十四篇。

圣人养育贤人,以及老百姓。前代圣王的制度,官员的俸禄都是农夫代耕而供给的,增加爵位减少俸禄,必倾向于官吏。先增加官吏的俸禄,才可以达到政治清平。因此叙述《班禄》第十五篇。

君主有患难臣下要忧虑,这是古今普通的道理。君主想达到政治清平,臣下应竭其智慧。正直善良诚信之士,都痛恨多次赦免罪犯。因此邪恶犯法的人繁兴,都是因为赦免的缘故。因此叙述《述赦》第十六篇。

前代圣王治理当世,兼用威仪和仁德,赏赐有设立封侯的制度,处罚有重刑。重赏严禁,臣下才恭敬其任职。想治理太平,必须遵循这种办法。因此叙述《三式》第十七篇。

百姓是国家的根本,五谷是百姓的命根。百姓徭役负担日不暇接,五谷怎么会茂盛呢?公卿大臣,终究劳苦百姓,轻易夺去百姓的农时,实在使人愤怒争讼!因此叙述《爱日》第十八篇。

观察官吏治理诉讼,争讼的人居大多数。这种灾祸所引起的根源,在于官吏欺诈所为。要断绝末利,必须堵塞其根源。百姓不受欺诈,世道才能平安。因此叙述《断讼》第十九篇。

五帝三王之称,是分别优劣情况的。虽想超过三皇,首先应当达到太平。一定需要三十年才能使仁政大行,这是孔子的经典之言。遇到衰世奸人掌权,能不使用刑法吗?因此叙述《衰制》第二十篇。

圣明的君主忧虑勤劳国事,选拔简练

将帅 ,授给他斧钺 ,给他以重权。诚然有许多人被昏暗所蒙蔽 ,不知变易形势 ,赏罚不明 ,怎么会不失败呢 ?因此叙述《劝将》第二十一篇。

蛮夷之人扰乱华夏 ,是古今的祸患。尧、舜忧愁百姓 ,皋陶抵御叛乱 ;宣王中兴周朝 ,南仲征伐边疆。如今百姓每天都有死亡 ,如何能屏藩边境呢 ?因此叙述《救边》第二十二篇。

凡百姓的性情 ,与君主相违背 ,不能从远处考虑 ,各取一种法式 ,苟且挟持利己的议论 ,作为国家的计策 ,应当根据他的言论 ,追问他所以要这样做。因此叙述《边议》第二十三篇。

边疆既然远离宫门 ,边郡太守专擅大权。尚书不能明察 ,相信他们的邪恶言论 ,让他们损坏边地郡县 ,殴打百姓向内地迁徙。如今边郡已成为荒废的丘墟 ,敌虏必产生侵扰之心。因此叙述《实边》第二十四篇。

天生的神物 ,圣人效法它。用蓍草占卜龟筮 ,以决定疑惑不解的事情。世俗工人浅陋愚昧 ,不能尽其才能 ,自然不是大贤 ,又凭什么相信呢 ?因此叙述《卜列》第二十五篇。

《易》中有占卜的祝史巫士 ,《诗》中有主持祭祀司仪的工祝。圣王先成就民事 ,然后致力于神灵。广大百姓才能勤于事乐于出力 ,神灵才能授予福运。孔子不祈祷神灵求福 ,用以显明福在于仁德。因此叙述《巫列》第二十六篇。

五行八卦 ,是阴阳二气所产生的 ,承受天地自然之气的薄和厚 ,而显其形状。天视其象 ,人才能奉顺其成象。不修养德行 ,福运不会来到。因此叙述《相列》第二十七篇。

《诗》称赞吉祥之梦 ,书传记载也很多 ,观察现象和行事 ,占卜的应验并不虚妄。福运从积善而来 ,灾祸是由于没有仁

德 ,吉凶的应验 ,与自己的行为相适应。因此叙述《梦列》第二十八篇。

论难横发议论 ,让原则不能通行。使后辈产生疑惑 ,不知所从。从过去的庚子 ,而有诘难的话 ,我怎能是好辩之人 ?是用它申明真理罢了。因此叙述《释难》第二十九篇。

朋友之间的交往 ,道义存在于父、兄、族人、诸舅、师长、朋友之中 ,讲习至高无上的道德 ,重要的是善于和朋长久相处 ,贵贱都不能改变这一原则。如今百姓散迁各地已久 ,不能长久相处了。因此叙述《交际》第三十篇。

君主要有美好的赞誉 ,臣子要有好的名声 ,君臣必须同心同德 ,愿望才能成功。君主要珍视自己的权力和神奇统治之术 ,不要把自己的情感显示于下面 ,治理的形势一旦成功 ,始终就不会倾斜。因此叙述《明忠》第三十一篇。

人和天的情感是相通的。气和感情是相互谐和的 ,善和恶是相互验证的 ,异端是可以变化的。圣人运用它 ,就像驾御舟车一样 ,振起百姓的精神 ,能不包含嘉音吗 ?因此叙述《本训》第三十二篇。

圣明的君主统治天下 ,莫大于修身教化 ,道德是根本 ,以仁义为辅佐。心思顺从政治 ,索取百姓务求宽容 ,天下的治理 ,为什么要有盛衰呢 ?因此叙述《德化》第三十三篇。

往上观察远古之时 ,五行的运行 ,可以咨询于《诗》《书》 ,考察于前代的遗训。气数虽然已尽 ,后代还会再进。虽说未必正确 ,可以依靠传闻。因此叙述《五德志》第三十四篇。

君子博学多识 ,以前的言论和过去的行为。察看氏族的变化 ,古代就有此姓。博见同□□□□□□□□□□□□(脱文如下 :祖 ,以赞贤圣。序此假意 ,待士揖损。)因此叙述《志氏姓》第三十五篇。